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9 772096 337230

2023/3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三年第三期(总第三十九期第七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一、参考主题

- (一)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 (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 (三) 统一战线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
- (四)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五) 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研究
- (六)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
- (七)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研究
- (八)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
- (九) 国际社会热点事件的统战视角研究
- (十) 统一战线(含各领域)研究述评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对参考主题范围内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作者向我刊投稿，视为同意将文稿的汇编权、发行权、翻译权、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网络出版及信息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授予我刊。

三、基本要求

对符合如下基本要求的稿件，我刊优先审稿，审稿通过后优先刊用。

(一) 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鲜明体现大统战视角。

(二) 立题。问题提出部分要有精到、深入的文献综述，能开门见山地指出本文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一般不少于10条。

(三) 结构。论证框架合理，论文一般应有一二级标题，结构有相当的系统性。各级标题能够明确表达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思路，内在逻辑严密。行文善于运用主题句、观点句。

(四) 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语法规则，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引文差错(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和参考文献著录信息)；无逻辑错误；坚持学术化表达和学理化阐释。

(五) 体例。论文须包含规范题目、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著录及作者有关信息。参照《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和我刊已出版论文体例进行撰写和排版。

(六) 篇幅。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宏富，优秀论文不限篇幅。

(七) 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不高于15%。请作者慎重投稿：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八) 审稿周期。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欢迎作者通过投稿邮箱直接向本刊编辑部咨询有关情况。联系电话：(023) 62874725。

(九) 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 关于我刊。微信公众号：tyzxxjy，全刊获取：<https://cqsy.net.cn/?Tongyi/Zhanxian/>。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 年第 3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 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 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 俊
李 捷 杨 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 俭 张 建 张献生
陈 纪 陈 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罗振建 相德宝 袁 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 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何晓栋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年第3期（总第39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7卷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01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及其团结奋斗逻辑 / 张艳娥
14 统一战线：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强大法宝 / 郭道久 郝若雯
25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统一战线视角
/ 冯霞 简智荣
36 形塑纵横交织的团结：统一战线价值新解 / 张淑娟 孙冉冉
46 统一战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与实践进路 / 杨可 刘宗灵

中华儿女大团结研究

- 57 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
/ 戴洁
70 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新实践：政党—人民关系视域下组建社会工作部考察 / 韩碧舟
85 统合治理与团结意蕴：组建社会工作部的逻辑理路探析
/ 赵亚楠 樊士博 徐敏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 95 修例风波以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方式、影响及趋势
/ 张建 涂钦云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中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数据库总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108 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斗争：逻辑、原则与策略 / 周光俊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 120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现实价值与实践路径
/ 高维 刘红丽
- 131 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建设助推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价值与路径
/ 罗妍 马丽琳
- 141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
/ 徐光木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 154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 / 郭永虎 于艳文
- 166 中美战略博弈下的美国对华人权制裁：法理批驳与中国因应
/ 李燕飙 许 妙
- 181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表现、后果及中国应对 / 尚海明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3 No.3(Sum No.39) Vol.7

- 01 The People's Standar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s Logic of Unity and Struggle Zhang Yan'e
- 14 The United Front:A Powerful Magic Weapon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Guo Daojiu&Hao Ruowen
- 25 An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Based on the United
Front Perspective Feng Xia&Jian Zhirong
- 36 Shaping Interwoven Unity: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United Front Zhang Shujuan&Sun Ranran
- 46 The United Front:the Genetic Background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Yang Ke&Liu Zongling
- 57 The Shaping of New Forms of Social Solidarity:Analysis on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Work Department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Systematization Dai Jie
- 70 The New Practice of Uni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Investigation on Establishing Social Work
Depar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people Relationship Han Bizhou
- 85 Integrated Governance and Solidarity Implication:An Analysis of the Logic of Establishing Social Work Department
Zhao Yanan&Fan Shibo&Xu Min
- 95 Britain's Intervention in Hong Kong's Affairs since the Amendment:Mode,Influence and Trend
Zhang Jian&Tu Qinyun
- 108 The Anti-Secession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ogic,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Zhou Guangjun
- 120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Prac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 of Unified Textbook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GaoWei&Liu Hongli
- 131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Unified Three-subject Textbooks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Value and Path Luo Yan&Ma Lilin
- 141 Tangible Sense Effectively Build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A Case Stud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Xu Guangmu
- 154 The U.S.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Evolution, Impact and China's Response
Guo Yonghu & Yu Yanwen
- 166 U.S.Human Rights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Under the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Criticism and China's Response Li Yanbiao&Xu Miao
- 181 Forced Labor in American Immigration Detention Centers: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and China's Response
Shang Haiming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及其团结奋斗逻辑

张艳娥

(西安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 团结奋斗话语为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中国式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实践形态和动力格局, 集中体现为人民本位上的团结奋斗。超大规模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时空境遇、化解“自由”与“秩序”张力的客观现实, 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建构起人民主体的力量动员与权利共享机制, 通过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来赢得自主现代化资格、推进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以及“政党主导—人民主体”的力量格局,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团结奋斗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结构依托。“团结奋斗”内在包含着党团结带领人民的主体层次、统一战线同心圆的场域层次、团结与斗争有机统一的方法层次。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逻辑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团结和联合最广泛的人民大众,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统一战线机制在形成团结奋斗格局中具有中心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对团结奋斗实践格局提出多方面的时代要求。团结奋斗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超越西方现代化奠定了根基动力,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由“外源型”向“内生型”的转变, 实现了对“中心国家”的“去依附”过程, 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案。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团结奋斗; 国家建设; 人民本位; 统一战线; 大团结

中图分类号: D261;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3-0001-13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3.001

作者简介: 张艳娥, 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副主任。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与逻辑经验”
(2022A015)

引用格式: 张艳娥.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及其团结奋斗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13.

党的二十大报告前所未有地强调了“团结奋斗”的重大时代价值。报告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要求“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1]。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人民本位。它是融“人民需求说的政策体系、人民主体说的力量体系、人民权利说的制度体系和人民满意说的评价体系”^[2]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形态，体现了现代化实践中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内在统一。人民本位的现代化新形态是为了人民的现代化，是依靠人民去奋斗的现代化，在实践格局上必然体现为“党—人民”的团结奋斗。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好人民本位、走好团结奋斗之路，也就守住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和魂。

近年来，“团结奋斗”话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学者从理论、历史、实践和世界意蕴四重视角对团结奋斗时代要求进行了分析^[3]。有的学者分析了团结奋斗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和时代要求^[4]。也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的叙事话语进行了理论解读^[5]。“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重要的规律性认识。整体把握这一重大论断的理论深蕴与历史逻辑，需要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中展开。团结奋斗实践格局何以生成？其实践机理何在？如何更好地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上团结奋斗的形势要求？这些重要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跟进。鉴于此，本文把对团结奋斗问题的分析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场域中，立足人民本位视角探讨其实践逻辑的生成依据、实践体系的结构依托与内在层次以及时代要求等问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实践逻辑的生成依据

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根本动力和内容的现代化首先发生于英美等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度转型，在全球范围迅速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推动着其他国家、民族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化浪潮之中。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有着与欧美先行国家截然不同的时空境遇，超大的规模、特殊的国情、后发外生的环境条件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国需要在统筹发展与秩序、民生与民主、发展成果共享与凝聚动员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做出创造性选择，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这些重大关系的有效调处，内在要求能有一个立足人民本位的先锋队政党广泛发动民众、团结带领民众通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来完成和推进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伟业。

（一）客观依据：超大规模后发国家现代化时空境遇的内在要求

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普遍通过全球范围的殖民掠夺完成自身资本原始积累，并借助于全球资源的共同支撑去实现工业化进程，其现代化模式是通过资本主义现代性形式展现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以一种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工业和科学力量，使自然、社会和人获得了极大发展和解放，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的物质力量，极大地释放了人的发展潜能。另一方面，资本本位的现代化又难以避免地造成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历史悖论和现实困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尖锐对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造

成工具理性控制人的主体精神, 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 贫富分化加剧, 社会公平正义缺位; 在国际关系上, 资本基于增值本质, “到处落户, 到处开发, 到处建立联系”^[6]⁴⁰⁴, 在全球性发展的同时, 更是造成世界性的战争冲突和不平等的加剧。

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后发国家, 中国是在西方长期掠夺造成的一穷二白的资源条件下开启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在有限的资源禀赋条件下, 中国没有也不可能照搬复制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种种先发优势, 满足超大规模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就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首要任务。西方列强的长期掠夺盘剥及商品经济冲击下小农经济的破产, 使近现代中国陷入了极度的社会贫困境地。“如何以有限的资源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既是推动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前提, 也是现代国家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基础。”^[7] 社会主义人民本位的现代化方案选择,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经由苏联国家建设的显著成就而引起先进中国人的广泛关注, 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陈独秀等都对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是由于西方国家的问题丛生使资本主义方案失去了原有的滤镜, 而且由于社会本位的国家建构方案与中国的民生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目睹普遍性的民生凋敝, 孙中山将民生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主张, 并将民生主义视同为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提出和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充分肯定和继承了孙中山的这些主张, 并将其付诸革命实践。“中国革命建国的指导思想是‘群众’的观念。……群众要求的不是抽象的人权, 而是社会、经济上的权利, 例如要土地, 要求男女平等。中国革命是从争取社会经济权利开始的, 进而要求政治权利, 要民主。”^[8] 民生问题的破解之道以及广泛发动和依靠民众力量、依托中央集权国家结构、保证国家集中有限资源、选择国家发展的优先次序, 都是以社会主义的人民本位现代化模式来承载的。可以说, 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 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其特定政治理念强加给国家的发展取向, 而是基于超大规模后发国家强化国家组织动员功能、赢得自主现代化资格、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客观需要。

（二）现实依据：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国家建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最重要的内容。建构一个具有明确发展导向, 能够有效动员社会大众, 整合分散的社会资源, 从根本上化解民族生存发展危机的强大国家, 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状态和中轴逻辑。后发国家面临的复杂时空境遇, 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实现民族和国家独立自主, 使得近代中国国家建构内在具有“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建构的双重任务。这双重使命内在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建构不仅要实现人民的自主与解放, 还要实现人民的团结与联合, 人民共和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选择。实现人民共和的根本在于实现人民主权, 即建立起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由人民来治理的现代国家。实现人民共和的关键在于使分散的人民凝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保持内在的团结统一。人民共和的国家建构观萌芽于辛亥革命之后, 其成熟的理论与成功实践则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实现了人民大众在主权和人权上的解放, 获得了自主和平等的发展, 成为国家主人。通过强大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组织整合、意识形态整合, 新中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 确立起具有高度动员力和政治权威力的国家秩序。

后发现代化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现实, 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人民本位的力量动员与权利共享来化解“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强大示范效应和显著社会动

员作用的影响下，能否实现相对均衡的现代化成果分享直接影响着后发国家社会局势的稳定和现代化进程。“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9]早发现代化国家的这种社会动员性借由全球化进程得到广泛迅速的扩大，使得任何一个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尽快缓解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都将会面临难以承受的社会动荡风险。阿尔蒙德和派伊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在全社会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荣誉的压力^[10]，是其国家政治体系最深层次的挑战。而后发国家面对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其实质“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刺激和强化着社会不满情绪，造成了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与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7]。中国避免这一普遍性挑战的路径选择是建构起真正由人民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守人民本位的价值立场，坚守人民中心理念，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11]，这样的发展会使我们“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11] 124}，“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1] 229}。

（三）历史依据：大一统国家现代性转型重塑的必然选择

不同的传统社会是在各自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下向现代国家转型与发展的。中国自秦汉以来逐渐成形的大一统国家在根本上是不同于西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辛亥革命后，传统帝国体系崩溃，“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将分散的局部整合为一个整体的问题，而是如何用新的体制以维持既有的整体和统一以免国家分裂与社会散乱”^[12]。所以，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建设内在是一个维持传统大一统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下的现代转型过程。“大一统是中国之轴，失去了大一统，中国也就失去了整体存续的基础与价值。”^[13]这种大一统模式所内蕴的合作型政治基因与和合型价值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实践形态的深层支撑。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王朝体系是由“君主+官僚体系+臣民”这三个支柱构成的，君主的最高权威及其所统帅的负责实际运作的庞大官僚机构、高度的中央集权与有限的地方分权的内在一统、汉民族主体地位与多民族的共生共存等都是其基本的构成要素。这些基本要素需要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得到保留和延续，唯其如此，才能在保证自身存在的同时应对内忧外患。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发酵酶”的注入，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的再造与承续既决定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人民性本位的必然在场，同时也决定了国家治理必然是致力于维护团结统一的统合型模式。这具体表现为：在国家结构上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是汉民族单一民族的国家；是中央集权制的单一制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制或广泛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是新的集权制国家，而不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是先锋队政党主导的国家，而不是两党制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是继续以家国共同体为本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国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而不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等方面^[14]。人民共和国的“政党+干部+人民”的治理体系，是通过以政党为核心的“党建国家”模式来完成现代转型的。“党建国家”与“人民共和”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也正是在这种互动中承担建设新社会、新国家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特的国家建设政治战略，即在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实践中以统一战线来创造和促进人民共和”^[15]。这也就决定了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实践逻辑生成的必然。

二、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实践形态的结构依托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要求其在实践中展现出共建共享、共富共荣取向的经济社会价值，建构起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崇高价值导向的人民中心的全面发展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民主观以及和平主义的国际民主观，开创出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团结奋斗是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本位的实践要求和实现形式，其实践展开需要相应的结构依托和体制支撑。这具体表现为：在道路方向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发展导向上坚守人民中心，在制度格局上构筑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在动力主体上形成真正能发挥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力量格局。

（一）本质依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必须借助阶级动员和政治整合才能完成，这一动员和整合的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在约束性，认识到先进的无产阶级要想成功领导中国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将广大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通过广泛的阶级动员实现政治和社会整合。近代中国社会有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多个阶级和阶层。在阶级动员的基础上实现政治整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广泛牢固的统一战线，是人民整体得以形成的基础。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人民本位和人民主体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建国的逻辑对中国民众进行有意识地塑造的产物，这个有意识地塑造过程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其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广大民众相结合的过程”^[16]。不同时期社会民众的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同时党自身的各方面情况也是变化的，这些都决定了党同人民大众的结合过程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要根据条件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将广大民众团结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持续性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国家语境中的“社会”不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松散集合，而是在党领导下凝聚成的人民。社会主义国家是以人民为政治基础而建立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最根本的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建共享的高质量发展、人民民主权利的全过程实践、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的要求，都必须依托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二）前提依托：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决定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的整体需求为立足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遵循，在实践中全面展现共享性、全面性、持续性和人类性等多层次要求。首先，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对共同富裕的执着追求，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追求共同富裕的思想因素一直稳定地内嵌于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漫长征程之中，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承担着表达以及解释无产阶级政党所追求政治、经济与社会目标的功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7]其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追求。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

方现代化的最大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尺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使物质文明发展服务于人，在厚植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致力于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再次，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内在要求。“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8] 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事关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生态文明新路。最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取向也必然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主义行动准则。西方国家建构的全球体系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依附性体系。西方国家依靠殖民掠夺、文化输入、意识形态灌输等手段，控制和压榨欠发达国家，攫取世界资源和财富。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这种和平主义既受到中华民族“和合”文化基因的滋养，也来自社会主义人民性情怀和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经验自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集中体现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心使命，为党凝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提供了价值理念和利益实现的深层次支持。

（三）制度依托：民主集中的人民权利制度体系

将“人民本位”放置于一国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地位，要求确立起保障人民权利的国家制度体系，为人民“翻身得解放”和当家作主创造平等正义的制度条件。西方现代化在其政治实践中更多的是满足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党等的实际需求，对社会大多数民众所期待的普遍性、公平性的公共利益和发展利益，往往只能是以一种兼顾的姿态出现，或是将其维持在一种不足以挑战和威胁既有统治秩序的有限富足水平。这与其所宣称的“平等博爱”“人民主权原则”相去甚远。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探索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战略政策、法律法规、选人用人、财政预算等公共事务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讨论与决定，最终变成公共意志和公共政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最有效政体形式。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载体，从党派阶层关系和谐、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序、民主权利与社会治理有机融合等维度构建起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实践更是进入到全过程的新高度，民主的主体更加广泛、民主的形式更加完整、民主的实践更加有效，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内在统一。这些政治文明的制度性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民享、保障民治、凝聚民力提供了坚实保障。

（四）力量依托：人民主体的力量格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国家现代化的主体力量。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吸纳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现代化成果是否为人民共享，这些从根本上决定着现代化道路的成败。人民是需要组织凝聚的，人民的力量是需要激发的，如何组织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就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问题。在这方面，西方现代化模式所能提供的经验是有限的。西方现代化将一个涉及多领域均衡

化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简约为单一的政治民主化过程, 将本身包括民主价值、制度、程序、结果、道路等多维度的政治民主进程简约为以公开竞争方式挑选领导人的程序性环节的实践操作。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激发民众的积极参与, 反而导致政治动荡、两极分化与社会撕裂的困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的动力条件, 建构起与人民紧密一体团结奋斗的力量格局和实践模式。这一人民主体的力量格局在今天已形成非常完整的体系, 即形成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和“凝结核”、以组织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政治联盟为组织机制、以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治理体系为制度根基、以筑牢人民团结为导向的价值目标体系的团结奋斗实践格局。这一格局从根本上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民众“一盘散沙”的难题, 真正确立起人民大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这种“政党主导—人民主体”的中心力量格局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超越西方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支撑,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由“外源型”向“内生型”的转变, 实现了对“中心国家”的“去依附”过程, 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案。

三、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实践体系的内在层次

从具体实践来看, “团结奋斗”内在包含着主体构成、场域结构以及内容方法等层次。把握好“团结奋斗”的主体层次, 需要我们超越主客二分思维, 立足主体间性清晰把握党与人民团结一体、共同奋斗的深层机理。把握好“团结奋斗”的结构层次, 需要我们认清统一战线机制在形成团结奋斗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发挥好大统战工作格局在助力大团结、促进共奋斗中的强大作用。把握好“团结奋斗”的内在层次, 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团结与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 运用好历史经验, 应对新的挑战。

(一) 主体层次: 党团结带领人民

团结奋斗从主体层面主要包含“党—人民”的双重结构, 体现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首先, 党之所以能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 根本上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是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先进政治力量。“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9]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内在决定了它必须而且能团结全体人民, 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拼搏奋斗。无产阶级政党团结带领的对象(即人民)具有广泛性和世界性, 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集合体, 同时也是“联合的行动, 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19] 50}。共产党人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崇高使命, 决定了其与人民一体的团结奋斗是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奋斗。这一共同的思想目标与具体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表现为阶段性目标与最高理想目标的统一。其次, 党自身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根基。团结首先是党的团结, 奋斗首先需要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自我更新的能力。没有党的团结, 就谈不上社会层面的团结。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讲到团结问题时就指出: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 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20] 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形成万

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一切艰难险阻。”^[21]所以，必须把党自身建设和团结统一作为做好其他工作的根本前提，促进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捍卫“两个确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团结有力。只有具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才能带来强大的外部感召力，具备强大的先进性道德优势。同时，具备强大的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能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执政党的内在要求。再次，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与人民团结奋斗上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方法论，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保障，以统一战线为基本形式的团结奋斗格局，而且在理论上形成了包括党内团结、党际团结、党群团结、民族团结、国际团结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团结奋斗的学说。

（二）场域层次：统一战线同心圆

作为承担了现代国家建设历史重任的中心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凝聚人民大众推进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式团结政治的主要实践机制，也是中国政治力量建构的一种主要方式。通过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将不同阶级、阶层、政党、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团体的人民大众统合在一起，形成了为完成各个历史时期任务而共同奋斗的一体性力量，形成人民整体的有机合力。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逻辑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团结和联合最广泛的人民大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2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通过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为主体场域。统一战线团结功能进一步全面体现，把一切能够团结的因素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凝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磅礴力量，同心共向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深度构织统一战线同心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这四者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形成一个由内而外、向心团结的同心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新时代新征程走好团结奋斗的历史必由之路，要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守圆心，扩共识；要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尊重差异而不扩大分歧，包容多样而不弱化主导。

（三）方法层次：团结与斗争的有机统一

要实现团结联合、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团结和斗争两者缺一不可。自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以来，团结与斗争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内在联系在一起。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百余年来，统一战线坚持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明确团结什么、斗争什么以及怎样在斗争中达到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把握团结与斗争的

关键在于做到求同存异，求同就是要增强一致性，存异就是学会包容多样性。一方面在政治目标、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上守住底线、扩大共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在面对不同利益诉求时要能坚持和照顾同盟者利益，尊重包容差异，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在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时，要始终坚持政治底线，对那些违背共同政治目标、破坏共同政治原则的错误观点和行为敢于进行批评和斗争，决不能以团结包容的名义任其蔓延发展，最终损害团结奋斗大局。新时代新征程，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做好新时代的团结联合工作，要进一步把握好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要做到求同存异，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积极力量，同时也要敢于与一切干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内外风险因素作斗争，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交织的复杂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斗争精神、锻造斗争本领。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实践始终是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实现和向前推进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从思想上、行动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融入团结奋斗的全过程。

四、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实践格局的时代要求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宏伟性、任务的艰巨性以及身处百年变局中形势的复杂性，都决定了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以更加紧密的团结、更加顽强的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以党的创新理论筑牢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需要用科学的思想理论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就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伟力。这其中最根本的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统一党和人民的意志和行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其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理论主题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性、创造性、战略性的重大论断，在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上旗帜鲜明、正本清源，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用以武装头脑、教育人民，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解决团结奋斗的各种难题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方法指引。这一思想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国人民的伟大团结精神，激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标识，激发出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二）以两个革命相协同开辟团结奋斗的行动新局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党自我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其目标是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伟大的社会革命。“两个革命相协同”指明了新时代团结奋斗何以可能与如何推进的深层机理。一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来巩固和加强党自身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保证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党能广泛团结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前提是自身的团结统一。这就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实现制度上的团结。二是在伟大社会革命向下以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加强党同人民的大团结。“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23]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抓手，巩固加强党同广大劳动者、建设者和爱国者的大团结大联合。首先是加强党同工农大众的紧密团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始终坚持好人民主体性，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其次，以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为主要场域，最大限度凝聚起与党外群众共同奋斗的广泛力量。巩固加强党同人民的团结最根本的依托是深化和完善党领导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大团结大联合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三）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理顺团结奋斗的利益关系

在世界百年变局的动荡变革期，我国面临空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社会人群利益关系的变化与固化、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与碎片化，使得巩固共同思想基础的要求更加迫切，党与人民的团结联合工作面临许多新的考验和挑战。工农联盟作为党长期执政和团结联合的阶级基础没有变，但工农联盟的内部形态也发生着一些深刻变化。比如，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身份人群不断缩减，新型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大量涌现；知识分子群体大量增加，呈现出明显的大众化趋势。社会大众的分化速度加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队伍日益壮大，新就业群体快速增长；非公有制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扩大，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逐渐成为侨社主体；大量的网络群体不断产生，网络空间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思想交锋的主阵地。这些新的变化对党的团结整合各方力量、增进政治共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巩固党同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增强不同党派、民族、阶层、社会群体对党的向心力是最大的政治，而理顺利益关系是增进认同的核心和关键。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4]。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决定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共同富裕，是实现现代化社会动员最有效的方式。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而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无疑又能从根本上为党同人民的大团结夯实认同根基。当前，我国要有效发挥大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强化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切实优化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培植和释放社

会大众潜力, 实现更高层次的共享发展。

(四) 以积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筑牢团结奋斗的制度根基

“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摆设的,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25] 进入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并阐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 系统提炼总结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的民主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与实践超越了西方式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选举民主模式, 实现了民主从为资本服务向为人民服务的转换, 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政治保障, 为人类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案。通过改善民生、推进民主政治来实现广泛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动员整合, 是中国共产党开辟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对于如何评判一个国家政治体制, 邓小平曾提出三条标准: “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 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 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1] 213} 无论是政治稳定、人民团结还是生产力发展, 突出的都是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 而不是依据所谓普世性的民主准则。好的民主应能增进人民的团结和民生幸福, 最终落实在国家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成效上, 而不是制造无休止的政党纷争, 造成政治共同体和社会的撕裂。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内的完整制度程序,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主体和团结统合的模式特色,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积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充分体现人民意志, 保障人民权益, 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保证党、国家、人民意愿和行动的同向同行、上下联动, 更程度地发挥团结奋斗的实践力量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五)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团结奋斗的道义高度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 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团结奋斗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品格, 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私品格, 能够而且必然要团结全体人民, 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拼搏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开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 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 为探索开辟人类新的现代化道路和新的文明形态坚持不懈地奋斗。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坚决摒弃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 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我们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拓展世界眼光, 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 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 团结联合全世界的进步力量,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积极贡献。这就要提升和激活团结奋斗内蕴的世界维度, 坚持独立自主, 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坚持对外开放, 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追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六) 以科学方式方法把握好团结奋斗的重大关系

新时代新征程, 走好团结奋斗必由之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进一步创新思路理念、政策举措、方法手段, 不断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增强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党的

向心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一是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圆心，把团结根基铸牢靠，同时要不断增进共识，扩大团结的范围，形成更大的同心圆。二是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做好团结联合工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既要做看得见的显绩，更要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做工作要坚持原则性，注重平等性，体现包容性，保持连续性，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三是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要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与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稳立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好尺度，做到宽严不误。四是把握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团结与斗争的内在统一，既要善于搞好团结，达成有原则、负责任的团结，又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我们要讲究斗争的策略方法，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大局大势，分清轻重缓急，拿捏好斗争的时、度、效。我们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做到在斗争中促团结、谋合作、求共赢。

五、结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下整体把握团结奋斗逻辑的生成必然、运行依托、实践机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展对团结奋斗的理论认知，筑牢新时代新征程走好团结奋斗历史必由之路的实践根基。团结奋斗话语也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团结奋斗一词贯穿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始终，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时总结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人民本位基础上的团结奋斗与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主义的“五个中国特色”逻辑一致、互为一体，同时也与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五个坚持”重大原则契合一致。深化对团结奋斗的相关理论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团结奋斗话语与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融合一致之处以及二者在论域和涉及面上存在的不同之处，做到研究上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以拓展和夯实新时代团结学的学理根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0.
- [2] 唐亚林. 人民本位观：基于经典现代化理论反思的多维度考察及其构建路径[J]. 行政论坛，2022（4）：5-13.
- [3] 郭跃文. 团结奋斗时代要求的多重意蕴[J]. 广东社会科学，2022（6）：5-14+280.
- [4] 王炳林，石卓群.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J]. 新视野，2023（1）：5-13.
- [5] 林华山.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团结叙事——运用大统战观学习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1）：5-1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 [7] 何显明. 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J]. 浙江学刊，2022（2）：4-14.

张艳娥.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及其团结奋斗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13.

- [8] 邹谠.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 [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17.
- [9]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曹沛霖, 郑世平, 公婷,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6.
- [10] 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 宾厄姆·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26.
- [11]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64.
- [12] 林尚立. 民主与民生: 人民民主的中国逻辑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 112-122.
- [13] 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 基础与发展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 24.
- [14] 凤翔. 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延续和再造——访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教授 [J]. 理论视野, 2011 (10): 5-9.
- [15] 林尚立. 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4): 1-6.
- [16] 刘建军, 陈周旺, 汪仕凯. 政治逻辑: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198.
- [17]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J]. 求是, 2021 (9): 4-15.
- [1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50.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4.
- [20]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35.
- [21]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1.
- [2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1.
- [23]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88.
- [24]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2: 17.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58.

责任编辑: 林华山



统一战线： 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强大法宝

郭道久 郝若雯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实现秩序与发展的持续互动和相互促进，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意旨。纵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统一战线凭借独特的策略内涵和历史象征，充当着党协调政治秩序与促进发展的强大法宝。统一战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重面相中发挥效能优势。政治上，统一战线化身“安全阀”，利用民主协商的制度渠道解决利益冲突，稳定政治秩序。经济上，统一战线发挥“推进器”作用，借助组织载体和人员流动联系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服务于新发展格局。文化上，统一战线深植党的民族与宗教工作，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搭建了党和人民之间的“连心桥”。社会上，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凝聚人心、整合力量的功能优势，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新时代新征程，统一战线要坚持团结、引导、教育的原则，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为起点，采用刚柔并济、张弛有度的方式方法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凝聚党的政治共识，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心基础。

关键词：政治秩序；国家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统一战线；人心基础；强大法宝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014-11

DOI：10.13946/j.cnki.jcqiis.2023.03.002

作者简介：郭道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郝若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郭道久，郝若雯. 统一战线：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强大法宝 [J]. 统一战线学
研究，2023（3）：14-24.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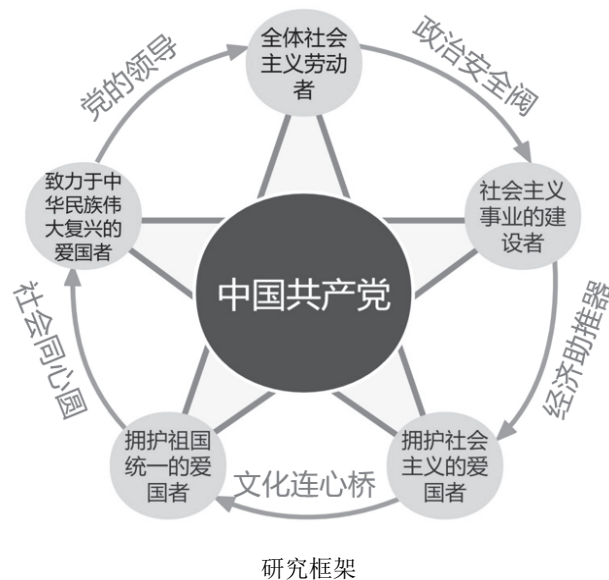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如何解决秩序与发展的关系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有研究认为, 现代化所带来的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性究其根源在于政治参与急剧扩张后所带来的制度化超载^[1], 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急剧的社会变革中社会成员人心不齐。统一战线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心问题提供了利器。在面对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时, 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 把握统一战线凝聚共识、整合社会的功能定位, 发挥统一战线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补充和辅助作用, 从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秩序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互动。鉴于此, 本文拟具体分析统一战线如何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心基础。

学界关于统一战线的功能和价值主要有两种分析范式。一类是工具性的策略范式。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诞生于革命时期, 因而其从一开始便具有极强的务实性和策略性特征。无论是抗战时期, 作为国共合作、民族团结的阶级联盟手段; 又或者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宣传和平与民主, 为党争取意识形态话语权, 统一战线都顺应革命形势的需求, 以革命策略的形式存在, 呈现出极强的敌我对立色彩^[2]。另一类研究思路是价值性的治道范式。学界围绕统一战线的理论内涵、制度形态、实践经验和内在价值等进行探讨, 深入发掘了统一战线在当代国家治理中的逻辑理路和思想蕴涵。

统一战线由术转道的进阶呈现出两条基本线索。一方面, 从制度结构层面来看, 统一战线以人民政协为组织平台, 贯穿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等当中, 从克敌之术上升为执政之道^[3]。另一方面, 从理论体系上来看, 统一战线研究不再将统一战线局限于特定时段或特定国家, 在理论溯源和空间拓展中丰富了统一战线作为一门理论科学的内涵。统一战线起源于利益结盟的需求, 承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 在中国独特的革命实践和治国道路中形成了“统一战线学”^[4]。统一战线承担的政治吸纳和整合功能以动态性和包容性为主要特征, 根本区别于西方权力竞争的政治运转模式, 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相较于西方国家政党的优越性^[5]。统一战线所展现出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精髓也逐步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赋予中国模式以世界价值^[6]。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范畴得到了深度拓展。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被纳入统一战线的构成范围, 标志着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大团结格局全面形成。大团结格局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 遵循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和海内外同胞五条主线, 不断拓展其包容半径, 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提供最广泛的人心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统一战线日益呈现出平面式扩充和立体化层次。平面式扩充指的是统一战线在立足圆心的基础上, 以求同存异、民主协商为原则,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在此过程当中, 统一战线充分发挥自身效能优势, 以“政治安全阀”“经济助推器”“文化连心桥”和“社会同心圆”的结构功能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凝聚人心、整合力量。立体化层次主要从政党与社会互动角度出发, 将统一战线筑牢人心基础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 统一战线聚焦广大职工群体利益, 强化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凝聚力, 从而有力地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其次, 统一战线面向群众, 依照从代表人士到基层群众的路线, 广征民意、深度宣传, 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最后, 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大团结格局的

构建提供方向引导。依托两个共同体，统一战线开拓了海内外双线并行的新型立体化统战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汇聚磅礴力量。



二、统一战线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7]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一战线的优势在于凝聚人心，解决人心向背问题。这是统一战线融入新时代发展格局，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统一战线在新时代显露出四重效能优势，即政治效能、经济效能、文化效能和社会效能。统一战线的政治效能集中体现在其“安全阀”作用：在民主协商的原则之上，为执政党争取广泛的支持，有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统一战线的经济效能依靠其对民营经济人士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平台，助推国民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统一战线的文化效能以民族和宗教领域最为显著，推动各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牢牢团结在党的周围，筑牢党和民族宗教界的“连心桥”。统一战线的社会效能关注治理语境下的社会整合问题，通过对分散的社会力量进行归并，构建了党和人民共商共建共享的社会“同心圆”。

（一）安全阀：统一战线的政治效能

统一战线始终服务于政权的人心凝聚，在巩固自身团结、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时，分化敌对势力。毛泽东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更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8]这不仅揭示了政治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心和力量，也集中体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质与精髓。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战线充当了中国政治的“安全阀”。

巩固自身团结、壮大自身力量是统一战线发挥政治效能的关键。壮大基础力量是统战工作的前提。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解决人心和力量这两个根本问题，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是统一战线发挥“安全阀”功能的首要途径。在中国共产

郭道久，郝若雯. 统一战线：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强大法宝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4-24.

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获得了汇聚人心的力量源泉，为发展和壮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提供了必要条件。争取中间势力是统战工作的重点。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统一战线力图同中间势力寻求合作。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团体派别尽管存在着利益分殊，但是统一战线着眼于共同利益，努力通过和而不同的原则实现集体行动。统一战线凭借领导核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对中间势力进行民主协商和积极争取，为党赢得多数的支持。分化敌对势力是统一战线的策略目标。敌我对立是统一战线存在的条件，也是统一战线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创立统一战线，是因为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取得革命胜利。总的来说，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以汇聚人心、凝聚共识为宗旨，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支持力量、分化反对派、增进政治共识提供了战略武器。

统一战线产生伊始便作为政党间联盟策略而存在。秉承着夺取革命领导权、实现革命胜利的核心宗旨，统一战线在敌我冲突严峻的情境下，始终聚焦于党际合作和政治协商，为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同盟、分化反对势力。在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在策略工具层面发挥“安全阀”功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工具箱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际，统一战线作为处理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和海内外同胞等关系的手段和方法，被纳入中国社会建构体制的范畴之中，并逐渐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9]。革命时期所遗留的敌我对立色彩开始淡化，各民主党派也通过统一战线转化成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势力。增强自身力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成为这一时期统战工作的聚焦点。人民政协的成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为统一战线提供了组织渠道和制度形态。统一战线得以从联盟手段、生存策略向实体化组织结构转变，成为中国政治形态中的结构性“安全阀”。

中国共产党通过将统一战线的方式方法和价值内涵贯穿至国家建构的领域，使得统一战线从党的领导策略上升为国家治理原则，形成了我国“众星拱月”式的政党格局，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凝聚和社会整合机制。凝聚的关键在于建立共识，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而整合的关键在于充分的意见表达、利益输入和协商民主。不同于西式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所实行的“合法反对”和多元利益冲突调节机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其领导性、合作性、协商性三元并存的政治逻辑中^[10]。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党格局当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同时也明确了政党统一战线的凝聚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政协为基本制度平台，各民主党派秉持平等主体地位，参政议政、合作协商、民主监督，充分实现利益整合、广泛凝聚共识，从而实现从凝聚到整合再到凝聚的良性循环。这种核心一元性与结构多元性所创立的复合立体的政党关系格局，为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与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效能提供力量来源^[11]。

可见，统一战线先后从策略工具、制度结构层面发挥“安全阀”作用，促进了革命胜利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同时，统一战线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党争取多数支持、维持社会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助推器：统一战线的经济效能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力量在个体私域扩张、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组织兴起三个层面形塑了当代中国利益关系和相互交织的利益表达机制^[12]。面对日益复杂的利益分殊格局，统一战线着力构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社会利益再整合机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发展提供助推力。利益关系是

经济部门关注的重点，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协调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一方面，统一战线通过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为经济发展提供创新活力。另一方面，统一战线依靠广泛交往、内外联动为本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人才和资源的双重优势使统一战线能够协调多元利益诉求、团结各方力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助力。具体到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统一战线通过在国内对民营经济人士与港澳台同胞的凝聚整合，在国际上凝聚华侨华人力量，实现了统战工作与双循环发展格局互为补充、一体共进，充当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助推器”。

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是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力。统战工作重点通过发挥工商联组织的统战性、经济性和民间性作用，以工商联为组织载体实现党、政府与民营经济人士之间的互联互通。工商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为主体，具有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有机统一基本特征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是政府管理和服务民营经济的助手，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战性是工商联的根本性质，也是其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根本依据。中国共产党通过工商联将党的指导思想和重大的经济方针贯彻落实至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身上，保障了党对国民经济运行方向的把握。自上而下的统战属性规定了工商联的官方色彩，而经济性和民间性则集中反映了工商联自下而上的组织优势。工商联以服务经济工作为宗旨，为参与的会员提供多方协调、组织沟通和信息咨询等类型的服务^[13]。在为民营经济人士提供组织服务平台的基础上，工商联汇聚各级民间商会的利益表达和意见整合成果，通过政协协商和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为民营经济人士提供了下情上达的制度渠道。在协调平衡工商联的统战性、经济性和民间性的关系中，统一战线通过构建政府、工商联与民营经济人士的三方良性互动格局，以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推进国民经济规范有序发展。

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广泛联系港澳台同胞与海外侨胞的优势，是增强我国在全球贸易体系当中的参与度，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地位，推进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机制。统一战线联系广泛、内引外联的资源优势，充分体现在其广泛延伸的包容半径和不断拓展的同心圆格局中^[14]。统一战线借助港澳台同胞与海外侨胞雄厚的经济实力、双向的本土化服务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经验，充分发挥海内外同胞资源优势，持续吸引他们对大陆经济的资金投入与人才流动^[15]。在“引进来”的基础上，统一战线还推动着国内资本同侨资、内地资本同港澳台资合作“走出去”。统一战线通过利用华人华侨在海内外建立的社会关系与制度网络，为我国企业打破信息不对称等所带来的国际投资障碍提供积极助力，服务有实力、有能力的民营企业有序规范开展国际化生产和海外并购等活动，促进国内国际资源高效配置。

可见，高质量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发挥经济效能的主要承转点。凭借人才和资源的双重优势，统一战线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助力提升市场活跃度，助推国民经济持续向好。

（三）连心桥：统一战线的文化效能

人心和力量两者之间，人心问题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在统战工作当中是第一位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16]人心的汇聚需要统一战线呈现出包容性的特征，以更广泛地整合凝聚共识。借助其伸展的包容半径，统一战线尊重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并使差异化的社会文化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凝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识^[17]。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共存是统一战

郭道久, 郝若雯. 统一战线: 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强大法宝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4-24.

线解决人心问题的基本原则。统一战线以党的领导为出发点, 在统筹兼顾中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点, 搭建起党和人民之间牢固的“连心桥”。

民族、宗教领域关系和谐集中体现了统一战线在汇聚人心中的广泛包容性。在处理民族关系上, 统一战线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格局, 贯彻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大团结原则, 助力党组织凝聚各族群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处理宗教关系上, 统一战线坚持以导为主,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统一战线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搭建起了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连心桥”。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相较于先前民族工作更关注各民族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 在理论纵深和实践广度上实现了拓展和延伸。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更为深刻的战略导向。统一战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 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 从文化认同和价值共享入手, 构建差异与团结、多元与一体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格局。在精神层面上, 统一战线尊重各民族文化, 强化各民族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 铸牢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借助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加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严厉打击民族分裂活动等手段, 统一战线打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着在一起。

党的宗教工作的根本方向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引导、支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共建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中国的宗教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正确认识到宗教现象的客观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是统一战线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前提。对宗教界开展统战工作以“导”字当头, 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 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18]。党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引导是政治方向和价值目标的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自觉接受并认同党的领导, 顺应社会主义发展大势, 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面向宗教团体,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引导宗教界人士牢固树立爱国爱党的根本立场,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保障宗教界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可见, 统一战线协调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凝聚人心共识、整合民族宗教界力量。统一战线通过建立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 推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为各族人民以及宗教界同呼吸、共命运架起了稳固的“连心桥”。

(四) 同心圆: 统一战线的社会效能

统一战线的广泛代表和多元包容的属性赋予其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统一战线不仅要在思想文化上“凝聚人心”, 而且要在社会治理中“整合力量”^[19]。因此, 统一战线在社会场域所发挥的重要效能在于它对分散的社会力量进行团结, 形成社会治理同心圆格局。这主要涉及两个步骤。第一, 统一战线要利用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等形式吸纳整合社会力量, 实现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二, 统一战线需要解决整合后社会力量的目标问题。“劲往一处使”的团结局面需要统一战线坚守底线思维, 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将全国人民的力量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来。

基于统一战线对社会力量的整合，中国共产党巩固其执政地位，在治理过程中构建一个强大的社会同心圆。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利益分化，现代社会不断成长发育，产生了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网络。国家与社会领域的共生共存，为统一战线构建社会同心圆提供机会空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的新的中间阶层和体制外力量，统一战线凭借刚柔并济的工作方法、常态运行的组织制度和包容广泛的辐射半径，将碎片化的社会力量和意见表达吸纳整理，输送到政治体制中，从横向统筹维度解决了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问题。相较于纵向的党组织网络，统一战线为执政党提供更为灵活开放的柔性整合选择和横向团结机制，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联结代表人士、协商民主等形式，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互动。社会各阶级阶层能够将统战网络作为“传声筒”，进行利益诉求表达。执政党也能够通过统战工作吸纳整合多元社会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将其团结到党的轨道上来。

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宗旨是增强党的向心力。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决定了统一战线的战略方向。在实践中，统战工作要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将统一战线所整合的力量凝聚到党的方针路线上来。统一战线尊重诉求差异，构筑人心共识，目的是将不同阶层、民族、政党等力量叠加，转化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的强大合力。从根本上来说，统一战线的社会效能是将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共识，促使他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团结奋斗。

可见，统一战线所构建的社会同心圆，内核是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异同共存是统一战线存在的客观条件。实现统一战线成员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行，是统一战线的价值诉求。统一战线既追求道路共识、制度共识的“大同”，也允许阶层分化、利益差别等“小异”存在。在大统战格局中，党和人民共筑社会同心圆、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统一战线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进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三位一体^[20]。物质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要求以巨大的人口规模，创造出相当数量的物质财富和优质的精神文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人的现代化超越国家边界、面向世界，提倡合作共赢和民心相通。概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一战线依靠特有的效能优势，逐步有序地凝聚人心共识、整合集体力量。具体来说，统一战线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为起始点，团结联合广大职工群体，增强党对工人阶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解决了主心骨问题，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统一战线夯实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第二级阶梯。统一战线遵循“代表一群众”的逻辑路线，通过联结各界代表人士，深入所联系群众，实现了对党的群众基础的深度拓宽。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将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和绿色开放的新发展观念深入民众实践，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群众认同。最后，统一战线坚定维护和平与发展道路，大力开拓海外发展空间，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赢得最为广泛的人心基础。

(一) 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支柱作用的基础。面对新时代基数庞大的职工队伍, 党以统一战线为凝心聚力的重要法宝, 对职工内部结构分化与利益殊同实现人心力量的整合凝聚。通过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统一战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规模巨大的条件下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必要条件。

百余年来, 工人阶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基础。进入新时代, 工人阶级内部的异质性分化对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提出了新问题。一方面, 工人阶级的外延发生变化, 使得工人阶级不再作为传统的无产阶级意义上的工人, 而更多地呈现出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广大职工群众^[21]。农业劳动者因社会流动的加快而大量转化为工人阶级, 成为“农民工”。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 截至 2022 年, 全国职工总数 4.02 亿人左右,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8400 万人, 农民工 2.93 亿人^[22]。这一外延的拓展伴随着内部结构的分化, 从事工业生产的产业工人比例逐步降低, 代之以从事脑力活动的白领群体不断扩大。知识分子依靠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 积极开拓先进生产力, 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面对上述变化, 统一战线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出发, 协调工人内部差异, 强化党对工人阶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首先, 统一战线借助人民政协制度和民主党派等渠道, 收集职工群体意见, 切实保障包括农民工、特困职工等在内的广大职工权益。其次, 统一战线面对全国职工队伍的内部分化, 力求从差异性、多元性、分殊性中寻求利益汇合点。对于合理合法的工人阶级利益予以照顾, 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平等交流; 对于有差别的特殊群体利益, 从加强团结的立场出发, 整合凝聚共识。最后, 统一战线面向广大职工群体, 积极宣传党的大政方针和战略决策。这有助于增强当代工人阶级“四个意识”, 鼓励其主动团结在党的旗帜之下, 巩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共识。

可见, 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凝聚阶级基础、整合工人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径。工人阶级的人心向背问题得以更好解决。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最广泛的力量整合提供有利前提, 也为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筑牢阶级基础。

(二)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价值导向, 追求人民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双协调, 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以此为背景, 统一战线动员各界代表人士深入群众,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和人民共同构成同心圆体制, 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设, 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汇聚强大力量。统一战线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具体方式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团结、教育和引导为原则, 与不同阶层、民族、党派、宗教和海内外同胞等领域的代表人士广泛交友、相互联通, 从而由代表人士深入广大群众, 建立大团结大联合的格局。

一方面, 统一战线的工作基点是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代表人士的沟通联结。党外代表人士借助统一战线平台实现制度化意见表达, 并且基于协商民主原则有意识地被整合进入党和政府机构, 担任相关职务, 从而实现了党外力量在国家机器中的有效代表。同时, 这也意味着对党外代表人士群体的积极赋能, 使得决策共识能够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 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的目标是在团结联合当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完善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构建。因此，拓展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统一战线同心圆结构辐射半径，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人心，就成为统一战线的根本方向。为此，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就不能局限在个体精英层次的整合上，而必须拓展到社会大众的关怀上。对统一战线来说，凝聚党外代表人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通过凝聚代表人士以关怀、凝聚和带动整个大众社会才是根本^[23]。统一战线通过民主党派成员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凝聚不同党派力量与阶层共识，借助少数民族、宗教、港澳台等领域的代表人士巩固我国民族、宗教、国家统一等领域的团结。

从代表人士到广大群众，统一战线充实了党的群众基础。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通过统一战线延伸至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真正实现了党和人民群众上下联通、同心连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从目标愿景深入实践，转化成为社会整体的自觉行动。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为凝聚主线，充分贯彻了党的领导，为多元社会提供了黏合剂和催化剂^{[20] 172}。中国社会得以既保持高度多样性，又具有高度凝聚力，形成有机的整体，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

（三）夯实两个共同体

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坚持走和平与发展道路既需要汇聚人心力量，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同时也要促进海内外民心相通，推动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统一战线凭借强大的人心聚合能力，巩固大陆范围内的联盟，拓展大陆范围外的联盟。在巩固和拓展两个范围联盟的基础上，统一战线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向接轨，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合型同心圆大团结格局。

首先，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大陆范围内，统一战线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力量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教育各方面成员，引导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之上，巩固“众星拱月”的良好局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统一战线形成吸引力、凝聚力、号召力的根本来源。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统一战线自身也就成为无本之木。因此，统一战线能够在大陆内外两个范围展开工作，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障大陆范围内联盟的根本。

在大陆范围外，统一战线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政治基础，利用同根同族的文化资源，提升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纳入其性质规定当中，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的内部构成。针对香港和澳门同胞，统一战线坚持爱国者治港、治澳的原则，积极交友，联络先进港澳人士，深度培育爱国力量。统一战线以中华海外联谊会等组织团体为平台，加强内地与港澳地区互联互通；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战略基点，加快促进港澳同胞在政治回归之后的经济融合和思想共识。针对台湾同胞，统一战线围绕一个中国的根本原则，积极探索招商引资、文化交流、返乡寻根等多层次、多领域的交往方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针对华侨华人，统一战线以祖国统一为主线，将全球华侨华人团结在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下。海外侨胞与祖国大陆拥有共同的血缘之根、文化之魂和复兴之梦，并且在人脉网络和经济资源上均具备一定的优势。新时代侨务工作牢牢把握共圆中国梦的原则，当好海外

郭道久, 郝若雯. 统一战线: 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强大法宝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4-24.

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以文化交流、经济来往和组织社团等形式强化华侨华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心共识。

其次, 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统一战线的人心汇聚和力量整合作用便愈发突出。统一战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日渐呈现出价值领域和实践层面的交叉融合。一方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统战工作提供了价值指引, 其与统一战线具有价值理性层面的连贯性。统一战线强调在团结联合中发展壮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寻求人类全体的共同利益。从本质上来说, 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 统一战线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引导, 极大地拓展了自身的涵盖广度、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统一战线被赋予的美美与共的价值规范, 根本区别于西方国家所鼓吹的零和博弈思想, 从而为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智慧。总而言之, 统一战线不仅解决国内人心向背的问题, 同时还面向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 推动世界各国人员沟通、文明联通、民心相通, 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最广泛的人心力量。

四、结语

政治的功能在于创造秩序, 政治的使命在于促进发展^[24]。而实现秩序与发展的持续互动和相互促进, 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意旨。纵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统一战线凭借独特的策略内涵和历史象征, 充当着党协调政治秩序与促进发展的重要法宝。从联盟手段到制度支撑再到新时代的同圆心格局, 统一战线在立体化层次中不断拓宽党的辐射范围和包容半径。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为起点, 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批评、再团结的原则, 采用刚柔并济、张弛有度的方式方法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 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凝聚了党的政治共识, 进而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心基础。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统一战线也将通过新的结构形态和工作方法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大局。

参考文献:

- [1]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王冠华, 刘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1.
- [2] 张伟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统一战线范式创新及其实踐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3): 9-19.
- [3] 杨世照, 高福进.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脉络耙梳、要义研炼与时代展望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1): 53-61.
- [4] 商红日. 统一战线政治哲学: 基于统一战线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论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3): 62-68.
- [5] 陈明明, 陈远星. 代议制政府与代表制政府: 一个理论和历史的比较 [J]. 学术月刊, 2021 (7): 78-90.
- [6] 何虎生, 赵文心.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 法宝、和合与平衡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1 (1): 123-133.
- [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46.

- [9] 肖存良, 林尚立.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278.
- [10] 林尚立.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协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1: 215.
- [11] 周淑真. 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 (7): 6-13.
- [12] 李炜永. 发挥政协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研究: 体系、过程、政策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40.
- [13] 韩福国. 民营经济制度变迁中的工商联: 组织的双重代理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98.
- [14]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等. 中国统一战线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81.
- [15] 陈明明, 肖存良.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前沿 (2018)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242.
- [16]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N]. 人民日报, 2015-05-21 (1).
- [17] 姜胜利, 张玉杰. 凝心聚力: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建设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98.
- [18] 卓新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论述的重大现实意义 [J]. 中国宗教, 2018 (4): 17-19.
- [19] 钱再见. “人心”与“力量”: 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 [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5): 68-76.
- [20] 本书编写组. 觉醒与超越: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2: 4.
- [21] 李忠杰.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新体系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53.
- [22]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综述 [N]. 工人日报, 2023-03-01 (2).
- [23] 林尚立, 肖存良. 统一战线与中国发展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28.
- [24] 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369.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 统一战线视角

冯霞 简智荣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社会稳定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整合、认同构建、社会治理三方面制度安排。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历来在这三个维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统一战线具有政治整合机制，以广泛吸纳和畅通渠道实现各群体的有序政治参与，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具有认同构建机制，通过意识形态引领和良性政治文化塑造凝聚思想共识，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统一战线具有社会治理机制，通过资源汲取和资源赋予化解社会冲突，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通过政治整合、认同构建、社会治理机制，有效避免了现代化中的政治失序、价值冲突、社会动荡陷阱，实现了长期社会稳定，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之治；两大奇迹；社会长期稳定；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3) 03-0025-11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3.003

作者简介：冯霞，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教授；简智荣，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党百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20AZD110）；福建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我为建设新福建献良策”（统一战线专项）课题“统一战线视域下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研究”（JAT22003）

引用格式：冯霞，简智荣.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统一战线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25-35.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1]。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2]。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来看，阿拉伯国家经历“阿拉伯之春”冲击，国内反复出现政局动荡、社会恶化^[3]；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政治暴力、城市暴力此起彼伏^[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实现的社会长期稳定特别难得。对现代化中的社会动荡问题，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已经做了诸多研究。阿普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人类事务变得日益复杂的过程”^[5]，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意味着“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6]，亨廷顿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乱”^[7]。对于如何化解现代化中的不稳定性，西方学者认为关键是“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6] 49}，提高“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7] 60}。

正因现代化的快速变化极易带来不稳定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2014 年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做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工作。”^[8] 2017 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9]。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9] 471}。2022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10]，将社会长期稳定视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性有利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并通过“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等制度健全来维护社会稳定^{[1] 52-54}。这些重要论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以及从凝聚人心、社会治理、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实现社会稳定。

国内学界对中国如何实现社会稳定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社会稳定的五大阐释路径。一是基于中国现代化中的协商要素，认为中国具有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利益协商机制，实现了集体利益和集体共识的良性互动，避免了冲突的发生^[11]；中国式现代化贯穿着商量思维，体现为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形成团结政治^[12]。二是基于中国政党制度，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为价值导向的^[13]，发挥着政治吸纳、民主参与和凝聚共识的作用，为中国社会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14]。三是基于制度和治理的动态调适，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现代化新变化，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迁在“秩序与活力”间寻求平衡点^[15]，化解了现代化产生的矛盾冲突^[16]；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保持开放性的学习型政党，不断更新政治体制以适应现代化进程^[17]。四是基于现代化中的政治吸纳和政治参与的畅通，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吸纳新阶层，从而实现较为充分的政治整合^[18]；中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民主化，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及时化解可能的不稳定因素^[19]。五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秩序供给，认为现代化中的社会稳定有赖于高水平的制度化建设、强大政府和有力政党^[20]；党践行初心使命以及中国之治的优势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21]；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主

冯霞, 简智荣.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 统一战线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25-35.

导、明晰的经济产权界定、公平正义的法治、对社会利益的协调实现了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秩序^[2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稳定的重要论述, 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创造, 就制度机制而言在于政治整合、认同构建和社会治理三个维度的共同发力。既有研究的阐释路径二、四侧重制度上的政治吸纳与政治参与, 支撑了政治整合维度。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实际上也导向这一维度。阐释路径一侧重凝聚共识, 支撑了认同构建维度。阐释路径三、五侧重治理动态调适对矛盾冲突的化解, 支撑了社会治理维度。既有研究大多止步于整体因果关系的探讨, 未能更具体地分析形成这种因果关系的制度安排, 如政法委、统一战线、政协、人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一些研究虽关注到了制度层面, 但未能具体揭示其中的作用机制, 留下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从统一战线角度入手能够拓展既有研究。一方面, 统一战线虽非实现社会稳定的全部制度内容, 但是其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制度安排, “统一战线能够在政治上凝聚人心、治理中凝聚力量”^[23]; “统一战线对中国多元化社会进行政治整合, 形成了合作型政治”^[24]。这些理论观点都表明统一战线及其相关制度机制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统一战线在实现团结和稳定中的巨大作用。在 2022 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 他强调统一战线在新时代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 为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伟力”; “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25]。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 39}。这些观点表明, 统一战线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大有可为。

综上所述,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 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整合、认同构建、社会治理三方面制度安排。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 历来在这三个维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基于此, 本文从统一战线角度入手, 具体分析其如何通过政治整合、认同构建和社会治理等制度机制运作,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本文提出统一战线维护社会稳定的分析框架, 包括三方面。其一, 统一战线具有政治整合机制, 能够有效吸纳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各类社会政治力量,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发挥着广泛的利益代表和利益协商整合作用, 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其二, 统一战线具有认同构建机制,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为引领, 对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多元价值观进行引领和整合, 并形成以协商合作为导向的良性政治文化, 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其三, 统一战线具有社会治理机制, 基于对各界的广泛联系, 能够有效调动整合各界资源投入社会治理, 在现实治理当中及时消弭社会冲突和危机动荡, 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

二、政治整合机制: 统一战线实现有序政治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力量, 理顺复杂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 从而维护政治大局安定团结, 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统一战线制度体系内含政治整合机制, 通过广泛的政治吸纳与参与渠道的畅通, 实现对各界社会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 保证政治秩序。此种整合主要通过统一战线的制度、组织和活动形态实现。

（一）以广泛吸纳实现有序参与

政治吸纳表现为政治体系对社会的吸纳。统一战线所发挥的政治吸纳功能是一种“合作型吸纳”^[26]，通过统一战线体系内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制度安排，通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群团组织等组织形式，党和国家实现对各界群体的吸纳与整合。具体来看，统一战线通过宏观、中观到微观层次的运作，从制度形态、组织形态、活动形态三个层面实现全面广泛的政治吸纳，对党和国家的吸纳渠道构成了重要补充。

一是从宏观层面通过统战制度体系及其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官方性、制度性政治吸纳。这种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一个多层次、跨部门的完整制度体系，包含着自中央到基层的各层级政治协商、民主党派建设、民主党派参政等众多更为具体的制度。其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事务是统战工作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统一战线密切相关。这一制度在坚持党和国家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赋予少数民族群体以广泛的自治权，吸纳少数民族群体参与政治体系。其三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秉持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通过自治制度、选举制度以及中央的全面管治权等，为港澳台同胞和广大爱国人士提供了政治参与空间。相对健全的制度化建设使中国避免陷入西方民族冲突、种族冲突等政治乱局中，保持了社会稳定。

二是从中观层面通过人民团体、群众团体等组织形态，实现政治性、组织性政治吸纳。人民团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属于党的外围组织，但又具备一定的复合性。它一方面作为准政府机构管理相关社会群体，另一方面又作为非政府组织而受政府管理，其政治性高于一般社会组织^[27]。宪法规定人民团体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人民团体由包括青联、台联、妇联、侨联、工商联、共青团、工会、科协等在内的团体组成。此外统一战线框架下还存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宋庆龄基金会、欧美同学会等群众团体。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覆盖各个社会领域，为党和国家实现广泛吸纳、整合各类社会力量提供了重要组织基础。不同于西方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导致政治极化^[28]，中国的群团组织实现了广泛的利益代表。

三是从微观层面通过日常的统战活动，实现非正式性、活动性政治吸纳。相比制度形态和组织形态，活动形态无疑更为常态化，也更具有灵活性、艺术性。它表明统一战线所实现的吸纳不仅是一种制度化、组织化吸纳，更是一种情感性吸纳。统一战线的这种情感功能对于实现社会团结尤为重要。统一战线情感功能实现的特点在于持续性和微观性，依托日常一系列活动形态与党外人士展开沟通交流，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构筑日常交往共识。这是一种政治性和社会性相交织的活动形态。这些活动形态的具体形式分为一对一联络和集体活动两种：一对一联络更具有日常性，集体活动主要有学习会、交流会、宣讲会等形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寓政治性于社会性交往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出共同的政治认同、和谐式政治交往、民主式政治表达，从而实现对党外人士的情感团结。

统一战线通过对各界社会政治力量的合作型吸纳，塑造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实现了对不同社会力量的整合。同时在政治吸纳中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画出最大同心圆，实现了对各界社会政治力量的有机团结。这有效降低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爆发冲突的潜在风险，大大夯实社会稳定的根基。

冯霞, 简智荣.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 统一战线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25-35.

(二) 以畅通渠道实现有序参与

参与的畅通与反馈是吸纳的动态化与深化。统一战线不仅通过政治吸纳实现各类群体的参与权利赋予, 也为各阶层各群体提供了畅通的多层次政治参与渠道。这让各阶层各群体在政治互动参与中实现了深度融入。就政治性、制度性程度而言, 统一战线体系内含的政治参与渠道具有三个层次。

一是强制制度性、强程序法理性、强正式性的制度层次参与。制度参与是一种官方化、体系化表达, 这种参与主要包括三方面安排。其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依托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 党外人士得以实现有序政治参与, 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中的参政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其二, 遍布各个层级和领域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为各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参与渠道。协商增进共识、减少冲突, 实现政治局势安定团结。其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等为少数民族群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爱国人士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渠道。这些群体以此参政议政, 参与国家方针政策制定。

二是次政治性、弱制度性、弱程序性的组织层次参与。组织参与处于政治体系和社会的中介环节, 发挥着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集成作用, 主要通过各领域人民团体来实现。人民团体是党联系特定社会群体的组织载体和社会空间, 也是各类群体表达利益诉求、实现政治偏好的制度化平台。它们介于党和社会之间, 可以实现党群之间的有效沟通、协商、协调、平衡^[29]。这些人民团体大部分都建立了从中央到乡村的完整组织结构, 能够把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渠道传达到上层权力系统。另一方面, 它们广泛覆盖经济社会各界, 类型众多、联系广泛, 实现了表达渠道广泛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目前八大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数量已达 800 余万个。庞大且覆盖广泛的人民团体的有效运行, 为各界群体利益表达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是非正式化、日常化、情感化的个体统战工作层次参与。其工作渠道偏向一种个体性、个性化的参与, 能够实现诉求表达的民主化、和谐化、灵活化, 充分体现在统战工作的“联谊交友”方式上。它实质上是依托社会关系网络, 寓相对正式、严肃的政治性表达于社会交往、日常对话之中, 通过形式的日常化、社交化而使政治体系柔性化, 通过统战工作者的工作艺术补充制度和组织的参与效能, 从而使参与机制更为健全。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和情感功能的实现在统战工作中具有核心地位。它们一方面依赖于统战工作者的个人社会网络和个人工作艺术, 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增进情感和社交联络的一系列活动形式, 如日常的线上沟通联络、线下登门拜访、重大事项通报等。统战工作者需要同时兼顾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既在现有社会网络中加深情感实现, 又不断拓宽联络面。

通过统一战线畅通参与渠道, 社会政治各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被党政系统吸收, 为实现各界群体的利益向国家意志转化提供合法渠道。这有效避免了不同社会力量可能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对抗, 体现中国的合作型、团结型政治特征^[25],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同时,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渠道团结其他政治主体参与国家治理, 使各界人士对国家事务和关乎自身利益的事务提出意见、参与决策和进行监督, 实现了对不同社会力量的团结。

三、认同构建机制：统一战线凝聚思想共识

随着现代化发展而滋生的新价值理念，外部输入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等，对我国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在多元化思想场域中，构建集体认同、凝聚思想共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29] 140}从统一战线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具有思想政治引领、凝心聚力等作用，能够凝聚思想共识，实现思想团结。这主要通过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引领和良性政治文化塑造实现。

（一）意识形态引领维护思想团结

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思想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清醒认识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种主义之间的斗争。统一战线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是应对百年变局、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途径，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统一战线通过教育与斗争两种方法实现认同构建，达成社会稳定。

一是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意识形态建设内在地包含建设和斗争两个维度，教育则属于建设维度。这一维度又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是广度，即需要不断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覆盖面，不断扩大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是深度，即需要推动现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受众不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把握与运用，增强意识形态斗争能力。就教育的广度而言，按统一战线的同心圆格局，它主要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受众乃至持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这部分群体缺乏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背景和信念认同，要想争取这部分群体的认同就不能只进行简单的政治灌输，必须采用更灵活多样的跨界性教育手段。所谓跨界性就是用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活动教育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如对民营经济人士采用感恩回报社会树典型、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就教育的深度而言，它主要针对统一战线同心圆的圆心和次圆心群体，目标在于增强理论素养和斗争能力。教育方式主要是结合党的方针、政策、先进理论进行理论学习，在统战工作中进行理论运用，相关形式包括座谈会、学习会等。

二是对错误意识形态的批判斗争。错误意识形态主要指西方渗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内存在的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思潮，这部分内容属于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斗争对象。西方借学术活动和政治宣传等名义传播所谓“宪政”“三权分立”等政治理念。对此，统一战线通过现实的协商民主实践为社会主义民主正名，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宣传，与民主党派成员的沟通对话，揭露西式民主扎根于西方政治传统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实质，引领民主党派成员和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价值，塑造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共识。面对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威胁，加强民族宗教领域的统战工作，与民族宗教界人士保持友好联系沟通，不断深化民族团结意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塑造民族宗教界的社会主义共识。面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去意识形态化、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外知识分子、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日益隐蔽的渗透，统一战线要重点加强意识形态引导，增强他们的组织归属感、政治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

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对错误意识形态的斗争，统一战线从正反两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

冯霞, 简智荣.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 统一战线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25-35.

民族、宗教、政党、阶层等各群体可能产生的新价值观念和政治价值进行疏导和引领, 确保将他们整合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当中, 保证思想上的团结, 为社会稳定提供思想保障。

（二）良性政治文化塑造维护思想团结

统一战线培育出了合作型政治文化, 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合作型政治。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 其作用在于为政治系统赋予价值取向, 规范个人政治行为, 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30]。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自建党以来就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强调团结、协商的合作型政治文化, 潜移默化影响广大成员, 规范成员的政治行为, 并进一步内化为成员的政治意识、心理、价值等。合作型政治文化有利于我国社会稳定。

一是赋予政治参与者以合作团结的政治价值。与西方竞争型政治下强调竞争与制衡的政治文化不同, 统一战线代表的是合作型政治, 统战实践中塑造的价值是团结、和谐取向的政治价值。在宏观与中观的制度化、组织化运作中, 统一战线形塑新型政党关系和协商民主氛围, 通过合作型政治参与训练, 将共识、合作、共赢、协商等政治价值内化入政治参与主体的思维方式当中。不同社会力量在政治参与时注重协商、寻求共识, 不仅承认社会主体的多元化, 而且认为多元主体之间完全可以合作, 通过有效的协商过程寻求共识, 维护共同的政治认同和公共利益。这与西方治理中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相互否定、相互僵持, 从而导致治理低效形成鲜明对比, 表明中国之治是一种合作团结之治。在微观层面的统战工作当中, 统一战线在日常交往中内化社会主义主流价值, 团结各界人士, 实现社会稳定。在这一实践中, 统战工作并非简单僵硬的灌输, 而是注重平等对话、引导, 形成和谐、平等的政治文化, 促进各界人士政治参与中和谐情感的实现。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各类协商机制的运行, 我国的不同社会力量在政治参与中都得以分享共识, 保持团结合作, 避免陷入西方的对抗型政治当中, 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是规范政治行为, 促进各方的团结合作。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来看, 那些陷入动荡的国家往往都缺乏群体间的共识结构, 在族群对抗、群体分裂当中无法自拔、撕裂社会。共识结构的意义在于协调群体的行为冲突, 规范群体的行为方式。统一战线蕴含的政治价值潜移默化影响政治参与的主体, 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这些政治价值是不同社会力量所共同具有的共识结构, 逐渐成为采取政治行动的既定背景和信念基础, 塑造着政治主体的行为。我国政党政治受协商、秩序、合作等政治价值规范, 形成了坚持共产党统一领导、各方通力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各方注重协商, 寻求共识。反观西方, 竞争、制衡的政治价值形成政党相互倾轧乃至相互僵持的低效政治行为。基于和谐、平等、统一等政治价值规范, 我国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避免了西方一些国家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泛滥问题。宗教关系上, 中国共产党形成与巩固了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消除了宗教压迫、宗教冲突、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种种危害。在阶层关系上, 我国吸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国家治理, 形成注重协商、合作、团结的良好社会参与氛围。反观西方, 阶层区隔日益严重, 贫富差距背景下政治参与往往成为资本的权利, 公共领域萎缩, 各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堪忧^[31]。

政治价值和政治行动是相互塑造的关系, 政治价值在政治行动中不断被建构和再建构, 而建构出的政治价值也在不断规范着政治行为。统战实践中形成的以民主、和谐、团结为核心的统战文化

对政治主体的团结发挥巨大作用，而这种团结性的政治参与又能不断再生产出团结性政治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有助于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

四、社会治理机制：统一战线化解社会冲突

资源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问题。资源直接关涉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实现政治整合和认同构建同样离不开特定资源支撑。实现科学的资源配置是统一战线社会治理机制的核心，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基础。从统一战线视角来看，统一战线具有人才荟萃、联系广泛、资源密集的优势，具备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和广泛的资源调配渠道，在化解社会冲突当中能够提供有力资源支撑。统一战线通过资源汲取和资源赋予参与社会治理，解决现代化中产生的社会冲突和重大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在共治共建共商中实现不同社会力量的整合，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资源汲取为社会冲突治理提供基本前提

统一战线主要向各界汲取物质资源、组织资源、智力资源。它不是面向全部民众，而是主要面向统一战线中的党外代表人士。统一战线成员的特点是他们都为各自领域佼佼者，具备较为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向党政系统建言献策，也可以发挥自身社会资本优势，筹措物质资源、调动组织人力。统一战线资源汲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物质资源筹措。作为政治联盟，经济功能并非统一战线主要方面，统一战线在常态化形势下并不会主动筹措物质资源。但是，任何组织的运转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资源，统一战线的各构成群体都具备一定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物质筹措能力，在诸如新冠疫情等危机状态下能够辅助党委、政府进行物资筹措。统一战线一方面因其作为政治联盟，资源触角遍及社会各界，能够更为广泛地获取各界资源；另一方面因其成员本身为各界杰出人士，具备较为雄厚的经济能力和社会网络，能够提供资金和渠道支持，因而可以实现较为有效的物资筹措。物资筹措方式一种是基于自身经济实力，生产或购买物资进行捐赠；另一种是基于自身社会资本，向外部联络其他经济力量。统一战线具备的经济资源和延伸的物资汲取是其维护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石。

二是组织资源调动。统一战线是联合性质的组织，其成员遍及各界，由民主党派、工商联、宗教团体、华侨联谊会等各类组织形式将各界成员充分组织起来，从而具备更强的组织效能。与行政组织相比，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多为联合性质，并非行政机构，其内部强制性和科层化程度相对较低，因而运作更为灵活；与民间组织相比，统一战线的内部成员多为各界精英，成员素质高、政治意识强，组织架构也相对更为完善，因而具备更强的行动能力。基于联合性质，统一战线对组织资源的调动也并非一种行政命令，更偏向于一种带有政治性约束的倡议与号召。统一战线所拥有的丰富组织资源一方面提供了维系社会政治各界团结稳定的组织人力基础，另一方面本身也是对各界的一种组织整合，实现了界域内的团结。强大的组织能力是中国之治区别于西方之乱的突出优势，发达的组织体系提供了社会治理的充足组织资源，为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组织基础^[32]。

三是智力资源供给。统一战线成员就其所属职业类型来看，包括党外知识分子、企业家、社会工作者等，皆为各自领域的精英人士，具备较强专业能力和较高知识素养，往往能提供各自领域内

冯霞, 简智荣.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 统一战线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25-35.

的专业见解, 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通过统一战线平台的集成, 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得以汇集, 建言献策。集思广益正是智力资源汲取的关键所在。智力资源供给的途径分为主动建言和政府问策。主动建言依托于上述论及的政治吸纳与表达渠道, 通过政治协商制度、统战部门等, 就相关大政方针、法律法规、民生政策等问题提供本领域专业见解。政府问策则是发挥统一战线具有的智库功能。面对重大决策问题, 各级政府部门坚持民主决策, 通过统战部门向相关领域专业人士或利益相关方征询意见, 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二) 资源赋予为社会冲突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资源汲取机制充分利用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优势, 汲取这一政治联盟中丰富的物质、组织、智力资源, 为社会稳定提供重要现实基础。资源汲取最终是为了将整合的资源投入社会治理当中, 直接作用于社会稳定的实现, 这就形成了统一战线的资源赋予机制。这一机制利用统一战线丰富的物质、组织、智力资源投入治理场域: 一方面各界力量共建共商共治, 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增进社会团结^[24]; 另一方面实现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沟通, 理顺国家与社会关系, 实现党群、政群关系和谐。统一战线通过资源赋予机制参与治理, 促进社会稳定, 主要涵盖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实现不同社会力量在治理中的集成和参与。广大成员在统一战线汇集下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实现共治共商共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各类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33]。统一战线可以为这些社会组织群体提供重要平台, 实现不同主体的集成和共同参与。统一战线通过资源赋予为社会稳定贡献力量。其一, 统一战线利用资源丰富、联络广泛、人才荟萃的优势, 参与治理、建言献策, 为社会治理注入丰富的物质、组织、智力资源, 提升治理效能, 更好满足各类群体的需求, 维持社会稳定。其二, 统一战线发挥团结和联合的作用, 将制度框架内的各种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以及政协、各种统战性人民团体与社会团体等组织平台资源赋予各类治理情境, 充当调解者、沟通者和协调者, 化解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实现社会关系和谐。其三, 统一战线将不同社会力量集成和投入治理, 这是一个共同的资源赋予过程。不同社会力量内部所进行的协商和沟通也促进了它们之间的整合, 对社会稳定产生作用。

第二个层面是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沟通联系。维护社会稳定不仅需要不同社会力量之间进行协调整合, 还需协调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实现党群、政群关系和谐。以统一战线平台为纽带, 可以较好实现国家与社会各界的双向沟通联系。资源赋予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向社会贯彻国家意志、整合社会的过程, 另一方面是社会各界向国家表达诉求以及对国家和社会合理划界的过程。统一战线通过两方面的资源赋予为社会稳定贡献力量。其一, 统一战线的资源赋予过程是一个引导的过程。统一战线的资源赋予是在党委领导下, 以社会治理、问题解决为导向, 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资源赋予的过程其实也是国家依托统一战线平台整合各界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过程, 是国家对社会各界贯彻意志的过程。其二, 统一战线的资源赋予过程是一个治理的过程。治理不是单方面的行政执行, 而是多主体、双方面的沟通和协商。资源赋予体现国家对社会需求的回应, 是社会诉求向上表达的结果。资源赋予也体现出治理中党引领下的不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导向, 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划界, 既发挥党的引领统合作用, 又避免行政力量过多干涉导致的国家与社会冲突,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通过政治整合、认同构建、社会治理机制，有效避免了现代化中的政治失序、价值冲突、社会动荡陷阱，实现了长期社会稳定，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统一战线促进社会稳定过程中，形成了与西方竞争型政治截然不同的合作型政治，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价值取向，丰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以统一战线视角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是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还包括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社会稳定是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和社会根基。社会稳定的实现有赖于建立包容性、开放性的制度体系，能够根据现代化形势保持动态调适，实现对社会的广泛吸纳整合；也有赖于凝聚出共同的价值认同，夯实国家统一、社会大局稳定的思想基础；更有赖于建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执政根基扎牢在基层。二是中国之治是协商合作之治、以人民为中心之治。西方的治理实践教训表明，政治上的相互竞争、相互制衡、零和博弈，带来的是治理低效、政治极化、国家内耗，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中国之治是秉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之治，立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建立广泛的协商机制达成政治主体间的合作，实现了高效的国家治理，为其他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树立了治理典范。三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基所在。协商合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统一战线开放包容的政治整合，社会治理的高效组织动员等，都根源于社会主义逻辑超越了资本逻辑下的零和博弈、个体孤立、工具理性等局限，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使人民凝聚成自觉的历史主体，能动地创造自身历史。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1.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4.
- [3] 田文林. 衰朽与动荡：“阿拉伯之春”十周年反思[J]. 国际论坛，2021（3）：3-17+155.
- [4] 卡琳娜·巴特雅尼，温大琳. 现代化进程：拉美与中国的经验对比[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1）：131-138+8+14.
- [5] 戴维·E·阿普特. 现代化的政治[M]. 陈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
- [6] S. N. 艾森斯塔德.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 张旅平，沈原，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3.
- [7]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4.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17：174.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37.
-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文件[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2.
- [11] 王道勇. 高速现代化中的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J]. 科学社会主义，2022（6）：12-18.

冯霞, 简智荣.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 统一战线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25-35.

- [12] 文梓浩, 王衡.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商量思维: 内涵、实践与功能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38-50.
- [13] 刘飞. 新中国政党制度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探析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 (11): 115-119.
- [14] 雷振文, 张小萍. 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阐释 [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6): 15-24.
- [15] 李友梅. 秩序与活力: 中国社会变迁的动态平衡 [J]. 探索与争鸣, 2019 (6): 5-8.
- [16] 熊光清, 蔡正道.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及目的——从现代化进程角度的考察 [J]. 学习与探索, 2022 (8): 55-66.
- [17] 郑永年. 政党与发展中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 [J]. 行政管理改革, 2021 (9): 4-8.
- [18] 黄金辉, 魏倩. 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吸纳与整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的一个解释视角 [J]. 教学与研究, 2017 (12): 74-83.
- [19] 马原. 政策倡导与法治维稳: 多元参与视角下的社会冲突治理 [J]. 治理研究, 2019 (5): 114-121.
- [20] 韩雨筱. 变革与秩序——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稳定与发展的平衡 [J]. 理论观察, 2021 (10): 69-75.
- [21] 高中伟. 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 [J]. 红旗文稿, 2022 (7): 27-29.
- [22] 王庆德. 当代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秩序演进逻辑 [J].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1): 16-24.
- [23] 钱再见. “人心”与“力量”: 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 [J]. 南京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5): 68-76.
- [24] 徐理响. 合作型政治: 统一战线与政治整合的中国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4): 7-14.
- [25]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81.
- [26] 林华山, 罗振建. 新型国家形态的独特道路——以统一战线为视角 [J]. 理论与改革, 2019 (6): 14-28.
- [27] 康晓强. 人民团体参与协商民主建设制度化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1.
- [28] 银培菽. 资本阴影之下的“财阀政治”——基金会与美国政治极化的结构演变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 (3): 141-150.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34.
- [30] 鲁恂·W·派伊. 政治发展面面观 [M]. 任晓, 王元,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34.
- [31] 王荣军. “不平等的民主”美国贫富差距扩大与政治极化并行 [J]. 人民论坛, 2019 (4): 22-23.
- [32] 孙晓晖, 刘同舫. 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动员的功能边界和优化策略 [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 23-32.
- [3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36.

责任编辑: 龚静阳



形塑纵横交织的团结：统一战线价值新解

张淑娟 孙冉冉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从基础理论层面探析统一战线的两面旗帜——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对于理解统一战线团结机制、深入开展新时代统战工作具有参考价值。在广义上,人们依据性别、种族、民族、宗教、阶级等要素组成社会群体,这种“团结”可理解为“统一战线”。按对象的指向维度来划分,团结的要素可归于纵向或横向两类。纵向划分突出“我群”与“他者”间的区隔,淡化群体内上下层级的差异,强化“我群”的社会团结。阶级分析视域强调的横向划分是按在生产中的地位将人群划分为若干阶级,实现了横向团结由“自在”向“自觉”的迈进,对于透过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表象而剖析背后的本质——阶级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为国际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巩固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中,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统筹群体划分的纵向和横向双重维度,以横向的共同性消解纵向群体间的对立,以纵向的凝聚力弥合横向群体间的隔阂,通过恰当的统战策略形塑纵横交织的团结。

关键词:统一战线; 政治联盟; 共同体; 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 群体; 阶级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3-0036-10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3.03.004

作者简介:张淑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孙冉冉,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1AMZ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中国’认同的历史演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研究”(20RC(3)102DUT)

引用格式:张淑娟,孙冉冉.形塑纵横交织的团结:统一战线价值新解[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3):36-45.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方针, 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爱国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促进了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 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 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 找到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1]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两面旗帜和重要的工作原则, 最早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二者侧重不同的对象, “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主要面向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而“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主要指向“大陆同胞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2]。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 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 促进政治社会主要关系和谐。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须基于不同的着力点采取灵活的政策策略, 科学运用两面旗帜处理纵横交织的群体关系。本文以纵横交织群体关系的有效处理为切入点, 对统一战线价值的内在逻辑进行解析。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3]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法宝。这里的统一战线特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战略与策略, 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完成历史使命、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如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 它们都是狭义上的统一战线。此外, 不同个体或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联盟或形成联合, 该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组建统一战线。如英国人民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4]、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同外国干涉者和伏尔加河中游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建立统一战线^[5]等, 这类“团结”可视为广义统一战线。本文尝试在广义统一战线概念基础之上, 通过对人群横向与纵向划分交织与互动的梳理, 探究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价值, 以期进一步丰富统一战线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参考。

自党的十三大提出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江泽民同志指出: “我们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 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抓住有利时机, 集中力量发展自己。”^[6] 胡锦涛同志强调: “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 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两面旗帜的明确与传承是我国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重要成就。厘清两面旗帜间的关系, 探索两面旗帜之间的内在逻辑, 对于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提出: 只有理解“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性”, 才能“消除部分人头脑中存在的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中国各自独立、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可以分离的认识误区”^[8]。有研究指出: “人们用更理性的视角来认识中国, 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情感和认同。”^[9]有研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根本内涵，表现为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有机统一。”^[10]还有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爱国主义的主题主线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本质特征是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11]上述研究对建党以来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简要梳理，但对两面旗帜产生的理论基础关注较少，且侧重于就两者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展开具体分析，缺乏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层面探究两面旗帜的内在逻辑。而针对统一战线中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相关研究亦缺乏运用两面旗帜对其背后纵横交织的相互关系做深入的梳理。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群体划分视角梳理人群关系，对于进一步把握纵横交织的群体关系、理解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内在逻辑、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无法脱离集体而孤立存在，为满足生存与发展的必要诉求须同“他者”发生联系，选择特定团结对象而结成群体，在排他的共同实践中利益与共、谋求社会团结。分清敌友须依据一定标准与要素，性别、种族、民族、国家、宗教信仰等都可作为判断要素。基于这些要素，人类社会分为 2 种性别、3 大人种、2 500 多个民族、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众多宗教信仰。不同群体间可能因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习俗上的差异而滋生矛盾，表现为性别对立、种族冲突、民族矛盾等。根据统战对象（群体）的指向维度、择取要素（民族、宗教、阶级等），可把社会关系明晰为纵向与横向两类。其中，性别、种族、民族等要素构成的关系强调纵向分野，在同“他者”的交互中凸显不同种族、民族间的互斥，淡化同一纵向群体内上下层间的差异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以阶级作为划分敌我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2] 400}，提出用阶级观点审视人类历史，梳理人类发展脉络，探索不同社会群体间冲突背后的本质。在阶级叙事方式下，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抑或是自上而下的压迫与妥协，侧重点在于不同横向群体间的关系。以群体团结（或者说“统一战线”）对象的指向维度审视阶级分析法，便能发现其在把握群体矛盾的本质、引领全人类解放事业等方面的独特价值。统筹两重维度并采取灵活的战略策略处理纵横交错关系，对于理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间的内在逻辑、发挥统一战线促进团结的价值具有参考意义。

二、纵向维度的群体划分及其现实影响

原始社会以来人类长期处于群居状态，个体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须参与到社会关系中而同“他者”发生联系。在同异己的交互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亲疏之别，关系亲密者围绕共同诉求结为群体。性别、种族贯穿于人类产生发展的全过程，民族、国家与宗教随着人类演化而逐渐产生，而作为历史范畴又终将消弭。这些要素都可以作为个人明晰所属群体、明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依据。

性别、种族等天然要素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主要结群依据。原始社会早期从事狩猎的男性与负责野果采集的女性有着明确的分工，在生产中归属于不同群体。因两种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稳定性的差

距以及早期生殖崇拜的影响, 无论是中国神话中捏土造人的女娲抑或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盖亚, 都在不同程度上确证了母系社会女性地位的超然。原始农业的出现释放了男性的体能优势,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下男性社会地位攀升。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启重新诠释了男女在生产中体能上的差别, 女性进入工厂使在劳动与斗争中社会地位得以重新提振。历史上男女之间的地位及其关系历经变迁, 整个过程中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长期存在, 因性别差异而引发的激烈对抗屡见不鲜。种族也是群体划分的天然要素, 根据肤色、发色, 人类可分为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外貌上的明显区分使不同人族间泾渭分明, 在交往中因系列因素影响而可能走向对立。一种族为利益而奴役、屠戮其他种族的现象屡见不鲜, 譬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进行的种族灭绝与黑奴贸易、在美洲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等。有研究指出: “到 1900 年, 美国印第安人口数量从几百万下降至 23.7 万。”^[13] 时至今日, 西方一些国家内部的种族对立依然尖锐。

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族是开展纵向群体划分的重要因素。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 因自然环境、演化历史、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 人类社会由队群、氏族到部落、部落联盟进而演化出具备不同特征的民族。各个民族对内团结本族成员繁衍生息, 对外为争夺土地、水源等稀缺资源发生冲突, 在同异民族的斗争中民族认同意识得以进一步确证。尤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使民族分野的影响日趋拓展, 西方民族主义者在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张扬狭隘的民族性, 为争取民族利益不择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新崛起的德意志民族(同盟国一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均为德意志人居于主导地位)挑战英吉利、法兰西殖民霸权而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西方国家在对外扩张中亦惯用民族分野来操纵殖民地人民, 挑动各殖民地民族内耗进而维系统治。比利时对卢旺达的殖民即是如此, 人为地将当地原住民按肤色深浅程度等因素强行划分为图西族与胡图族, 并将其民族成分标注在“身份证”上, 为维系统治操纵图西族管理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 埋下了卢旺达独立后民族大屠杀的祸根。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板块内客观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单元。因演化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不同民族单元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 处理民族关系成为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同民族相对应, 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也是重要的群体划分要素。1648 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开始, 民族国家逐渐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登上历史舞台。所有由一个或多个民族构成的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 人口、领土、政权、主权构成了国家的四要素, 而人的国籍自然是其同异国人交往中最重要的个体标识。当今世界按照国籍的不同, 人类可划分为将近两百个主权国家的国民。国旗、国歌、国徽等符号将国家印记标记在每个国民身上, 对本国居民开展的“国家教育”“公民教育”历来为各国政府所重视。现代国家政权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在国家利己思想的引导下, 不同国籍的居民在同外籍人士互动中倾向于立足本国立场, 捍卫国家尊严与利益。国籍分野在国家强制力的培育与规训下具有极强的能动性, 甚至能够超越民族、宗教等“软要素”而发挥动员作用。2022 年 2 月以来同属斯拉夫民族、东正教徒的俄罗斯联邦与乌克兰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即是如此。因人口的跨国流动与迁移, 历史上一部分中华民族成员迁居境外, 成为海外华侨华人, 也有一部分外籍人士在中国境内定居但尚未入籍。在这种背景下, 处理好海内外

同胞关系以及国内本国公民同外籍人士间的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亦十分重要。

宗教信仰也是划分人的所属群体、形塑自我与异己间差别的重要标识性因素。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14]有不同信仰的个体因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可能结为不同群体。按是否信仰某种宗教可分为有神论与无神论者。有神论者依所崇拜偶像的不同而成为不同宗教的信徒。同一宗教内又因历史传承、教义诠释的差异而划分为不同派别，如基督徒分为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新教派，新教又包含英国国教、加尔文宗、路德宗等派别。不同宗教之间尤其是“一神论”宗教，因教义上的排他性容易滋生极为尖锐的相互间矛盾。因历史原因和社会所处发展阶段，中国目前依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新时代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处理好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

现实中多种纵向要素交织结合并共同发挥作用。纵向要素在交往中突出本群体同纵向的异群体的关系，侧重通过明晰群体间的边界促进群体内的团结，而本群体内上下层级之间的区分则被淡化。各种划分要素并非孤立存在，往往共同发生作用，诸如俄罗斯与西欧国家之间既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又有天主教、新教同东正教的矛盾，还有拉丁人、日耳曼人同斯拉夫人之间的互斥。将其中任何一项单独抽出，皆可表现为两种上下一体的纵向群体间的对抗。比如，无论是西欧国家的社会上层，抑或是中产阶级、普通劳工，在“恐俄”心理上总能找到共同语言。上迄人类早期的氏族与部落，下至今天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民族国家，纵向的群体划分与统一战线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居于主要地位。

三、横向维度的群体划分及其现实价值

横向维度的群体划分与统一战线的出现晚于纵向维度，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缺乏私有财产，虽形成了简单的社会分工但尚未上升到阶级分化的程度，即便氏族首领亦不具备超越众人的地位，也须参与生产劳动，如神农氏“教民耕农”^[15]，虞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15] 25}。首领权力的传承采用“禅让制”，人际间等级观念尚未明晰。群体划分与人际团结主要依据性别、氏族、图腾等纵向维度的要素。

私有制的产生促使横向要素的群体划分与统一战线在实践层面上成为可能。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富余劳动产品得以积累保存，私有财产逐渐出现，人类产生贫富分化，导致在原始社会晚期私有制正式出现。“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16]按照占有的土地、生产工具以及社会地位等要素，人类分为不同群体，不同地位的群体间因利益上的对立产生矛盾，无论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起义，抑或是佃农同地主间的斗争，乃至近代以来工人同工厂主的矛盾，实质上都是不同的横向群体之间的冲突，是弱势一方同强势一方的斗争。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横向群体间的斗争往往超越了民族、宗教信仰等纵向因素，更具广泛性。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即是如此。八王之乱爆发宗室相互倾轧，导

致连年战争。各族人民反抗晋室压迫: 永宁元年(301年)十月氐族人李特、李雄领导秦、雍六郡流民在益州起义; 太安二年(303年)晋廷征荆州壮勇赴益州, 遭到荆州民众强烈反抗, “义阳蛮张昌举兵反”^[17]; 永兴元年(304年)“匈奴左贤王刘元海反于离石”^{[17] 66}; 永嘉四年京兆人王如在宛发动起义。为反抗晋朝皇室的统治, 汉、氐、蛮、匈奴等各民族被压迫者纷纷起义, 自发地将斗争矛头指向共同的宿敌。

理论层面上也进行过以横向维度研究人类群体的尝试。古印度诗歌中的《梨俱吠陀·原人歌》将人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 强调不同种姓之间的区隔, 搭建起持续至今的印度种姓制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依据财富多寡, “在一切城邦中, 所有公民可分为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间阶级”^[18], 将人分为三个阶级。法国中世纪的三级会议将人划分为三大等级: 第一等级——教士、第二等级——贵族和第三等级——市民。在中国, 《左传·昭公七年》曾载: “天有十日, 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 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 士臣阜, 阜臣舆, 舆臣隶, 隶臣僚, 僚臣仆, 仆臣台。”^[19]近代资产阶级已开始意识到阶级的存在。列宁指出: “从法国大革命时起, 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 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 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20]

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诞生前, 因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 横向的群体划分与统一战线客观存在。某些思想家、政治家也在理论上探讨过按照横向维度划分人群的可能。近代一些思想家的著述中甚至带有朴素的阶级分析色彩, 但整体上并没有形塑出一个相对系统科学的横向划分要素体系, 在同纵向划分的比较中横向分野不甚明显。且因历史惯性, 民族、国家、宗教等要素随私有制的形成而发展, 每一纵向群体中的上层掌握话语权, 在本群体内建构“统一战线”, 甚至操纵舆论诱导本群体与异群体进行对抗, 以民族间、国家间的对抗消解群体内下层对上层的冲击, 刻意淡化乃至禁锢横向的划分方式。诸如《管子·小匡》中强调: “士农工商四民者, 国之石民也……公修公族, 家修家族, 使相连以事, 相及以禄, 则民相亲矣。”^[21]带有朴素的横向不同群体间团结的思想, 强调团结四民“尊王攘夷”对抗异族。一言以蔽之, 阶级分析法诞生前横向维度的群体划分与统一战线构建尚处于“自在”阶段。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诞生为研究人的群体划分与统一战线构建提供了科学的横向要素——阶级。阶级理论的产生与运用标志着横向划分与统一战线构建开展由“自在”走向“自觉”。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象、诠释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2] 178}列宁则明确界定了阶级的概念: “所谓阶级, 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 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 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 就是这样一些集团, 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2]在明确阶级概念的基础上用阶级分析法将社会人划

分为若干阶级，并以阶级群体为依托，对内建立同一阶级内的“统一战线”，对外开展政治斗争以获取阶级利益，实现了自觉的横向分野。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开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纵向维度的叙事方式，重构了人类群体划分与团结的历史。用阶级视域审视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探索其内部机理，对于探究冲突本质、化解群体矛盾乃至全人类解放事业具有特殊价值。

一是冲破了群体划分维度的单一性，自觉地用横向的阶级叙事剖析人类历史。相较于纵向的种族、民族、宗教等因素，阶级要素突出处于不同横切面的阶级之间在经济利益、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方面的差异。正如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所强调的：“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23]他将一个民族划分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与无产阶级的民族。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不同，人类社会可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可据此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阶级与阶级关系进行系统梳理。按照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人划分为若干阶级，随社会形态交替先后经历了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农民阶级（尤其是无土地佃农）与封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最终的历史走向是阶级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是透过纵向群体间矛盾的表象，厘清了冲突背后的本质逻辑。今天种族与民族仍是划分人群的最主要依据之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为强调种族、民族分野，突出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的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差别，而对同一种族、民族内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差别与对立的关注则存在人为缺位和有意遮蔽。2020年5月，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暴力执法中死亡，引发的全美大规模反种族歧视示威事件便是典型。美国骚乱呈现“身份政治口号比阶级政治口号更有号召力”和“不反对美国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24]两个特点。西方这些国家强调不同人种之间的对立而漠视阶级利益上的对立，深刻反映了采用纵向要素对人群进行划分的欺骗性，种族矛盾的激化掩盖了阶级对立的本质；异种族间的互斥转移了疫情冲击下资本主义国家普通民众对社会上层的不满，反而巩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依托纵向划分，资本主义国家将阶级矛盾转化为种族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掩盖住，这于无产阶级而言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三是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阶级叙事方式将人群划分为不同阶级，突出同属无产阶级的各国、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联合，共同反对各国、各民族上层势力的剥削与压迫。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帮助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厘清了战争与革命时代自身的斗争宿敌与团结对象，回答了“分清敌友”的问题，为19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1864年9月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即以早期“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组织”为载体，积极展开对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在“八小时工作制”“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设立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资产阶级为巩固自身统治，强调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希冀以“排外”的手段实现“聚内”的目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与之不同，马克思、

恩格斯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工人没有祖国”^{[12] 419}，号召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无产者打破民族隔阂，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实现阶级解放。20 世纪上半叶，列宁进一步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22] 368}的口号，号召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剥削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1941 年毛泽东在日本工农学校开学时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25]，强调中国人民应当同日本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军国主义与反动派，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

四、统一战线形塑纵横交织的团结

基于适当的维度划分人的所属群体、选择适当的团结对象，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凝聚力量开展政治军事斗争，为组成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提供指引，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能继续发挥促进社会和谐、凝聚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和谐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项基本特征，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12] 432}的主张进行了批判继承。斯大林在苏联建设中强调“各族人民的民族传统同苏联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切身利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26]，重视国内劳动者的团结。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 21 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 24}的目标，和谐是社会层面的基本要求。

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纵横关系对社会和谐构成潜在制约。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由民族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横向与纵向划分交错的时代。面向当今世界，对外要以现代主权国家的民族原则为基础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以及文化归属感，对内则以实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和社会和谐为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紧密团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与冲突，某些潜在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方面，受境外反动分子挑拨的“藏独”和新疆分裂势力妄图分裂国家，挑拨少数民族同胞与中华民族整体间的关系；在一些地区“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思想依然存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威胁。宗教方面，“东伊运”等恐怖主义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的渗透不利于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部分地区农村的非法无序传教也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某些邪教组织披着宗教的外衣展开渗透活动。在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港独”“台独”势力在西方势力的蛊惑下，不断制造事端，干扰国家安全，阻挠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

处理群体关系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筹双重维度，高举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面旗帜，采用适当的措施消解不同群体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要求“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7]。这五对关系也是当今中国政治和社会中需要妥善处理的重大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收入差距短期内无法彻底消除，阶层分化客观存在。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应先对冲突予以定性，分清该类矛盾属于“敌我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28]。比如，对某些成员非法经营、恶意破坏劳资关系的行径必须依法严惩；而针对大多数并未触及法律层面的阶层间冲突，则应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纵向维度的统一战线进行弥合，在调解冲突中强调纵向的共同性；以“中华儿女”“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旗号凝聚力量，消解横向阶层间的隔阂，以纵向维度的爱国主义旗帜促进重大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面对纵向群体间的冲突，诸如民族矛盾、宗教对立等，在调处中除运用传统策略外，应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以横向划分凸显共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29]。工人、农民是我国人民群众的主体，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无论是汉族、少数民族，无神论者或爱国的宗教界人士、信教信众，还是男性、女性，只要参与劳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在处理突发群众性冲突事件时，应突出其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者的共性、作为一名公民的共性，激发其“劳动者”的共情感，淡化民族冲突与性别对立。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横向共同性弥合纵向群体间的隔阂，重点协调好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而处理海内外同胞关系则应将两面旗帜结合，以劳动人民的共情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公约数凝聚海内外同胞。

总而言之，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面对群体冲突首先应厘清群体间冲突的向度，明晰该类矛盾是属于纵向的单元民族、性别、宗教引发的，还是横向的阶级、阶层之间的对立引发的，而后采取灵活的策略消解纵横交错的群体间的矛盾。在巩固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中，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统筹群体划分的双重维度，以横向的共同性消解纵向群体间的对立，以纵向的凝聚力弥合横向群体间的隔阂，通过恰当的统战策略形塑纵横交织的团结，广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9-40.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5.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8.
- [5] 列宁全集：第3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58.
- [6]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2.
- [7] 胡锦涛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36.
- [8] 温静. 论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核心地位[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2）：37-42+111.
- [9] 邵彦涛，蔡方.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新特征及教育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4）：16-18.
- [10] 杨林香，林弼渠.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特征和培育路径[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张淑娟, 孙冉冉. 形塑纵横交织的团结: 统一战线价值新解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36-45.

(3): 76-83.

- [11] 王树荫. 坚持爱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中国共产党百年爱国主义的主题主线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 (8): 25-36+159.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5.
- [13] 张梦旭. 印第安人一直遭受美国政府歧视和不公正对待 [N]. 人民日报, 2021-08-09 (16).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 [15]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3.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
- [17] 房玄龄. 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64.
- [18]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205.
- [19] 春秋左传校注: 下册 [M]. 陈戎国, 撰.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872.
- [20]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12.
- [21] 赵守正. 管子注译: 上册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2: 198.
- [22] 列宁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1.
- [23] 列宁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44-345.
- [24] 魏南枝. 弗洛伊德事件与美国政治的“制度失灵”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0 (8): 59-69+95-96.
- [25] 王纪刚. 这里是延安——中国共产党对外如何讲好革命故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282.
- [26] 斯大林文集 (1934—1952)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426.
- [27]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4.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0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62.
-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7.

责任编辑: 林华山



统一战线：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与实践进路

杨可 刘宗灵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统一战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了磅礴力量，反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强调“和谐共生”理念，蕴藏了“多样一体”的统一战线基调，体现鲜明的统一战线底色。二者具有共同原则、共同立场、共同目标。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统一战线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团结形态得到跃升——从对“人”的团结上升至对“文明”的认同。在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过程中，统一战线进一步拓展了团结维度——从人、社会、自然的团结与联合层面，拓展至包含人、社会、自然在内以及更高层面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团结与联合。统一战线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引领，以新的文明模式、新的文明理念为世界文明发展指引前进方向，进而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影响世界现代化的关键枢纽。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之下，中华民族正在全力建构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双重价值导向：立足中国，坚持最大公约数和画出最大同心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向世界，以统一战线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人民走向更高级文明形态的社会发展之路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五个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团结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046-11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3.03.005

作者简介：杨可，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宗灵，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精神’的纪念、阐释及其价值意义研究”（21JHQ022）

引用格式：杨可，刘宗灵. 统一战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46-56.

杨可, 刘宗灵. 统一战线: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46-56.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 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协调、平衡、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对此, 有学者认为,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桎梏的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价值、逻辑层面都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甚至以往的社会主义文明^[1]。有学者从历史视野解读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超越性^[2]。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明, 在于它“以文明形态的适应问题、实现问题、发展问题为切入点, 深刻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3]。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除了科学理论支撑和长期实践检验, 还有统一战线这一重要的基因底色, 这是我党独特的强大法宝。二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辩证统一的互动关系。党的二十大阐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并多次强调“团结”主题。加深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 有必要运用统一战线视角进行研究阐释。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底蕴

人类文明新形态源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根植于中华大地, 旨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 由五个文明建设共同构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的话语符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式提出及其在实践中的不断深化,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结合国情、世情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体现,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 内生于社会主义文明和中华传统文明, 具有极其深厚的理论底蕴。

(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人类文明新形态代表的是一种以新文明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形态, 在理论上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范畴,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社会形态”范畴对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演进规律进行了详细概括, 阐明了文明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至高级阶段的形态, 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4]。“在这样的文明形态演进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属于社会主义文明。”^[5]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标志, 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范式。社会主义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被论及。马克思、恩格斯在文中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弊端(即剥削和贫富两极化), 强调无产阶级文明的价值取向^[6]。资本主义文明的特征表现为“社会分裂和对抗”^[7]。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向往, 指向摆脱这种“社会分裂和对抗”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过渡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是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他们将共产主义视为资本主义之后更高的社会形态, 即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社会。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 关于“社会形态”“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国家消亡”等论述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范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社会具有三个特征: 消灭了阶级, 生产力高度发达, 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并结合中国实际演化而成, 最终指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类

文明新形态并非从资本主义文明直接过渡到理想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科学理论的长期实践、对社会主义文明模式的反复验证，将前人关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构想在中国不断实践深化、不断创新发展而转化为一种现实可能性。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为重点建设目标的“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态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完善、经济系统优化、文化导向积极、社会整体向上、生态关系平衡的深刻反映，体现了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诉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之风采特征。这种多样包容、科学现代、协调平衡、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道路当中。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智慧结晶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主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8]。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创新理论与实践摸索，逐步构建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同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发展模式。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用于具体实践，在全面抗战时期从政治、经济、文化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文明系统化发展路径的超前视野，为中国文明形态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毛泽东文明思想的指导下，邓小平结合实际情况，继续对中国文明发展道路进行探索。他指出：“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9]邓小平关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论述，强调了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既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又推动了中国社会形态的重大转型。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10]。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形成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三位一体”战略布局，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赓续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明确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并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战略地位，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明的论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与发展，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内涵进行了完善。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现代化的重点建设范畴，确立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整体发展。五个文明建设构建起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深刻阐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理论和实践基础，具有鲜明的现代化特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人类文明新形态赓续了“天下大同”“社稷为民”“贵和尚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贯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论述逻辑，符合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要求。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达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凝聚了中国共

杨可, 刘宗灵. 统一战线: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46-56.

产党人和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结晶。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蕴藏了中国特色统一战线理念

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探索出超越西方文明范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蕴藏了“多样一体”的统一战线基调。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强调“和谐共生”理念，体现鲜明的统一战线底色。首先，“和谐”有和睦协调、和而不同、关系融洽之意。现代社会中，和谐的深层含义在于社会之间存在普遍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相互信任的纽带。统一战线则是这一关键纽带。统一战线促进团结与联合，在新时代的一大重要作用是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要想追求一种真正属人的文明发展模式，就必须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努力平衡好‘同’与‘异’之间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各方面关系和谐，在多元中找到最大共识，“不断增强中国方案的国际认可度与接受度”^[13]。其次，“共生”被释义为双方彼此依赖，要以共赢为前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对内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要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因此，坚持统一战线，巩固、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和谐共生”理念为共识，画好最大同心圆，是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障，也是保证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前提、构建过程以及构建目标都蕴藏了“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理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统一战线，以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为奋斗目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不断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与创新，创造了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构建结果于统一战线工作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团结中国人民开展五个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前提；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及其国际影响，证明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号召力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流文明形态，符合马克思关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目标。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强调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统一战线的内在关联和紧密互动，阐明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法宝地位，立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五个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建设，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确途径。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同向发力，以先进思想、优越制度、优秀文化、科学手段、和谐理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探索出代表中华民族前进方向、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引领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统一战线的关联与互动

从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统一战线的内在联动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之路蕴藏于五个方面的文明建设事业当中，统一战线对于把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社会主体与社会构成的关系、人类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关系，具有集中性、引领性、促进性作用。二者的具体关联体现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之路涵盖了五个文明建设相互协调的发展路径，统一战线对于五个文明的共同发展具有强大的协调作用，五个文明建设依赖于统一战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凝聚、引领、整合作用。二者具有共同的原则、立场、目标。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统一战线不仅具有

内在联动性，亦在实践中保持着紧密互动。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统一战线具有共同特征：原则、立场、目标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二者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勇于自我革命，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根基，逐步构建起代表着中国先进道路、先进理论、先进制度、先进文化协调发展的中国文明范式——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坚持统一战线方针，长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探索、实践取得的共同成果。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法宝。“统一战线的本质即是党的领导方式，其宏观表现为党的领导能力直接体现在统战战略布局及其策略中。”^[14]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五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标志的当代中国文明形态，已然成为朝气蓬勃的东方文明形态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正蹄疾步稳地迈向现代化发展之路。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根本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以其科学、先进的执政理念深刻把握着社会发展规律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善于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历史经验和实践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共同发展的根本所在，是推进五个文明建设、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二者共同强调的根本立场。坚持人的全面发展，须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谈发展，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基本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站在人民立场，汇聚最广泛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政治文明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经济文明建设保证人民利益实现，以精神文明建设保证人民精神需求，以社会文明建设保证人民幸福生活，以生态文明建设保证人民拥有美好家园，这是五个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巩固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历史重合性、目标一致性、发展融合性。因此，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充分发挥团结、协调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在不同时代的整体诉求，也是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明确了全体人民的发展方向，揭示了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需要统一战线发挥团结、协调、聚合的重要功能。二者的内在联动性始终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而展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二者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以往社会主义文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反映了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状态，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价值趋向和根本目标。人类文明新形态旨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进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但这一目标无法直接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蕴含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进而推动世界现代化，既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发挥自身独特作用，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加快实现共同的价值目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夯实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民基础，汇聚了更多力量投入到五个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当中。

杨可, 刘宗灵. 统一战线: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46-56.

统筹、协调五个文明所涉及的复杂关系,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 亦是统一战线的价值所在。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统一战线提出更高要求：主题升华、职能扩大

人类文明新形态旨在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方面建立立体化、协调化的发展范式, 为人民群众创造出不同于任何时期、不同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新路, 为全体人类指明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前进路径。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统一战线将“和谐”作为哲学基础, 始终以服务于人民、协调复杂关系为己任, 从五个方面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为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了崭新视野, 也对统一战线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 统一战线的核心主题进一步升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由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现代文明范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其一方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中庸”, 另一方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样态的观点。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内涵, 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协调。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和伟大实践,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服务于人民大众, 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围绕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 协调处理复杂关系。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法宝, 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结果, 统一战线是过程。在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进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 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发挥了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团结力量作用、组织协调作用, 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良好、紧密的互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统一战线提出了更高要求, 使团结形态得到跃升——从对“人”的团结上升至对“文明”的认同。在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过程中, 统一战线进一步拓展了团结维度——从人、社会、自然的团结与联合层面, 拓展至包含人、社会、自然在内以及更高层面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团结与联合。这种变化将统一战线的核心意义推向了时代前沿, 从不同范畴围绕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 搭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统一战线的新格局, 保持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统一战线的紧密互动。

其次, 统一战线的职责功能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服务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从横向维度参与谱写中国共产党奋斗史和近代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内部关系发生变化, 需要通过协调关系深化团结。统一战线的优势是团结与联合, 尤其是对于五大关系处理能够助力解决人与社会、自然的突出矛盾。统一战线作为强大法宝, 始终发挥着统筹大局、协调关系的重要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为统一战线协调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视野, 打破了人们对统一战线的一般认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崭新文明形态, 其系统内在的关系协调程度与中华文明的发展脚步息息相关。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结构关系中, 物质文明是构成一切的根本“基础”, 政治文明是所有成果的有效“保障”, 精神文明是促进不同文明发展的核心“支柱”, 社会文明是滋养其他文明的优质“土壤”,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先决“条件”^[15]。五大文明之间相互支撑, 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框架体系。五大文明分别在其各自领域取得突出成果, 相互之间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以符合人

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良性循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行稳致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部关系涉及人、社会、自然三个主体，以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关系，要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的重要作用。统一战线的功能不仅限于对五大关系的处理，更重要的是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高度出发，传递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具有较强包容性的文明观，调节同一时空体系下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整体协调性和多元包容性。统一战线的统筹协调作用和先进理念传递，启发以新的文明模式、新的文明理念为世界文明发展指引前进方向。

（三）统一战线强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引领：最大公约数与最大同心圆

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超越古今、区别西方的价值引领，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创新性、创造性的贡献，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统一战线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不仅继续发挥调节统筹作用，还具有强化价值引领的作用。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在开放与包容中发挥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的优势，以独特的中华文明理念和优秀的社会主义文明理念引领人类文明脚步向前。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价值引领作用。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且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和资本始终服务于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社会、自然共生，真正做到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于中华传统文明且超越中华传统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强调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以思想创新、科学创新、制度创新等方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且超越了其他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在平衡中发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彰显着中国特色。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引领作用不仅需要本身具有独特性、前瞻性、创造性、发展性，还需要通过一定方式手段去加强和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如何放大、如何引领人民群众前进，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凝心聚力作用。统一战线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能够汇聚最广泛的力量，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重叠共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人类发展目标。围绕这一共识和目标，统一战线参与构建两个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引领得到强化，体现在统一战线推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上，统一战线能够增进不同利益主体的共识，减少摩擦，增加经济建设动力，推进全面共同富裕。政治上，统一战线能够服务政治制度完善，扩大政治共同体，巩固政治力量。精神上，统一战线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传递至群众心中，强调人民群众的参与者和享受者身份，激发人民共筑家园意识。社会上，统一战线统筹其他四个文明，帮助人民群众构建一个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国际上，统一战线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内团结不同社会力量、社会团体等各领域各阶层，对外团结不同国家，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优势，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由党和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有力体现。统一战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优势，是五个文明协调发展、走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有力证明。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有能力引领国家现代化

杨可, 刘宗灵. 统一战线: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46-56.

发展、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障。统一战线通过对中华文明建设进行内部统筹以及对其他文明进行协调, 在求同存异中增强文明互鉴交流, 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增进重叠共识, 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三、统一战线助推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实践进路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 并强调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 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12]⁷。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个文明建设构成了一套系统性的中国当代文明建设工程, 呈现出具有超越性、独特性、和谐性特征的新文明范式。统一战线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理论逻辑契合、历史逻辑重合、实践逻辑耦合、价值逻辑吻合等内在联系。在加强五个文明建设、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 统一战线不仅发挥着一以贯之的凝心聚力、统筹协调作用, 更是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引领, 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影响世界现代化的关键枢纽。

(一) 共享利益: 统一战线推动物质文明建设

物质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统一战线与物质文明建设互为促进, 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物质文明要求经济呈高质量发展状态, 我国经济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能源价格暴涨、供应链失衡等影响, 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风险积聚, 资金、技术、人才流动性增强, 国际贸易影响加大, 占我国出口总额 45% 的民营企业压力剧增, 物质文明建设面临新的挑战。物质生产作为支撑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 需要团结更多主体来夯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

统一战线在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利益共赢。统一战线要发挥团结的优势, 实现中华民族利益共赢。物质文明建设以更好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核心, 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核心的不同群体, 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主体性。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关键, 民营企业是实现利益共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统战工作要引导民营企业践行和谐、持续的绿色发展理念, 发展根植于中国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的特色商会组织, 参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统战部门统筹和规划民营企业内部中高级人才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团结和培养工作, 汇聚人才助力民营经济的转型需要。”^[16] 统一战线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汇聚不同群体、不同人才参与经济建设, 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实现利益共赢。物质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得到有力提升, 亦将为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 塑造认同: 统一战线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核。统一战线与精神文明建设互为奠基, 有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特别是西方加大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渗透和瓦解, 多元文化交流的双刃剑使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严峻。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与人民、集体与个人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指向。通过坚持统一战线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统一战线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强化认同塑造。第一，要将统一战线与中国特色治理经验有机结合。依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简称《条例》），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情况，展开具有针对性、互动性的工作。要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优势，深入基层进行摸底调研，了解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动态，寻找切入点，增进共识。要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引领作用，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要将统一战线与新型文化传播相结合。积极鼓励统战工作、红色文化以及新型文化产业相互融合，尤其是用好数字、媒体等具有专业性、影响力的行业，通过数字统战、统战精准化、舆论引导等前沿方式，形成多效合力，通过文化认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战线始终坚持科学的、先进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吸收优秀文化精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融合与发展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稳步前进。

（三）发展民主：统一战线推动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保障。统一战线与政治文明建设互为依存，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大党长期执政难题是政治文明建设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用“民主”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中国政治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嵌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重要表达形式，现代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逐步开创了政治文明新局面。统一战线为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创新制度、完善机制提供了整全性的政治力量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统一战线的顺利实施依赖于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存在着契合关系。统一战线作为党领导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手段，将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统一战线在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助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统一战线发挥民主动员功能，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积极发展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统一战线发挥民主表达功能，统一战线的制度安排能够使分散的民意得到系统、综合的表达，政治协商搭建了吸纳各方建议的平台。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统一战线发挥民主决策功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统战工作使得更多基层群众意见转化为重大决策。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统一战线发挥民主监督功能。《条例》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使现代化、特色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足够动能带领人民群众迈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关键所在。

（四）共同治理：统一战线推动社会文明建设

社会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缩影。统一战线与社会文明建设互为依赖，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统一战线实际上对社会文明的促成因素发挥保障作用，包括在政治文明方面巩固思想政治基础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在物质文明方面协调政商关系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精神文明方面加强认同塑造保障社会氛围和谐，在生态文明方面强化和谐共生意识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文

杨可, 刘宗灵. 统一战线: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46-56.

明建设是所有社会主体的共同责任。当前, 我国社会文明建设主要依靠政党推力, 这既是优势, 也存在短板。“党政推力在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难题和基础问题上具有显著效能, 但是基层社会治理也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力量, 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7]因此, 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需要通过统一战线的社会号召力来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活力。

统一战线在推动社会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共同治理。首先, 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价值引领作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为根本引领, 传递共建、共享、共治理念, 深化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认识, 激发社会主体内驱动力。其次, 要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协调作用, 统筹各方利益, 化解社会矛盾, 展开多样化、科学化的团结工作, 促进政党、社会、群众关系融洽, 形成多元共治的协同局面, 推动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最后, 要发挥统一战线联系社会基层的桥梁作用, 建立广泛联系, 扩大工作覆盖面, 增强社会治理的民主性、凝聚力。社会文明进步为统一战线提供更多的发展条件。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融入社会整体发展进程, 是优化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文明建设进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法宝。

(五) 和谐共生: 统一战线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体现。统一战线与生态文明建设互为引领, 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强调: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2] 50} 生态文明建设以“和谐共生”意识贯彻统一战线思维, 联合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自然协调发展, 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统一战线思维的高度融合。统一战线能够引导广大成员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将“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前提”意识渗透进大团结中, 引领更多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统一战线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和谐共生。第一, 统一战线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倡导, 引导成员参与环保事业, 吸纳科技团队和专业人才、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企业, 加快促进绿色转型, 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 统一战线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倡导, 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要将古今中外优秀生态治理经验与实际相结合, 协调民营企业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关系。第三, 国际统一战线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倡导, 传递中国绿色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携手共建绿色家园, 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生态文明实践, 以统一战线思维促进群众达成生态共识, 壮大生态文明建设力量, 以现代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融合发展理念服务中华民族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 以五个文明建设为着力点, 逐步构建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统一战线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 二者的内在联动在于双方都具有共同原则、共同立场、共同目标。紧密互动在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契机, 而统一战线能够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引领功能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深厚的根基。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地位, 是我们致力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引领全国人民走向高度文明社会的重要方略。

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也为新时代新征程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管道与力量辐射平台。在统一战线视域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既充分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性、规律性、创新性与可持续性，也清晰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之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之下，中华民族正在全力建构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双重价值导向：立足中国，坚持最大公约数和画出最大同心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向世界，以统一战线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东方文明的现代化新模式为辐射光源，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为世界人民走向更高级文明形态的社会发展之路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韩喜平，郝婧智. 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4）：49-56.
- [2] 孙正聿.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J]. 哲学研究，2022（1）：5-11+125.
- [3] 吴凯.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与中国叙事 [J]. 探索，2022（4）：13-26.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4.
- [5] 田心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11）：12-22+113.
- [6]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9.
- [7] 韩震. 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历程 [J]. 人民论坛，2021（34）：16-21.
- [8] 吴海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 [J]. 理论视野，2021（11）：49-54.
- [9]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8.
- [1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32.
- [11] 秦宣，林建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9.
- [1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
- [13] 何虎生，赵文心.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法宝、和合与平衡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1）：123-133.
- [14] 江国华，乌日尼勒. 习近平“爱国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25-32.
- [15] 陈金龙，蒋先寒.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由来、特征与价值 [J]. 学术研究，2021（9）：1-5.
- [16] 朱尉，王聪玲.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探析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5）：73-77.
- [17] 周进萍.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J]. 重庆社会科学，2022（10）：97-107.

责任编辑：林华山



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 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

戴洁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现代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与团结整合是国家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现代国家既要加强政治团结，也要加强政治团结与社会团结相互配合的大团结。社会团结与整合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依托。社会团结与整合的实现，既有自发的生成机制，亦有自觉的生成机制。在经济与社会高度变迁与转型的时代，社会分化呈现出普遍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来加强社会整合。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集中体现在两个维度：以政治团结的方式提升社会团结；以社会善治的方式增进社会团结。前者在统一战线中得到充分地证成，后者散布于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有利于为良好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团结提供新的支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统筹调和多样社会力量的根本保证，政府职能统合是应对社会治理复杂性的关键要素，民间社会的动员与共同参与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基础。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有利于构建和完善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即以社会善治推动社会团结。社会工作部的组建，也体现了社会治理体系化与集成化的发展方向，将开创社会团结与整合新格局，打造中国特色融合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大治理格局。

关键词：社会工作部；大团结；大治理；大统战；社会团结；政治团结；社会治理；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21；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057-13

DOI：10.13946/j.cnki.jcqiis.2023.03.006

作者简介：戴洁，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戴洁.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J].统一战线学
研究，2023（3）：57-69.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领导全体人民团结奋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该论断深刻地指出在当前和今后国家与社会发展中应着力维护高度团结局面，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团结为动力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表明，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瞬息万变与永不止歇的革新潮流之下，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一旦有所不慎，社会分化与社会解离将犹如一把利刃，顷刻之间阻断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甚而使国家和社会堕入停滞乃至倒退的渊谷。远至 20 世纪 70、80 年代诸多拉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教训，近至近年来一些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因种族、宗教、贫富极化等社会分化与撕裂问题而导致严重的国家治理困境，都令人深思与警觉。如何在社会元素纷繁芜杂且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始终能生发社会凝聚力、维系社会共同体、抱持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核心议题。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团结是赢得人心的重要方法。现代国家既要加强政治团结，也要加强政治团结与社会团结相互配合的大团结。社会团结在本质上需要党和国家引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揭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峥嵘岁月的革命年代，统一战线凝聚起各方面的社会政治力量，以创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为共同目标而团结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伴随经济生产和生活领域的繁荣兴盛，新兴的社会力量不断涌现，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成为党建引领、统战团结需要实现工作覆盖的新范围。“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1]新时代新征程要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社会团结的实现和保障，既需要政治团结的持续推进，亦需要党和国家对社会的良善治理。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架构大统战与大团结格局，需要进一步建构新的支撑框架。近年来，社会治理领域中出现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要求在人民群众反映问题强烈的领域，在社会矛盾和冲突集中的领域，在两新社会组织及新就业群体蓬勃兴起、社会分化日趋显著的领域，需要持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通过系统性、整体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完善和提升，重点解决影响和阻碍社会团结的突出问题，着力覆盖社会团结的真空或匮乏领域。近年来，党和国家的社会治理与团结新兴社会力量的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不仅实现了“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投入更多生产性活动，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使民营企业主形成并巩固了与执政党的长期互惠关系以及彼此具有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有研究认为，“党建在社会组织中的治理嵌入以及社会组织发展中对党建的‘借道’整合”，不仅提升了社会组织的治理绩效，而且加强了社会组织的向心力^[3]。还有研究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社会工作与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了联结，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4]。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使社会治理的目的和目标、结果和效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团结，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作出了相应政

策和制度安排。该方案指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两新’工委职责”^[5]。此次党中央专门成立一个职能部门统筹领导社会治理,契合社会治理体系化与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其治理方式和效能有利于形塑社会团结新格局,打造中国特色融合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大治理格局。鉴于此,本文重点从社会学的大治理观对组建社会工作部开展理论探析。

二、现代社会转型中结构分化加速

近现代经济与社会转型自工业革命发端。经济领域中生产方式天翻地覆的疾速变革,猛烈冲击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传统乡土社会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变迁的速度相应迟缓。“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6]在平缓的社会变迁中,乡土社会以天然的血缘与地缘联结形成家庭、家族、村落等基本社会共同体。这些人类基本的共同体具有天然的相似性,拥有相似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由家庭形成家族,家族形成村落,村落形成乡村和集镇,进而构筑成整个国家与社会。此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环节社会”^{[7] 136},即社会由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环节构成,每个环节的功能大体是自给自足的,环节之间并不相互依赖与互嵌,此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呼应着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方式。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社会密度的扩张势必引发快速的技术革新与社会分工,进而推进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密度的扩张,通常意味着人口密度增加以及社会成员之间传播和交流信息的密度增长。尤其是伴随城市的大规模出现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人口在一定区域聚集、区域内传播与交流的信息激增,进而使社会密度迅速增加。社会密度的增大、社会成员在特定区域内的聚合与集中,使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人们不再需要完全的自给自足,而可以依靠自身专业化生产创造的价值,换取他人生产的专业化产品。自此,自给自足的“环节社会”逐渐趋于解体,社会不再呈现为一个同质性强的环节构件,而是出现异质性强的个体,以及形成社会分化与多元化的结构。

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开启新的进程,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转型的40余年,使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与社会现代化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城镇化率提高十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七。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8]。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在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经济财富的同时,也不断推进着社会领域的接续转型与变迁。在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化与变迁的速度加快。

其一,利益结构分化。以居民整体的收入水平而言,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转型以来,我国经济

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惠及全体人民。2015 年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 966 元，到 2022 年快速上升到 36 883 元，增长了 67.9%^[9]。然而另一方面，以收入结构而言，不同居民群体的收入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 2022 年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来看，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 601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 303 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0 598 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7 397 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0 116 元^[10]。高收入组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组的 10.48 倍，两者之间的差距较为显著。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在客观利益分化的基础上，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观意识日益增强。

表 1 2015—2022 年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单位：元）^[11]

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份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低收入组	8 601	8 333	7 869	7 380	6 441	5 958	5 529	5 221
20%中间偏下收入组	19 303	18 446	16 443	15 777	14 361	13 843	12 899	11 894
20%中间收入组	30 598	29 053	26 249	25 035	23 189	22 495	20 924	19 320
20%中间偏上收入组	47 397	44 949	41 172	39 231	36 471	34 547	31 990	29 438
20%高收入组	90 116	85 836	80 294	76 401	70 640	64 934	59 260	54 544
均值	36 883	35 128	32 189	30 732	28 228	25 973	23 821	21 966

其二，组织结构分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乡社会的组织单元形式相对固定且同质，在农村实施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组织单元的人民公社制，在城市施行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组织单元的“单位制”。社会成员通过归属于某一特定的公社组织或单位组织，继而实现社会整合与团结。改革开放开启的现代化转型，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城市中原有的主导组织形式“单位制”逐渐式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以互联网技术为旗帜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快速步入信息时代，知识与技术在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关键的作用，通过创新提升的劳动生产效率、经济与社会活力远超过之前所有世代。与此情形相对应，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混合所有制企业、新经济组织与新社会组织等“两新组织”方兴未艾，且新型组织中的新就业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

表 2 2015—2021 年我国不同法人性质的单位数量（单位：个）^[12]

法人性质	年份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国有控股	323 277	293 473	266 434	325 800	310 992	291 263
集体控股	187 668	180 550	172 503	249 946	243 393	253 199
私人控股	27 545 002	23 903 057	19 811 755	16 204 143	12 537 206	10 677 612
港澳台商控股	135 201	131 106	123 562	113 103	103 849	101 730
外商控股	109 043	102 477	92 856	111 628	99 987	99 693
其他法人	365 021	444 793	624 160	1 093 062	1 323 021	1 169 757
总数	28 665 212	25 055 456	21 091 270	18 097 682	14 618 448	12 593 254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笔者整理，部分数据为笔者计算所得；统计年鉴中缺少 2018 年数据

戴洁. 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 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57-69.

表 3 2015—2019 年在不同法人性质单位中的就业人数 (单位: 万人) ^[12]

就业人数 \ 年份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国有单位	5 473	5 740	6 064	6 170	6 208
集体单位	296	347	406	453	481
私营企业	22 834	21 376	19 881	17 997	16 395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 157	1 153	1 290	1 305	1 344
外商投资企业	1 203	1 212	1 291	1 361	1 446
个体经济组织	17 692	16 037	14 226	12 862	11 682
总数	48 655	45 865	43 158	40 148	37 556

注: 表中数据来源于笔者整理, 部分数据为笔者计算所得; 统计年鉴中缺少 2020、2021 年在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中就业人数的数据

表 2 和表 3 的数据显示出我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其一, 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组织迅速增多, 诸多不同的所有制成分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所有制形式, 由份额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控股。其二, 非公有制形式的企业和组织发展速度加快, 非公有制企业和组织的数量占全部法人组织总数的份额由 2015 年 95.7%, 上升至 2021 年的 98.2%。其三, 在混合所有制组织、非公有制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个体经济组织中就业的社会成员数量快速上升。表 3 数据显示, 2019 年仅在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中就业的社会成员数量已超过 4 亿人。伴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 新的组织形式与就业形式仍然在持续涌现, 社会成员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组织形式中就业及自我雇佣的就业日益广泛。

其三, 认同结构分化。认同是社会成员对于自身与他人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情感、处境、观念、价值等而产生的亲近之感, 进而影响社会成员更倾向于采取合作性的态度与支持性的行为。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 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方式单一, 久居在一起的社会成员联结成自然的社会共同体, 并以集体意识约束和规范社会行为, 形成高度同构的社会认同。家庭、家族、村落、社会乃至国家的认同结构来自同质性构建的集体意识。“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 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 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7] 42}, “当集体意识完全覆盖了我们的整个意识, 并在所有方面都与我们息息相通的时候, 那么从相似性产生出来的团结就发展到了它的极致状态, 但此时此刻我们的个性却已丧失殆尽”^{[7] 90}。在此种高同质性的“环节社会”中, 强大的集体意识塑造着社会成员认同的统一性。

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加速了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 增加了社会成员之间交往的密度。现代社会集约型的生产方式与契约型的交易方式, 使社会成员不再固守于某一个特定的劳动、居住和生活之地, 而是在不同的地域、职业、生活场景中快速流动。社会流动还增加了社会成员的交往密度, 社会成员的交往不再局限于天然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内部, 而是扩展到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生活场景中的其他社会成员。信息时代的到来更使社会成员能够触及的信息数量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各式各样的信息、观念、价值在信息网络平台中得以充分地展现和议论^[13]。

概言之，社会流动与社会交往的迅速扩张，增强了社会成员的异质性，以集体意识为纽带的认同结构面临新挑战。

三、现代社会分化的不同类型及挑战

现代社会是具有高度“自反性”特质的社会。“自反性”内含的一个首要维度即“自我对抗”^[14]。现代社会发展中蕴含着不断自我变革、自我革新，进而削弱既存的现代性而持续向新的现代性转变的要素。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5]正是在“自反性”特质的推动下，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中的社会分化力量始终未曾停歇，而是持续地自我变化与自我更新，进而使全世界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卷入波澜壮阔的社会分化与革新浪潮之中。

在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社会分化的加速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事实，但其自身并未具有绝对的价值意义与内涵。如若对此社会事实进行价值判断，则需要以分析社会分化的不同类型为前提。一方面，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顺应历史时代沿革的要求、符合社会成员的合理需求，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社会分化，无疑通常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是人类文明持续提升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与人类社会的理想与期待相异，不合理、反常的社会分化则可能给社会成员造成困扰和疑虑。在严重的情形下，社会成员间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与不合作的行为，可能引致社会分离与撕裂的巨大冲击。

（一）常态的、合理的社会分化

现代化社会转型是一项庞大而繁复的工程。此过程中社会结构的精细分化，有助于社会系统适应复杂变化的环境。社会之所以能被视为一个整体系统来感知与对待，是因为它拥有自身的边界，在边界之外则是社会系统所处的环境。对于任何系统而言，需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与维持，因而在社会系统中，由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而呈现出的特定结构，通常对应着适应环境复杂变化的功能。环境常具有动态的复杂性。“所谓复杂性，就是把它理解成可能性的总体性”，“系统的环境始终是过度复杂，无法加以概括和无法加以控制的”^[16]。在社会系统中，社会结构的建构与设置需要具有降低环境复杂性的功能，能满足“减少与某相关行动系统有关的环境复杂性的需求”^[17]。社会结构的精细分化，意味着社会系统在动态地、弹性地适应环境变迁，“不断的分化允许系统与其环境发展更有弹性的关系，结果就是增加系统的适应程度”^{[16] 302}。

社会结构的专门化，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社会变迁的类型中，社会发展是一种正向的社会变迁，即进步的、积极的社会变革过程。这意味着“人类从原始的文化匮乏、愚昧、不安全状态，慢慢地、逐步地、不断地进展到更高水平的文明，这种进展只是偶然受挫，它会继续从现在走向未来”^[18]。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初民的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一直伴随着社会结构持续地专门化的历史过程。“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19]到了近现代社会,基于知识和技能的社会分工体系日益深入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专门化,使社会持续地进步与发展。

(二) 反常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化

反常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化,通常有如下几种表征和类型:

其一,失范的社会分化。在现代化疾速的变迁与转型期,若社会分化的速度过于迅疾,原有社会规范不再能承担指引与约束社会成员社会行为的功能而逐渐衰落。同时,若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和建立、尚未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此时社会成员的行为很可能会失去规范的控制,社会的凝聚与整合将面临危机。“这些规范不仅规定个人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而且个人的需求和愿望本身,也部分地是由这些规范决定的。如果这种起控制作用的规范性结构遭到破坏和瓦解,个人的行为也将同样失常并陷入混乱——个人将因其活动失去意义而沦于空虚境地。失范正是规范对于个人行为的控制被打破之后的无序状态。这种状态推至其极,就是‘纯粹个人主义’的状态。”^[20]失范的社会分化会引致社会成员极度地追求利益,社会呈现出冷漠疏离的原子化形态。

其二,不公正的社会分化。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常态的、合理的社会分化通常是基于职业的分化。在职业分化的基础上,社会成员呈现出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的区别和差距。职业作为社会分化的主要依据,通常被认为是合适和可接受的,原因在于职业分化是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生产要素的专门化与专业化,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的效率与效能以及社会生活的福利与福祉。公正的社会分化中始终蕴含着新的社会团结力量,社会成员接受公正的社会分化,并在此种社会分化中形成相互依赖、互相嵌合的有机团结。但是,如若社会分化建立在不平等与强制性的基础之上,社会成员在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社会地位上的状况受制于先天的出身或强制性的权力等因素,此种社会分化则是不公正的,不公正的社会分化将引致激烈的社会冲突与对抗。

其三,异化的社会分化。“异化”是马克思在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反常社会分化现象时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本义是将人工具化而非人性化的社会分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分化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两个阶级,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工具化和异化。“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21]工人在职业分化中持续地被劳动异化,工具化的劳动成为压迫人、支配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受分工制约的不同的个人的共同生活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生活本身不是自愿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22]在异化的社会分化中,社会成员感受到社会加之其身的压迫性与支配性,而倾向于与社会分离。

综言之,若社会分化超过常态的、合理的限度时,则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解组。社会解组是指一个社会趋向分散与解体的过程,即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之间,在反常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化的作用之下,相互之间逐渐失去社会关系与联结。“社会原子化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解组运动的直接产物,是对社会整合状态的否定。”^[23]当社会结构的分化,意味着离心、分散与联结匮乏时,社会成员普遍经历着“一种脱离道德基础,不再有任何准则而仅有互不相关的冲动,不再有延续感、民族感和责任感的人的精神状态”;“一种个体的社会团结感(其精神力量的主体)被打破或被致命

削弱的精神状态”^[24]。社会系统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需要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具有关联性，并通过关系联结成整体。但是反常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化则会破坏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凝聚机制，使社会结构中要素间的联结断裂，进而使社会系统的持续存在面临严重危机。

四、统一战线：团结新兴的社会力量

社会团结与整合的生成机制有自发团结与自觉团结的区别。“‘自发’和‘自觉’是表征人类生存、活动状态的哲学范畴，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的解放、个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就人类特有的价值实践活动而言，其标志着对自身活动是否遵循历史必然性的把握程度，包括自身实践活动的规律性，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遵循程度。”^[25]具体而言，若要判断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是自发的抑或是自觉的，需要考察社会成员在实践社会行为时是否具有主体意识、能否理解其行为蕴含的社会意义、是否掌握了约束其行为的客观规律、是否有计划和目的地实施行为，是否能预见行为的结果和后果等。

其一，自发的社会团结与整合。这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社会团体之间，以相同的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为纽带，基于共同的生活利益、情感、观念、价值等而自发联结与整合成一个整体。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中古老和原初的团结形式。在工业社会中，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与专业化水平提升，加速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但在新的社会分化与流动中亦孕育着新的有机社会团结与整合的萌芽。“在第二种团结里（意指有机团结的情况下），个人之所以依赖社会，是因为它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7] 89}“第二种情况指的是，当我们与社会发生连带关系时，社会是由一些特别而又不同的职能通过相互间的确切关系结合而成的系统。”^{[7] 89-90}在工业社会的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的情形下，社会成员之间具有彼此依赖、相互依存的深层需要，是形成新的有机团结的潜在基础与前提。

然而，有机团结的潜在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定能成就社会团结与整合的现实。在工业社会转型中，先发展国家中出现的由劳资矛盾和冲突引致的工业和商业破产、阶级对抗导致的社会撕裂、异化的社会分化引起的社会失调等，不仅不能增进社会团结与整合，反而会引发社会分裂与解体的危机。究其原因在于，在复杂且多样态的社会分化情形下，单纯依靠自发的相互依赖机制，而未能深刻理解、掌握和遵循客观历史与发展规律时，自发的社会行为只能是盲目地为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所支配和驱使，即“主体可能觉察到自身生存状况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还不知道其所以然的必然性和规律性”^[26]。此种自发的社会团结与整合，在面对复杂现实时是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

其二，自觉的社会团结与整合。这是指价值主体主动意识和理解到社会团结与整合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在掌握社会团结与整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有计划、有目标的行动，以特定的方式和路径实现社会团结与整合的目的。自觉的社会行动，意味着价值主体主动发现了蕴藏在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不再听任历史必然性的控制和役使，而是在客观规律的指引下，有觉知、有意图地展开社会实践，实现社会行为的过程与目的、人类实践与客观规律的和谐统一。由“自发”

到“自觉”的过程, 是人类社会自我发现、自我解放、创造历史与未来的历程。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社会密度持续扩张, 社会团结与整合无法完全依靠自发形成, 需要自觉的团结机制。

统一战线是我国在现代化转型中自觉建构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与社会团结机制, 是党和国家在掌握政治与社会团结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自觉制定且持续发展的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作为自觉的政治与社会团结机制的统一战线, 既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 亦是服务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机制。“统一战线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 以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为重要原则, 具有多层次的安全功能”^[27], 因而要“坚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8]。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继续扩大, 促进构建大团结大联合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机制和理念, 听取意见和建议, 发现、联系和培养其中的代表人士, 开展相应的政治安排与政治吸纳, 不断团结新兴社会力量。

当前, 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社会力量不断出现。表 2 和表 3 的数据显示, 我国目前混合所有制单位、非公有制单位达到 2 800 余万家, 在混合所有制单位、非公有制单位中就业的社会成员超过 4 亿人。截至 2021 年底, 我国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社会组织 90.2 万个, 比上年增长 0.9%; 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 1 100 万人, 比上年增长 3.6%^[10]。我国行业协会商会数量达 11.39 万家, 其中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 886 家, 全国行业协会商会共拥有企业会员总数超过 746 万家, 总资产约 3 500 亿元, 基本形成了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门类、各个层次的行业协会商会体系^[28]。在蓬勃发展的新兴社会力量中, 增长尤为迅速的是新就业群体。目前, 它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络平台实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就业的劳动者群体。他们的人数规模较为庞大, 职业稳定性相对弱、流动性强, 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签订的劳动雇佣形式灵活多样。

统一战线在面对两新组织、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形下, 展开诸多推进团结与整合的工作。各个地方的组织、统战部门积极探索团结新兴社会力量的具体措施和可行路径。一是加强地区内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 并推动国有机关企事业单位与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组织形成联动机制。二是组织推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成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参与社区治理、公益行动和志愿服务等, 使他们成为社会治理与服务的新兴力量。三是支持两新组织健康发展, 培育两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代表人士, 使其成为社会团结的重要力量和桥梁纽带。

五、组建社会工作部: 以社会善治增进社会团结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机遇期, 同时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态势来看,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依然存在深层次矛盾, 党的建设仍然面临顽固性、多发性问题, 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增多^[8]。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发展期, 社会团结与整合是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在此现实情形下, 单纯依靠社会自发生成的社会团结与整合形式, 不仅需要长久时间的磨合与积累, 而且在分化与加速变革之中, 会显得脆弱和力不能及。因此, 我国需要从顶层设计高度进一步巩固自觉的社会团结与

整合机制。与此同时，当前统一战线在发挥政治与社会团结功能时，主要是通过政治吸纳、协商民主等方式增进社会团结，工作对象亦限于党外人士尤其是其中的党外代表人士，这使得社会团结与整合的形式和工作面受到一定制约。从大团结角度看，中央部署成立社会工作部，旨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拓宽自觉的社会团结与整合形式、路径和方式。

（一）党领导治理保障社会团结

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归属于党中央的职能部门，按照机构职责相对独立地行使特定的管理职能，并组织、实施、协调本系统和领域的工作。“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在社会治理领域加强党的领导，有助于社会治理的体系化与协调化。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民在社会领域中的治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使全球社会步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与激烈变革期，面对日益庞大复杂、分支繁多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需要寻求新的方法管理与服务社会，“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它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9]。

社会治理理念蕴含“多样化”的视野，存在着多种主体、多种方法、多种路径等，其核心是通过多主体的合作与互动实现治理的目标。实施良好的社会治理，需要多主体共同尽责地合作与协同，但是涉及社会群体与公共生活及其间利益的集体行动时，却常常面临种种陷阱与危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30]。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体现出由党中央统一集中领导社会治理的理念。党统一领导社会治理，有利于协调社会治理中的多种主体，推动构建大的社会团结与整合格局。

（二）政府主导治理促成社会团结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划定中，统合了若干原属有关党的机构、政府部门的职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指出：“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央社会工作部划入民政部的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拟订社会工作政策等职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划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归口承担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职责，划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全国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等职责。”中央社会工作部与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设计有所差异：后者通过政治团结推动社会团结，前者通过具体的统合政府部门职能实施社会治理、作为维护社会团结的抓手。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完善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是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承担着社会治理领域的主导职责。伴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社会治理领域相应地由简单治理向复杂治理转型。社会成员利益的分化及对自身利益、权益维护的主体意识增强，不同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和纠纷的情形凸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1]利益的表达与诉求、权益的冲突与矛盾，是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复杂问题，尤其集中体现在人民信访工作、基层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等工作中。之前，这些政府工作职责分散在不同的行政部门之中，易于受到单一行政部门职能与职责有限性的影响，难于统筹处置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进而使社会治理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凸显，这不利于社会团结与整合。中央社会工作部统合了多个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有利于系统、综合地应对社会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吸收

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调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分化, 解决社会治理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以良好的社会治理为着力点促成社会团结。

(三) 社会协同治理共建社会团结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重点在社会领域。伴随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 社会领域出现诸多新现象与新问题。一是新经济组织方兴未艾,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如潮水般涌现。二是新社会组织生机勃勃, 在政府与市场之外非政府与非营利型组织兴起, 涵括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各类群众团体等民间性组织。三是新就业群体规模日益扩大, 在信息网络时代, 以平台经济等为显著表征的新产业形态日新月异, 围绕新的产业形态如网络物流、网络运送、网络约车等出现许多新就业群体。面对诸多新兴的重要社会力量, 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 以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 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 以引领新兴社会力量健康有序地发展, 增强两新组织及新就业群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社会治理的理想格局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基础。在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变迁与转型期, 社会领域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持续增强。此种情形之下, “不存在对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实现完全或总体控制的情况”, “要想对社会的多种目标在一个宽广的空间和实践范围内进行调控”^[32] 是不易实现的。因此, 需要有效且有序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并在共同治理中达成社会团结与整合。按照这次机构改革方案, 中央社会工作部承担推动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 一是以党建引领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两新组织、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 二是指导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社会管理、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的专业化、社会化水平; 三是统筹全国志愿服务工作, 倡导志愿精神, 引导民间资金、民间组织、社会公众参与慈善与志愿行动, 引领社会力量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共建团结的共同体。

六、结语

现代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 社会分化与团结整合是国家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社会分化的持续加速集中体现在利益结构、组织结构与认知结构分化等层面, 且其结果和功能具有不同的类型。一方面, 常态的、合理的社会分化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 伴随社会结构的精细化与专业化, 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繁荣。另一方面, 反常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化则会损害社会团结, 影响社会稳定与良好秩序; 严重情形下更可能导致社会解体, 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社会分裂与动荡。社会是国家的基础, 当社会分化的规模和速度超过国家和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承载能力时, 依赖完全自发生成的社会团结形式是不够的, 需要强有力的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 以使社会在激烈变迁中保持稳定与整合。统一战线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 其核心在于通过政治团结促进社会团结。与此同时, 我国大团结格局仍需进一步拓展。社会工作部的组建, 有利于构建和完善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 即以社会善治推动社会团结。在此之前, 我国社会治理的结构呈现散点式分布特征, 散布在国家与社会的各个层面, 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疑难和复杂问题需要通过高效统筹进行解决。“此次成立社

会工作部，由执政党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从‘大治理观’的统筹整合思维来看，它有助于促进社会的一体化治理。”^[33]社会工作部的组建，致力于统筹社会治理的多重维度，在推动社会治理的体系化与集成化的过程中，调和多元社会利益、解决复杂社会矛盾、动员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在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持续推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N]. 人民日报, 2021-01-06(1).
- [2] 何轩, 马骏. 党建也是生产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机制与效果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8(3): 1-24.
- [3] 侯利文. 社会组织党建的过程与机制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 2021(3): 15-24.
- [4] 哈曼. 社会工作党的建设与党的群众工作新联结[J]. 社会与公益, 2018(9): 86-87.
-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N]. 人民日报, 2023-03-17(1).
-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
- [7]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敬东,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9]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5 年/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6-02-29) [2023-04-18] / (2023-02-28) [2023-04-18].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899041.html.
- [10]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3-02-28) [2023-04-18].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 [11] 国家统计局. 2022 年中国统计年鉴[EB/OL]. (2023-02-28) [2023-04-18]. <http://www.stats.gov.cn/sj/nds/2022/indexch.htm>.
- [12] 国家统计局. 2016—2022 年中国统计年鉴[EB/OL]. (2023-02-28) [2023-04-18]. <http://www.stats.gov.cn/sj/nds/>.
- [13] 戴洁. 信息社会结构分化与包容性团结: 层次、形态与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1): 51-61.
- [14] 乌尔里希·贝克, 安东尼·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 自反性现代化[M]. 赵文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9.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30.
- [16] 刘少杰. 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97.
- [17] 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 张茂元,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51.
- [18] Nisbet R.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10.
- [19]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93.
- [20] 塔尔科特·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 张明德, 夏翼南,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430-431.
- [21] 马克思. 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9.

戴洁. 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 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57-69.

-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5-86.
- [23] 田毅鹏, 吕方. 社会原子化: 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 [J]. 天津社会科学, 2010 (5): 68-73.
- [24] Maclver R.M. The ramparts we guard [M].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55: 84-85.
- [25] 裴学进. 自发与自觉: 主导价值观转化为主流价值观的两种方式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 (10): 102-110.
- [26] 孙伟平, 罗建文. 从自发到自觉: 民生幸福的价值追求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 29-33.
- [27] 林华山, 龚静阳. 大安全与大统战: 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74-92.
- [28] 李昌禹. 我国行业协会商会数量达 11.39 万 [N]. 人民日报, 2022-08-25 (4).
- [29]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 (1): 20-32.
- [30] 曼瑟·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 [J]. 陈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3.
-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87.
- [32] 鲍勃·杰索普. 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 以经济发展为例 [J]. 漆燕, 译.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2019 (3): 52-67.
- [33] 徐勇. 以“大治理观”看社会工作部 [EB/OL]. (2023-03-27) [2023-04-20]. <https://news.bjd.com.cn/2023/03/27/10377900.shtml>.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新实践： 政党—人民关系视域下组建社会工作部考察

韩碧舟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中央决定组建社会工作部并以此推动对“体制外”经济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覆盖，体现出“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综合治理方案。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组织的团结体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战略的创新，实现了从西方语境下“国家—社会”范式到中国语境下“政党—人民”范式的转型升级。党对经济社会组织的团结工作在本质上是党不断调整这些组织和群体的发展方向，使它们从根本上服务于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团结各界社会团体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展现出政党整合人民的不同方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深刻理解党与人民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团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包括：处理好党的领导与释放社会活力之间的关系，明确党与团结对象共同的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政治社会整合的中国方案。这些经验也为新时代新征程协同构建对社会领域的大团结格局提供了现实启示：系统化开展团结工作，将团结工作与团结对象具体情况有机结合，及时将团结实践的积极成果公共化、学术化、法治化。从政党与人民互动的视角出发，不断赋予优良传统以新的生命力，有助于把握“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一体化治理方略，形成中华儿女大团结并共同致力于实现强国复兴目标的生动局面。

关键词：经济社会组织；国家与社会；政党与人民；大党建；大社会；大统战；社会工作部

中图分类号：D621；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070-15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3.007

作者简介：韩碧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韩碧舟. 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新实践：政党—人民关系视域下组建社会工作部考察[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3）：70-84.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1]为落实党的二十大的部署,中共中央在深入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草案)》。该草案经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后,其中国家机构改革部分的内容经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指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两新’工委职责”^[2]。

组建社会工作部鲜明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指出:“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突出重点行业和领域,针对性比较强,力度比较大,涉及面比较广,触及的利益比较深,着力解决一些事关重大、社会关注的难点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3]就覆盖范围而言,除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之外的几乎全部“体制外”领域都将成为社会工作部开展党建工作全覆盖的空间。就覆盖层次而言,团结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本身也是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工作部开展相关领域党建工作时,必然会同时涉及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可见,社会工作部的职责职能体现党建引领下的“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治理方略,统一于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治理需求。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关系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梳理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有助于我们站在更高的视角加深对“大党建+大社会+大统战”治理格局的理解,为党更好领导“大社会”工作提供有益借鉴。由于“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工作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本文拟从政治学角度切入,对历史上党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其中的经验、启示展开讨论,以期为今后党加强对经济社会组织的团结工作提供一定参考。本文所讲的“经济社会组织”主要指由人民群众组成、带有自发性质的组织或群体,不包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这样的“体制内”组织,但涵盖松散性甚至仅具有共同特性却完全分散的社会群体。

二、理论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组织的团结体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战略,能够大致对应政治学领域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不过,西方舶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框架往往预设国家与社会的天然对抗逻辑,而其结论往往指向国家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必然面临的困境。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有效整合起来的成功经验而提炼出“政党”与“人民”两个重要范畴,

赋予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以丰富的中国内涵，使得从“国家—社会”到“政党—人民”的范式转换成为可能。这种范式转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启发。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代表性西方研究进路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研究中颇为活跃的一个领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对象是一国管辖范围内政府与政府之外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其政治发展历程中面临国家建设和社会整合的双重任务，能突出体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易变性，因此广为比较政治研究所关注。由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涉及面极其庞杂，此处仅考察对本文主题有较大启发价值的相关研究成果。

比如，亨廷顿认为，后发现代化国家频繁出现的政治秩序失控，根源在于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兴阶层和群体卷入政治带来的冲击，突破了政治体制的容纳能力^[4]。亨廷顿将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于政治参与的政体称为“普力夺政体”^{[4] 60-61}。在这种政体形态中，包括军人在内的各种社会群体都会深度介入政治当中，而国家缺乏有效的制度和能力来驾驭这些群体，常常陷入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恶性循环当中^{[4] 161-214}。此外，亨廷顿还提出，政党力量常体现在组织的复杂性和深度，特别是体现在与工会、农会等经济社会组织的联系方面，而共产党国家在政治秩序方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自觉的政治组织建设^{[4] 342-334}。

又比如，米格代尔研究发现，摆脱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常常在与政治强人争夺社会控制方面有心无力。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在世界经济扩张和殖民统治的影响下，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发生社会控制的碎片化，国家领导者建立强大的次级组织机构既可能起到良好的动员效果，也可能摆脱国家的控制。为了防止地头蛇式政治强人的反叛，领导者有时会尝试摧毁这些有能力开展动员的机构。而在地方层面，国家在地方的政策执行者、地方政客与强人之间的三角关系也会削弱国家能力。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往往对这些政治势力选择妥协，但也因此加剧了社会控制的碎片化^[5]。

再比如，法团主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框架，一度被许多中外学者用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整合实践。法团主义指国家将若干代表不同行业利益的垄断性集团吸纳进国家政策过程中，通过授予这些集团在其领域内垄断性权力而换取对这些集团控制权的体制机制^[6]。在法团主义框架下，国家运用其权威而对经济社会组织进行体制性统合，从而将原先分散的利益统一传递到国家体制之中，使国家与社会构成有机整体。

（二）中国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范式的新探索

西方学者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共同指向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对立的格局下，任何现代国家都需要保证各种社会力量有机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国家整合社会力量带来的挑战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尤为严峻，整合效果不佳的国家往往会遭遇社会力量的掣肘甚至反噬。但是，西方学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受其自身视野所限而难以有效解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让当代中国政治学者们纷纷意识到，需要依据中国经验提出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实现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重构。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有关政治学者大力倡导政治学研究本土化，从不同角度将“政党”与“人民”两大范畴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当中。杨光斌比较了英美式以商人为主导的现代化、法德日式以官僚为主导的现代化以及俄中式以政党为主导的现代化，并根据后者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7]。

王绍光认为应当以“人民社会”取代充满虚幻的“市民社会”，人民社会中的各种民间组织在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基本要求引领下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人民政府产生良性互动^[8]。潘维认为，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力度较为涣散，给政府带来巨大负担，为了重新组织起有效的基层组织、盘活基层治理，共产党员应当身先士卒地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治理一线当中^[9]。景跃进提出将政党带进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来，将政党作为经验分析中独立变量而建立起“政党—国家—社会”三元结构框架^[10]。

把政党与人民带进来的研究思路得到了近年来一系列研究的回应。有学者研究了干部驻村工作中干部在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党两个传统下对人民群众运用的情感治理技术，认为这些情感技术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有效连接^[11]。有研究认为我国的政党中心主义以及执政党的全方位在场跳出了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摆脱西方话语的桎梏，并提出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学话语体系^[12]。有学者在研究“基层”概念时提出从国家与社会的动态流变和交互形塑切入来理解基层的语义，认为我国行政统合的基层治理“表现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13]。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国家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双向组织嵌入”，需“结合被嵌入组织的特性进行适应性治理”^[14]。

（三）从“国家—社会”到“政党—人民”的范式发展

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政党与人民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政治学者创造性地将两个范畴从不同角度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当中，不仅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研究的理论创新，也从侧面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整合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两大关键因素。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个可以解释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及其演变逻辑的框架呼之欲出，即将“国家—社会”发展为“政党—人民”，用于考察政党与人民互动的逻辑。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社会的两种形态，它们在生产关系上的共同点是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内在地要求以有组织、成规模、普遍交往的社会形态代替原先分散、封闭的古代社会形态。因此，组织水平和组织质量就决定了现代化的水平和质量，而社会主义的组织化程度又优于资本主义。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并遭遇外部侵略和民族危机，鲜明地体现在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方面。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条件下，中国采取资本主义的组织化方案只能导致进一步沦为附庸，因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组织化方案就成为兼具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和抵御外敌两大功能的最佳方案。扮演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双重先锋队角色的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中承担起了统领和落实社会主义组织化方案的任务，引导当时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大众”成为组织起来并掌握现代文明的“人民”，以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推进了抵御外敌和现代国家建设两大工作。在掌握政权后，执政党则需要时刻铭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握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人民也需要积极响应执政党的领导，在本职工作、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这样，各种由人民构成的子系统就可以在执政党这个中心系统的领导与协调下，共同推动国家这个复杂巨系统运转起来，达到现代社会组织化的目的，服务于社会化大生产。

以上逻辑构成了本文考察中国共产党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基本框架，为研究阐释组建社会工作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供了学理支撑。党对经济社会组织的团结工作在本质上是党不断调整这些组织和群体的发展方向，使它们从根本上服务于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政党—

人民”范式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与价值追求。下文以“政党—人民”范式为理论工具，对中国共产党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历程、经验和启示进行分析。

三、中国共产党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一定要一块过、一块干，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5]在党的奋斗历程中，党和人民的互动是一个重要方面。在互动中，中国共产党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针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扮演着领导核心的角色，而人民群众有序地组成各种服务于当时大局的组织群体并积极发挥作用，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1921—1949 年：凝聚救亡图存的强大合力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党对工人和知识分子两大群体的团结工作使党在全国上下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发生质的飞跃，也为日后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团结广大农民群体并发动农民参与革命是中共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构成党在这一时期团结工作的重要内容。然而团结农民工作往往伴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应当被视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超出了本文所界定经济社会组织的范围，故此处不纳入考察。

1. 领导工会团体和工人运动。工人阶级走向历史舞台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有革命性的群体，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历次救亡图存运动收效不佳的局面。然而现实中工人群体在革命问题上从自发走向自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先锋队式政党引领工人逐步具备阶级觉悟，结成组织参与社会实践。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接过了这一历史重任，而工人群体也成为首先需要被团结和领导的群体。

早在党的一大关于工作计划的决议中，“成立产业工会”就被列为党的基本任务，旨在提高工人觉悟的工人学校成为组织工会的一个阶段^[16]。党的一大确定的方案得到了执行，各地建立起的党组织迅速深入工人群体。1922 年 1 月至 1923 年 2 月，在党的直接领导或参与下，全国掀起了一波罢工高潮。在中共早期领导的工人运动当中，毛泽东同志的实践卓有成效，并且对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毛泽东开始在湖南工人中发展党员时，他注意到当地工人群体中存在一个影响较大但缺乏先进指导思想的“湖南劳工会”。毛泽东从劳工会中享有威信的创始人黄爱、庞人铨入手，帮助他们制定斗争策略，分析以往工人斗争失败的原因，很快赢得黄、庞信任，并同他们一同成功改组劳工会；黄、庞二人在斗争中转变思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7]。后来在安源指导工人运动期间，毛泽东深入生产一线同工人交朋友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传播革命思想，之后又领导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在安源建立起工人补习学校和路矿工人俱乐部等组织团体，并在 1922 年 9 月成功组织了一次安全、胜利的罢工，借机发展了一批工人入党，安源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17] 85-86}。1922 年 11 月至 12 月间，毛泽东当选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主席、总干事，并代表联合会同主政湖南的赵恒惕政府进行谈判，成功为工人们争取到了结社、集会的权利^{[17] 88-89}。

五卅运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波工人运动高潮。1925 年 5 月底，面对日本纱厂大罢工的高涨形势，蔡和森提出将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色彩的民族斗争并立即开展示威活动，在中共中央紧急会

议上得到通过。5月30日,上海数千名学生和工人打出反帝口号在租借地区举行示威,遭到租借当局武装镇压,13名抗议者牺牲在枪下。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把运动扩大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成立上海总工会领导罢工运动。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全市罢工人数在6月达到20余万人^[18]。此外,五卅运动在全国各地引发反响,特别是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对港英殖民当局造成了巨大冲击。五卅运动推动了党组织在群众斗争的发展和影响力,提高了民众的觉悟。当时还是商务印书馆学徒、店员的陈云就是在五卅运动中转变思想并被发动起来,参与和领导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罢工运动,并于当年八九月间入党^[19]。

2. 领导知识分子团体发动左翼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历来是所有政治组织争取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主要由知识分子发起,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建党以后的数年当中,邓中夏、沈雁冰、蒋光慈、恽代英等中共党员及其他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陆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其中蒋光慈等人还发起了主张革命文学的春雷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给文化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刺激了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向左翼和中共靠拢。此时的党组织开始在一些文学社团中布局,例如周恩来在郭沫若建议下调派阳翰笙等人加入“创造社”并在其中建立党小组。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经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批准成立,标志着党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全面领导的开始。

党团结知识分子并推动建立左翼文学组织的实践,在鲁迅的支持下极大地增强了号召力。晚年鲁迅在党的团结下发生思想转变,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国统区的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20]。1930年3月2日,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与夏衍等人负责参与筹建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提醒成员们革命的复杂性和艰苦性使左翼容易转变为右翼。在谈到对左联的期许时,鲁迅特别指出,“战线应该扩大”,“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而“统一战线”须以工农大众为“共同目的”^[21]。鲁迅本人并非中共党员,然而他的主张已经向中共的方针和路线靠近。鲁迅以党外人士和国内文化旗帜的身份提出了与共产党相得益彰的主张,并且对革命的复杂性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对文化战线产生积极意义。

左联成立后,中共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全面铺开,推动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涵盖文学、社会科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领域,这些领域也各自建立起了党的组织。中共通过中央文委和地下组织对这些文化团体进行领导,在国统区的文化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国内的大型电影公司,尤其是“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或“充满封建思想”,或充盈“才子佳人那一套”^[22]。夏衍直接负责由中共筹建的“电影小组”,他带领一些党员和进步人士加入大型电影公司,又推动成立了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参与制作了一系列传达救国思想的作品,扭转了电影文化市场的不良倾向。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发行的电影《风云儿女》^[23]。在新闻出版界,上海著名刊物《生活周刊》的转变过程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新闻出版界颇有名望的中共党员胡愈之协助《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开展编辑和出版工作,推动《生活周刊》从一个指导职业教育的刊物,转变为冒着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风险而关注社会现实和民族命运的舆论阵地^[24]。左翼文化在都市中的兴盛使不少怀揣进步追求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心生向往,他们不仅踊跃加入共产党,有些还直接离开城市,投奔

延安。这一时期，中共通过团结文化组织而在文化领域领导权的争夺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二）1949—1978年：全方位整合背景下的策略性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共组织网络的不断扩展和延伸，新中国政府对基层组织实现了全方位的接管，在城市中和乡村中分别建立起能够有序运转的“单位体制”和“公社体制”。基层单位和公社兼具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特点，它们作为国家体制的末梢发挥着组织基层经济社会生活的功能，完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一时期，中共推动建立了一系列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组织并在人民政协制度下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引导，还创造性地发挥了“红色资本家”等经济社会群体的功能。

1. 破旧立新与人民团体体系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的现实需求对原有社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重组，解散了一些失去价值的旧社团，接管了原国统区科教文卫领域的社会团体，在原中央苏区成立的一系列人民群众团体基础上建立了符合新中国建设需要的人民团体^[25]。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遍及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但都代表着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构成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在国家建设初期的历次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重点建设的群众团体分别是青年团、工会和农会。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决定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来团结和领导广大青年。中央为加强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于1950年3、4月间先后发布两个指示，部署青年团工作落实到各级党委、党组织，使进步青年群体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人才^[26]。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一方面将新组建的社会组织纳入国家体制当中，共同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适时发挥社会组织灵活、能动的特点，在党无法直接介入的领域发挥社会政治功能。在整合、吸纳方面，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社团组织都被整合到人民政协体系之内，而社会组织也作为“单位+公社”体制的特殊部分形成了分层化、成体系的制度网络。例如，党对文艺界的领导延续了抗战时期“中央文委—文化界同盟—具体领域组织”的模式，将各专业、学科都组织到特定协会中接受党的领导，有些机构还在地方设置分支机构。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大城市设立分会，指派分会负责人和当地文学刊物的编委成员^[27]。在灵活发挥功能方面，社会组织在外交领域协助解决了诸多棘手问题。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尚有许多日侨和日本战俘滞留中国，在日华侨也有许多人士缺乏回国途径，鉴于中日两国未建立外交关系，我国政府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互为对方人员返回提供方便；1952年成立的中国贸易促进会，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对外经贸活动，获取了我国当时急需的外汇和紧缺物资^{[25] 455-456}。

2. 灵活发挥工商业组织的作用。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成立，成为团结工商业者的主要组织。在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巩固国防根基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团结和引导了一批支持新中国建设的“红色资本家”。

党对荣氏集团及其代表荣毅仁先生的团结引导产生了模范效应。荣毅仁是新中国改造融合民族资本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位优秀民族资本家。上海解放前的荣氏家族是上海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企业集团，但在连年战火中损失惨重。荣毅仁在解放前见证过国民党政权和日本侵略者对其家族的压迫。他在解放军进驻上海时就对军队露宿街头的举动产生好感，后来又通过同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人的

交往看到了党和政府保护工商业组织的决心, 也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 决定配合党的政策。在“五反”运动期间, 在党中央的直接参与下, 荣毅仁及其产业受到正确对待。据当时被中央调派到上海负责“五反”的薄一波回忆, 荣氏作为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调查中被发现有一些“问题”, 他和陈毅经过反复商量认为应当将其定为“基本守法户”。此事经由周恩来报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认为为了树立“标兵”以在全国大城市产生影响, 应当直接把荣氏划为“完全守法户”^[28]。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荣毅仁清晰地认识到历史的大势所趋, 积极配合公私合营以及政府的赎买政策, 参与推动公有制的建立, 而他自己也受到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 获得了荣誉和地位^[29]。

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国际环境下, 境外爱国资本家及其企业也成为党的团结对象。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主持广东工作的叶剑英的指示下, 广东省商业厅、统战部在澳门成立了一家“南光公司”, 服务于广西和海南的解放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 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了“禁运”。为了解决“禁运”条件下的战略物资供应, 南光公司联系了澳门当地的商业巨贾何贤、马万祺提供帮助, 通过澳门向内地秘密运送物资。当时在香港一家船厂工作的霍英东注意到南光公司购货量大、出价也有吸引力, 因此决定前往澳门与南光公司做运货生意。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霍英东在危险而复杂的条件下完成了一批批战略物资的运送^[30]。这样, 霍英东既赚到了个人经商生涯的第一桶金, 也为抗美援朝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他日后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打下了基础。

(三) 1978—2012年: 推动经济社会组织复苏和发展壮大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改革开放的征程正式开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需要激发和释放社会活力, 发挥各个领域经济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这一时期, 党在政策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便利空间, 又在新的经济社会组织取得发展成果后及时建立配套保障制度, 并着手布局在这些组织的党建工作。

1. 培育和团结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培育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既有赖于中央从宏观方面上制定政策、把握方向, 也有赖于地方政府在一线发挥作用。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进行互动的地方政府干部本身也是党的干部, 其工作内容从根本上来讲也是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因此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执行均可被视为党团结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具体实践。

以团结为取向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1979年初, 邓小平用火锅宴请荣毅仁等五位著名工商界人士, 听取了他们关于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建议, 工商业群体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自此正式开启^[31]。1979年3月, 国务院提出适当发展个体工商业。1980年8月,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 允许城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流动, 逐步推行公开招工, 推动多样化的就业方式。手工业、零售、餐饮、科教文卫等领域的个体工商业组织在新政策的支持下迅速发展^[32]。微观层面, 国家对个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也逐步加大。在这些探索和努力的过程中,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起来了。

以理论政策发展保障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 党自此之后逐渐加大对非公有制组织的培育力度。我国在宏观政策和法律文件中不断放开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限制, 在具体政策执行中也形成了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的机制。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明确非

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体制性障碍，拓宽非公有资本的活动范围，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的保护力度。2004 年 3 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多处与非公有制经济有关。此后的《物权法》等一系列国家立法和政策文件进一步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地位。在政策执行机制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我各级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激励各级政府对各类非公有制企业大力扶持。

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加强引领和团结。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团结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成为党的重要工作。各级统战部门和工商联引导他们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还将其中的优秀代表吸收进各级人大、政协和工商联当中^[33]。1998 年 2 月，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提出了“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江泽民在 2001 年 3 月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别联组会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把企业发展和国家发展、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市场法则与社会主义道德这三对关系结合起来^[34]²⁰⁶。“三个结合”成为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行动方针。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还解决了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先进分子入党问题。自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获得了明晰的政治地位，使日后在该领域的党建工作开展有了政策依据。

2. 培育和团结社会组织。改革开放后，一部分资源从国家的控制当中游离出来形成“自由流动资源”，人们有机会利用这些资源在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当中行动^[35]。社会组织团体运用这些新的资源在新的空间内全面铺开，遍及兴趣爱好、社会服务、社会公益、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尽管新兴的社会组织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但依然对政府保持着较强的依赖性。首先，许多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从原先属于政府的功能和组织中分化出来的，往往挂靠在特定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事业单位，即使是小型的纯民间组织开展活动也常需要政府的帮助^[33]²⁶。此外，社会组织的成立需要得到政府的审批和登记，在政府批准的范围内活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人民的结社热情高涨，学术组织、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实现爆炸式增长。为了规范社会组织的管理，民政部于 1988 年成立社会团体管理司，国务院又于 1989 年 10 月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将社团审批权统一收至民政部门，并要求登记社团拥有“业务主管单位”，原有社团也因此得到整顿和重新登记。1998 年，国务院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主管单位责任和资金上提高了对社团注册的要求。

在基层经济中介组织建设方面，政府支持此类组织参与市场治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假冒伪劣、恶性价格战等市场乱象开始出现。市场乱象的治理既需要法治手段从终端加以调整，也需要组织起来的市场主体从开端加以遏制。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地方政府尝试让行业协会等组织成为治理市场乱象的生力军，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温州烟具产业一度出现无序竞争，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1991 年当地烟具企业成立烟具协会并被温州市政府同意行使一定市场监管职权，使得行业得到整顿，打火机等产品的质量和国内外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针对义乌小商品城交易分散、庞杂，商业信誉受到影响，义乌市政府培育出“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和“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等自律性组织，成功规范了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36]。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党中央意识到了在这些新组织开展党建工作的必要性。1994 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各种

新建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 开展党的活动”。1998年2月, 中组部与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 提出了在社会团体中的党组织覆盖问题。2000年7月, 中组部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此后,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也都强调了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力度的问题。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下的深入团结

党的十八大之后, 为了巩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回应时代与社会变迁带来的新挑战, 经济社会组织团结工作重心从培育组织发展转向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社会组织的领导, 以党建引领为鲜明特征的团结工作在新时期被推向了新的高度。随着党建工作深入扎实的开展, 经济社会组织以更坚定的姿态、更强大的动力和更新颖的形式投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中。

1. 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2016年3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正式提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亲”指领导干部同民企坦诚交往, 真心支持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家积极主动与党和政府沟通; “清”指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关系清白、纯洁, 民营企业家洁身自好、走正道^[37]。此次重要讲话成为新时代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2017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其中专门强调了“加强党对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领导”, 做出支持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发挥党员企业家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的部署。2018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重大论断^[38]。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 “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1] 30}

以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团结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一些优秀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张名片, 但也成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战略体系当中的重点攻击对象。2018年12月, 美国政府出于对我国华为公司在全球通信技术领域领先地位的忌惮, 以牵强的理由动用“长臂管辖”, 先令加拿大警方配合其非法拘捕途经加拿大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后向加拿大政府提出引渡孟晚舟。自孟晚舟被拘押起, 中国政府尤其是外交部门就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关心下开展工作。在2021年9月11日的中美元首通话中, 习近平主席再次明确就孟晚舟事件做出表态, 最终促成孟晚舟被释放回国^[39]。孟晚舟事件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优秀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大保护, 还成为一次影响遍及全国上下的生动的爱党爱国教育。

2. 开创社会治理领域团结工作新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部分提到, 应在企业、社会组织开展党建、发展党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 完善党领导社会组织的制度, “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3条第4款规定: “社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 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 教育管理党员, 引领服务群众, 推动事业发展。”在这些文件精神指引下, 各级党组织在实践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

基层党建广泛通过社会组织覆盖到各个领域, 积极开展各类制度和机制创新, 有效动员起经济社会组织参与到基层社会的多元共治格局当中。例如, 杭州的社会组织孵化器“凯益荟”党委在十余年来通过党建引领, 培育出数十家在基层社会生活发挥积极作用的社会组织, 被中组部列为“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直接联系点”。 “凯益荟”党组织积极转变话语和制度表现形式，探索新社会群体的政治定位，做到了对社会组织成员在新形势下的政治整合^[40]。又如，青岛市阳城区“新心向阳”和即墨区“新新相连”两个实践创新基地，都是当地基层统战部门与基层政府、基层经济社会组织共同打造的，这些基地实现了党建与统战的深度融合，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工作方面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促进了当地基层治理的良好效果，成为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典型^[41]。一些省市党委先期探索建立社会工作机构，并与相关行政部门合署办公，实现了“党政合一、双轮驱动”的优势。北京市在 2018 年 11 月实现了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市民政局合署办公，不仅推动了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党建的突破，还在养老、民生保障、超大城市治理减负、便民利民服务、社会动员等方面取得了实际效果^[42]。

对经济社会组织的团结产生实际效能。一些学者采用量化实证研究方法探寻党建工作在“两新”组织中的作用机制。其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组织在党建工作的引领下取得积极成果。有学者基于第十一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数据开展的研究表明，对民营经济人士而言，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在教育活动中加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这些因素促使民营企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光彩事业，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43]。有学者基于对中国基金会数据的研究表明，在基金会建立党组织以及有效的党组织建设都是基金会筹资收入得以提高的重要原因，驳斥了社会组织党建只是形式化任务的谬论^[44]。

四、中国共产党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深刻理解党与人民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团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也为新时代新征程通过组建社会工作部，协同构建社会领域的大团结格局提供了现实启示。

（一）历史经验

1. 处理好党的领导与释放社会活力之间的关系。以权力的收放为标准纵观党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不同历史阶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个历史阶段，能够发现一个鲜明的“否定之否定”结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党不断凝聚力量并最终通过政权实现对全国上下的全方位领导；在改革开放时期党培育经济社会组织发展、释放社会活力；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团结方式实现创新发展，站在更高的方位强调党对经济社会组织的领导。如何根据现实条件处理好收和放之间的关系，避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是我们党处理同社会经济组织关系所要解决好的问题。收和放的程度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坚持党在基本路线方针上的领导是不变的原則。坚持党的领导能够使团结工作保持正确的方向，防止社会力量的碎片化与无序扩张，以配套政策与立法及时跟进有目的、有计划地释放社会活力。从经济社会组织的角度讲，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与团结对象活力的激发并不必然发生冲突，只要党的方针政策能够赢得民心，能够符合历史前进方向，那么团结对象就能够自发地拥护党的领导并发挥积极作用。一定条件下，经济社会组织的创造性探索反过来还能给党自身的工作带来启发，推动党的自我革命。

2. 明确党与团结对象共同的行动方针。党在不同时期都会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分析，也会

对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评估。在经济社会组织团结工作上, 党在每个时期都会根据国内外环境确定团结对象范围, 进而凝聚共识, 确定共同的行动方针。在团结对象上, 经济社会组织的团结工作需要根据组织的不同定位来决定扶持培育、限制发展还是予以取缔。此外, 团结工作常常需要落实到这些组织内具体的社会精英, 但这并不代表对群众路线的背离。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野下, 社会精英与人民群众并不是彼此对立的, 社会精英只是人民群众当中能够发挥较大作用的那部分群体, 本身来源于人民群众。社会精英获得的声望、财富、权力等社会资源也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赋予, 他们有义务运用自身的能力为人民群众创造福祉。团结社会精英常常能够具有示范效应, 带来广泛的影响力。在共同方针上, 党在不同时期把经济社会组织团结到主要路线上来。党没有也不应有自身私利, 思维方式也是从全社会大局和发展大势出发, 但需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社会经济组织有自身利益, 但其利益只有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大局和大势才有可能长远发展。因此, 使经济社会组织成员认识到拥护党的领导与自身利益的同一性并自发参与党和人民的事业, 就成为团结工作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3. 独立自主探索现代社会整合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步前进和飞跃都离不开对中国实际的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在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所有社会群体及其结成的各种组织, 都需要被放在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 也都需要被放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标准下进行衡量。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团结策略。一百余年来, 党对经济社会组织团结工作的所有积极成果都是结合中国现实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党探索经济社会组织团结工作的独立性不仅仅体现在面对国外理论和中国现实的态度上, 也体现在面对党外影响的态度上。党对经济社会组织的团结从来不是简单地与之建立良好关系, 而是积极主动地根据党的事业需要对团结对象产生实质影响, 使它们有机地融入党的事业当中。必要时, 党还会直接推动培育能够发挥特定功能的新组织群体, 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反过来, 一旦有相关经济社会组织发展方向偏离党的事业, 那么党和政府会及时、果断地采取各种手段纠正方向。

(二) 现实启示

1. 系统化开展团结工作。“大党建+大社会+大统战”体现的系统化治理观, 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得益彰, 构成我国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方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社会治理是与国家安全被安排在同一部分加以部署的。在生产方式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 随着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 人们常用“后真相”“黑天鹅事件”等词汇描述当今时代变幻莫测的特点。各类群体不断涌现并在全球范围内甚至虚拟空间中广泛地交织在一起, 这些群体利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碰撞和重组, 发生各种良性或恶性的互动。经济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产物, 其中共同指向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多元化是值得追求和维护的, 然而当多元化超过一定限度就会走向鱼龙混杂的碎片化, 对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冲击。保证良性多元化、避免恶性多元化正是以系统化治理观统领团结工作的意义所在。新组建的社会工作部整合了基层事务的“千条线”, 将它们归口到相对集中的部门, 将社会作为系统整体进行治理^[45]。系统化的团结工作需要落实到“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工作体系的建立上。社会工作部是在复杂治理、跨部门治理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 但具体工作依然要由特定公私部门协作承担。各级统战部门、政协、民政部门、发改委乃至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安全部门都是大社会治理格局的协同单元。在治理实践

中，我国实现对社会领域的大团结引领需要继续深化大协同格局。

2. 将团结工作与团结对象具体情况有机结合。近年来，经济社会组织的党建活动方兴未艾，活动形式多样。但无论何种组织开展怎样的党建活动，都需要将党建的顶层设计与具体组织的社会功能有机结合，寻找到两者恰当的契合点。除了集中性的党建活动之外，团结工作还应当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贯穿于社会领域的具体场景之中。但是，考虑团结对象的具体情况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迁就，反而应当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问题频出，治理赤字遍及全球，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身份政治危机和民粹主义现象。这些危机背后的一些极端思潮也开始蔓延至我国，例如片面强调组织、群体的小众性和异质性，抗拒所谓“宏大叙事”。然而，任何群体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而单独存在，也都有着自觉或不自觉的社会定位，都可能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造成积极或消极、显著或隐蔽的影响。未来对社会领域的团结工作应当注意防范西方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试图以“社会”解构“国家”的思潮渗透和“颜色革命”策动。

3. 及时将团结实践的积极成果公共化、学术化、法治化。为了更好地规划未来对社会领域的团结工作，需要从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总结经验，把团结实践的积极成果固定下来，形成具有大众性、科学性以及制度性的更高层次成果。首先，对积极实践成果要通过公共平台为社会各界所知晓，实现成果的公共化。公共化的对象当然包括直接从事一线党建和治理工作的群体，经验交流平台的建立有助于实务工作者相互学习。从更大的范围讲，所有人民群众都生活、工作在一定的基层组织当中，因此随时可能被基层治理所影响，也都有可能成为在协作共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主体。在公共空间内面向不特定主体的经验传播，有助于全社会形成支持和参与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其次，公共化的积极经验需要学术研究的跟进和提炼。党团结社会经济组织的实践在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取得过成功，如今更是不断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实践形态。这些成功案例本身就是社会科学创新的宝库，而创新性研究成果也会反过来优化未来的团结工作。最后，积极实践成果的固定离不开法治化权威制度体系的建构与运行。组建社会工作部将催生社会工作领域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这一体系将与党建、统战等方面的党内法规以及相关领域国家法律共同构成今后团结工作的行为规范，为团结工作保驾护航。

五、结语

在西方理论话语下，国家与社会往往呈现出彼此对立、冲突的图景，其背后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相互对抗的现实格局，而这一格局常常引起后发现代化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各种社会整合失败的实践。相较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由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共同开创并践行，党和人民面对重重困难和挑战逐步建立起的血肉联系，构成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坚实基础。政党中心主义的党建国家战略，具体展开为党通过团结经济社会组织而实现对人民的有效整合，既保证强有力的国家持续发挥作用，也培育出团结有序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从而避免“普力夺社会”“强社会一弱国家”等容易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出现的困境，推动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以及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逐步实现。因此，“政党—人民”范式既能够在理论上对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内在

韩碧舟. 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新实践: 政党—人民关系视域下组建社会工作部考察[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3): 70-84.

缺陷做出有效替代, 也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在优势。中央决定组建社会工作部, 既是党团结经济社会组织优良传统的延续, 也是党应对时代巨变、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而开展的新实践。从政党与人民互动的视角出发, 不断赋予优良传统以新的生命力, 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综合性治理方略, 推动未来经济社会组织团结工作的顺利开展, 形成中华儿女大团结并共同致力于实现强国复兴目标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 [1]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2: 51.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N]. 人民日报, 2023-03-17 (1).
- [3] 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 中共中央举行民主协商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3-03-01 (1).
- [4]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王冠华, 等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4.
- [5] 米格代尔. 强社会与弱国家 [M]. 张长东,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280.
- [6] 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974 (1): 85-131.
- [7] 杨光斌. 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 [J]. 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 1-6+31.
- [8] 王绍光. 国家治理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432-464.
- [9] 潘维. 信仰人民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49-168.
- [10] 景跃进. 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 [J]. 探索与争鸣, 2019 (8): 85-100+198.
- [11] 向德平, 向凯. 情感治理: 驻村帮扶如何连接国家与社会 [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6): 84-93.
- [12] 卢艳齐.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路径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本土研究为对象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6): 29-36.
- [13] 苏曦凌, 黄婷.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界面: 行动语境中的基层概念及其理解 [J]. 行政论坛, 2022 (2): 25-31.
- [14] 皇甫鑫, 陈国权. 基于国家—社会分析的党组织属性识别与分类建设 [J]. 江海学刊, 2023 (1): 165-171+256.
- [15]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1 (7): 4-17.
- [16]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6-7.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 (1893—1949)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81-83.
- [18] 王建初, 孙茂生. 中国工人运动史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108-110.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传 (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23-35.
- [20]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02.
- [21] 鲁迅全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38-243.
- [22] 阳翰笙. 左翼电影运动的若干历史经验 [J]. 电影艺术, 1983 (11): 1-7.
- [23] 陈播.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诞生、成长与发展 [J]. 当代电影, 1991 (4): 6-15.
- [24] 胡愈之. 我的回忆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2.

- [25] 王世刚. 中国社团史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4: 435-438.
- [26] 陈至立.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647-649.
- [27] R.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 [M]. 谢亮生,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46.
- [28]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修订本): 上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179.
- [29] 世事评忆——荣毅仁有关谈话和文章摘登 [J]. 党的文献, 2007 (3): 30-36.
- [30] 熊坤静, 霍英东: 冒险援朝闯“禁运” [J]. 党史文苑, 2008 (12): 52-55.
- [31] 吴跃农. 邓小平请工商五老吃火锅 [J]. 世纪行, 2001 (9): 14-15.
- [32] 萧冬连. 探路之役: 1978—1992 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54-62.
- [33]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2017: 446-447.
- [34] 江泽民文选: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06.
- [35] 孙立平. “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J]. 探索, 1993 (1): 64-68.
- [36] 余晖. 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转型期的发展 [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3 (1): 70-119.
- [37] 习近平. 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2016 年 3 月 4 日) [N]. 人民日报, 2016-03-09 (2).
- [38]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侧记 [N]. 人民日报, 2018-11-02 (3).
- [39] 华春莹: 孟晚舟事件得以妥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 [EB/OL]. (2021-09-28) [2023-04-23]. http://news.cnr.cn/native/gd/20210928/t20210928_525618287.shtml.
- [40] 王杨. 党如何塑造社会群体——以社会组织孵化器党建为例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 (1): 130-138.
- [4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怎么干? 这个会总结经验、展望方向! [EB/OL]. (2023-03-25) [2023-04-23]. https://mp.weixin.qq.com/s/LD_g48V9Z8BS15am9JCMUQ.
- [42] 以首善标准绘就社会建设和民政时代画卷 [EB/OL]. (2022-08-11) [2023-04-23]. https://mzzt.mca.gov.cn/article/zt_20d/mzsn/df/202210/20221000044283.shtml.
- [43] 原东良, 周建. 非公党建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参与光彩事业吗——基于第十一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微观数据 [J]. 当代财经, 2020 (5): 123-134.
- [44] 欧翠玲, 颜克高. 党组织建设是否提高了社会组织筹资收入? ——来自中国基金会的经验证据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 (12): 51-68.
- [45] 徐勇. 以“大治理观”看社会工作部 [EB/OL]. (2023-03-29) [2023-04-2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1688233725460063&wfr=spider&for=pc>.

责任编辑: 林华山



统合治理与团结意蕴： 组建社会工作部的逻辑理路探析

赵亚楠¹ 樊士博² 徐敏²

(1.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 上海 200233;
2.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现实的有力之策。组建社会工作部有利于实现对社会不同主体、不同领域的统合治理，在政党统合治理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社会领域的大团结，蕴含着鲜明的团结底色和整合功能。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党和国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做出的重大顶层设计，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激活基层多元治理主体的客观要求。在功能发挥机制上，社会工作部广泛吸纳人民群众意见，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共治水平，进一步纾解基层社会矛盾，整合社会资源，激活社会力量，进而构建协同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在价值实现效果上，组建社会工作部，优化了相关部门的归口管理，能够厚植社会团结根基，凝聚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关键词：社会工作部；政党统合；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团结；大统战工作格局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3) 03-0085-10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3.03.008

作者简介：赵亚楠，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后；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徐敏，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话语创新研究”（2022EDS003）；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增强大学生历史自信研究”（2022ECNU-YYJ027）

引用格式：赵亚楠，樊士博，徐敏. 统合治理与团结意蕴：组建社会工作部的逻辑理路探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3）：85-94.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效能的逻辑使然。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简称《方案》），明确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1]。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中央社会工作部旨在整合多元社会力量，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这一目标设定有利于实现党对社会不同主体、不同领域的统合治理，蕴含着鲜明的团结底色和整合功能。政党统合治理是指以政党权威为基础，党组织发挥政治领导和社会整合功能，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将基层多元力量动员、组织起来的系统性治理模式，能够促进党建引领基层共治的实现。本研究主要以政党统合治理为分析视角，重点讨论组建社会工作部对党领导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团结逻辑。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占据基础地位，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部署，组建社会工作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不懈探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由于组建社会工作部的方案提出不久，学界对此议题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但涉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研究已较为深入。有研究聚焦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行动目标，提出机构改革是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行为方式，能够彰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2]。学界此前对“社会工作”的认识主要局限在社会学学科中，普遍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项社会服务活动，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3]。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组建社会工作部的部署，体现出一种大社会观，超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界定，彰显了因时而新的政治观念。在此背景下，学界对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中“社会工作”含义的认识逐步深化。比如，徐勇认为社会工作部中的“社会工作”强调的是一种“大社会”，是以执政党基于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需要而设立的，反映出执政党致力践行的“大治理观”^[4]。这一观点勾勒了社会工作部中“社会工作”的独特性和特指性。有研究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认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遵循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5]。

总体而言，学界从多个维度对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缘由与意义进行了初步研究，但对社会工作部所蕴含的党的领导与团结意义的分析尚未深入。组建社会工作部，旨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大党建工作，在政党统合治理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社会领域的大团结。鉴于此，本文从统合治理与团结意蕴的视角分析组建社会工作部的逻辑理路，厘清其促进社会大团结的价值。

一、组建社会工作部的现实依据

受社会环境变化与社会结构调整影响，尤其是在社会日益碎片化的情况下，基层治理面临新挑战新任务，亟须构建与基层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模式。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根据新形势新发展做出的重大顶层设计。探究组建社会工作部的现实依据，可以从政治、实践与主体三个维度展开。

（一）政治之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当前社会发展瞬息万变，各种治理难题和挑战层出不穷，对中国共产党统合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治理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政权基础，组建社会工作部的

根本目的就是更好发挥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全面领导作用, 发挥党建引领的优势, 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6]在领导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同基层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 突显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逻辑主线。作为党中央的职能部门, 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指导人民信访工作, 征集人民建议, 同时也积极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 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等。在发挥这些作用的过程中,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 能够将党的全面领导触角延伸到基层, 彰显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的优势, 进而提升党统合社会治理的效能。同时, 中央社会工作部主要统筹指导信访局、国资委等部门工作, 进一步提升了党对社会相关领域治理的领导水平, 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在基层治理的大格局中,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进一步强化了党对社会建设的统一领导, 有利于打开基层治理的新局面。同时, 省、市、县三级党委组建相应的社会工作部门, 实现组织体系的上下协同联动, 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在基层社会的全面领导, 更好地推进政党统合基层社会治理。

可见, 组建社会工作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能够有效整合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统筹基层社会各条战线, “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7]。在具体实践中, 只有把党的全面领导具体贯彻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方向, 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实践之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机构属于上层建筑, 需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8]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动作”^[9], 有利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进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组织保障。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基层社会结构变化对党和国家机构的体系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一些领域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与社会发展实际不匹配, 一定程度存在权责脱节、职能交叉、条块分割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领导, 亟须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系统性优化、全局性规划、整体性深化。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旨在通过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体制机制、运行管理, 完善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 以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 基层安则天下安。推动和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议题,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职能来看, 《方案》将有关基层事务归口到社会工作部门进行统筹性指导管理, 有利于发挥党和国家整合资源的优势, 进而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此外, 在坚持中央和地方一盘棋的基础上, 省、市、县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有利于优化地方组织体系, 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

需求，促进基层社会稳定，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保障。由此，在基层社会组织机构不断调整与相互形塑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统合治理模式的成效也逐渐凸显，彰显出“中国之治”的价值旨归。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立足于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职能体系，实质上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战略性行动，在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须组建从中央到地方上下联动的社会工作部门体系，协同发力、综合发力，促进解决社会治理的诸多难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

（三）主体之维：激活基层多元治理主体的客观要求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基层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亟须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治理积极性，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健全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6] 44}这就需要统筹协调各类组织和各类群体的作用，包括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新就业群体、行业协会等，充分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资源，激活多元主体的内在动力。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应时之举，能够有效统合多元社会主体力量。

当前我国社会已经迈入精细化治理阶段，基层社会治理事务涉及的部门、行业、领域日益广泛，衍生了一系列新的基层社会问题，亟须通过激活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予以化解。中央社会工作部主要负责统筹信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层政权建设、社会人才队伍建设、志愿服务管理等工作，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够满足基层社会多元复杂治理需求。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有利于有效统筹解决基层社会各领域的难点堵点问题。一方面，组建社会工作部是推动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当前基层社会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缺乏机制性联系，呈现出碎片化问题。根据全国总工会的最新调查，目前全国职工总数 4.02 亿人左右，其中包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8 400 万人^[10]。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大多处于分散状态，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激活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共治力量。另一方面，组建社会工作部是提升基层社会整合效能的需要。基层社会由多个独立单元组成，而单一行政部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时，职能权限往往影响组织协调范围和效能。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需要执政党统合多元治理主体的力量，形成基层社会条块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根据《方案》规定，省、市、县三级党委也将组建社会工作部门，通过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两新”工委职责，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和社会整合功能，将基层社会多元治理力量统合在党的领导下，更高效地将基层多元力量组织起来，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有序运转。

社会建设关乎民生福祉和社会发展，涉及各个战线和各个方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基层治理的规律性认识。基层社会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也离不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组建社会工作部体现了协同高效的治理原则，能够有效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社会管理职能，妥善处理基层社会条块分割问题，实现党建工作与基层政权建设的统筹推进，满足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二、社会工作部的功能发挥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 组建社会工作部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开创基层社会治理新局面的创新探索。中央社会工作部的主要职能是发挥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整合优化机构职能, 巩固基层政权建设。社会工作部广泛吸纳人民群众意见, 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共治水平, 进一步纾解基层社会矛盾, 整合社会资源, 激活社会力量, 进而构建协同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合力。

(一) 矛盾纾解: 广泛吸纳回应民意诉求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基层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基层治理过程中,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 广泛吸纳回应民意诉求, 不断促进人的现代化。同时, 基层社会群体诉求具有异质性明显的个性化特征, 需要结合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特性, 从多个层面和维度回应群众需求。《方案》提出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 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 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这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基层民意的高度重视, 有利于纾解基层社会矛盾, 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理念。

一是畅通民意诉求表达渠道。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11] 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 旨在确保民意诉求表达渠道的畅通, 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优势落到实处, 开创党领导信访工作的新局面。在此过程中, 社会工作部以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为出发点, 以摸清群众诉求为立足点, 找到基层社会工作中的痛点难点, 打通关节点, 更好地为民解难、为民分忧。由此而言, 在加强党的领导基础上, 社会工作部的组建能够进一步提升民意表达渠道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真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推动信访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凝聚基层群众智慧。问题来源于群众, 办法同样来源于群众。基层工作既要问需于民, 又要问计于民。《方案》明确指出将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纳入中央社会工作部的重要职能, 此举旨在有效汇聚民意民情民智, 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关键举措。在征集人民建议过程中, 社会工作部能够提前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 加强风险研判的前瞻性,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同时, 社会工作部通过征集人民群众建议, 广泛吸纳人民群众智慧, 为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继而把群众智慧转化为执政资源。此外, 征集人民建议的过程也是接受群众监督的过程。党政部门能够有效接受群众对党政工作的监督, 改进工作作风和群众工作方法, 增强人民建议征集的实效性。

三是回应群众利益诉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组建社会工作部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探索, 能为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倾听群众诉求提供有力保障。社会工作部的职能整合与功能发挥能够优化基层群众民意表达程序, 提升收集民意、分析民意、回应民意的效能。依托社会工作部, 各级党组织能够高效听取群众意见, 真正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社会工作部能够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 厚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发扬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的崭新实践。

(二) 政党统合: 强化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工作中的核心力量, 是党的组织体系的神经

末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6] 55} 组建社会工作部有利于激活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进一步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方案》明确规定要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将原来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事务集中归口到一个部门，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一方面，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能够有力优化政党统合的基层实践，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执行力，为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政党统合建立在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基础上，意在推动党的组织力量向基层社会各领域延伸。具体而言，组建社会工作部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所联系的特定群体中，实现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全覆盖。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部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创新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的各个领域，突显中国制度和治理优势。

另一方面，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发挥以政治权威为重要前提，以党建引领为重要方式，能有效聚合纷繁复杂的组织网络，最大限度地把基层社会力量凝聚起来，进而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奠定组织基础。一是发挥党员联系功能。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员是党组织的肌体细胞^[12]。当前平台经济飞速发展，衍生出规模庞大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但由于新就业群体流动性高、构成性复杂、组织性松散，党建工作开展难度大。社会工作部作为党的职能部门，能够协助基层党组织联系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积极分子等，进而实现党的组织覆盖，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二是发挥组织嵌入功能。应对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状况，中国共产党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会的各条战线中，进而获得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新时代以来，基层社会多元主体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体量上日益复杂。这些主体总体呈现出独立零散的特点，倘若基层党组织不能对其加以有效引领，则无法有效聚合多元主体力量。社会工作部能为基层党组织提供支点和依托，通过将基层党组织嵌入多元社会主体的治理结构中，不仅能够稳固基层治理格局，还能够充分发挥党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优势。

（三）力量激活：提升党建引领共治水平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共治，能够有效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6] 45}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能够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整合引领体制内外的多元社会主体力量，进一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是深化党建引领的协同共治理念。基层治理现代化理应呈现出社会多元力量和活力秩序的有机统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社会治理主体较为单一，党政部门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对社会进行全面管控。改革开放以后，基层社会治理在维持行政主导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进入新时代，社会治理主体原子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求发挥多元主体力量。因此，从传统的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向多元化、协同化的现代社会治理转型，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发多元治理主体活力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治理理念不断升级的体现。这一过程体现出基层社会治理从“一元主导”到“协同共治”理念的转变。概而言之，组建社会工作部进一步体现出“一核多元”治理理念的深化。

二是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共治水平。进入新时代，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基层社会事务

赵亚楠, 樊士博, 徐敏. 统合治理与团结意蕴: 组建社会工作部的逻辑理路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85-94.

日益增多。组建社会工作部意在将相关社会治理事务集中归口, 摒弃单个部门“唱独角戏”的现象, 聚集党建引领基层共治的合力。具体而言, 为了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共治水平, 社会工作部通过推动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及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促进形成多元化、开放式、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 地方社会工作部门能充分调动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和社会民众的活力, 打通不同部门、行业、领域之间的条块阻隔, 推动形成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实现发展与治理的同频共振。

三是激活党建引领基层共治力量。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动员、整合分散的多元主体力量, 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 有利于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同时, 通过组建社会工作部整合社会治理职能, 加强各个领域党建工作, 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持续构建, 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总而言之, 组建社会工作部能够发挥政党统合治理优势, 提升党建引领社会共治水平, 将基层社会活力转化为治理动力。

（四）格局构建：增强大团结大联合的实效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有利于加强党对社会领域的整合, 提升政党统合多元社会主体力量的效能, 促进整个社会的大团结大联合。从职能来看, 社会工作部的团结对象更为基层、更加广泛、更具有“草根”特征。这进一步拓展了团结的范围、夯实了团结的基础, 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概言之, 组建社会工作部能够确保党在基层社会工作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通过广泛凝聚基层社会人心、汇聚基层社会力量, 形成促进社会团结的强大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 根据新时代要求对统战工作做出了重大部署, 有力推动了社会大团结大联合的创新发展。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不仅需要统战工作部门发挥作用, 更需要多部门的协同联动。

组建社会工作部有利于从纵向和横向维度将多元群体有效组织、团结、凝聚起来, 提升大团结大联合的工作实效。纵向上, 构建上下联动的大团结工作局面。在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基础上, 中央要求省、市、县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 有利于整合不同层级党政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的资源力量, 促进社会团结工作重心下移。在党的团结工作延伸到基层社会的神经末梢的基础上, 构建起高效联动、上下贯通的大团结工作格局, 进而释放新时代团结奋斗合力。横向上, 凝聚多元主体的团结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顶层设计上统筹规划大团结大联合工作与基层社会工作的有效对接, 组建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门）, 统一指导各种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志愿者组织的党建工作。新社会组织人士、新经济组织人士等都是社会团结工作的重要对象。《方案》明确地方社会工作部门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两新”工委职责。可见, 社会工作部的职能设定具有深刻的团结意蕴。

事实上, 党建工作是推动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一环。社会工作部着力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能够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 打造出团结的集群网络, 提升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成员团结奋斗的效能, 进而在政党统合实践中扎实推进大团结大联合工作的创新发展。

三、社会工作部的团结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6] 57} 随着社会的结构

转型、利益分化、矛盾叠加，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组建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门），优化了相关部门的归口管理，能够厚植社会团结根基，有助于正确处理党统一领导的一致性与社会结构多样性关系，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政党层面：有助于正确处理党统一领导一致性与社会结构多样性的关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领域和群体。受此影响，新时代社会团结工作的对象、领域、任务日趋复杂。面对这种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13]的基本原则。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不是统一战线工作部门一家的事，而是党领导下的全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阶层更加多样、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在此背景下，社会团结工作要妥善处理“一致”与“多样”的关系，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充分尊重社会差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形成致力于共同事业的合力。

组建社会工作部能有效强化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发挥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优势。一是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组建社会工作部意在整合多元主体力量，满足社会多元主体需求，进一步增强政治共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部能够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推动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工作实践，从而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使得党的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构建共同的社会价值，有效凝聚社会合力，有利于大团结工作格局不断完善。二是在确保一致性中体现多样性。社会工作部整合相关分散的社会管理职责，将相关的社会工作事务归口管理，构建起从分散到集中的力量格局，最大程度激发社会发展活力。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明确不同部门之间、基层条块之间、多元群体之间的职责关系，形成统一规划、分级管理的模式，增进沟通协调，能够有效营造包容和谐的社会氛围。同时，社会工作部还承担着征集人民建议的职能，这有利于及时了解不同群众的意见诉求，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普遍问题。总之，组建社会工作部有利于不断增进政治共识，有效引领多元化的群体观念，将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囊括在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内，在充分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增进政治认同，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伟力。

（二）国家层面：有助于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大团结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6] 57}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利益诉求更加多样，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如何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成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应该看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领导能够高效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促进社会大团结大联合。在此背景下，组建社会工作部是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是应对基层社会结构变化，克服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同时，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党中央的职能部门，能够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效统筹指导信访、国资等部门的相关工作，积极推进特定社会领域的党建实践，发挥党建引领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增进团结。

具体而言，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门）的组建，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统筹国家

与社会资源, 将多元社会主体组织起来, 凝聚多元社会力量的政治共识, 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进入新时代, 随着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动,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量涌现, 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是经济社会的活跃部分,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凝聚他们的力量, 增强社会的稳定性。通过社会工作部的职能发挥, 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党统合优势, 最大限度地组织、团结、凝聚新的社会力量, 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大团结大联合。在中国语境中, 社会工作是群众路线的专业化表达, 有助于党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多方力量, 强化其服务性和专业性, 提升社会治理的效度^[14]。组建社会工作部, 有利于将国家与社会的力量统合在党的领导下, 激发党政、群团、社会组织的力量, 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局面。

(三) 社会层面: 有助于推动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根据治理目标和执政环境的转换, 积极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统合型治理模式。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 组建社会工作部能够统合社会治理各方力量资源, 推动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证明,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只有从组织架构、制度安排和行动策略上多措并举, 才能有效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门)的组建, 是党和国家机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的一大亮点, 能够满足社会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一是有利于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组织架构。在社会治理过程中, 基层党组织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也是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中坚力量。在突出防控化解政治安全、社会治安、社会矛盾、公共安全、网络安全五类基层社会风险中, 需要强化党对基层社会的全面领导, 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探索社会组织助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门)的组建, 一方面通过党建引领持续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推动党的组织体系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合功能, 更好地统合人、财、物, 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优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有序推动社会治理的形式, 引导社会力量推动政党、国家、社会发展, 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实效。

二是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体系在规范化、科学化轨道上运行。组建社会工作部是在推动创新性、系统性、整体性治理职能重构的基础上, 对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行的创新性实践探索, 为开创大团结大联合局面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支撑。在整体性治理结构的基础上, 社会工作部致力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 促进了大团结工作局面的制度体系构建。当然, 组建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门)尚处于起步阶段, 下一步需要围绕大团结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健全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

三是有利于优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策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 落脚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有利于推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互动实践。组建社会工作部, 能够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领导, 促进党的领导覆盖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 把党的领导贯穿加强社会团结的全过程, 形成多元主体同心协力、协同联动的局面。组建社会工作部带动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 构建契合社会多样化需要的治理模式, 有利于将党的主张、路线、

方针、政策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同意志与行动自觉，增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实现多元社会治理主体行动上的一致，促进形成最根本的团结和最持久的凝聚。

四、结语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现实的有力之策。《方案》要求：中央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 2023 年年底完成，地方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 2024 年年底完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未雨绸缪，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前瞻性预判。具体而言，在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门）组建过程中，各级党委需注意理顺相关职能职责、协调部门关系、规范政治过程、健全体制机制等，更好实现改革初衷。在政党统合的规范引导下，组建社会工作部致力于党建引领和巩固基层政权的双重目标，推动多元治理主体的上下纵横联动，进一步统筹组织资源、提升服务质量、夯实治理基础，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新时代新征程，组建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门），能够统合多元社会主体，有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生动局面，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N]. 人民日报, 2023-03-17(1).
- [2] 黄科, 王婷. 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行动体系与效能转化[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3): 50-56.
- [3] 王思斌. 社会工作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9.
- [4] 徐勇. 以“大治理观”看社会工作部[N]. 北京日报, 2023-03-27(10).
- [5] 蒋敏娟.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与社会治理现代化[J]. 人民论坛, 2023(7): 49-52.
- [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2.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259.
- [8] 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 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主协商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俞正声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N]. 人民日报, 2018-03-02(1).
- [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25.
- [10] 易舒冉, 张丹峰. 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 8 400 万人[N]. 人民日报, 2023-03-27(1).
- [1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王沪宁出席[N]. 人民日报, 2022-03-02(1).
- [12] 樊士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论纲——基于“结构—功能”视角的审思[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5-12.
- [13]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5.
- [14] 侯利文. “党建”社会工作: 何以可能? 如何可为? ——兼谈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 河北学刊, 2022(6): 9-15.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修例风波以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方式、影响及趋势

张建 涂钦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233）

摘要：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英国以所谓“监督”《中英联合声明》实施为借口，加大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和干预力度。英国以持续发布涉港报告、政客祸乱香港、将BNO扩权政策作为工具、借助多边联盟施压等方式介入香港事务。英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对外部势力形成负面“示范”，干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破坏中英关系的发展，影响英国与香港地区之间的正向互动。从未来趋势看，英国会继续以《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介入香港事务的所谓“依据”，对香港事务进行干预，以“全球英国”战略中的价值观外交持续关注香港事务，试图在对香港的所谓“政治和道德责任”与在香港的利益布局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应通过多种方式反对英国干预香港事务，加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建设，积极开展涉港外交斗争，更加明确地向国际社会表明香港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策。

关键词：反干涉；反制裁；修例风波；英国；香港事务；《中英联合声明》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095-13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3.009

作者简介：张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复旦大学统战研究基地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涂钦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21VMG036）

引用格式：张建，涂钦云. 修例风波以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方式、影响及趋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3）：95-107.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坚决打击反中乱港乱澳势力，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1]。英国是干预香港事务的主要外部势力之一。在香港回归前的殖民统治末期，英国进行一系列政治操弄，企图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有效管治，延续英国对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影响^[2]。英国政府宣称，虽然其对香港的主权和管辖已经停止，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要终止它对香港的“承诺”；英国将继续承担对香港人民所谓“重大政治和道德责任”，确保香港继续保持繁荣^[3]。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英国以履行所谓“道德责任”为由，通过公开表态、扶植亲英人士、提供英国国民身份、把香港议题“欧盟化”等一系列手段干预香港事务，意图将香港打造成一个“让英国满意的所谓的高度自治的民主实体”^[4]。2019 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英国以所谓“监督”《中英联合声明》实施为借口，通过多种方式介入香港事务，干扰“一国两制”实践，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的繁荣稳定。

相关研究从不同视角关注了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有研究认为，香港回归以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力度不断升级，干涉手段集中在舆论攻击和外交施压上，涉港立场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干涉主体呈现“集团化”特征，干涉行为以“民主”和“人权”为幌子^[5]。有研究认为，英国在对港事务的干预上呈现出渐进性、灵活性、回应性的特点，而美国在对港政策上体现出明显的介入性、对抗性、遏制性特征^[6]。还有研究认为，1997 年以来，英国对香港政策的政治目标是支持香港“民主化”进程，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干预香港政治事务^[4]。本文在梳理修例风波以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方式、影响的基础上，总结英国等西方国家介入香港事务的新变化、新特征，预判英国介入香港事务的趋势，并提出中国防范、遏制和反制英国介入香港事务的政策选择。

一、修例风波以来英国介入香港事务的方式

2019 年 6 月香港修例风波爆发后，“港独”“黑暴”“揽炒”等激进暴力分子打着“反修例”的幌子持续制造暴力事件，冲击中联办、占领立法会、肆意侮辱国旗国徽及区旗区徽、暴力袭击警察与爱国人士，其所作所为已全然超出自由表达意见的范畴，给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损害。这些行为严重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修例风波发生后，英国以曾经的所谓“宗主国”自居，深度干预香港事务，对香港局势的发展推波助澜、煽风点火。

（一）持续发布涉港报告

持续发表所谓“香港半年报告”成为英国干预香港事务的重要途径。香港回归后，为评估所谓中国在收回香港主权后对《中英联合声明》的遵守情况，以维护香港自治为名，英国外交部开始定期向议会提交香港系列报告，即《关于中英联合声明执行情况的半年报告》，之后改称《香港半年报告》。该系列报告长期以来恶意抹黑“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和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政策，在修例风波发生后更是变本加厉。2020 年 6 月，英国外交部发布第 46 份《香港半年报告》，关注修例风波发生后香港的政治发展情况、部分乱港分子的动向及中国全国人大推动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动态。英国将修例风波中乱港分子的暴乱行为美化为“勇敢者的行为”，声称英国对香港及其自由的支持坚定不移。英方诬称国安法对香港“高度自治权”造成冲击。同时，“港英双边关系”在报告

中不再被提及^[7]。在2020年12月发布的第47份《香港半年报告》中, 英国政府宣称“不反对香港通过自己的国家安全法, 但坚决反对中国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强加这种威权主义法律”的立场^[8], 并以此为由污名化香港国安法的出台。2021年6月, 英国在中国的强烈抗议下仍然发布第48份《香港半年报告》, 对香港推迟四年一届的立法会选举一事表示“关注”。报告宣称“中国政府需要向香港人民和世界人民保证, 选举将尽快举行, 不会以新冠疫情为借口, 进一步破坏香港的自治”^[9]。2021年12月发布的第49份《香港半年报告》更是公然唱衰香港法治和发展, 污名化香港国安法和香港的选举制度, 指责国安法打击反对派、对《苹果日报》的查封和所谓“大规模逮捕民主派政客和活动人士”等事件。报告还宣称, 香港的自由受到侵蚀是对自由和民主的侮辱, 英国将继续向北京及香港当局表明对香港国安法的反对, 并会与国际伙伴合作, 要求中国履行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承诺的对香港的义务^[10]。2022年3月31日, 英国政府发表第50份《香港半年报告》, 批评中国政府的治港政策特别是香港国安法, 诬称香港政治和司法状况持续恶化。报告提及多项重要事件, 包括《立场新闻》停运、区议员被取消资格、“支联会”解散等, 并批评中国对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已不能反映现实, 香港国安法被用以收紧各项自由等, 香港国安法破坏《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的权利及自由^[11]。另外, 2020年英国外交部发布的《2019人权与民主报告》谈及修例风波中所谓“警察使用暴力”事件^[12]。2021年11月, 英国外交部发布的《2020人权与民主报告》, 诬称“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高度自治”^[13]。

(二) 英国政客祸乱香港

修例风波以来, 英国一些政客一再插手香港事务, 采取扶持反中乱港势力、操弄所谓 BNO 政策等方式祸乱香港。英国的议会和行政当局中, 从来不乏有鲜明反华立场的政客。炒作涉港议题更是成为英国议会里的寻常作风。涉港议题成为英国反华议员的“政绩密码”。他们借此大做文章, 企图获得更多关注以积累政治资本。他们一方面炒作各种议题, 尤其是高举“人权”大旗, 为香港反对派甚至暴乱分子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另一方面频频会见祸港乱港头目, 起到出谋划策、遥控指挥的作用^[14]。2019年11月香港区议员选举中, 一些英国政客以所谓“国际观察员”身份抵达香港, 帮助反对派候选人公开拉票, 密会香港反对派人士, 同时不忘对建制派候选人进行挑衅。2019年11月5日, 英国国会成立“跨党派香港小组”, 以推进所谓“香港的民主和法治, 捍卫香港的人权, 就香港时局交流相关资讯, 以及调整英国与香港两地民众的关系”。该小组主席由英国绿党前主席贝内特以及自民党议员卡迈克尔联合担任。卡迈克尔同时还是英国非政府反华组织“香港监察”的赞助人。2020年8月4日, “跨党派香港小组”发表所谓“香港人道救援人员的安全空间日益缩小”的报告。报告污称, 香港警方在示威活动中侵害了医护人员与人道救援工作者的人权, 以不同形式的武力恐吓甚至拘捕对待他们, 从而导致受伤的示威者未能得到及时适当的医疗援助; 香港警方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和《中英联合声明》。同时, 报告还提出一系列建议, 声称英国应该制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及警务处处长等相关高级官员^[15]。2020年4月, 英国下议院成立“中国研究小组”。小组的创始人是下议院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以及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的顾问尼尔·奥布莱恩。同年12月, 该小组发布所谓“在新世界捍卫民主”的报告, 建议英国效仿美国, 从 BNO 政策着手帮助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的港人移民, 保障港人权利。“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的前主席罗冠聪出席该报告的线上发布会。该报告相关建议成为后来英国操弄 BNO 的

政策基础^[16]。

2020 年 5 月以来，针对中国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区推动国家安全立法和完善选举制度，英国当局不断发表和采取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论和措施。6 月，英国时任首相约翰逊声称，英国不会坐视香港不理^[17]。7 月，英国宣布无限期暂停与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并禁止向香港出口有关武器装备。2021 年 4 月，英国逾百位跨党派国会议员联名去信约翰逊，反对中国对英国国会议员实施制裁，要求就香港和新疆议题加强制裁，以制裁“打压香港民主运动”的官员和企业。英国影子外相丽莎·南迪和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是这次署名的连线牵头之人^[18]。英国还通过打“外籍法官”牌进行政治操弄，借所谓“召回”香港终审法院英籍非常任法官，恶意抹黑香港国安法，肆意诋毁香港法治，干预香港事务。2021 年 10 月，英国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阿利斯泰尔·卡迈克尔发表“是时候把英国法官从香港撤走”的文章，抹黑香港司法机构为“袋鼠法庭”，妄称“英国法官继续留在香港只是对不公正的司法制度给予虚假尊重”^[19]。12 月，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向国会提交所谓“香港半年报告”，当中就提到英国政府希望可以继续委派法官来港，但要经英国最高法院评估，并声称最重要的是“香港法院及法制独立运作、不受政治干预”^[10]。2022 年 3 月 30 日，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及副院长贺知义以所谓“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为借口，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自 1997 年香港回归以来，英国派现任法官到香港终审法院担任法官的安排告终。2023 年 2 月 27 日，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2 届会议发言中抹黑香港人权状况。克莱弗利污称，在香港国安法下，香港独立媒体机构已被关闭，《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也被削弱。

另外，一些政客还威胁对香港进行制裁。2022 年 5 月底，110 名来自不同政党的英国国会议员，联署呼吁英国政府针对所谓与侵犯人权行为有关联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审查这些官员在英国的资产。这些议员在发给英国时任外交大臣特拉斯的信件中妄称，一旦完成审查工作，英国日后若展开涉港制裁措施，可以审查结果为基础。率领议员发出这项呼吁的保守党议员邓肯·史密斯、图根达特，以及工党议员麦克唐纳敦促英国时任外交大臣特拉斯将香港国安法实施两周年作为考虑展开审查的时机。此外，英国政客公然为“港独”分子站台，为香港警方的通缉犯提供所谓庇护。2020 年 12 月，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在伦敦会见“港独”分子罗冠聪，成为首位与“港独”分子直接会面的英国政府内阁官员。彭黛玲在会面后声称，英国会与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并信守承诺，支持保护香港人的自由^[20]。2021 年 4 月，罗冠聪通过社交网站表示其已获批英国批准政治庇护申请^[21]。

（三）将 BNO 扩权政策作为工具

BNO 是英国自 1987 年 7 月 1 日至 1997 年 7 月 1 日签发给中国香港居民中具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护照。持有 BNO 护照者虽具有英国国籍，但并未能自动取得英国居留权及工作权，且最多只能在英国免签停留 6 个月。香港回归前，英方便明确承诺不给予 BNO 旅行证件持有者在英居留权。自 2020 年 6 月香港国安法通过后，英方便宣称要为香港居民进入英国学习和工作，并最终申请英国国籍开辟新的通道。2020 年 7 月后，英国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精神和两国有关谅解共识，炮制出台关于香港居民申领英国国民（海外）签证的新政策，推出所谓 BNO 合资格者移民英国的新路径^[22]¹¹，并一再扩大 BNO 签证适用范围。其实质是以此作为介入香港事务的工具，提升介入香港事务的范畴，并直接为某些“港独”“黑暴”等反中乱港分子提供庇护。2020 年 10 月 22 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向拥有所谓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也就是 BNO 资格的香港人，开启申请居留签证的通

道, 名额没有上限。2021 年 1 月 31 日, 英国专门针对香港持有 BNO 居民的新政开始实施, 以所谓 BNO “5+1” 入籍政策, 允许护照持有人和近亲申请到英国居住、读书或就业, 并将为准备移居英国的港人提供经济和交通上的便利。6 月 9 日, 英国国会下议院讨论香港人权状况。辩论发起人兰德尔声称, 香港在联合国承认的条约下移交中国, 现在是时候评估条约是否得到遵守, 对那些已经知悉的违反人权的香港法官, 也应考虑是否该对他们实施制裁。保守党议员还提出英国应给予 1997 年以后出生的年青一代港人申请 BNO 签证的资格, 并确保香港议题列入 G7 峰会的议程^[22]。12 月, 英国执政保守党下议院议员格林提出修订包含 BNO 条款的《国籍与边界法案》, 以让 BNO 计划涵盖父母一方持 BNO 资格的年轻人, 但该法案当时未获英国政府接纳。2022 年 2 月, 上议院议员奥尔顿、末任港督彭定康以及前司法大臣范克林再在上议院提出相关修订议案。2 月 24 日, 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放宽 BNO 签证计划, 于 10 月开始容许 BNO 护照拥有者子女以个人身份独立申请 BNO 签证, 无须再以受养人方式申请, 但申请人仍须符合证明可自给自足等经济要求。这些都是英方操弄 BNO 以达到干涉香港事务目的的行径。2023 年 1 月 31 日, 英国内政部声称, 英国国民 (海外) 签证推出的两年内有 14.45 万港人获批赴英生活。

(四) 借助多边联盟施压

自香港回归以来, 英国一直致力将香港问题“国际化”“欧盟化”, 在国际层面寻找“名正言顺”介入香港事务的契机^[4]。英国正式“脱欧”后, 将香港议题一同带进“五眼联盟”、G7 会议等多边机制。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组成的“五眼联盟”是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情报共享联盟, 并逐渐向政治安全联盟方向发展演变^[23]。“五眼联盟”萌芽于二战期间的英美情报合作, 正式成立于 1946 年。在冷战期间, 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情报战。当前, “五眼联盟”在对华政策上已初步达成一致, 将从包括且不限于技术、意识形态及国际规则三个方面出手打压遏制中国。在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以自身价值观操纵着联盟的行动, 塑造着联盟机制与目标。拜登政府加强运用联盟体系与意识形态工具持续向英国施压, 英国对“英美特殊关系”的需要、对香港的诉求将英国同美国及“五眼联盟”紧密捆绑在一起。2020 年 5 月 28 日,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就中国计划制定香港国安法发表所谓联合声明, 妄称“它会削弱香港人民的自由, 极大侵蚀使香港赖以繁荣的自治权和制度”^[24]。6 月 30 日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 “五眼联盟”便发表联合涉港声明抵制香港国安法, 妄称该法有损中国对“一国两制”的承诺、违背国际义务。随后“五眼联盟”国家相继宣布暂停与香港签订的移交逃犯协议。美国还在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待遇的基础上终止香港的国际船舶运营收入互惠免税待遇。对香港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情况, “五眼联盟”也投以长期的关注。新冠疫情期间, “五眼联盟”便发表联合声明干涉香港地方选举事务。2020 年 8 月 9 日, 英国外交大臣与美加澳新四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香港特区政府恢复被裁定提名无效的立法会参选人资格。他们对《香港国安法》也深表“关切”, 声称该法案正在“侵蚀”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25]。11 月, 英国再次推动“五眼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施压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取消撤销不符合资格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和举措。2021 年 1 月 11 日, 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香港特区政府拘捕超过 50 名协调及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12 月 19 日, 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在“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指导下顺利举行。12 月 20 日,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外交部部长以及美国国务卿

发表联合声明称，“注意到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对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中民主元素受侵蚀表达严重关切”，妄言香港的民主要素已受到侵蚀^[26]。2022 年 2 月 8 日，“五眼联盟”的“白手套”即“媒体自由联盟”又联合出面污蔑中国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打击香港媒体自由。

英国也纠集七国集团在香港议题上对华施压。2020 年 6 月 17 日，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首次就中国决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表达所谓“高度关注”，声称其违反了香港基本法和所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27]。2021 年 12 月 20 日，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发表声明诬称，香港新选举制度严格限制了选民的选择，破坏了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高度自治。2022 年 5 月 9 日，在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第二天，英国就与美国等七国集团国家外长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抹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宣称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择程序以及香港政治多元化和基本自由持续遭受攻击表达所谓严重关切。

二、英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影响及趋势

英国当局以所谓“监督”《中英联合声明》实施为借口，把《中英联合声明》作为法律依据对香港事务进行肆无忌惮的干预和介入，既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影响中英两国关系，又干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一）英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影响

第一，对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形成负面“示范”。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长达 150 余年，作为香港曾经的“宗主国”，加之英方对《中英联合声明》的鼓噪，其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往往形成“示范”效应。修例风波以来，英国在西方介入和干预香港事务上发挥着负面的“引领”作用，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和特征。在英国作出暂停与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操弄 BNO 修改针对香港的移民政策等举动后，一些西方国家跟随英国在涉港问题上的举动，采取相同或类似的手法。另外，一些外部势力也将英国关于《中英联合声明》的单方面立场作为所谓依据，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和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举措进行抹黑和攻击。

第二，干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近年来，英国当局把《中英联合声明》作为所谓法律依据介入香港事务，干扰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实施和选举制度的完善，实施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庇护”、输送资金、提供培训以及提供国际平台推动“港独”国际化等行径。英国加大对香港事务的干预，甚至推出干预香港事务的法律化、制度化措施，对香港局势推波助澜，干扰“一国两制”的实践，严重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比如，英国政府违反中英两国的有关共识，单方面出台的 BNO 新政策，既为“港独”分子提供庇护，影响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也造成香港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造成较为负面的影响。

第三，破坏中英关系的发展。中英两国在涉港问题上的分歧是双边关系下滑的直接导火索。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英国干预香港事务的动作不断，从暂停与香港签订的移交逃犯安排协议，到宣布为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港人提供入籍通道，英国在涉港问题上的一系列举动破坏了中英两国政府达成的共识，破坏了中英友好和互信关系的基石，使中英关系陷入低谷。英国对港政策从属于对华政策框架，虽然在其干涉香港事务的同时，也有意识地防范中英关系风险升级，试图在

干涉香港事务和维持中英在特定议题上的合作关系之间维持平衡。但事实上, 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6]。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数据表明, 涉港问题、中美竞争和“脱欧”三个政治因素使中英关系继续下滑; 鉴于中英在涉港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英国在对港政策中已经不再保持战略利益与道德责任的平衡^[28]。

第四, 影响英国与香港地区之间的正向互动。英国与香港地区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密切交往, 英国在港有 30 万公民和 700 多家企业, 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符合中英两国共同利益。由于英国与香港地区的特殊历史关系, 香港基本法特别提出要保护英国在香港地区的合法利益。2020 年 7 月, 英国暂停与香港的移交逃犯协议, 直接影响香港地区与英国之间在刑事司法方面的合作。2021 年 2 月 16 日, 英国外交部更新其官网上香港营商风险指引。与此前版本不同的是, 该版本的指引没有再直接描述“香港享有高度自治”, 而是改为香港在“一国两制”模式下运作。英国在香港具有庞大的利益存在, 英国干涉香港事务不但影响英国与香港地区之间的正向互动, 也对英国自身在香港的利益造成影响和冲击。

(二) 英国介入香港事务的趋势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表明反对英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坚定立场, 但是英国为延续所谓殖民影响一再变本加厉地干预香港事务。虽然英国将对港政策作为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 可能对其会有所控制, 但英国以所谓“监督”《中英联合声明》实施为由, 干预香港事务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第一, 英国在“全球英国”战略中将价值观外交置于对华政策之中。英国虽然仍重视与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的互动关系以维护其经济利益, 但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 价值观外交已经成为其更重要的考虑。英国“脱欧”后, 重新定位自身的国际角色, 推行“全球英国”战略。英国在“全球英国”的战略框架下努力寻找自身的国际定位, 试图在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中英两国的互动中“校准”与中国的关系。2021 年 3 月, 约翰逊政府发布《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 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政策文件, 在冷战后英国政府第一次全面评估自身的国际地位。这是“全球英国”思想理念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首次系统呈现, 进一步体现出英国试图重新构建国家身份的内涵。该文件中, 英国妄称中国对其构成“系统性挑战”^[29]。2023 年 3 月 13 日, 英国苏纳克政府发表《安全、防卫、发展及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政策文件的 2023 年更新版。报告无理指责中国给英国带来“划时代与体制上的挑战”^[30]。英国外交政策小组发布的《黄金时代之后: 重置中英接触》报告认为, 英国在很多问题上, 尤其是价值观问题上与中国存在根本性差异和分歧; 面对这些分歧, 英国应在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战略韧性, 较少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度, 同时在关键问题上捍卫英国的价值观和利益^[31]。

与此同时, 英方也意识到疫情后经济复苏还需要与中国巩固经贸关系, 尤其是在英国已经“脱欧”的大背景下, 必须继续开拓中国市场, 加强与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的经贸联系, 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经贸关系多元化。2022 年是中英建交 50 周年。50 年来, 中英两国贸易额从 3 亿美元增加到大约 1 000 亿美元, 双向投资存量从近乎为零上升到 500 亿美元。中国内地是英国的第六大出口市场, 是英国在欧洲之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伦敦已成全球第一大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心、第二大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沪伦通”是首个连接中国和西方主要资本市场的合作项目。这些成果既是伦敦金融优势地位的体现, 更得益于中英紧密关系的支撑。但近年来英国政府极力倡导“价值观外

交”，在涉港、涉疆、华为 5G 等问题上追随美国、施压中国。中英关系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第二，英国将继续以《中英联合声明》为所谓依据干预香港事务。英国作为香港曾经的宗主国，不愿意接受在香港事务上被边缘化的事实，意图利用丰富的多边外交资源强化与联盟国家的关系，协调立场共同对抗中国，但又无法掌握联盟内部的对华政策走向。2020 年 7 月，英国首相一面宣称将对中国人权和中国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表达严重关切，一面又说不能让英国被推入自动反华的境地，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接触政策^[32]。英国认为，《中英联合声明》仍然具有所谓约束力，其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方，对香港负有“政治和道义责任”，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促请中国履行对香港的“义务”，回归《中英联合声明》下的“承诺”。因此，英国将持续发布《香港半年报告》以“关注”甚至“监察”香港事务。笔者通过对截至 2021 年 12 月英国外交部发布的 50 份《香港半年报告》系统分析发现，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关注”可谓事无巨细。香港回归 25 年来，《香港半年报告》“关注”的事件多达 200 多项。另外，英国还将继续操弄 BNO 政策、借助国际平台联合盟友在涉港议题上对华施压。

第三，英国试图在对香港的所谓“政治和道德责任”与在香港的利益布局之间取得平衡。香港地区是英国在全球重要的贸易伙伴，是英国第十三大出口市场，在亚太区仅次于中国内地和印度。截至 2019 年年底，英国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头寸市值高达 1 170 亿英镑，是香港银行业的重要直接投资来源。截至 2021 年 6 月，有 667 家英国公司在香港经营，其中 138 家为地区总部^[33]。同时，在香港的 161 家持牌银行中 6 家来自英国，165 家认定的保险公司中 9 家来自英国。2018 年香港特区与英国曾就更紧密经贸合作事宜发表过共同声明，宣布双方的合作范围将包括全球自由贸易、创新、创业产业和“一带一路”倡议^[34]。英国是香港在欧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虽然英国和香港之间具有密切的经贸合作，但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英国政府以承担对香港的所谓“政治和道德责任”干预香港事务的政策不会改变，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在经济利益集团的压力下，英国政府也会顾忌在港英国利益集团的诉求，在一些方面继续加强与香港的经贸往来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

三、中国的应对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遏制，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斗争^[35]。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英国都将是干涉香港事务最主要的外部势力之一。对于英方企图通过发表报告、操弄 BNO、施压法官离任等手段干预香港事务必须予以反制，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

（一）通过法律手段反制英国等外部势力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中国政府反制英国干预香港事务的最大举措是顶住美西方的压力，制定实施香港国家安全和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从制度、政策上压缩了美西方通过代理人介入香港事务的空间，从法律上和心理上对外部势力在香港的活动形成震慑。2020 年 5 月 28 日，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6 月 30 日，

张建, 涂钦云. 修例风波以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方式、影响及趋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95-107.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在当日生效实施。香港国安法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 构筑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制度屏障。2021年3月11日, 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3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中央推进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香港特区政府据此完成本地配套立法, 有效堵塞香港选举制度的漏洞, 维护香港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 开启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随着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断健全、香港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 外部势力在香港长期培植的代理人通过选举进入制度内危害国家安全的制度漏洞得到弥补, 一些为外部势力利益服务的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分子受到法律制裁, 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空间被压缩。2021年6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在应对、反制外国就涉港问题恶意制裁中方人员方面, 有了可以运用的法律武器。

(二) 向国际社会阐明中方对中英联合声明的立场

《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内容是确认中国政府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同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国, 并对过渡期作出安排。香港回归后, 中国中央政府治理香港的宪制、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 无权对香港事务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2] 11}。首先, 《中英联合声明》的主要贡献和主要功能是两国和平解决了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 中国政府高度肯定《中英联合声明》的重要功能, 更没有否定《中英联合声明》的历史贡献。《中英联合声明》具有阶段性的历史使命和功能, 随着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中英联合声明》中与英方有关的条款均已履行完毕。其次, 《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项双边条约, 其特殊性在于中英两国就部分条款做出了“没有共识”的单方面声明, 以取得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共识”。1997年7月1日,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 香港就纳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 具体条款都在《中英联合声明》的中国政府单方面声明中体现。《中英联合声明》关于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中方的政策宣示, 已充分体现在全国人大制定的香港基本法中。第三, 《中英联合声明》不是英国干预香港事务的“尚方宝剑”, 英国应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收起前“宗主国”的傲慢与偏见, 正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准则。中国政府欢迎英国关心香港安全和发展的友好人士就香港的繁荣稳定提出建议, 也欢迎英国企业到香港投资或借助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第四, 对《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 中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 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不具备任何约束力^[36]。

(三) 积极开展涉港外交斗争

针对英国政府政治操弄BNO政策, 中国外交部表示, 自2021年1月31日起, 中方不再承认所谓的BNO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 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37]。同日,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 BNO护照不能用于香港出入境、不得在香港作为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 相关香港居民乘机赴港须出示特区护照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以及未持有其他有效旅行证件的非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 可向入境处申领签证身份书以用于国际旅行。为了配合中央政府, 香港特区政府已给14个驻港总领

事馆发信，要求对方不得承认英国 BNO 护照作为“旅游证件”。2022 年 2 月 4 日至 6 日，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访华。在两国发表的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中国“重申支持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上完全行使主权的的要求”。双方重申将在涉及彼此主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阿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重申支持阿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完全行使主权的的要求，以及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尽快重启谈判以期和平解决争端。另外，未来可借鉴外交部发布的“美国干涉香港事务清单”方式，发布“英国干涉香港事务清单”，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行径。支持更多内外机构发表经营报告，借助国际组织、高校、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商会以及跨国公司的有关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香港营商环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真实情况。

（四）采取差异化政策反制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要充分利用外部势力对港政策的差异性，采用不同烈度和等级的反介入、反干预以及相应的互动政策。外部势力在涉港问题上的政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规律。“五眼联盟”内部在对华战略和涉港政策上存在分歧和差异。“五眼联盟”介入香港事务既有各成员维护自己在港现实利益的原因，也由于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香港地区被“五眼联盟”赋予更加重要的地缘政治含义^[38]。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西方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在中国人权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比如，2021 年初，新西兰拒签了“五眼联盟”涉及香港和新疆议题的所谓联合声明，也没有参与西方就新疆人权议题对中国的联合“制裁”。4 月，新西兰外交部部长马胡塔重申对华友好政策，并表示对“五眼联盟”扩权到分享情报范围以外的军事外交事务感到不安^[39]。不容讳言的是，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空间受到大幅压缩，但外部势力不会放弃采取各种方式打“香港牌”的企图和行动。中国中央政府在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方面，仍要加强反干预、反制裁的机制建设，以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差异化、层次化、阶段化应对外部势力的干预。

四、结语

2022 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50 周年。涉港问题是中英关系的核心问题。2022 年 3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也不同。双方应该着眼战略和长远，坚持相互尊重，本着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对话交流，扩大互利合作。中方愿以坦诚、开放、包容的态度同英方开展对话合作，希望英方以客观公正态度看待中国和中英关系，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40]。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发展因约翰逊政府在新冠疫情、华为市场准入和香港修例风波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面临新困难。新冠疫情发生后，保守党政府对华政策的价值观外交、意识形态色彩和屈从美国压力的取向进一步增强。英国政府也希望借助涉港问题、南海问题以及华为 5G 等问题显示大国地位、巩固英美特殊关系^[41]。近年来，英国仍把香港作为延续其在东亚地区昔日辉煌的所谓“王牌”，企图利用香港议题制衡崛起的中国、紧跟美国对抗中国、延续英国对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影响。只要英方尊重中方在涉港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香港地区完全能够继续为中英关系发挥正能量。同时，中方应

张建, 涂钦云. 修例风波以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方式、影响及趋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95-107.

更加明确地向国际社会表明香港的繁荣稳定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 让国际社会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香港, 了解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策。另外, 中央层面和特区层面要加强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机制建设, 特别是特别行政区在落实中央反外国制裁决定与统筹维护特别行政区特殊地、繁荣稳定之间要取得平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7.
- [3] Forewor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Six-Monthly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on Hong Kong, January-June 1997 [EB/OL]. [2023-02-10].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00964/1997_Jul-Dec.pdf.
- [4] 陈寒溪, 刘诗琦. 英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及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J]. 战略决策研究, 2018 (1): 25-39.
- [5] 郭永虎, 王卓亚. 香港回归 25 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101-112.
- [6] 周方舟. 英美对港政策的比较研究——基于大国博弈、国家利益与外交传统视阈 [J]. 港澳研究, 2021 (4): 46-54.
- [7]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July to December 2019 [EB/OL]. (2020-06-11) [2023-04-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ix-monthly-report-on-hong-kong-july-to-december-2019>.
- [8]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January to June 2020 [EB/OL]. (2020-11-23) [2023-04-20].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37162/Hong_Kong_Six_Monthly_Report_January_-_June_2020.pdf.
- [9]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July to December 2020 [EB/OL]. (2021-06-10) [2023-04-20].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92734/hong-kong-six-monthly-report-48-jul-dec-2020.pdf.
- [10]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January to June 2021 [EB/OL]. [2023-04-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ix-monthly-report-on-hong-kong-january-to-june-2021.pdf>.
- [11] 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July to December 2021 [EB/OL]. (2022-03-21) [2023-04-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ix-monthly-report-on-hong-kong-1-july-to-31-december-2021>.
- [12] 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 2019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report [EB/OL]. [2023-04-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uman-rights-and-democracy-report-2019/human-rights-and-democracy-the-2019-foreign-and-commonwealth-office-report>.
- [13] Foreword by 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 and Foreign, Commonwealth & Development Office. Human Rights

- and Democracy Reports 2021 [EB/OL]. [2023-04-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n-rights-and-democracy-reports>.
- [14] 部分英国政客在幕后祸乱香港 [N]. 环球时报, 2022-12-30 (14).
- [15] Register of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EB/OL]. [2023-02-09].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cmallparty/200924/hong-kong.htm>.
- [16] Defending Democracy in a new world [EB/OL]. [2023-01-30]. <https://chinaresearchgroup.org/research/defending-democracy>.
- [17] Guy Faulconbridge, Anne Marie Roantree, British PM Johnson Tells China: We' ll not Walk away from Hong Kong People [EB/OL]. [2023-03-0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protests-idCAKBN23A091>.
- [18] 新疆与香港问题: 英国过百议员联署吁加强制裁中国, 称中英“黄金时代”已过去 [EB/OL]. [2023-03-15].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uk-56744630>.
- [19] 英议员促撤在港法官 郑若骅斥诋毁《国安法》行为低劣重申司法独立 [N]. 星岛日报, 2021-10-19.
- [20] BNO 居英计划下月底开始, 内政大臣与罗冠聪等人会晤称会尽量保香港自由 [EB/OL]. [2023-03-30]. <https://www.rfi.fr/cn/>.
- [21] 罗冠聪获英政治庇护, 伦敦宣布高额助港人计划 [EB/OL]. [2023-03-28]. <https://www.dw.com/zh>.
- [22] 英国下议院讨论港人权, 议员提准 97 后出生港人申 BNO 签证 [EB/OL]. (2021-06-10) [2023-03-30].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610/bkn-20210610010120396-0610_00822_001.html.
- [23] 蔡翠红, 王天婵. 五眼联盟的对华政策协调及其限度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1 (5): 16-24.
- [24] China' s Proposed New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Joint Statement [EB/OL]. [2023-03-3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oint-statement-from-the-uk-australia-canada-and-united-states-on-hong-kong>.
- [25] 美国等五国外长吁港府恢复被 DQ 立法会参选人资格 [EB/OL]. (2020-08-10) [2023-03-20].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00810-1075809>.
- [26] Five Eyes countries express 'grave concern' over erosion of democratic elements in Hong Kong [EB/OL]. (2021-12-21) [2023-02-21]. <https://www.aa.com.tr/en/world/five-eyes-countries-express-grave-concern-over-erosion-of-democratic-elements-in-hong-kong/2452610>.
- [27] 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Hong Kong [EB/OL]. (2020-06-17) [2023-02-25]. <https://hk.usconsulate.gov/n-2020061701/>.
- [28] 傅聪聪, 李明泽. “黄金时代”结束: 后疫情时期中英关系将继续下滑 [J]. 国际政治科学, 2021 (1): 167-176.
- [29]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EB/OL]. [2023-03-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
- [30]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 Responding to a more contested and volatile world [EB/OL]. (2023-03-13)

张建, 涂钦云. 修例风波以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方式、影响及趋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95-107.

- [2023-03-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grated-review-refresh-2023-responding-to-a-more-contested-and-volatile-world/integrated-review-refresh-2023-responding-to-a-more-contested-and-volatile-world>.
- [31] Sophia Gaston and Rana Mitter. After the Golden Age: Resetting UK-China Engagemen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Group [EB/OL]. (2020-07) [2023-03-20]. <https://bfp.org.uk/2020/07/resetting-uk-china-engagement/>.
- [32] Integrated Review: PM Boris Johnson's China Policy riddled with contradictions. Guardian [EB/OL]. [2023-02-26]. <https://www.sundayguardianlive.com/world/integrated-review-pm-boris-johnsons-china-policy-riddled-contradictions>.
- [33] 2021 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报告 [R].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2021-10.
- [34] 香港与英国就更紧密经贸合作事宜发表共同声明 [EB/OL]. (2018-03-21) [2023-03-20].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21/P2018032100626.htm>.
- [3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1-11-17 (1).
- [36] 外交部: 《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 已不具现实意义 [EB/OL]. (2017-06-30) [2023-02-20].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3P6v>.
- [37] 外交部: 1 月 31 日起中方不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履行旅行和身份证明 [EB/OL]. (2021-01-29) [2023-04-01].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01-29/9399788.shtml>.
- [38] 沈本秋, 唐小松. 对“五眼联盟”介入香港的转型分析 [J]. 情报杂志, 2022 (3) 31-37.
- [39] 新西兰重申对华友好政策: 中国表示欢迎, “五眼联盟”下一步动向引发关注 [EB/OL]. [2023-04-02].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6860521?at_medium=custom7&at_custom4=FBBD5492-A653-11EB-8316-D55F4D484DA%E2%80%A6.
- [40] 外交部.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 [EB/OL]. (2022-03-25) [2023-04-10]. https://www.mfa.gov.cn/zyxw/202203/t20220325_10655711.shtml.
- [41] 王展鹏. 百年大变局下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J]. 欧洲研究, 2020 (6): 32-50.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斗争：逻辑、原则与策略

周光俊

（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反分裂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延续历史发展、接力现实实践、谋划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致力于促进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主权独立、维护领土完整。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逻辑、大一统历史观的历史逻辑、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实践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治理逻辑等整体性理念。中国共产党在反分裂斗争中，始终坚持权威集中但有积极性的原则、底线思维但有灵活性的原则、共同一致但有差别性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分裂势力、不同时间情势、不同历史发展等开展具体的反分裂斗争，以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为基础铸牢反分裂斗争的铜墙铁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核心铸牢反分裂斗争的认同基石，以成熟定型法律为武器铸牢反分裂斗争的坚强后盾，以我为主铸牢反分裂斗争的主导权主动权，以国际合作为支撑铸牢反分裂斗争的国际统一战线，丰富了反分裂斗争的实践策略，探索形成了中国反分裂斗争的体系道路。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反分裂斗争的正确道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中国要进一步提升反分裂斗争的国际话语权，为人类社会反分裂斗争贡献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分裂主义；反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108-12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3.010

作者简介：周光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反分裂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21CZZ046）

引用格式：周光俊. 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斗争：逻辑、原则与策略[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3): 108-119.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以“台独”“港独”“藏独”和新疆分裂势力为代表的分裂运动（分离运动）是带给国家政权最直接、最强烈冲击的一种现实威胁，给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民族理论带来了新的课题，给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带来了新的挑战。因而，反分裂斗争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中国的反分裂斗争是反对民族分裂势力（新疆分裂势力、“藏独”等）和反对政治分裂势力（“台独”“港独”等）的结合，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反分裂斗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等历史任务。完成这些历史任务，要坚持反分裂斗争，始终促进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主权独立、维护领土完整。因而，整体性地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形成的不同时期的反分裂策略，总结反分裂的成功经验，深化对反分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建构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的话语体系，揭示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分裂斗争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历史贡献，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需要。

在已有的文献中，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斗争：

一是针对具体分裂势力的斗争策略。针对台湾问题，要着眼于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和国内关切，警惕美国制造“事实台独”倾向^[1]，要始终掌握国家统一主导权^[2]，将两岸的政治合作视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种手段^[3]。针对“港独”，要分析不同时期“港独”思潮的特征^[4]，遏制所谓的“全民公投”^[5]，从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历史文化传统教育、政治法律制度规制、经济社会参与融合等方面稳步推进^[6]。针对新疆分裂势力，要重视新媒体对新疆分裂势力的助推作用^[7]，铸牢反分裂斗争的社会根基^[8]。针对“藏独”，有学者认为“藏独”的本质是复辟政教合一政体^[9]，并随着国际、国内以及西藏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0]。

二是认为政治认同、制度建构、域外关系、利益考量等因素对中国反分裂斗争有着重要影响。反分裂斗争政策从宽到严，可分为包容、同化、排斥三种形态，主权国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国家对分裂活动的政策选择^[11]。从特定国家退出将面临一定的惩罚，迫使分裂主义成员考虑到可能失去的利益^[12]。台湾问题的解决与“港澳模式”有明显区别^[13]，要重视不同分裂势力的合流^[14]和分裂势力的国际化^[15]。中国反分裂主义战略以国家认同为核心，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在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外交诸领域确定具体工作方针和政策^[16]；价值认同关系合法性与政治认同，成为影响国家认同的关键因素^[17]。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历经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文化认同三条路径^[18]。

三是认为中国的反分裂斗争要致力于完善法律和政策。反分裂应重视法律的作用，可以采取通过制定国防法、反侵略法以维护自己的对外主权，制定戒严法、紧急状态法、反分裂国家法等以维护自己的对内主权相结合的方式立法^[19]；完善宪法和《反分裂国家法》的配套建设，创新以法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反分裂斗争话语体系等途径实现反分裂国家法律机制的系统性建构^[20]。反分裂斗争的策略包括国家强制力的军事打击、利益让步的制度妥协、国际体系层面的孤立和封锁，强化国家能力的强制性、整合性与凝聚性建设，建构国家认同^[21]。反分裂国家战略以制度建构为核心、以经济发展为内在动力、以军事遏制为保障、以文化认同为纽带、以反对外来干涉为支点^[22]。

已有研究集中从“台独”“港独”“藏独”和新疆分裂势力等个案梳理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

策略和方式，肯定了政治认同、制度建构、法律法规等对反分裂斗争的作用，但对反分裂斗争整体性的历史梳理、逻辑话语、指导原则、实践策略等并未能形成系统论述。本文试图总结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的相关历史，梳理反分裂斗争的逻辑，探索反分裂斗争的原则，描述反分裂斗争的策略，形成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的中国话语。

二、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的逻辑遵循

反分裂斗争是政治性地、系统性地促进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主权独立、维护领土完整的活动，建基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结合在一起，创制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民族团结、主权独立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历史进程。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民族国家共同体是近代以来民族单元与国家单元相一致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年代，民族国家是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遍形成的“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23]，民族国家已经成了最为重要的政治实体。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有其新的意涵，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承认民族国家就在于承认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是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地理共同体等的结合，共同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反对国家的分裂。可以认为，反分裂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维系的重要前提。“要么迅速地演变为民族国家并成为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一员，要么继续维持原先的国家形态而徘徊于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之外，甚至沦为民族国家的殖民地，受苦于统治和压迫。”^[24]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将中国从天下（帝国）的体系中解脱出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民族国家的一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更是争取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了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25]。这一论断显然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并结合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事实进行阐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在中国的反分裂斗争中要求“保持中央权力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将社会成员从特定的地缘关系中解放出来并组织成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主体”，“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认同之间形成平等的和具有各自特点的政治结构”^[26]。

（二）历史逻辑：大一统历史观

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启示。反分裂斗争涉及思想的认同、地理的完整、政治的一体、历史的延续、文化的绵延等多个方面，作为致力于促进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主权独立、维护领土完整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反分裂斗争作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手段以延续大一统的历史观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大一统’是刻画古今中国理想政治形态的核心符号和代码，远远超越制度纬度的内涵，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共识，也是对于认同政治的终极指向，被普遍识别、认同和遵循。”^[27]古往今来，追求统一、反对分裂是大一统的基本价值导向。在这种导向之下，大一统衍生出制度设计、文化塑造、价值认同、政策派生等多方面的举措，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试图将社会纳入国家的治理轨道，汉唐都护府制度、元朝理藩院制度、明朝土司制度、清朝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等都试图将少数民族融入共同体之中，

“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试图从整个民族的复合性推演出国家统一的合理性。类似的政策、制度、言论等在中国历史上一再被提及, 试图揭示中国绵延至今的韧性所在。

纵观中国历史, 统一的时间是要远远多于分裂的, 每一次的分裂之后, 中国人总能迅速地找到大一统的道路, 重新走上大一统的轨道。分裂之后迅速地走向统一, 这是中国历史绵延不断的重要保证, 这种政治韧性离不开大一统的政治实践。正是因为大一统, 才赋予了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政治韧性。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累积的, 承接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政治资源和历史积累。在这其中, 最为主要的是大一统的政治实践。大一统的理念和实践提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动力, 规约着中华民族发展方向,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基本的政治保障。只有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才能沿着共同体的方向和目标演进, 而不会出现国家分裂、民族分离的情况。

（三）实践逻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 这既是历史的传承, 也是现实的需要。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大特色, 也是重要的发展利好, 多民族意味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的不可分割性, 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精神, 意味着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统一是对多民族的进一步界定, 意在表明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是统一不可分割的, 各民族只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发展空间和发展可能, 脱离了统一的国家这一载体, 多民族势必会四分五裂, 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党在历史上的任何形势下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分裂, 从反对伪满洲国到反对国民党划江而治, 从反对达赖喇嘛图谋西藏“独立”到反对伊塔事件, 从反对“台湾独立”到反对“香港独立”等, 都在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坚定决心。在反分裂斗争中,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既是反分裂斗争的理由, 也是反分裂斗争的依靠, 更是反分裂斗争的目标。要坚持把反分裂斗争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手段。之所以要开展反分裂斗争, 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这一基本国情要求以反分裂斗争作为手段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事实。要坚持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反分裂斗争的依靠, 开展反分裂斗争只有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依靠, 维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才能有效、彻底、成功。要坚持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反分裂斗争的目标, 开展反分裂斗争的最终目标是维系、发展和壮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为中华民族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四）治理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

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以来, 中华民族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符号, 不断被赋予文化意义、经济意义、领土意义、政治意义。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宪法序言中, “中华民族”入宪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反分裂为手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 统一才能确保在统一的地理疆域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分裂则会导致疆域上的分散进而难以有效连接多民族, 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反分裂斗争的重要认同建构,

最直接的就是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提性认同。因而，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反分裂斗争的重要治理逻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其本质是要实现根据国家建设需要而设定的规范性政治目的。这一目的就是要在我国主权疆域内全方位实现现代化，容纳多样性，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促进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力。”^[28]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地理上的连接、政治上的一统、经济上的一体等都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建立各民族共同体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念，建立共同精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从这个方面来说，“台独史观”的所谓“民族叙事”本质，就是“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29]，其他分裂势力亦然。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在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开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就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等共识。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追求“中华民族的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的指导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斗争始终坚持权威集中但有积极性的原则、底线思维但有灵活性的原则、共同一致但有差别性的原则，根据不同分裂势力、不同时间情势、不同历史发展等开展具体的反分裂斗争。

（一）权威集中但有积极性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却是世界大国中唯一尚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以“台独”“港独”“藏独”和新疆分裂势力为代表的分裂势力构成了对中国国家统一的最大挑战，反分裂斗争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纵观历史，党是否完全掌握反分裂斗争的领导权和主动权，直接关系到反分裂斗争的成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始终坚持以反分裂斗争促进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完成主权独立、维护领土完整。针对不同地区反分裂斗争，党的领导地位是一致性的，领导权威是一贯的。无论是对台湾、香港还是西藏、新疆地区的反分裂斗争而言，党始终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就目前而言，党通过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针对性地统筹协调领导具体事务，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针对不同地区反分裂斗争，党的领导方式是差异性的，这是为了更好地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在反分裂斗争中，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地方工作的积极性能够激发地方主观能动性，深切地认识到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意义，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落实反分裂斗争，坚定地维护国家安全。同时，发挥地方工作的积极性要持之以恒地坚持群众路线，打一场反分裂斗争的人民战争。党在反分裂斗争中始终坚持寄希望于人民的重要原则，就是充分认识到人民在反分裂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发挥群众智慧，倡导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使人民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对于台湾而言，由于两岸尚未统一，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共同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所指出的, 我们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一如既往尊重台湾同胞、关爱台湾同胞、团结台湾同胞、依靠台湾同胞。针对香港而言, 我们党坚定支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高度自治, 实现“港人治港”, 并坚持一个国家的底线, 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针对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反分裂斗争而言, 要将党的领导深入到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 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等,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对待“藏独”问题时, 要重视用西藏的发展历程去驳斥“藏独”的虚妄之言, 重视背后的西方势力的介入, 更要驳斥分裂问题宗教化的谎言。

(二) 底线思维但有灵活性的原则

纵观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的历史, 我们党始终坚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底线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旗帜鲜明地指出, 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反分裂斗争的底线思维意味着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事态下都要始终坚持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严肃性和紧迫性, 且同样严肃对待民族分裂势力和政治分裂势力。也就是说, 反分裂斗争的一致原则是反分裂斗争的底线思维, 这种一致原则能够确保我们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事态下始终坚持领土完整、民族团结。中国反分裂斗争的全国一盘棋思维是反分裂斗争的复杂性造成的, 民族分裂势力与政治分裂势力是最重要的两种分裂势力, 它们的同流合污是造成中国反分裂斗争形势日益复杂的重要原因, 甚至曾出现过所谓“五独论坛”^[30], 旨在叫嚣分裂、反对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分裂斗争的重要论述把推进祖国统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结合, 把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为新时代中国反对分裂主义、推进祖国统一描绘了战略蓝图^[31], 体现出新时代反分裂斗争的全国一盘棋思想。

在底线思维的基础上, 受限于对反分裂斗争规律的认识、中国本身的地位和整个国际机制、国际规则, 中国的反分裂斗争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党根据时代、事件和历史等强调反分裂斗争的具体化、分类化策略, 灵活性地探索反分裂斗争的方略与策略, 形成了反对民族分裂的民族区域自治模式和反对政治分裂的“一国两制”模式。在这两个重要的模式之下, 反分裂斗争旨在全面系统地了解 and 掌握具体分裂运动的历史、现实和情势, 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在反对民族分裂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反民族分裂斗争实现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的转变, 经历了民族自决与联邦制(1922—1937年)、变化中的“民族自决”(1937—1946年)、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1946—1949年)的发展变化^[32],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分裂斗争, 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 被界定为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反对政治分裂斗争中, 党的主张实现了从“武力解放台湾”(1949—1955年)到“和平解放台湾”(1955—1979年)再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1979年至今)的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反对政治分裂势力的斗争始终强调中央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提出新时代党解决

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三）共同一致但有差别性的原则

反分裂斗争的共同一致原则意味着反分裂斗争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只有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主动地位，增强主动作为，才能在具体的反分裂斗争中把握主导权和主动权，才能确保反分裂斗争始终沿着既定的轨道行进。值得注意的是，反分裂斗争的共同一致并不意味着对待所有反分裂斗争都要采取相同的策略。事实上，对待不同的分裂势力要根据不同时间、不同特点，充分考虑不同分裂势力的历史脉络与历史纠葛。不同的历史延续对分裂势力的影响是不同的，为此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由于不同时期的“台独”“港独”“藏独”和新疆分裂势力等分裂势力的行事风格、极端思想、利益纠葛等不同，反分裂斗争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比如，中央治疆的原则从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确立的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拓展为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确立的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这一原则的转变是根据新疆发展事业的侧重点而转变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新疆的发展重点是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要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这表明党在新疆反分裂斗争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对宗教极端思想等进行了有效遏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先后召开，提出了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不断深化对治藏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两岸分隔的状态下，台湾民进党的崛起冲击了“九二共识”，分裂主义活动愈演愈烈，美国、日本等敌对势力暗中的支持和蛊惑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大陆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力量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治理港澳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

四、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的实践策略

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反对分裂的历史，在统一与分裂的博弈中坚定了统一的价值。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分裂的历史，从革命时期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伪满洲国、反对蒋介石划江而治等，到建设、改革时期和新时代反对“台湾独立”、反对“西藏独立”、反对新疆分裂势力、反对“香港独立”等，我们党始终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在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外交诸领域确定具体工作方针和政策。这些工作方针和政策包括国家强制力的军事打击、利益让步的制度妥协、国际体系层面的孤立和封锁，强化国家能力的强制

性、整合性与凝聚性建设, 建构国家认同^[16]。纵观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的历史, 以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为基础铸牢反分裂斗争的铜墙铁壁,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核心铸牢反分裂斗争的认同基石, 以成熟定型的法律为武器铸牢反分裂斗争的坚强后盾, 以我为主铸牢反分裂斗争的主导权主动权, 以国际合作为支撑铸牢反分裂斗争的国际统一战线, 丰富了反分裂斗争的实践策略, 探索形成了中国反分裂斗争的体系道路。

(一) 以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为基础铸牢反分裂斗争的铜墙铁壁

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反分裂斗争不是一朝一夕的, 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不是一人之力可以为之的, 而是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 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发展进步。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 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反分裂是民族大义。作为民族大义, 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反分裂斗争中, 共同实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发动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群众直接参与反分裂斗争, 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直接与分裂势力作斗争, 打早、打小、打苗头, 积极争做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宣传者、践行者、引领者。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 党破获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 群众参与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 铸牢群众反分裂斗争的思想屏障, 以实际行动践行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无论是反对民族分裂势力还是政治分裂势力, 人民群众要始终正确理解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 铸牢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思想屏障, 切断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渠道, 打赢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无论在台湾、香港还是西藏、新疆, 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和艰巨性是多方面因素的集合, 除了外来势力的干预之外, 所在地区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蛊惑是重要原因。宗教极端化的宣传、对历史的歪曲、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曲解、对极端意识形态的推崇等极端化的思想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铸牢群众反分裂斗争的思想屏障, 就要在群众中消解极端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加大对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宣传力度, 加大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打击力度, 加强对分离主义势力尤其是“两面人”的揭露, 坚决与反分裂斗争中的“两面派”“两面人”作斗争, 让群众了解事实的真相。

(二)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核心铸牢反分裂斗争的认同基石

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是反分裂斗争的底线。当然, 反分裂斗争不是为了治理而治理, 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分离运动和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决定了必须把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在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中, 党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在文化意义上界定了何谓中华民族共同体, 也在政治意义上表明了民族事务治理应该倡导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建设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有两个方面的基本限定。一方面, 正是因为我国是多民族国家, 才要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树立“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和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多民族国家是统一的，才要求培育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追求一体的主线和方向。反分裂斗争维护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给疆界内的所有民族以共同的政治身份，这种政治身份避免了民族身份（少数民族）、区域身份（边疆区域）和阶层身份（社会底层）的复合叠加^[33]；塑造了一种基于领土认同的国家认同^[34]，形成了命运与共的整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反分裂政策实现了从反分裂到促进团结统一的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政策的重要进阶，是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政策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拓展。中国的反分裂斗争已经实现了从单一的事务治理到整体的事务治理的转变。反分裂斗争不是仅仅针对分离运动本身的治理，而是关系到经济发展、边疆治理、政治稳定、文化认同等方面，积极培育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民族团结是生命线，要倡导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和睦、共同发展的民族团结进步精神。国家稳定、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三）以成熟定型的法律为武器铸牢反分裂斗争的坚强后盾

以法律为武器开展反分裂斗争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在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中，法律始终是重要的后盾。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党内法规，以及通过法律程序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制定法律法规，打击分裂主义势力，保障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反分裂国家法》为代表的法律是反分裂斗争中以法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反分裂话语体系，有助于实现反分裂国家法律机制的系统性建构^[35]。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在宪法之外，我国可以采取制定国防法、反侵略法以维护自己的对外主权和制定戒严法、紧急状态法、反分裂国家法等以维护自己的对内主权相结合的方式立法^[36]。针对具体的反分裂斗争，党领导立法机关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针对台湾问题，最为典型的是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旨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事实上是以法律反制所谓“法理台独”，防止台湾当局“臆造国家形象”^[37]。虽然《反分裂国家法》仅适用于台湾问题，但却为香港、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反分裂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范例。针对香港问题，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在宪法和基本法的基础上，党中央根据香港地区反分裂斗争的情势，审时度势，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针对基本法具体条文的释法、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特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等具体的法律。针对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最为重要的法律。

（四）以我为主铸牢反分裂斗争的主导权主动权

由于分裂运动关系到分离的族群—区域、民族国家和世界政治的关系，反分裂斗争总是面临着分裂族群—区域的反对和境外敌对势力的干涉。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在反分裂斗争中始终反对外来干涉，主张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分裂主义问题，坚决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等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民族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的治理首先应该以民族国家本身为中心开展治理。”^[38]值得说明的是，独立自主地

解决分裂主义问题并不代表不支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分裂主义势力, 而是说应该在涉及本国的分裂主义问题时, 要保持独立自主的话语权, 不允许他国干涉。因此, “比较妥当的办法, 是将分离主义运动的问题留待有关国家自己去处理, 也即视为有关主权国家的内政”^[39]。中国共产党在反分裂斗争实践中, 始终把坚持主权独立视为重要原则。对于香港、台湾问题, 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香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已的问题, 不允许他国借助香港、台湾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 他国无权对香港、台湾问题指手画脚, 更不能煽风点火。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在蔡英文窜访美国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之后, 国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萧美琴及其家属进行制裁, 对支持“台独”的台湾远景基金会和亚洲自由民主联盟 2 家台湾机构实施惩戒。外交部宣布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采取制裁措施。对于涉藏、涉疆问题,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 西藏、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必要举措, 涉藏问题、涉疆问题并不是所谓“宗教问题”。“宗教问题”只不过是某些国家利用涉藏、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 也只是分裂主义势力博得“同情”的一张牌而已。从他国对中国反分裂斗争的干预而言, 反分裂斗争应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在拒绝他国干涉的基础上, 防止本国分裂主义势力与外部敌对势力同流合污。

（五）以国际合作为支撑铸牢反分裂斗争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民族事务治理中, 边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因而也是容易挑起民族情绪、煽动民族对立、制造民族矛盾的高发地区^[40]。治国必治边战略下, 边疆变成了发展的前沿, 边缘成为发展的重心, 国界变成了发展的中介, 打破地理上的封闭与隔阂, 这是一种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的能力。因而, 从边疆边缘的地理意义出发, 有必要强化合作治理的必要性, 使边疆成为反分裂斗争的重要前沿、重心和中介。除了边疆的区域之外, 分离主义的扩散性效应导致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而, 中国始终坚持在区域协同治理的基础上, 努力践行多边主义机制, 在既有国际规则维护、新的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这一体制机制的坚持和创新的背后,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践行的价值观。“一项新的全球协议可以把‘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这一概念作为富有活力的准则。‘全球公域’是当代全球化的基础, 它不仅是一个资源共享体, 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41]在这一意义上说,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化问题的应对, 是对作为公域的全球性挑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正在成为中国外交新的中心原则, 这一新原则的确立有助于中国供给全球治理方案。”^[42]中国始终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 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更多领域、更高层次上实现全球治理。最为典型的案例是, 中国倡导组织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这“三股势力”。其中, 分离主义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产生的温床, 上海合作组织突出的合作治理重心之一在于反对民族分裂势力。

五、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上, 发展需要安全作为基础和后盾, 一个国家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

力离不开安全作为保障。反分裂斗争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抓手需要继续受到高度重视。中国的反分裂斗争一直在探索中前行，已经走出了一条反分裂斗争的正确道路。在分裂主义与分离活动成为全球性治理难题的时代，中国的反分裂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经验。中国倡导的“一国两制”反对政治分裂主义的模式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模式，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直是各种全球治理问题方案的提出者、积极建议者。我国要进一步提升反分裂斗争的国际话语权，为人类社会反分裂斗争贡献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冯帆. 挣脱约束——警惕美国制造“事实台独”倾向 [J]. 世界知识, 2020 (19): 62-63.
- [2] 尹茂祥. 在反“台独”斗争中掌握国家统一主导权——对 2016 年以来两岸关系的观察与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3): 25-34.
- [3] Sheryn Lee. The Defining Divid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US, Taiwan, China Strategic Dynamics [J]. Security Challenges, 2011 (1): 79-89.
- [4] 李鹏. “港独”思潮的兴起、主张及其危害论析 [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7 (3): 19-24.
- [5] 徐海波. “港独”的“公民民族自决”与“全民公投”之法理审视与批判 [J]. 法学论坛, 2017 (4): 43-54.
- [6] 刘秀伦, 叶新璐. “港独”分离主义对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J]. 当代青年研究, 2018 (6): 123-128.
- [7] 赵国军. 新媒体时代“疆独”网络分裂主义及其治理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5 (2): 31-39.
- [8] 李军刚, 施文会. 新疆分裂势力的发展及党的反分裂斗争策略研究 [J]. 喀什大学学报, 2016 (5): 9-11.
- [9] 李俊清. “藏独”的本质是复辟政教合一政体 [J]. 国际问题研究, 2008 (4): 7-12.
- [10] 郭永虎, 暴战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演变及启示——以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视角 [J]. 青海社会科学, 2016 (4): 1-6.
- [11] 杨东. 外部势力与国家反分裂政策之间关系的模式 [J]. 国际论坛, 2018 (1): 60-65.
- [12] Martijn Huysmans, Christophe Crombez. Making Exit Costly but Effici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it Clauses and Secession [J].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0 (4): 89-110.
- [13] Yihu Li.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olution to Taiwan: Two Comparative Analyses [J].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2020 (2): 270-287.
- [14] 陈文杰. “港独”“台独”合流形势分析 [J]. 统一论坛, 2019 (5): 43-46.
- [15] 李捷, 王婷婷. “疆独”、“藏独”的国际化路径研究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0 (2): 25-36.
- [16] 杨恕, 李捷. 论中国反分裂主义战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 (3): 60-73.
- [17] 李捷. 反分裂斗争中的认同政治: 价值与制度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6): 66-74.
- [18] 郭雷庆, 李新.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 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65-80.
- [19] 姜明安. 《反分裂国家法》的正当性与合宪性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110-117.
- [20] 周叶中. 论反分裂国家法律机制的问题意识与完善方向 [J]. 法学评论, 2018 (1): 1-8.

- 周光俊. 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斗争: 逻辑、原则与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08-119.
- [21] 李捷, 杨恕. 反分裂主义: 共识和应对 [J]. 国际政治研究, 2019 (4): 9-43.
- [22] 张仕荣. 基于国际经验构建中国反分裂战略体系的几点思考 [J]. 国际安全研究, 2011 (6): 25-29.
- [23] 列宁全集: 第 2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225.
- [24] 周平. 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17.
- [25]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22-623.
- [26]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上卷·第二部: 帝国与国家 [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825.
- [27] 常轶军. “大一统”的现代性解码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 [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 107-114.
- [28] 关凯.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理论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5): 71-77.
- [29] 陈思. 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以明郑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 82-96.
- [30] “五独”窜聚台北图分裂国家 叫嚣建全球“反中”联盟 [EB/OL]. (2018-03-25) [2023-02-1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5894521751116724&wfr=spider&for=pc>.
- [31] 曹伟, 李捷. 习近平新时代反分裂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3): 37-47.
- [32] 王珂.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290-317.
- [33] 周平. 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420.
- [34] 周光辉, 李虎. 领土认同: 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7): 46-64.
- [35] 周叶中. 论反分裂国家法律机制的问题意识与完善方向 [J]. 法学评论, 2018 (1): 1-8.
- [36] 姜明安. 《反分裂国家法》的正当性与合宪性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110-119.
- [37] 段磊, 邓玉凡. 论“法理台独”的“国际法形态” [J]. 台湾研究, 2022 (4): 10-21.
- [38] 周光俊. 族群分离运动治理: 缘起、结构与议题 [J]. 探索与争鸣, 2020 (6): 149-156.
- [39] 万鄂湘, 郭克强. 国际人权法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89.
- [40] 胡安·诺格. 民族主义与领土 [M]. 徐鹤林, 朱伦, 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31-32.
- [41] 戴维·赫尔德, 凯文·扬. 有效全球治理的原则 [J]. 朱旭, 译.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5): 1-11.
- [42] 庞中英.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类型与实施方略 [J]. 学术界, 2018 (1): 5-12.

责任编辑: 刘伊菡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现实价值与实践路径

高维 刘红丽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天津 300387)

摘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我国统编教材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健全了国家教材制度, 编写出版三科统编教材, 自此统编教材建设进入了新阶段。统编教材通过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进而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统编教材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 促进学生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有利于学生了解我国国情, 认识到全国人民是一个发展的整体并促进民族团结统一; 有利于学生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 提升学生作为接班人的使命担当; 有利于学生感知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增强文化自信; 有利于学生感悟人与自然的关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有利于学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促进其成为世界和平的推动者与维护者。进一步发挥统编教材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价值, 需要坚持党的领导, 进一步强化统编教材建设的意识形态内涵, 加强党领导下的统编教材编写队伍建设, 完善统编教材管理体制; 规范教材编写工作, 在教材中系统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元素, 优化教材设计和呈现方式; 做好教师培训工作, 加强教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并培养教师教材开发的能力; 借助现代教育技术, 挖掘和拓展教材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元素, 运用项目式学习等方式促进学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意识形态安全; 中华民族共同体; 国家教材制度; 统编教材

中图分类号: D61;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3-0120-11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3.03.011

作者简介: 高维,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刘红丽,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国家认同教育融入中小学课程的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CHA180267)

引用格式: 高维, 刘红丽.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现实价值与实践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3): 120-130.

高维, 刘红丽.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现实价值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20-130.

2022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只有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23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心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 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2]。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 教材为基。教材是传达国家意志、体现国家事权的特殊文化产品, 需要传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然而, 随着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 受西方外来思想侵袭、历史虚无主义袭扰等因素影响, 一段时期内出现“毒”教材、擅自偷换教材版本及小学数学插图事件等问题^[3], 存在着歪曲历史, 给学生灌输分裂思想, 弱化国民教育; 插图不美观, 不积极向上, 个别插图甚至存在错误等问题。如果长期使用这样的教材, 容易导致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模糊, 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祖国统一, 也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这些问题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 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 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 体现国家意志, 是国家事权^[4]。其中, 统编教材是培根铸魂的关键教材, 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密切联系。统编教材能够系统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 促进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 统编教材立足国际视野, 能够帮助学生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树立文化自信, 在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上起着重要作用, 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载体。

从已有研究来看, 学界认为统编教材有利于促进国家认同教育^[5]、民族认同教育^[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7]。当前, 关于如何通过统编教材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尚待加强。本文将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与现实价值, 分析统编教材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以期为统编教材进一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

统编教材也称“通用教材”“部编教材”, 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编辑, 通用于全国各地学校的教材”^[8]。我国统编教材建设于清末开始, 民国时期得到发展, 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编统用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其中经历不断的探索与尝试, 获得了许多经验,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统编教材建设更加完善。目前, 一些研究者系统地梳理了我国统编教材的发展脉络, 如郭戈从旧中国统编教材的历程、新中国统编教材的历程梳理了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9], 张振、刘学智从清末救亡图存时期、民国政局迭变时期、新中国除旧布新时期、新时代伟大复兴时期四个阶段梳理了中国百年统编教材建设的历史脉络^[10], 马丽琳梳理了新时代以来统编教材的重大举措与实践特色^[11]等。本文联系中国式现代化历程进一步梳理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教材编审工作，探索建立编审统一的教材制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2]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军阀混战，社会环境极为恶劣。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大力推进教育改革，狠抓革命根据地教材建设工作^[13]。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社会形势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在根据地建立了新的制度与课程，严格规定教材的政治导向，并设立了专门机构，尝试建立编审统一的教材制度。

1931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成立，统一管理根据地的教育工作。1932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内设立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苏区教育类图书的编纂与审定工作^[14]。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颁布，规定了地方苏维埃的编审出版机构及其职能^[15]，缩短了教材的审批和出版周期。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设立编审局，领导编审教材事宜。革命根据地的教材编审机构逐步健全，编审统一的教材制度探索不断深入。同时，革命根据地十分重视教材编写工作，多次组织人才力量参与教材编写。1942年，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为由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写的《文化课本》作序，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材编写工作的重视与关心^[1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条件极其艰苦，经济落后、文化贫瘠，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的构想并未完全落实。但在如此艰苦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教材编审统一制度的不断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教材建设事业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写供应全国的教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带来了社会性质上的变化，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宣传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就要对旧有的教科书编辑、出版和发行体制进行彻底变革^[16]。因此，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体现了对统编教材的重视。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时提出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同时决定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7]，专门负责编辑出版供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的教材。同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由其组织力量重新编写中小学各类课程的教材。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了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材体系的初步形成，建立起全国中小学教材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18]。1953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中央历史教学问题委员会”，加强了对语文、历史等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编写的统一领导。从1949到196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出版四套统编教材，有效解决了中小学的用书难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教材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统编教材没能持续地使用。总体来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不断探索与努力，使党的思想与国家意志能够充分融入教材，为教材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恢复统编教材制度，开启教材建设多样化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加快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与专门人才，国家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教材建设再次得到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点。

高维, 刘红丽.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现实价值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20-130.

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开始恢复统编教材建设的各项制度。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就分管科教工作, 要求尽快编写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材, 还强调教材编写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 要切实提高教材编写质量。1977年, 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制订了1978年度中小学教材出版计划, 明确提出中小学教材以后要由教育部统编。1978年4月, 国家恢复了教材建设工作, 包括教材编写与出版发行体制。中国共产党再次确立了对教材建设事业的统一领导, 统编教材建设逐步得到恢复。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中国共产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领导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基础上, 不断增强领导教材建设的适应性与灵活性。1988年, 国家教委《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颁布, 开启了我国义务教育教材“一纲多本”和教科书建设多样化新阶段。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 加速了教材多样化的进程。这是党中央基于当时社会发展形势及教育发展状况对教材建设事业进行的有效探索, 丰富拓展了教材建设呈现国家事权的形式, 体现了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灵活性, 教材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不断推进。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健全国家教材制度, 编写出版三科统编教材

党的十八大之后, 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工作非常重视, 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是铸魂工程, 强调统编教材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立足这一制高点, 加快推进从教材大国迈向教材强国, 助力实现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 成为时代的召唤和历史的必然^[19], 统编教材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新阶段。

2014年10月,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更名为“教育部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教材建设的领导决策工作。2016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 提出要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 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2017年3月, 教育部成立教材局专门指导管理教材建设, 同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开始在全国所有地区初始年级投入使用, 三年之内实现全国覆盖。2018年5月,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 它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专业机构。2019年完成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审编工作, 于同年秋季高一年级起使用新教材, 2022年所有省份实现全覆盖。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国不仅成功组织编写了多套全国通用教材, 还做到了全国学生都使用上了统编教材, 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政策灵活, 做到“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20], 让教材建设各方面体制机制衔接更加紧密。自此, 统编教材建设进入了新时代。

通过梳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 不难发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便十分重视教材建设工作。在党领导教材建设的百余年历程中, 我们也收获了许多宝贵经验。一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立足中国国情, 编写能够促进中国社会发展与学生发展的教材。二是健全教材管理制度, 设立专门机构统一编审教材, 组建专业队伍编写教材, 确保教材的专业性。三是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体现科学育人规律,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现实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以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实质内容、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导向，是统筹协调、全面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统编教材通过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进而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一）统编教材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学生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党的领导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前途、命运、性质和方向，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坚实的依靠、最显著的优势和最有力的保障^[21]。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能够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凝聚起来。只有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够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才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才能不断取得新进展与新成就。

统编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承载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任和使命，在落实国家事权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统编教材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22]，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统编教材有利于让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发展历史，有利于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增强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如六年级下册统编语文教材中《十六年前的回忆》一文讲述了李大钊同志在经历严酷的审问下不背叛党，展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有利于学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事业中奋斗的艰辛，感受党的伟大，增强学生对党的拥护与热爱。再如高中思想政治必修一课本系统梳理了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的思想理论，深刻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经历挫折后坚持社会主义的完整过程，使学生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所作的巨大贡献，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有利于学生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二）统编教材有利于学生了解我国国情，认识到全国人民是一个整体并促进民族团结统一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我国人口规模庞大的实际。人口是基本国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特征和前提条件。回顾党领导国家现代化的百余年历程，各个时期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与发展都得益于对当时人口重大问题的积极应对与妥善调整^[23]。对于人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没有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可以参考，因此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奋斗、努力开创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中国特色。巨大的人口规模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也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难题，并且人口国情是不断变化的。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直面人口负增长与人口区域不平衡等问题，持续推进人口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入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的源源动力。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统编教材立足中国国情，能够体现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巨大的人口规模是中国发展的基础，也

是中国的国家特色, 统编教材也将这一国情融入其中。使用统编教材有利于学生掌握我国基本国情, 认识到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而且是统一发展的整体。如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提到“知道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有 56 个民族”。让学生了解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知道我国的人口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构成的, 56 个民族是一个整体, 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再如统编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教材第六课《建设美丽中国》中讲述了发展中的人口问题, 让学生了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变化及党和国家对人口问题做出的正确政策调整等。这让他们了解到我国的人口现状, 明确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认识到全国人民是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 国家的发展需要每个人为之努力, 进而促进全国人民团结统一。

（三）统编教材有利于学生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 提升学生作为接班人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4] 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 也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23]。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完成现行标准下全部贫困人口脱贫的壮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从道路探索、理论阐释、目标部署等多个维度全面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规律性认识与开创性实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牵引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致力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所在, 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和新方向, 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崇高价值追求^[23]。

统编教材有利于学生了解我国经济体制, 了解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 还能让学生了解国家的发展与变化, 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共同富裕。统编教材可以让学生认识到共同富裕与每个人的美好生活都息息相关, 能够增强学生未来建设国家的责任感。如统编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教材第一课中“走向共同富裕”, 让学生们理解共同富裕是由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继而帮助和带动其他地区逐步实现富裕, 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并认识到人人共享需要人人共建, 增强学生作为接班人的使命担当意识。再如统编高中思想政治必修二课本梳理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让学生了解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致富观, 培养其奋斗精神, 并认识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上下同心, 进而增强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感。

（四）统编教材有利于学生感知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增强文化自信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23]。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协调的、平衡的现代化, 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不仅重视物质文明发展, 还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其大多数国家是以剥削多数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来满足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追求, 造成了西方式现代化具有物欲膨胀的特征, 造成了对金钱与物质的盲目崇拜与信仰缺失。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紧紧联系起来^[25], 不仅重视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 也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矢志奋斗, 开创了“两个文明”相互协调的现代化道路, 有效解决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两个文明”不平衡、不协调的世界性难题, 实

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

统编教材继承并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教材，同时统编教材也将中国丰富的物质文化融入其中，向学生展现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统编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富强与创新》向学生们介绍了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促进了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第三单元《文明与家园》中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向学生呈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柱，是维系我国各族人民世代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是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不竭动力。教材内容不仅让学生感受到祖国多姿多彩的物质、精神文化，体会中国文化的魅力，提升文化自信，还能让学生意识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有物质基础作为支撑，也要发挥好思想与文化的引领作用，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

（五）统编教材有利于学生感悟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科学合理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良好的自然环境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和最普惠的公共产品，关系着现代化建设的长久发展。历史已经证实，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式现代化老路注定是行不通的，无止境地掠夺自然资源无益于现代化发展，极易导致祸及全人类的生态危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向全世界展示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我国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将其融入包括教育在内的多项国家建设之中。统编教材也将生态文明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学生了解自然、热爱自然，自觉保护环境，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如统编语文六年级上册教材第 19 课《只有一个地球》使学生了解到地球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只有保护好地球生态环境才能让地球更好地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再如统编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上册教材第十课《建设美好祖国》中提出要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基本途径，让学生了解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作为教材编写依据的课程标准也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如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中都提到要了解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在课程内容部分提到要“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6]。这有利于学生了解国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理念，体悟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确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

（六）统编教材有利于学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学生成为世界和平的推动者与维护者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些国家靠着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然而这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谋取自身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平等与不稳定，也使得一些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处于不利地位^[21]。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内

依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对外坚持和平发展理念, 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 以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为目标, 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确立的“霸权秩序”^[27], 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作出了中国贡献。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开创了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统编教材立足世界主题, 培养学生的全球观念和国际理解素养。统编教材有利于学生树立和平发展观, 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如统编《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我们共同的世界”中“同住地球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学生了解到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 促使学生关注全球性问题, 引导学生树立全球观念, 积极构建美好世界。高中思想政治必修三课本中的“一带一路”部分, 让学生了解到“一带一路”能够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 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高中统编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下册介绍了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与主要趋势, 让学生了解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这些内容都有利于学生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并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促进其成为世界和平的推动者与维护者。

三、统编教材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率先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28]。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全方位积极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的战略需求,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统编教材建设是教育改革的重点, 是以教育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然而, 当前统编教材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还存在一些不足, 如教材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教材内容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联系尚需进一步加强, 部分教师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不足, 不能有效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理念融入教学等。进一步发挥统编教材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价值, 要在党的领导、教材编写、教师培训、教学方式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 坚持党的领导, 落实国家事权

当前, 党对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认识持续深化、能力显著增强。在未来的统编教材建设事业中, 面对新的要求与挑战, 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不动摇, 全面贯彻党关于教材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 切实把好育人育才的重要关口^[13]。

首先, 坚持党的领导, 进一步强化统编教材建设的意识形态内涵。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教材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不断强化党在教材建设中的领导权, 将党的思想全面地落实到统编教材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 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任务与教育工作重点把握教材的政治性与思想性, 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果, 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编教材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 要不断完善统编教材的意识形态审查机制, 保证统编教材体现国家意志。

其次, 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领导教材建设队伍工作。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教材建设队伍的领导, 严格把控教材编写人员的“政治性”与“专业性”, 保证教材建设队伍立场坚定、业务精湛、经验

丰富^[13]。

最后，坚持党的领导，完善统编教材建设的“国家—地方—学校”三级教材管理体制。发挥国家教材委员会、教材局对教材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地方政府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教材管理政策，加强对地方教材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29]。地方政府应在忠实于国家教材管理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特色与发展特点制定统编教材的使用制度，保障统编教材在使用的过程中做到因地制宜。同时，进一步明确学校教材管理职能，发挥学校的主体作用，引导学校在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安排下结合本校发展目标与学生的发展需求，积极参与教材建设，制定相关使用制度，促进统编教材的校本化实施。

（二）规范教材编写工作，系统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元素

“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国民。”^[30]国家主流价值观通过教材这个物质载体加以具体化，并通过对教材中价值取向的设定来达到引导社会的目的^[31]。教材编写是教材建设的首要环节，教材编写质量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规范教材编写工作是做好教材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统编教材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教材编写不容忽视。

首先，教材编写理念要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政策要求，保证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始终体现国家意志。教材的整体布局、单元结构设计及选文编排，既要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又要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求与伟大成果。

其次，教材编写内容要系统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教材编写内容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通过统编教材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教材编写内容中要系统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元素，如我国基本国情、党史、国家发展历程、生态文明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发展局势等。要做到与时俱进，体现时代进步，根据社会发展变化及时更新相关内容，彰显中国精神，展现文化自信。如及时反映二十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进展。同时，教材编写内容要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立足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让学生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责任与使命。

最后，教材设计和呈现形式要注意灵活和多样。只有通过恰当灵活的设计和呈现形式，教材内容才能焕发活力，帮助教师组织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对于不同教材内容要采取适合的呈现形式，可以通过阅读材料、创设情境、集体讨论、实践活动、价值反思等来提升学习效果。如统编教材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就适合以实践活动的形式展开，可以让学生观察学校及社区周边的环境，使其在切身体验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通过内容与形式的相互配合，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使教材成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三）做好教师培训工作，加强教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作为统编教材的直接使用者，教师对于统编教材的理解和把握、教师对于统编教材使用的观念和态度、教师自身专业素养等直接影响着统编教材使用效果^[32]。通过统编教材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做好教师培训工作，加强教师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增强教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首先，教师培训必须坚持师德为先，注重教师的思想政治和职业理想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增强教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与自信心，自觉拥护党的理论、路线，促进其从国家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教师这一职业的职责和使命，不断提升自身政

高维, 刘红丽.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现实价值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20-130.

治素养、品德修养与教育情怀。

其次, 教师培训内容要贯彻国家意志, 回应时代主题。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本质要求等纳入培训内容, 尤其要精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主动回应教育改革发展重点、难点问题, 及时解析热点和痛点问题^[33]。如将国家安全、法治教育、生态文明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等内容纳入培训, 加深教师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最后, 加强对教师的教材培训。帮助教师准确把握统编教材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育人导向和编写理念^[11]。通过教材培训加强各科教师对教材的理解, 培养教师教材开发的能力, 使其能够体会统编教材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联系。

(四) 优化教学方式, 增强学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感

统编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托。要在教学过程中以统编教材为基础挖掘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元素, 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展开教学并利用好现代技术手段, 使得统编教材的内容更好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增进学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首先, 教师要挖掘和拓展教材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元素, 对教材进行创造性地理解与使用。教师准确理解与把握统编教材的时代使命, 不仅要挖掘教材中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内容, 还要联系教材内容进行拓展, 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及意义。

其次, 运用情境学习、项目学习、探究学习、实践活动等多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与实践探究中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教师要基于教材内容, 结合身边可利用的资源带领学生开展学习活动, 通过自主探究、小组合作等方式让学生在具体活动中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与特点。如对处于革命老区的学校来说, 教师要利用好地域优势, 联系教材内容带领学生参观革命遗址, 让学生感受到党带领人民奋斗的艰辛, 让学生意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来之不易, 增强学生的使命感。

最后, 教师要善于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拓展学生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途径。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畅游祖国大好河山, 感受自然之美, 这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再如当教材中涉及国际交往时, 通过网络技术和智能教学平台, 让学生通过网络实现与其他国家学生的沟通与交流, 增进国际理解。这有利于学生树立全球观念, 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3-02-08 (1).
- [3] 王飞, 刘身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教材建设的价值意蕴与推进理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94-106.
- [4] 郑富芝. 尺寸教材 悠悠国事——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 [J]. 人民教育, 2020 (Z1): 6-9.
- [5] 高维, 颜蒙蒙. 统编教材与国家认同——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研究 [J]. 教育学报, 2020 (3): 34-43.

- [6] 王书敏. 统编七年级历史教材中的民族认同教学研究 [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9: 12-21.
- [7] 袁硕, 周梦圆. 以统编语文教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特征、机理与路径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2): 24-33.
- [8] 顾明远. 教育大词典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284.
- [9] 郭戈. 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经验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9 (5): 4-14.
- [10] 张振, 刘学智. 我国统编教材建设的百年脉络与核心议题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1 (4): 26-33.
- [11] 马丽琳. 新时代统编教材建设: 实践特色与价值意蕴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 (1): 32-39.
- [12]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1.
- [13] 黄强, 张廷凯, 任长松, 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1 (6): 4-12.
- [14] 皇甫束玉, 宋荐戈, 龚守静.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 62.
- [15] 江西省教育学会.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 (1922—1934) [G].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231-233.
- [16] 黄强. 新时代教材建设: 理念与实践 [J]. 中国出版, 2018 (9): 5-10.
- [17]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 [G].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482.
- [18] 课程教材研究所. 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 1949—2000 研究丛书 (出版管理卷)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2.
- [19] 余宏亮. 建设教材强国: 时代使命、主要标志与基本路径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3): 95-103.
- [2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EB/OL]. (2019-02-23) [2023-03-1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902/t20190223_370857.html.
- [21] 张士海.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内涵解读 [J]. 理论与改革, 2022 (6): 18-22.
- [22] 程良宏, 黄晓茜. 统编教材的载体属性及其学校化实施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11): 28-35.
- [23] 石建勋, 杨璐柳婷. 中国式现代化的演变历程、深刻内涵及推进路径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1): 73-82.
- [24]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1-08-18 (1).
- [25] 史巍. 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思想逻辑及时代要求 [J]. 社会科学家, 2023 (1): 22-29.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1-15.
- [27] 张丛.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刍议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 (6): 14-16.
- [28] 吴岩. 中国式现代化与高等教育改革创新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 (11): 21-29.
- [29] 许航, 孙绵涛. 中国共产党教材管理政策百年历程、特征和趋势 [J]. 中国教育科学, 2021 (5): 49-57.
- [30] 温儒敏. 如何用好“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8 (2): 4-9.
- [31] 傅建明. 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1.
- [32] 咸富莲, 马东峰. 统编教材使用的内涵、原则与策略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2 (5): 40-43.
- [33] 李尧. 民族地区教师精准培训的困境与突围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1): 152-159.

责任编辑: 刘泮菡



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建设 助推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价值与路径

罗妍 马丽琳

（教育部 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 100020）

摘要：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现代化是一个重要方面。课程教材建设是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抓手。统编教材在民族地区的使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举措，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推行统编教材，须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民族地区使用统编教材具有突出的现代化价值，是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有力举措，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教育水平，促进教育改革先进理念落地，推进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以统编教材建设推进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要处理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增强教材建设的时代性，科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好整体性与多元性的关系，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正确对待多元文化；处理好整体性与局部性的关系，以统编教材为抓手，推动整个教育体系变革转型；处理好内生性与外在性的关系，用好外部资源，立足本土人才培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民族教育；统编教材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131-10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3.012

作者简介：罗妍，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丽琳，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引用格式：罗妍，马丽琳. 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建设助推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价值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3）：131-140.

一、问题的提出

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四大任务，首要任务是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1]。民族地区现代化要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跟时代步伐，融入全国发展新格局。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从工业、经济发展拓展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现代化等各方面，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现代化是一个重要方面。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教育现代化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在党的领导下朝着现代化目标实现跨越式发展。党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这体现在“两个优先”上：“把民族教育事业作为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优先发展”“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重点，优先发展”^[2]。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提出了民族地区教育方针：尊重少数民族的办学形式和特点、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升学优待和经费资助、设置少数民族教育补助专款等，不断加强对民族教育的支持力度。1980年，教育部、国家民委发布《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大力扶持和发展民族教育的具体措施。1987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在各级学校注意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通知》，提出要在各级各类学校加强民族团结教育。1992年，《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创造条件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3]。20世纪80至90年代建立了完善民族学生考试招生优惠政策，利用内地优质资源举办西藏班、新疆班。200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以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为主，与国家扶持及发达地区、有关高等学校开展教育对口支援相结合，共同推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4]这一时期，民族教育取得显著成效，整体教育水平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进入新时代，2015年召开了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同年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改善民生、凝聚民心为导向，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受教育权利，提高各民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5]。党的十九大之后，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国家着力破解民族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矛盾，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民族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稳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稳步推进，教育信息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要看到，作为“后发型现代化”教育范式，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仍面临特殊的困难和问题。一是教育质量不高、内涵式发展不够。有学者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过分关注指标数据，局限在规模、数量等物质层面的增长，忽视了教育质量和教育内涵的提升，仍普遍存在教育理念和方式落后的问题^[6]。二是追求现代性与传承传统文化的矛盾。面对强势的现代文化，民族地区教育面临传统教育模式式微、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师资不足以及照搬

罗妍, 马丽琳. 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建设助推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 价值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31-140.

发达地区教学方式的问题^[6], 民族传统文化可能面临传承危机。三是教育不均衡问题制约民族教育现代化发展。教育均衡发展是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基础和起点不同, 在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发展质量等方面, 民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7]。其中,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不足, 成为他们学习现代知识技能的制约因素, 影响他们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形成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群体认同感的共同纽带, 为学生今后生存和发展奠定基础, 是学生作为个体得以社会流动的桥梁。”^[8]

课程教材建设是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抓手。统编教材在民族地区的使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举措, 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牢固树立“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思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 本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视域中, 聚焦统编教材建设和使用, 对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问题进行探析。

二、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推行统编教材的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是民族地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彰显其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这构成了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区别^[9]。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同样必须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民族地区统编教材的推行使用也必须贯彻这些基本原则。

(一)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政治前提。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首先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全方位坚持立德树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和最大特点,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是做好教育工作的根本保证。”^[10]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同样表明, 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体制与国家健全的民族教育管理机构, 是民族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教材领域作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沿阵地, 必须站稳立场、把好方向。统编教材建设集结各领域高水平专家, 以高要求创新“五个审查”机制、以快速度开展大规模试教试用, 体现出高效的组织领导力、动员力和执行力^[11], 生动证明了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民族地区整体推进统编教材, 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突出价值引领, 充分发挥教材育人优势。

(二) 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9]民族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必须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 必须关注民族教育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宏观背景下的特殊性, 适应民族地区的特点。精神文明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民族教育在育人方面更要注重精神层面, 推进各族人民群众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精神品位的现代化。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 注重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

识，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式现代化是惠及全体人民的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顺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民族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赋予各族群众获得适应现代化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随着现代化进程，各族人民的精神需求、价值诉求更为多元，文化自觉更加强烈，对优质教育、精品教材的需求更为迫切。统编教材坚持以学生为本，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体现了教育教学改革的先进理念和成果，是适应人民需求的优质精品教材，其在推行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的意愿、回应人民需求。

（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通过改革创新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成教育强国相匹配的具有高质量教育供给、高效率教育衔接、高水平教育公平为特征的新时代教育发展体系的总和”^[12]。对于民族地区而言，需要加快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大力缩小各民族、各地区的教育水平差距。随着帮扶政策的实施和财政资金的倾斜投入，民族地区在办学条件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教育质量方面仍有差距。以统编教材推行使用为抓手，及时将体现时代精神的教育理念传达到少数民族学校和学生，推进民族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少数民族学生从“能上学”到“上好学”。

三、统编教材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和意义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13]统编教材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代表了民族文化的主流，将培养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及文化有高度认同感的人作为铸魂育人的首要目标。民族地区使用统编教材，关系到民族团结、文化认同，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战略性举措。

（一）民族地区使用统编教材的政策背景

其一，民族地区实施民汉双语教育的政策历史。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我国民族地区逐步建立了采用国家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双语教育体系，形成了民汉双语教学课程和相应的教材体系。双语教育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模式以民族语教学为主，同时加授《汉语》课；二类模式以国家通用语教学为主，加授《民语文》课。其中一类模式学生《汉语》课使用的是专门为民族地区编写的《汉语》教材；二类模式学生语文课的开设和教材使用与汉族学校基本相同，一般使用全国通行的国家通用语教材。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教材体系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形成了相对封闭的课程教材体系。随着统编语文教材使用，民族地区一类模式学生使用的《汉语》教材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民族地区使用统编三科教材是一项重大政策举措，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相对独立的教材体系，意味着民族地区中小学课程教材体系开始与全国并轨。“三科统编教材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民族地区使用统编教材不仅是教育教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罗妍, 马丽琳. 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建设助推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 价值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31-140.

方向问题, 事关民族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是党和国家关于民族教育和教材建设的重大决策。”^[14]

其二, 民族地区使用统编三科教材的政策实施。2012年, 教育部开始启动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的编写, 2016年经中央宣传思想工作小组批准, 从2016年秋季学期进入试点使用, 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小学、初中起始年级投入使用, 部分民族地区如新疆也开始使用统编教材。2017年教育部启动高中三科统编教材编写, 2019年逐步投入使用。自此, 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建设全面完成, 有力推动立德树人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贯通起来, 形成一体化人才培养格局。2019年教育部制定《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铸魂工程”推进实施方案》, 全力做好教材使用工作。同年, 国家教材委员会出台《全国大中小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 要求民族地区逐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材使用, 并对民族地区使用三科统编教材的时间提出了要求, 相关民族地区也据此出台了推行统编教材的政策和方案。2019年秋季学期, 全国12个省、自治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民族地区均投入使用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2022年秋季学期, 民族地区高中起始年级开始使用高中三科统编教材, 计划至2025年实现统编教材全覆盖。统编教材推行过程中, 国家高度重视对民族地区的指导帮扶, 组织开展“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 重点面向“三区三州”的相关地区开展现场培训, 全力推动统编教材在民族地区使用落地。

(二) 统编教材对于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其一, 民族地区使用统编教材是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有力举措。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 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 体现国家意志, 是国家事权。”^[1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 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教材建设这一国家事权。在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思想指导下, 国家教材制度体制也发生重大变化。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教材局成立, 国家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2021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管理办法》, 第一次将民族地区教材审核管理的权责提升到国家层面, 大力加强民族地区教材管理。这一系列举措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集中体现, 而民族地区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正是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应有之举。

其二, 民族地区使用统编教材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主线。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 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 统编教材对于增进“五个认同”具有天然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研究统计, 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含有国家认同教育的内容所占比例高达52.39%”^[16], 涉及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地理认同等方面, 充分贯彻了立德树人要求。统编语文教材全面、系统、有机地体现了“五个认同”教育内容, 编入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秀选文; 以培养国土意识为着力点带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有针对性地选取体现民族团结进步、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选文, 旨在增强学生的祖国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统编历史教材“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史实为依托, 还原了各民族汇聚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过程, 强化了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促使学生形成共同的国家历史记忆”^[17]。统编三科教材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集中体现, 也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

依托。

其三，统编教材使用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未使用统编语文教材前，民族地区民语授课学校主要使用《汉语》教材。《汉语》教材的编写依据为《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2013年发布）等文件。该教材定位为第二语言教材，在课程目标设置上要求较低。与统编语文教材相比，该汉语教材的字词量、古诗词量较少，课文篇幅短，几乎没有文言文，语言理解、运用和写作的要求明显低于统编语文教材。相关调查发现：“教师和学生普遍反映汉语文教材内容过于简单，教材文化多样性和内涵性不够突出。”^[18]《汉语》教材的定位及其建设水平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导致学习《汉语》课程的一类模式学生语文学业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就业发展。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少数民族群体提升科学文化素质、加快发展、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路径。统编教材作为一项教育政策的推行，有利于缩小各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推动民族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全国各地各民族学生都能享受教育发展的成果。

其四，统编教材使用促进教育改革先进理念落地。教育现代化必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五育并举的课程教材体系，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实现“从传统的基础知识向能力的提升，从全面发展向个性发展的提升，从认知教育向非认知教育的提升，构成了人才培养理念的迭代升级”^[12]。长期以来，民族地区教育改革相对滞后，教育教学观念相对陈旧，应试教育导向相对严重，课程内容难繁偏旧，教材科学性时代性不足，种种不足制约了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进程。统编教材是落实课程改革、新课程标准先进理念的优质载体，有利于增强民族教育育人实效。以统编语文教材为例，在落实核心素养方面，统编语文教材坚持以生为本教学理念，有机融入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和审美创造的素养。2018年，教育部组织对统编语文教材使用进行回访调研，发现“近90%的学生表示喜欢读新教材，教师对新教材的总体满意度达90%，对教材的思想立意、内容选材、呈现方式等给予较高评价”^[19]。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研究”课题组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县域的调研发现，绝大多数教师认为统编语文教材能有效激发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2020年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对相关民族省区使用统编教材情况监测发现，虽然民族地区教师使用统编教材存在一定困难，但统编教材有效倒逼教师转变教学方式，大部分教师逐步调整、改变固有认知结构和教学定势思维，以适应统编教材要求。

其五，统编教材有助于推进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国家建设、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也是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信息交换的重要语言工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对于民族教育现代化意义重大，国家统编教材的全面推行使用将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实施。民汉双语教育经过几十年发展，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环境显著改善，教育水平普遍提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条件逐渐成熟。相应的语言政策、双语教学政策不断调整，以适应民族地区的语言环境变化。民族地区语言教育政策逐步转向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主的发展趋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有利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有助于民族教育融入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之中。统编教材使用开启了民族地区大范围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材的序幕。随着统编三科教材使用，民族中小学其他学科也将逐步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民族地区将逐步实现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教材并轨。这意味着民族地区课程教材建设将逐步纳

入国家课程教材建设总体规划, 加速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进程。

四、统编教材推进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路径

70 多年来, 我国民族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 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的教育仍存在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水平与我国发达地区仍存在差距。“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建立在过程基础上水平的实质性提升, 即在时间、空间和要素‘三维度’上现代性——人性、公平性、个性、民主性、生产性、终身性、创造性、法治性和专业性等的相对增长, 以此促进现代人的全面自由发展。”^[8] 民族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表现为教育质量不高、内涵式发展不够, 民族文化遗产存在危机, 以及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公平有待提高。充分发挥统编教材功能价值, 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

(一) 处理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增强教材体系的时代性, 科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教材的现代化是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化在课程教材领域的直观体现就是教材的现代性或时代性。统编教材在处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问题上具有典范性, 较好地体现了教材在时代性与经典性之间的平衡, 对于民族地区教材建设是有益借鉴。以统编初中语文教材选文为例, 我国古代作品占总篇目比例为 41%, 今文所占比例为 42.5%, 古今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作品归为古文, 以后的作品归为今文) 比例匀称^[20]。又如七年级语文教材中“科幻探险”单元选用了航空英雄杨利伟的《太空一日》和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带上她的眼睛》两篇时文, 体现培育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导向。相比之下, 少数民族语文教材的时代性有待提高, 以 2020 年在用的彝语文教材 (由四川省教育厅、凉山州教育局编译) 为例, 较多选文源自民间传说, 或者反映旧社会的悲惨生活, 最近的“时文”也集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少数民族语文教材普遍存在时代性不够的问题, 一方面是由于修订周期长, 党的最新理论政策进入教材比较滞后, 反映时代精神变化、新的教育理念不够及时, 知识内容陈旧; 另一方面是没有处理好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往往把重心放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

民族地区课程教材建设, 必须处理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民族文化遗产与创新, 必须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进行持续的现代化改造。2021 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管理办法》对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编写做出规定: “教材内容既要保持相对稳定, 又要坚持与时俱进, 聚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生动展示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新实践、新业绩、新作为, 及时反映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新变化新成果新趋势, 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总结提炼, 增强筛选辨别意识。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应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着重选择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与现代文化精神契合的内容, 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 促进学生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和生活方式上的现代化。二是充分发挥民族文字教材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面对文化传承面临的困难, 应高度重视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和保存语言文化资源, 需要以尊重文化多元性的、开放性的态度去筛选、开发民族文化资源, 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 生动展示各族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新实践、新业绩、新作为, 使教材贴近教学实际, 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性。

（二）处理好整体性与多元性的关系：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正确对待多元文化

统编三科教材中系统有机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进步理念的重要载体。“践行‘多元一体’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统编教材的首要原则，‘多元一体’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21]“多元一体”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整体性与多元性的关系。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石。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统编教材体现的就是这种强化一体、尊重多元的文化意识。如，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全面系统融入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知识和理念，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价值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情感依托，着力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统编语文教材具有“以中华民族共享文化符号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22]的特点；统编历史教材围绕各民族的“四个共同”（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创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选取各个时期的典型事例和史实来呈现中国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相比之下，民族地区教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仍显不足。一些自编民文教材（以民语文教材为主）在文化开放性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相对局限于本民族文化，而忽略其他民族的文化要素，没有充分体现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

民族地区教材（以民语文教材为主）要以统编教材为典范，并与统编教材形成育人合力。一是内容思想要与课程标准及统编教材对标。民文教材的编修要以中央精神和国家课程标准要求为依据，在内容上与普通中小学相对应的学科教材进行对标，确保将政治标准落实到思想倾向、中心内容、教材选材、知识点、历史人物事件、专有术语等各方面。二是正确处理涉民族关系内容。对于教材中涉及民族关系的内容，要着重阐明中华民族的共性，恰当表现民族个性，多讲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历史上各民族间曾发生的矛盾冲突。三是正确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展示，要避免简单、片面、封闭的倾向，如把文化单纯地理解为民俗传统、服饰节日等，而要深刻挖掘文化现象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对于涉及宗教的民族传统文化，要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避免在教育领域宣扬宗教。对于民间风俗习惯，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甄别和去除其中不符合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内容。

（三）处理好整体性与局部性的关系：以统编教材为抓手，推动整个教育体系变革转型

课程教材建设是系统性工程，统编教材使用是一个突破口。应把握好统编教材使用的机遇，推动民族地区整个课程教材建设的变革，从而促进整个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推进民族地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从整体上解决课程教材领域机制体制中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以民族文字教材为例，过去民文教材管理由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文教材实行审定制度，建立了省内和跨省区的教材审核机构及相关制度。在这种机制保障下，民文教材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历史成就。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文教材建设水平已不能完全适应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新时代国家教材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高度重视对民族地区教材的管理，并做出了新的制度设计。统编教材在民族地区的使用，是国家对民族地区教材建设整体设计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举措。这不仅会引发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的系统性变革，原有的双语教育模式、考试评价制度、师资保障等都会为适应统编教材而进行调整。如，为了保障统编教材使用，相关民族地区教育部门对教师队伍进行调整，配齐配强三科教师，对转岗

教师进行培训帮扶, 推动非专业教师实现转型。又如, 民族地区更加重视信息技术、网络资源的使用, 教育部门积极开发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广泛配备使用“班班通”“智慧白板”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民族地区应以统编教材使用为抓手, 推动整个课程教材领域的迭代升级, 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改革相关配套政策, 加快推进整个教育体系的现代化。

(四) 处理好内生性与外在性的关系: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立足本土人才培养

长期以来, 国家不断加强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和帮扶力度, 努力补齐全国教育现代化短板, 努力实现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教育优质公平。但是, 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无法仅靠外力帮扶实现, 没有同质化的发展模式可以照搬, 必须坚持民族地区教育内生发展的理念, 即“以培育民族地区教育自我发展能力为切入点的现代化发展理念”^[23]。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激发民族地区内生潜力”, 涉及依靠民族地区自身教育发展能力提升的内生路径。一方面, 统编教材政策是外在力量帮扶的一种方式, 有助于快速推广先进地区教育现代化的示范性经验。伴随着统编教材使用, 教育部在相关民族地区实施了配套保障措施, 包括长期跟踪了解教材使用情况、开发配套教学资源、开展教师培训和巡讲等。这一系列措施都有助于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民族地区要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另一方面, 民族地区要通过共建将政策等外在力量最终内化为内生动力, 改变教育发展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 力求满足民族群众现代化的教育诉求, 立足培养本土人才, 着力培养“民汉兼通”人才, 将优质教育转化为少数民族发展的经济红利和个人的成长红利, 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更有质量、更加公平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根本宗旨, 以人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为根本动力, 以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为实践路径。国家统编教材助推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 要把握三个重点。一是要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局来擘画和定位民族地区教材建设, 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对优质均衡教育的需求, 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体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需求, 充分发挥教育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功能。二是要坚持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统领, 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坚持科学系统思维, 树立大教育观, 聚焦教育体系内部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教师发展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 不断改革不适应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机制。三是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推动价值观教育,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重视发挥课程教材体系在政治导向、价值观塑造、文化传承方面的育人功能, 夯实教育强国建设的精神根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2] 李怡霖, 陈恩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政策: 回顾与展望 [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4 (6): 21-24.

- [3] 陈立鹏, 闫芸. 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政策建设百年历程 [J]. 中国民族教育, 2021 (6): 11-14.
- [4] 刘孙渊, 车双龙, 王路路. 民族地区教育治理现代化: 发展特征、现实挑战与变革路径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 (5): 42-49.
- [5]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 [EB/OL]. (2015-08-17) [2020-03-17] http://www.gov.cn/xinwen/2015-08/17/content_2914300.htm.
- [6] 田娟, 孙振东. 后发型现代化视角下少数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困境及对策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 210-214.
- [7] 陈·巴特尔. 加快推进民族教育现代化 [J]. 中国民族教育, 2020 (1): 15.
- [8] 汤书波. 教育现代化 2035: 民族教育的理性思考与实践路径 [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9 (4): 56-67.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10] 潘希武. 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2 (11): 3-10+77.
- [11] 马丽琳. 新时代统编教材建设: 实践特色与价值意蕴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 (1): 32-39.
- [12] 刘训华, 代冉.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概念、意蕴与战略基点 [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3 (2): 19-26.
- [13]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新华时评: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B/OL]. (2021-03-17) [2023-05-05].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7/content_5593580.htm.
- [14] 罗妍, 仇森, 潘信林. 国家统编教材助力民族地区教育质量提升——基于相关民族省 (自治区) 的调研 [J]. 中国民族教育, 2022 (6): 31-33.
- [15] 郑富芝. 尺寸教材 悠悠国事——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 [J]. 人民教育, 2020 (Z1): 6-9.
- [16] 高维, 颜蒙蒙. 统编教材与国家认同——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研究 [J]. 教育学报, 2020 (3): 34-43.
- [17] 孙妍. 统编历史教材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容教学指要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 (3): 45-52.
- [18] 李亚楠. 藏汉语文教材开发与使用情况调查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 X 县中学为例 [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8.
- [19]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 (2019)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34.
- [20] 陆丽程. 《初中语文教材 (2016 统编本)》选文系统研究 [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
- [21] 刘学智. 坚定不移用好统编教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1 (6): 62-64.
- [22] 王陆正, 赵岩.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内容呈现与教学路径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2): 34-43.
- [23] 李祥. 面向 2035 的民族地区教育内生发展图景及推进路径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 20-22.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

徐光木

(湖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2)

摘要：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有形、有感、有效构成统一整体，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其中，“有形”是外在要求，强调实践性；“有感”是内在要求，强调精神性；“有效”是目标要求，强调导向性。在扎根理论视角下，各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构成经验积累，即以“微场景化设置”实现铸牢的“有形”、以“小人物化设定”实现铸牢的“有感”、以“超常态化机制”实现铸牢的“有效”。随着实践深入进一步升华为实质理论和形式理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级指标体系由此生成。该指标体系中，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为一级指标，三个一级指标的有形、有感、有效维度构成二级指标，以及包括若干三级指标。新时代新征程应在有形、有感、有效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拓展“有形”载体，尤其是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有感”维度，重点强化社交软件的灵活应用；进一步夯实“有效”基础，特别是不断调整和优化指标体系。

关键词：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3) 03-0141-13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3.013

作者简介：徐光木，湖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委员会委员、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基金项目：湖北师范大学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重点课题“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案例研究”（2023TZA03）

引用格式：徐光木.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41-153.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既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起点，也是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党的民族工作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2]

近年来，各地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在有形有感有效方面持续用力，积极探索实践，形成典型经验，为深化理论研究奠定实践基础，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注入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8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在此聚焦。”^[3]2023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民委主任会议进一步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4]可见，确保有形有感有效，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和改善党的民族工作的总体要求，需要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

围绕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文献主要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总体要求出发，沿着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内容和关键等方面展开研究。有研究指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新时代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力量的必然要求，应形成立体架构，推动宣传教育“有形”；坚持内容为王，促使干部群众“有感”；推动创新交融，实现文化认同“有效”^[5]。有研究指出，为实现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应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断强化“五个认同”；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建好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坚持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另有研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有很多，但最基础、最普遍、最根本的方式就是日常交往中所形成的认知^[7]。还有研究指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在实现由生活世界向意义世界的有效建构，应以植根于生活为逻辑起点，以升华于生活为意义探赜，以回归于生活为实践指向，以引领于生活为价值旨归^[8]。

一些研究关注了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手段。有学者指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是在“有形”上用心、“有感”上用情、“有效”上用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各族人民生活相依、情感相融、心灵相通，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9]。另有学者以学校为研究对象，强调“有形、有感、有效”三者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内在机理，要做到见人、见物、见“铸牢”，应坚持系统观念和协同思维，从党的领导、师资队伍、教材编用、学生知行、典范榜样、语言文字、学段衔接等七个方面入手，持续打造思想长城，实现观念“筑基”^[10]。有学者认为，要形成教育合

力, 构建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一体化建设路径^[11], 以在学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 还有学者把 ChatGPT 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联系起来, 认为应发挥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其中的积极作用^[12]。

上述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参考, 但在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方面存在一定不足。鉴于此, 本文在理论界定基础上, 运用扎根理论对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相关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提炼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定性, 为各地深入推进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

理解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 首先必须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从根本政治保证来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体现了党推动我国民族工作不断发展完善的政治自觉。从思想之基来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定“五个认同”, 这体现了各民族归属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自觉^[13]。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从属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 但也有属于自己的价值维度, 主要体现在载体维度、方法维度和目标维度三个方面。

(一) 有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14] 长期以来, 社会上存在一种错误认识, 即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当作一种虚无的事业, 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既无法像经济增长那样量化考评, 也不像财政收支那样指标清晰, 因而可有可无, 走形式走过场即可。这是传统“GDP 至上论”影响的结果。新时代新征程想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一步抓紧抓好, 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 就必须纠正这种错误观念和做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1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应丰富载体, 做到铸牢“有形”。在古汉语中, “形”即实体, 如形仪、形体; 现代汉语将其引申为形状、形式。根据这一解释, “有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铸牢”本身具备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 使其看得见、摸得着, 而不是搞虚无主义、做空头文章。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 深刻认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堂必修课, 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是过程“有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常被视为感性概念, 而事实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凭空就能够铸牢的, 而必须依赖相应的载体和具备质的特征。载体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 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 定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 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推动“四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办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期刊, 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 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民族地区计划,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打造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创作和推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作品、艺术形式和文化品牌，打造同心圆实践场所和基地等。质的特征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被作为一项独立的工作来看待，而应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结合起来，寓铸牢于“乐”、寓铸牢于“工”、寓铸牢于“学”。

二是结果“有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应有出发点，也应有落脚点。其落脚点体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可察觉、可感知，包括“过程留痕”和“结果有痕”。因此，应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内容和标准，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脱定性困扰，成为可供民族地区间相互比较、借鉴、学习的可视参考。如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建立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实践基地，推动建设和扶持一批能够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商业和基地品牌，开展党员干部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结对认亲活动，等等。

（二）有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14]⁵¹他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进一步强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首先要对群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16]可见，走群众路线不仅要求 and 各族群众“吃住在一起”，而且要求和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想各族群众之所想，急各族群众之所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是如此。如果只是满足于走马观花式走访调研，敷衍塞责做表面文章，而不是与各族群众打成一片，不仅无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还有可能失去群众的信任，破坏党群关系，影响各族群众间的密切联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同时做到“有感”。在古汉语中，“感”即感情，指外界事物在人们思想情绪上引起的反应；现代社会引申出触碰、觉得、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激动等含义。结合这一解释，“有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铸牢”本身除具备一定外形之外，还应将感情融入其中，使其既有外在表现，也有精神内核。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感”，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应强化下述观念。第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项精神活动和意识强化过程，因而必须“入乡随俗”、换位思考，不断增进感知力、感染力、感召力。第二，人是感性动物，真诚待人、感情化人是化解矛盾、增进共识、凝聚力量的钥匙^[1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是如此，离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用情”，就不可能培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普遍认同。第三，“有感”既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组织者和实施者的有感，怀揣对各族群众的深厚感情，也包括各族群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有感，进而产生共鸣，双向互促，强化认同。因此，“有感”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方法，包括工作方式方法的“有感”和工作对象的“有感”。

（三）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维度

有效意为能够实现预期目的。因此，“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是如何准确确定性和量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只有确立目标，才能衡量是否达到目标以及达到预期目标的程度。指标体系作为一种基本评价手段，在各行各业日益得到广泛运用。其主要特点在于，通过将抽象的研究对象按照其本质属性和特征分解成为若干具体指标，并赋予相应权重，从而达到复杂

问题简单化、定性现象定量化的目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 需要经历认知、情感、意志等发展阶段, 只有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才能从形成认知到强化意志。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 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 既“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 又离不开“意识”的作用^[18]。因此, 只有各族群众的共同体意识得到真正强化, 才意味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实现。

铸牢的“有效”实现, 离不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标体系的构建。首先,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反映, 是一个多层次的严密逻辑系统。其中, 领土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反映, 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基础, 政治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源泉, 共同理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聚动力^[19]。其次, 在共同体建设背景下, 各民族的认知关联、情感依恋、互信互助是中华民族由多元逐步走向一体的价值基础, 在共同体视野下分析“铸牢”的相关机理与方案, 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20]。最后,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 “五个认同”是涵盖了国家、民族、文化、政党和制度五维关系的意识合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1]其中,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现实基础,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承载主体,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根基所在,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政治保障,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动力之源^[9]。因此, 衡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否“有效”, 应以“五个认同”为核心内容, 具体包括精神上的“有效”和实体上的“有效”两方面。

总之, “有形”“有感”“有效”是一个统一整体, 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其中, “有形”是外在要求, 强调实践性, 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实; “有感”是内在要求, 强调精神性, 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内化于心”; “有效”是目标要求, 强调导向性, 要求把增进“五个认同”、促进民族团结作为落脚点。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 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形、有感、有效, 这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三、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案例分析

多年来, 各地按照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 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 形成了一些典型案例和有益经验。

(一) 案例选择与基本情况

为确保案例具有广泛代表性, 在地域方面, 所选案例分别来自东西南北中, 并且涵盖城乡; 在领域方面, 所选案例涉及国土安全、教育、经济、语言文字和城市民族工作等。这些案例被视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进典型, 有的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典型模范”专栏重点推荐; 有的被评为“践行守望相助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典型; 有的还被制作成微电影或登上央视新闻, 在抖音等社交软件和平台上热传, 产生广泛和积极社会影响。

1. 祖国最西端护边员在帕米尔高原刻下 10 多万块“中国石”。1961 年, 19 岁的布茹玛汗·毛

勒朵和丈夫托依其别克在冬古拉玛安家。1964 年，他们夫妇二人成为第一批护边员，她发现这里虽有边界线，但没有界碑，那时，她便立下手刻界碑的决心。布茹玛汗·毛勒朵不识字，便向亲朋好友讨教，终于学会了“中国”二字的写法。至今，她已刻下带有“中国”二字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十多万块。布茹玛汗·毛勒朵说：“巡边虽然很辛苦，但父亲常说要时常想着安宁，有安宁，一切才会好。我想既然是中国公民，我就有义务守护边境”，“即使我不在了，但是我刻的中国石永远存在，中国永远在我心里，边境安全要比我的命还重要”。布茹玛汗·毛勒朵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护边员。她对子女说：“我过去吃的苦像山那么多，你们现在条件好了，更要守护好祖国的边境线。”

2. 中印边境线上“玉麦一家人”守护国土、永作扎根边陲的格桑花。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位于中印边境。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仅有父亲桑杰曲巴和卓嘎、央宗姐妹一户人家，被外界称作“三人乡”。一栋房子，既是乡政府，也是他们的家。1983 年，政府决定将玉麦仅剩的 3 户人家搬到邻近条件较好的曲松。年少的卓嘎和妹妹央宗也劝说过父亲，不要再回玉麦。但在外仅过了一个冬天，桑杰曲巴就坚持带着女儿们回家。桑杰曲巴说到：“如果我们走了，这块国土上就没有人了。”卓嘎和央宗姐妹渐渐理解了父亲的坚持，也承担起身上的责任。1988 年，卓嘎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玉麦乡的乡长。作为“爱国守边精神”的传承者，卓嘎几十年如一日，扎根祖国边陲，抵边放牧、抵边巡逻，守护国旗、守护祖国边疆，践行着“再苦再累也要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的誓言，谱写了“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爱国守边动人故事与时代赞歌。2017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卓嘎、央宗姐妹回信，肯定她们父女两代接力为国守边的行为，感谢长期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同志，勉励广大农牧民群众扎根雪域边陲，守护好国土，建设好家乡。近年来，玉麦乡的发展日新月异，成为“幸福美丽边境小康示范乡”。

3. 上海“妈妈老师”在学生心中种下民族团结的种子。自 2009 年担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生辅导员以来，洪汉英老师利用曾在新疆工作熟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锡伯语等多个民族语言的优势，以真诚的关爱帮助了一届又一届少数民族学生，适应了繁华都市的新生活，确立了学习的目标，树立起了自信的人生。她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妈妈老师”，学生家长也亲切地称她为“来自上海的天使”。十多年来的每个寒暑假，洪汉英都要千里迢迢奔赴新疆做家访，已走过了 24 万多公里行程。在洪汉英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学生的电话和家庭地址。洪汉英以润物细无声的谆谆慈母心，教育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在洪汉英的教育引导下，学生们成长为一颗颗民族团结的种子。2017 年，在新疆电视台举办的演讲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的选手怕孜来·斯马依自豪地称自己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培养的一颗民族团结的种子。

4. 下乡青年带头发展牧区经济筑牢民族团结的经济根基。1974 年，廷·巴特尔从呼和浩特市来到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下乡，由城市青年成为普通牧民。1993 年，廷·巴特尔当选为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书记，决心带领群众共同致富。1996 年，草场分到每户，廷·巴特尔是最后参与分配的一批，草场大部分被沙地覆盖，寸草不生。面对严峻现实，廷·巴特尔走遍方圆百里的沙窝子，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他率先实行“围栏轮牧”，在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牲畜。为了阻止草场沙化退化，他提出“蹄腿理论”，通过计算蹄腿数量这一直观化方式，来向牧民群众

徐光木.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41-153.

说明“减羊增牛”的意义。在千里草原的一隅，凭着“让牧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廷·巴特尔扎根牧区近 50 年，探索出保护生态、发展经济新路子，使当地牧民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筑牢了民族团结的经济根基。

5. 东部教师 30 多年的接力和坚守锻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奇迹。江苏省海安市宁蒭支教教师群体，是江苏省海安市赴云南省丽江市宁蒭彝族自治县支教的教师队伍。自 1988 年至今，10 批 213 人在大山深处接力演绎着一曲支援贫困地区教育、致力脱贫攻坚、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华美乐章。30 多年来，海安老师为宁蒭培养合格的初、高中毕业生 2 万多名，输送了大学、中专生 1 万多名。无数少年因知识改变了命运，从放牛娃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海安老师凭借务实、坚毅、包容、博爱，感动了少数民族同胞，赢得了宁蒭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们发自内心地把海安老师当成自己的亲人。时任宁蒭县委书记阿苏大岭在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动情地说：“我们宁蒭人，最尊贵的是舅舅，海安老师就是我们宁蒭各族人民的舅舅！”海安老师用宝贵的青春和智慧播撒文明的种子，成为东部地区教育支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榜样，成为民族团结互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楷模。

6. 内蒙古全方位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第二幼儿园园长王素梅扎根学前教育 30 年，坚持民族团结从幼儿园抓起，组织由家、园、社区共同参与的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把该幼儿园打造成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阵地。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沙民工连队队长敖特更花为了摆脱贫困，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跟着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各族人民种树治沙，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在库布其沙漠腹地建成了一条打通当地经济命脉的“穿沙公路”。2021 年 12 月，内蒙古师范大学成立“石榴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示范班，该班由 34 个不同民族的 56 名学生组成，寓意 56 个民族亲如一家、携手共进。2023 年初，国家民委印发《关于命名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定》，内蒙古 12 个地区和单位榜上有名。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有 78 个地区和单位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7. 延续回汉历史情缘共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教育基地。河南省沁阳市邙邙村和博爱县大新庄村延续五百年的“邙新社亲”回汉情缘，在 2015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沁阳市大力推广“邙新社亲”经验，将邙邙村打造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教育基地”，通过召开“邙新社亲”现场观摩会，组织全市民族村街（社区）到邙邙村参观学习，通过村级党组织密切沟通和协调交流，引导回汉群众和谐共处，带领各族群众之间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截至 2020 年，沁阳市累计接受示范教育党员干部达 13 000 余人次，9 个民族村（街）同周边 20 多个汉族村签订民族团结进步友好村协议，博爱大新庄村与周边 36 个行政村签订睦邻友好村庄民族团结进步协议。沁阳市讲好“邙新社亲”故事，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2020 年，由姬雨执导的 6 集系列微电影《邙新社亲》在网上热播，引起热议。

（二）对案例的理论分析

扎根理论认为，知识是积累而成的，是一个不断从事实到实质理论，然后到形式理论演进的过程。由于建构形式理论需要大量的资料来源，因此需要实质理论作为中介。扎根理论为质性研究长期以来的系统性不强、理论和方法关系模糊、方法论与研究技术相脱节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近些年来，随着学术思潮的传播，扎根理论在我国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并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得到广泛运用。扎根理论超越了以下固有的方法论认识：理论研究经验研究是

二分的；资料搜集与资料分析是两个独立步骤；质性研究方法是印象主义式的，是非系统的；质性研究是量化研究的探索性先导；质性研究只能提供描述性的个案，无法得到普遍化的理论^[22]。扎根理论以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合二为一的优势，可将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案例研究和理论研究统一起来，从而达到案例研究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本研究依托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标体系分析思路，从有形、有感、有效三个维度对上述 6 个典型案例进行理论分析。

1. 以“微场景化设置”实现铸牢的“有形”

一直以来，我们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场景设置越是宏大，越是能够起到震撼心灵的作用。而事实是，那些细小的场景和入微的情节，更能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在“中国石”案例中，场景位于我国西部边陲的帕米尔高原，述事的对象是一块块刻有“中国”两个字的石头和年复一年的巡边。在“妈妈老师”案例中，场景聚焦于一个记录了学生电话和家庭地址的小小笔记本，那是洪汉英 24 万多公里家访的凭借。在“玉麦一家人”案例中，场景从中印边境线上的一栋房子切入，那里既是乡政府，也是卓嘎的家。在“下乡知青”案例中，场景是我国北部的一片荒芜草原，以及发生在那里的“蹄腿理论”故事。

这种“微场景化设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方面，微场景化使“有形”更加牢固。在几何学看来，在所有多边形中，只有三角形最为稳固。在上述案例中，单一的人物，单一的场景和单一的情节，正好构成了这种三角形关系。而事实上，在全国各地，存在着无数个类似“小三角形”关系，正是凭借这些扎根于祖国基层的“小三角”，才垒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三角”。另一方面，微场景化使“有形”更加通俗易懂。孟德斯鸠说，法律不是高深的逻辑艺术，而是一位家长的简单道理^[23]。法律只有尽可能做到简单易懂，才能够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遵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是如此，如果只是凭借空洞说教和进行理论化阐释，自然无法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洪汉英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只有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内心世界，才能有的放矢地引导和教育。”上述案例正是凭借一个个简单事实，向人们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简单道理”，从而使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无形之中得到不断强化。

2. 以“小人物化设定”实现铸牢的“有感”

帕米尔高原上的布茹玛汗·毛勒朵、西藏隆子县玉麦乡的牧民卓嘎、上海“妈妈老师”洪汉英、下乡知青廷·巴特尔、宁夏支教教师群体、沁阳市邙邙村和博爱县大新庄村的村民，无一不是公众心目中的小人物。正是这些“小人物”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向人们讲述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道理。巡边一时容易，坚持巡边 60 年不易；一代人放牧戍边容易，几代人坚持放牧戍边为常人所不能及；海安老师支教一年容易，30 多年接力支教更难能可贵。同理，正是沁阳市回汉两族群众五百年坚守，才有了新时代的“邙新社亲”。

这种“小人物化设定”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扎根基层的职业设定。人们可能职业不同，但大多都工作在基层岗位，因而“小人物化设定”更能激起人们的代入感。巡边员、教师、村支书等都是置身祖国基层的不同职业和岗位。这种“小人物叙事”方式所映射的是社会中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他们拥有坚韧的生命力、勤勉乐观的精神和面对残酷现实时的豁达心态^[24]。借助“小人物叙事”，每个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我”的存在，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主人公的感染,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二是朴实无华的行为设定。案例中的主人公都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和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 不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 都是普通人只要付出一定努力, 就能够企及的现实榜样。布茹玛汗·毛勒朵说: “我做了一个护边员分内的事, 国家却给了我崇高荣誉, 我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我们全家用脚步丈量祖国神圣领土的决心不停, 巡边护边的信念不改, 心系祖国的爱国之情不变。”在2021年荣获“七一勋章”时, 卓嘎说: “这个勋章, 属于玉麦、属于西藏和长期坚守祖国边陲的各族群众。”正是这些平民英雄, “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执着和坚忍、褪落一身光环后, 还归普通人的平和与尊严”^[25]。他们之所以普通而又不普通, 与关乎国家民族大义时所展现出的超乎常人的执着和坚忍密不可分。

3. 以“超常态化机制”实现铸牢的“有效”

所谓有效, 就是所获是从事有目的活动的结果^[26]。上述案例所涉及地区之所以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取得理想效果, 除“有形”“有感”外, 同样离不开“有效”。“有形”“有感”构成“有效”的前提, “有效”是“有形”“有感”的结果。实现“有形”“有感”向“有效”转化, 需要借助“有形”“有感”的“超常态化机制”。这里的“超常态化机制”体现在: 第一, 只有将“有形”“有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为一种机制, 才有可能达到“有效”铸牢的目标; 第二, 如果仅仅满足于机制的建立, 而不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 势必影响铸牢的“有效”程度。只有建立这种“超常态化机制”, 才能实现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

在“建设示范区”案例中, 内蒙古自治区并没有拘泥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某一领域或方面, 而是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广泛动员, 在全区上下掀起了一股全方位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热潮。从幼儿园到大学, 从机关到企业, 从普通牧民到干部, 意在营造一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人参与”的浓烈氛围。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关制度建设到强化落实,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物质载体到精神载体,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内蒙古自治区通过不断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方位, 实现有形、有感、有效铸牢的目标。

在“邗新社亲”案例中, 沁阳市邗邰村和博爱县大新庄村的村民之间所建立的正是这种“超常态化机制”。一方面, 他们通过建立两村领导班子沟通交流制度、在两村传统庙会时开展相互慰问活动、每年春节到对方村内举办联谊座谈会、签订民族团结进步协议书、建立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教育基地和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 建立了一种常态化机制, 使回汉村民间的睦邻友好从点对点之间的自发行为上升为面对面之间的自觉行为。另一方面, 这种睦邻友好又不仅仅是时代的产物, 也是历史赓续和文化遗产的结果。正如大新庄村党支部书记赵长礼所说: “邗新两村结缘于明朝正德年间。一次偶然的机, 大新庄村的一名回族村民被山西省陵川县县令陈我捷所救。为了回报陈县令的恩情, 大新庄村村民备好礼物, 到陈县令的家乡邗邰村致谢。经过商议, 两村结为‘社亲’。自此, 世代友好的理念就在村民们心中扎下了根。五百多年来, 两村互帮互助的事情数不胜数, 感情也日益深厚。新中国成立后, 民族团结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当厚重历史文化和常态化机制产生交集, “超常态化机制”便应运而生。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看, 正因为“邗新社亲”增进了回汉村民之间的友好交往, 强化了彼此的历史记忆与族际文化认可, 使得“邗新社亲”成为我国族际友好交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文明典范和经受住历史检验的文化品牌^[27]。

结合扎根理论，对实践案例进一步总结提炼后可以看到，各地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构成经验积累。以“微场景化设置”实现铸牢的“有形”、以“小人物化设定”实现铸牢的“有感”、以“超常态化机制”实现铸牢的“有效”，可被看作实质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有形”为载体，以“有感”为方法，以“有效”为目标，则可作为形式理论的初始形态。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刻意制造的政策术语，而在对近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来各地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动实践的经验总结，既具有实质理论的内核，内容质朴；也具有形式理论的外在，朗朗上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

四、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未来展望

近年来，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在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持续用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基地、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新时代新征程探索建立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标体系，使之规范、精准和可操作，成为全面深入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对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理论界定，根据扎根理论对相关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提炼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定性。从理论上，“有形”“有感”“有效”分别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方法和目标维度。从实践上，“微场景化设置”“小人物化设定”“超常态化机制”分别成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形”“有感”“有效”。本文尝试对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标体系进行初步构建。

（一）指标体系

根据理论梳理和案例分析，本文围绕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尝试构建一个三级指标体系，目的是在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量化方面进行一些有益尝试。其中，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为一级指标，三个一级指标的有形、有感、有效维度构成二级指标，以及若干三级指标（见表 1）。

表 1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政治认同	增强政治认同“有形”	过程“有形”：完善有关政策法规体系、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推动“四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和相关主题活动等
		结果“有形”：上述实践的可视成果
	增强政治认同“有感”	工作方式“有感”：换位思考，具有感知力、感染力、感召力
		工作对象“有感”：产生共鸣
	增强政治认同“有效”	精神“有效”：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更加坚定
		实体“有效”：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更加牢固

(接上表)

文化认同	增强文化认同“有形”	过程“有形”：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建设、传统文化教育主题活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教育，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打造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创作和推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艺术作品、艺术形式和文化品牌，打造同心圆实践场所和基地等
		结果“有形”：上述实践的可视成果
	增强文化认同“有感”	工作方式“有感”：换位思考，具有感知力、感染力、感召力
		工作对象“有感”：产生共鸣
	增强文化认同“有效”	精神“有效”：各族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更加坚定
		实体“有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传承
身份认同	增强身份认同“有形”	过程“有形”：完善有关政策法规体系、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教育基地建设和相关主题活动等
		结果“有形”：上述实践的可视成果
	增强身份认同“有感”	工作方式“有感”：换位思考，具有感知力、感染力、感召力
		工作对象“有感”：产生共鸣
	增强身份认同“有效”	精神“有效”：各族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更加坚定
		实体“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统一稳固、牢不可破

当然，根据理论梳理所提炼出的指标体系虽然罗列了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若干要素，但仍不够全面、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需要各地进一步从自身实际出发，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实践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从而形成既具有全国共性，又具有区域特色的若干区域性指标体系，以更好指导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二）未来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1] 245}这种共同体不仅是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更是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唯一能够把各民族根本利益紧紧维系在一起的整体性力量。本文的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清晰地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必须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贯穿始终。而要想真正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有形、有感、有效三者不可或缺。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这给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新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各民族所处区位、资源禀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样，如果任由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势必会造成民族间的矛盾冲突乃至毁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8]。历史上，因忽视共同体意识培养和共同体建设而导致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只有共同体意识得到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才有能力抵御外部威胁、维系内部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才能获得有效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民族

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勇于面对、方法得当，挑战就有可能实现向机遇的转化。有形、有感、有效作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要求，便是实现挑战转化为机遇的一把钥匙。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在有形、有感、有效方面持续用力。

第一，进一步拓展“有形”载体。时代在发展，开展工作的载体也在不断丰富。近年来，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特别 ChatGPT 的推出颠覆了人类对于机器学习的认知。“人机语境融合意味着大型语言模型可以在与用户的交流互动中生成和发展语境，人和 ChatGPT 的交流互动过程意味着人机相互生成、相互影响。”^[29]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履行好人类工作和学习助手角色，而且能够在共同体意识培育方面发挥重大影响，因此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主动权，主动跳出“舒适区”，以有目的的信息检索和算法优化，拓展信息的维度，在受体维度对“信息茧房”进行对象性的“改造”变得尤为迫切^[12]。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人自主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载体之一。

第二，进一步丰富“有感”维度。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的需求层次也会相应提升，精神需求将逐渐在人类需求中占据主导地位。情感作为精神需求的一种类型，在总需求中的分量将会愈发突显。在这种背景下，“有感”将不能再局限于传统固有形式，而是应更多借助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方式。如抖音等社交软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灵活运用，使各族群众能够跨越空间的限制，在同一个场景中更好地交往交流交融。

第三，进一步夯实“有效”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持续过程，是一项战略工程和长期任务，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外在要求，不能按部就班、急于求成^[30]。“有效”是一个相对概念，永远在路上。由该属性所决定，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标体系绝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扎根实践，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提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40.
- [2]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N]. 人民日报，2022-03-06（1）.
- [3]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2021-08-29（1）.
- [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国民委主任会议聚焦这些内容 [EB/OL]. （2023-01-14）[2023-04-06]. <http://cpc.people.com.cn/n1/2023/0114/c64387-32606649.html>.
- [5] 覃娟. 在“有形、有感、有效”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当代广西，2022（23）：26-27.
- [6] 李晓江. 喀什地区有形有感有效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研究 [J]. 新疆社科论坛，2022（5）：35-39+47.
- [7] 王瑞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中的日常交往认知 [J]. 广西民族研究，2022（5）：71-78.
- [8] 孟凡丽，王静，王国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化：内涵、机理及路径 [J]. 广西民族研究，2022（5）：54-62.

徐光木.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41-153.

- [9] 孟凡丽. 在有形有感有效上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红旗文稿, 2022 (12): 26-29.
- [10] 李建军, 郭远. 观念“筑基”: 高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3): 1-9.
- [11] 江世鑫, 徐丽曼, 刘影. 大中小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 (6): 81-84.
- [12] 焦立涛. 论 ChatGPT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J]. 民族学刊, 2023 (1): 1-8.
- [13] 董慧, 王晓珍. 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研究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 1-5.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99.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6.
- [16]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N]. 人民日报, 2022-03-02 (1).
- [17] 卡耐基. 人性的弱点 [M]. 袁玲, 译.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123.
-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85.
- [19] 岳清春, 秦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与“结构”研究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2 (4): 1-6.
- [20] 马伟华, 李修远. 认知、情感与互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视角思考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 18-24.
-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44.
- [22] 吴肃然, 李名荟. 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J]. 社会学研究, 2020 (2): 75-98+243.
- [23]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下卷 [M]. 许明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605.
- [24] 胡晚君. 小人物、镜头语法和叙事美学: 贾樟柯纪实电影的三个面向 [J]. 视听, 2021 (10): 12-13.
- [25] 瞿巍. 平民的英雄化与英雄的平民化——试论央视《体育人间》栏目 [J]. 新闻界, 2005 (2): 77-76.
- [26] 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212.
- [27] 王广瑞, 刘杰. 主体间性视域下“邗新社亲”的文化传播 [J]. 民族学论丛, 2022 (1): 51-57.
- [28] 宋才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维体系构建及路径选择 [J]. 党政研究, 2021 (3): 59-69.
- [29] 王天恩. ChatGPT 的特性、教育意义及其问题应对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 (4): 19-25.
- [30] 赵心愚, 康坤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常态化 [J]. 民族学刊, 2022 (12): 1-12+146.

责任编辑: 刘泚菡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

郭永虎 于艳文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 美国开启了对华科技遏制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 美国开启对华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出口全面封锁。中美建交前后, 美国逐步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 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趋严。特朗普政府至拜登政府时期,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全面升级, 矛头直指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具有突出特征: 直指中国核心技术, “联盟化”愈演愈烈, 手段多元化,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目标呈现“工具化”属性。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给中美双方乃至全球市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面对美国科技遏制战略的不断升级, 中国政府应当加快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研发, 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 做好对等反制裁措施,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拓宽国际合作的新渠道。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科技竞争; 遏制战略; 科技遏制; 出口管制; 国家安全; 科技强国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3-0154-12

近年来, 美国加大了对华科技遏制的力度。2022年8月9日,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 拉长对华科技制裁清单, 意在重塑美国在世界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霸权地位。2023年1月27日, 美国联合日本、荷兰于华盛顿签订关于扩大对华芯片技术限制的协议, 联合日本和荷兰对华施压。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之一的荷兰阿斯麦公司 (ASML) 和日本表示会对华实行一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3.014

作者简介: 郭永虎,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于艳文,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 (1979-2019)” (19ZDA169)

引用格式: 郭永虎, 于艳文.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 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54-165.

定技术出口限制。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追根溯源,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已走过 70 多年的历史。一部新中国科技奋斗史就是在应对美西方“卡脖子”历史图景中发展演变至今的。百年变局下,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关键核心技术的内驱动力支撑。如何防范和化解美西方对华科技遏制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提出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规划科技体制新顶层设计, 统筹科技力量在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 实现高新技术的自立自强。

从学术研究来看, 学界对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周琪详细分析了美国对华“科技脱钩”的进程和影响^[1]。姜志达研究了数字霸权与美国科技遏制的联系与影响^[2]。池志培分析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实施进程和制约因素^[3]。唐新华通过解读美国出台的对华战略规划和措施, 提出“科技脱钩”是美国构建科技霸权的一个体现^[4]。蔡仲从哲学角度分析美国对华科技遏制背后的冷战思维^[5]。丁明磊、黄宁指出美国利用联盟体系遏制我国科技发展, 需要从持久战角度面对发展的威胁与挑战^[6]。王立分析美国所倡导的“四方芯片联盟”背后是对华科技遏制的考量^[7]。学界关于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研究在时间上集中于近五年, 研究则集中于特朗普政府“科技脱钩”战略的具体措施与影响, 但对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整体脉络缺乏系统梳理。基于此, 本文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历史演进、主要特征、影响及中国应对进行探讨。

一、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历史演进

中美实力消长决定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总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 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 在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方面进行管制, 并根据政治形势、国际格局以及中美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进行调整。纵观历史,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演进历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全面封锁

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废待兴, 科技事业艰难起步。美国对华采取敌对态度, 对华技术出口全面封锁。这一时期,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全面封锁, 严重阻碍了新中国经济与科技事业发展。

1949 年 10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明确表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列为 R 类^①, 对涉及军事武器的战略物资实行禁运, 设立“许可证清单”以限制对华技术出口。11 月, 美国联合 17 个西方国家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 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与贸易限制。12 月, 美国出台 NSC48/2 号文件, 制定严格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措施, 指出要尽一切努力禁止新中国从非苏联来源获得直接用于军事用途的 1A 类战略物资和技术设备, 但允许对华出口 1B 类非战略物资, 其出口数量控制在正常民用范围之内^[8]。1950 年 3 月, 美国公布的《战略物资管制办法》中罗列出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原料、机器技术设备等共计 600 余种对华出口管制物资^[9]。6 月, 美国颁布《1950 年输出统制法令》, 规定煤油、橡胶、铜、铅等 11 种货品除非有特别输出许可证, 否则不得输往中国内地和澳门^[10]。

①1948 年 3 月 1 日, 美国将所有国家划分为 R 类和 O 类, 其中 R 类包括苏联以及东欧所有国家, O 类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

1950 年 10 月末，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表示“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上述地区，包括纺织品、废橡胶等在内^[11]。12 月末，美国发布“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命令，规定所有输送向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的一切战略物资都必须管制。1951 年，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召开第五次大会，出台制裁中国的非法决议案，决定对华实行“军械、军火、战争工具、原子能、石油、战略意义的运输器材以及用于生产军事工具”等 1700 余种物资禁运。8 月，美国国会通过《巴特尔法案》，要求所有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都要严格执行对华禁运的政策。迫于美国的胁迫，到 1953 年 3 月参加对中国技术出口封锁禁运的国家达到 45 个^[12]。1952 年 7 月 28 日，美国同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专门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对华制定“特别货单”，封锁中国技术出口产品多达 400 余项。

（二）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松动

1972 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国对华长达 20 年封锁禁运，实现了中美关系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中美建交前后，美国逐步放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

为联合中国制衡苏联，美国愿意有条件地向中国出口某些高技术产品，但禁止对华出口核心技术，以防中国掌握核心技术从而摆脱其控制。1971 年 4 月，尼克松政府批准波音公司向中国出口 10 架波音 707 飞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出口的高新技术含量最高的产品。1973 年，宝曼·凯洛格公司向中国出口的 8 套制氨生产成套设备，成为美国向中国转让的第一个大型高新技术项目^[13]。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放宽部分军民两用技术对华出口限制。1979 年，美国国防部批准美国公司提出的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申请达 20 余个，出售物资清单中包括运输直升机、电子检测设备、防空雷达等一系列以往对华严禁出口的技术产品。时任美国总统福特不顾国防部极力反对，批准对华出售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斯佩喷式发动机，这是美国第一次对华出售军民两用高技术产品。

1980 年 7 月，美国准许对华出口 400 多种用于军事后勤的先进技术设备^[14]。1983 年，美国总统里根宣布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双倍”政策，即美国对华出口的技术产品是苏联的两倍，将中国划入技术出口管制较弱的 V 组，公布新的“对华出口指导原则”，将对华出口的技术产品分为绿区、黄区、红区三类，除最核心的红区类技术产品禁止对华出口外，其余技术产品可酌情对华出口。截止到 1986 年底，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出口已达 10 亿美元，中国成为进口美国高技术产品前 20 名的国家之一^[15]。

（三）20 世纪 80 年代末之后：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趋严

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认为中国不再具有冷战时期制衡苏联的重要战略地位，反而会成为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潜在对手，因此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更加严格。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之后，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决定对华高新技术出口和转让实施制裁。老布什总统签署停止对华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的命令，禁止对华治安类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终止长征火箭发射休斯卫星的合同、禁止出售核设备和核燃料等。在美国先后出台的 12 项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高技术制裁中，涉及技术出口的条例就占了 5 项，至少中断了近 300 项对中国技术出口的许可。

郭永虎, 于艳文.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 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54-165.

1991年5月27日, 美国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口可能用于导弹试验的高速计算机和供中国火箭发射的美国卫星。1993年9月, 克林顿政府放松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 只对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所必需的关键性技术实行严格管制, 允许对华销售价值800万美元的超级计算机。1994年,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建立, 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1996年, 美国与33个国家代表于荷兰签署《瓦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WA), 决定自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交换规则。在看似自愿基础上形成的技术出口机制“瓦森纳安排”, 实质上却完全由美国一手操纵。当成员国拟向中国出口某项技术时, 美国直接出面干涉迫使交易无法进行。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出口的严格管制阻碍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进步。1999年5月25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公布《考克斯报告》, 诬称中国在过去20年里窃取美国核武器和导弹技术, 攻击中国将美国高性能计算机、精密机械、民用航空等先进技术用于军事研究目的, 并以此为借口全面加强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 逼迫中国在高新技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让步。

2001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同年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自执政伊始, 小布什严格控制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尤其是航天卫星及相关核心技术。2002年2月, 美国审计署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名为《出口限制: 美国急需就中国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作基本政策评估》的报告, 要求美国政府对华高新技术出口实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16]。2003年, 美国加大对中国软件和高新技术设备的管制力度。2004年, 美国国会通过2005财年《国防拨款授权法》, 规定禁止通过豁免条款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 如卫星技术、军事技术等, 明确关键军事技术清单中所有物项出口都需要出口许可证^[17]。小布什政府在2006年《国防授权法》中要求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国务院等机构联合审查对中国高新技术的出口, 包括对华出口法律与实施程序是否一致; 香港向内地转移敏感物资的潜在可能性等, 最终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18]。据统计,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中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18.3%下降至2006年的9.1%^[19]。2007年6月19日, 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 其中有近20类高新技术产品禁止向中国出口。

奥巴马政府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不断对华施压, 企图重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在此背景下, 美国加强了敏感核心技术的对华出口管制。2011年, 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由众议院议员沃尔夫提出的“禁止美国与中国之间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决议案^[20]。4月, 奥巴马签署的《2011财年国防部及全年继续拨款法》中将其通过成为“沃尔夫条款”。该条款专门针对中国航天高新技术进行制裁, 阻碍中国官员、科学家与美国航天局的科技交流, 直接以法律形式限制了中美科技合作^[21]。为遏制中国新能源技术产品进一步发展, 奥巴马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 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开展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2012年11月, 经“双反”调查后,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仲裁宣布, 对中国产业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征收18.32%~249.96%的反倾销税以及14.78%~15.97%的反补贴税^[22]。2013年, 奥巴马总统签署通过的《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明确“中国例外”条款, 严禁卫星及部分高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与再出口^[23]。2016年, 奥巴马发布总统令, 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中国福建宏芯基地收购德国半导体公司爱思强, 以行政手段阻挠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业务。

（四）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全面升级

特朗普、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全面升级。2017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中国确立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rival）^[24]。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在此战略背景下全面升级。

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陆续出台多个立法条例，涉及出口管制、电信设备与许可、投资限制、留学签证多个领域，采用政治、经济、司法、军事、信息等手段全面升级对华科技遏制，矛头直指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特朗普多维打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严格对华出口管制。2019 年 4 月，美国将 37 家中国企业及科研院所、学校等机构列入“未经验证实体清单”，5 月将华为及其 68 家子公司整体列入“实体清单”。2020 年 7 月 1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第 4130 号法案，禁止那些接受美国商务部、国防部、国家情报部门资助的微电子制造和先进研发机构与中国实体机构合作，一旦发现将撤回资助资金。截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中国实体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共有 465 家，涉及国防军工、航天科技、通信技术、半导体技术、人工智能等研究机构、企业，甚至是部分高校^[25]。特朗普对华科技遏制政策也阻碍了中美科技与人文交流。2018 年，美国国务院修改针对中国留学生签证的发放政策，签证有效期由 5 年缩短至 1 年^[26]。

拜登政府基本沿袭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遏制政策，但在竞争行为上有所调整。一方面，拜登延续特朗普任期内对华遏制打压行动。以对华高新技术企业遏制为例，2021 年 6 月 3 日，拜登发布政令将包括华为、中国航天科技、中国移动通信等在内的 59 家中国企业列入禁止美国人投资的“黑名单”，理由是所谓“中国企业涉及军事威胁”^[27]。截至 2022 年 6 月 7 日，被 BIS 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注册地在中国的实地（包括机构和个人）共有 517 个，大陆地区、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分别有 426 个、82 个、9 个^[28]。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科技竞争行为进行了调整，对华科技遏制战略升级。拜登宣称要在核心技术方面打压遏制中国，而在非核心技术领域与中国保持广泛合作，如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公共卫生问题等方面。利用多边外交加强盟友联系是拜登对华科技竞争行为调整的又一重点。2021 年，美国联合欧洲和日、韩等地区或国家的企业建立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抢占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话语权。2022 年 3 月，拜登政府向韩国政府建议，与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旨在将中国大陆排除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近期，拜登不断在芯片领域对华施压，联合日本、荷兰限制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对华科技遏制还会继续升级。

特朗普政府至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国会在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方面立法频繁。美国国会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出台了多项法案防止美国高新技术进入中国。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第 1459 号法案和 3532 号法案中要求国务卿和商务部长对出口到中国的、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某些技术和知识产权实行管制，诬称中国利用文化和技术交流的渠道“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并将此类技术运用于军事，对美国造成威胁。为遏制中国在 5G 通信等高科技领域对美国的赶超态势，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手段对华为等中国通信企业实行全面打压和遏制。随着中美高科技领域竞争趋紧，美国国会立法目标瞄准以微电子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核心技术，不断强化对华技术壁垒，严格管控对华高新技术出口，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进步。

二、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主要特征

中美科技竞争是一场政治、经济、技术、产业等多重因素、多种角色交织在一起的大国战略博弈。随着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战略构想日趋清晰，其对华科技博弈行动也逐步升级。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具有突出特征。

（一）直指“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物资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始终聚焦核心技术领域，对中国“卡脖子”技术实行封锁遏制。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全面封锁，尤其限制军事战略物资对华出口。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先后多次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但并不对华出口相关的核心技术，防止中国日后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日趋严格，在计算机、航天卫星、核设备与燃料、军事设备等核心技术产品对华出口上层层加码。特朗普任职期间，美国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制定技术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华为、中兴等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科技制裁，对中国5G通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实行封锁。拜登采取“小院高墙”对华科技遏制战略，在核心技术和产业变革方面对中国科技实施精准打击。“小院高墙”是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进一步成熟，即挑选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在其周围划定战略边界，边界之内的技术如军事安全、芯片研制、量子计算、基因编辑等核心技术要严格封锁，而边界之外即不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可以对华开放。“小院”是核心技术的范围，“高墙”则是封锁核心技术的手段。美国对华科技遏制领域直接瞄准中国“卡脖子”核心技术，旨在打压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科研创新能力。

（二）“联盟化”愈演愈烈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联合西欧等17个国家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设立专门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机构“中国委员会”。冷战结束后，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美国联合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签署《瓦森纳协定》。虽然成员国可以在自愿基础上参照管制原则和清单实行出口管制，但实际上却受美国操纵。2004年，捷克决定以5500万美元合同价格拟向中国出口无源雷达系统，美国横加阻拦迫使交易最终取消。2019年新修订的《瓦森纳协定》中增设大硅片的生产技术，进一步限制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拜登上任后，裹挟盟友压制中国科技的发展，搭建起对华科技遏制联盟，意图在科技领域深化联盟体系。2021年2月19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声称：“你们知道，我们必须一起准备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29]拜登上台以来，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美墨西哥高级别经济对话、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以及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AUKUS）等体系，与盟友搭建起一个“复合阵营”与“盟伴体系”相互嵌套的对华科技竞争格局^[30]。从巴黎统筹委员会到“瓦森纳安排”再到拜登对华科技联盟，美国对华科技遏制联盟化趋向凸显，意图编织最为紧密的对华技术封锁网络。对抢先锁定全球前沿创新技术规则和新技术生态体系，进一步攫取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利益，美国深谙其道。

（三）手段多元化

纵观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历程，美国对华科技制裁手段日臻多元化，利用立法、行政、司法、舆论、人才交流等多手段联合制裁中国科技发展。其一，美国国会出台对华科技制裁法案。新中国成

立初期，美国国会相继通过《巴特尔法》《现今美国对远东的政策》等报告，在中美之间树立了一道坚固的“柏林墙”。20 世纪 80 年代末之后，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加剧，美国国会不断出台对华科技遏制法案。近年来，美国第 116 届、117 届国会出台了多项法案防止美国高新技术进入中国。其二，利用行政手段限制对华技术出口与投资。美国将技术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制度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武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陆续出台《1949 年出口管制法》《共同防务援助管制法》《出口管制法规》，对向新中国技术出口全面封锁。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多种核心技术领域限制对华出口转让与投资，如中海收购优尼科失败、三一重工美国投资风力发电受阻以及华为在美投资受挫等，整合对华出口管制与监管机构。特朗普、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通过拉长“实体清单”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精准打击与制裁，阻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其三，通过司法诉讼精准打击高新技术企业。2018 年，在美国应对外部技术威胁为由的“中国行动计划”推动下，司法部发起至少 68 项相关科研人员司法诉讼，针对的是大部分美国高校中的中国籍专家学者。其四，对华舆论施压，阻碍科技与人才交流。美国政府在多个场合公开宣称“中国科技威胁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沃尔夫条款”限制中美航天技术的科技交流。特朗普政府修改中国留学生签证的发放政策，中止学术交流项目，限制相关机构在美的科研活动，均阻碍了中美科技与人才交流。

（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将中美科技竞争意识形态化，制造对华技术壁垒，是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惯用伎俩。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企图用政治打压、军事遏制、经济封锁等手段扼杀新中国，意识形态遏制是其中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极力推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演变，以中美意识形态差异发动对华舆论攻击。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升，“美国对快速崛起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受威胁感和竞争的压迫感”^[31]。特朗普发动“全政府”对华科技战，在多次公开演讲时使用“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等污名化标签，鼓吹“中国科技威胁论”大搞舆论和意识形态冲突，公开指责中国 5G 技术和网络安全的威胁。拜登上任后，进一步升级中美科技竞争的意识形态化战略，推行其所谓的价值观联盟，以最低的成本换取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拜登政府宣称：“必须与盟友和伙伴一起振兴世界各地的民主，使其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占据优势。”^[32]拜登大打“意识形态牌”，对内开展广泛政治动员，获取政党与民众支持；对外宣扬所谓“民主价值观”拉拢盟友，污名化中国，制造国际舆论声势，旨在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联盟”来遏制中国科技发展。

（五）目标高度“工具化”

纵观 70 多年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演进轨迹，其对华遏制目标呈现出“工具化”属性。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20 余年，美国实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和全面封锁，这实质上是美国打压遏制新中国的有力工具。中美建交前后，美国需要改善中美关系来制衡苏联，对华战略由“遏制”转向“接触”，这一时期美国逐步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将维持霸权地位，防止亚太地区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作为战略核心，不断调整对华战略以牵制中国发展，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绝对优势，这一时期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趋严。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战略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科技遏制也全面升级。70 多年来，科技已经沦为美国用来打压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在中美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美国很可能会“长

期将中国视为挑战其霸权的主要威胁, 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 规锁中国的发展空间, 使中国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霸权”^[33]。

三、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负面影响与中国应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大国战略博弈, 使得高新技术成为撬动全球利益与价值分配版图的关键因素。美国凭借超级大国地位, 多方位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对中美双方、全球市场都将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当前中美科技博弈愈发激烈, 中国政府应加快核心技术产业研发, 尽快摆脱被动局面, 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

(一) 负面影响

综合来看,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使得中国获取外部关键核心技术的渠道进一步受限, 阻碍了中美双方的科技合作与人才交流, 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业务带来不确定性风险与困难, 同时也对美国自身利益和全球市场环境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1.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害己伤人”。美国对华采取的一系列科技遏制做法, 不仅损害了中国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 对美国自身利益和全球市场环境也造成了严重危害。一方面,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遏制与打击, 给美国经济利益带来了极大损失。美国政府对华科技出口管制给高通、博通、英特尔等美国公司造成一系列附带伤害。自 2022 年年初以来, 美国科技公司已裁员 29 万多人。截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 美国已有 489 家科技公司撤裁了约 13.9 万个技术岗位^[34]。科技市场股票纷纷下跌, 高科技交易总额多次创历史新低, 仅华为一家公司就有数十亿美元的业务损失^[2]。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科技领域的创新进程, 增加了美国的创新成本。另一方面, 美国对华科技霸权严重破坏了全球市场环境。波及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芯片危机还在持续, 这与美国制裁中国科技企业进而干扰全球产业链脱不开干系。美国对华挑起的贸易战扰乱了正常贸易秩序, 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产品的自由流动。若美国倡导的数字科技霸权不断推进, 将会对国际商业贸易造成严重威胁^[35]。

2. 中国获取外部关键核心技术途径受限。美国掌握着全球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机械制造、航天等行业的关键技术研发和先进工艺流程, 目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诸多元器件和装备尚需要依赖美国技术和产品进行生产制造。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将中国潜在的“卡脖子”技术风险放大, 其带来的代价也极大。仅以中兴通讯为例, 其被处以 14 亿美元罚金, 股价下跌幅度达 60%以上^[36]。2022 年 1 月, 美国众议院公布了一项旨在提高美国对中国竞争力的法案, 支持美国芯片产业, 包括为半导体制造和研究提供 520 亿美元的补贴^[37]。为彻底切断境外对中国关键技术的供应, 美国长臂管辖西欧、日韩等盟友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不惜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阻挠关键技术供应商向中国企业供货。美国通过对荷兰政府施加压力, 阻拦全球光刻机巨头 ASML 向中芯国际交付 EUV 光刻机。迫于美国威胁, ASML 拖延对华出口的发货时间。全球市场上, 美国对半导体产业的把控权和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影响力, 使得行业内与美国经贸往来颇为谨慎, 对美国出口禁令颇为忌惮。因此, 全球核心元件供应商在与华经贸往来时不得已会考虑美国方面的因素, 导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获取国外关键

核心技术途径进一步受限。

3.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业务受阻。美国竭力阻挠中国高科技企业向海外市场拓展业务。一方面，美国多次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企业的高科技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全力排除美国市场中的中国产品。2021 年 11 月 11 日，拜登正式签署《2021 安全设备法案》，试图完全阻止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通信设备产品进入美国的电信网络。美国长臂管辖阻止其他国家使用中国产品，严重降低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额。据统计，2021 年第一季度，华为手机的市场销售量已经跌出全球前五名^[38]。美国正积极游说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各国，迫使其放弃购买中国的 5G 设备，意图将中国 5G 通信设备再次排除出欧洲市场。另一方面，限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跨境并购业务，以此来压缩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2021 年 2 月 18 日，美国众议院提出第 1138 号法案，禁止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向总部设在中国或中国公民拥有超过 25% 投票权的股份制小企业提供援助、资助或协助。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以极其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屡屡使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收购受挫。2020 年 11 月，特朗普签署命令禁止美国对被列入美国国防部名单的 31 家中国大型国有或民营企业进行投资活动，并在限期内撤回已有投资。

4. 阻碍中美科技教育和人文交流。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等多个部门合力限制中美之间科技教育和人才交流，给中美双方造成了科技和人才交流上的双向损失。一方面，影响中国高科技人才引进与培养。2020 年 5 月，白宫网站发布公告暂停参与所谓“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硕博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等入境美国^[39]。美国限制中国学者以及其他科研人员赴美进行科技交流，将一批批高校和科研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修改中国学生的留学签证政策，驱逐华人科学家和研究学者。中国每年有超过 35 万的学生和研究者赴美留学，每年约有超过 25% 的归国人员来自美国。由于美国对中国公民的留学签证办理和审批愈发严格，高层次留学人才归国发展受到阻碍。另一方面，限制美国自身科技创新与发展。美国阻止中美之间科技教育与人才流动，是逆全球化的行为，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科研实力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没有中国高新技术人才的输入，美国科技竞争力必定大打折扣。

（二）中国应对

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已经到来，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对美国遏制政策时刻保持警惕，并及时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来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1. 加快科技自主创新，构建突破“卡脖子”技术新体制。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中国赢得中美科技博弈主动权的关键在于掌握“卡脖子”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虽然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长足发展，但诸多“卡脖子”技术瓶颈仍突出。一方面，加快科技自主创新，将核心技术攻坚放到首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40]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前沿工程技术、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等领域投资，瞄准高新技术企业这个创新主体，聚焦产业技术补足短板，整合科研技术研发力量，走自主研发之路。另一方面，构建突破“卡脖子”技术新体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2023 年 3 月 10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按照部署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强化科技部的新战略规划，进一步健全科技创新体制。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布，提出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表示科技改革任务将力争在 2023 年年

郭永虎, 于艳文.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 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54-165.

底前完成^[41]。我国要加强科技创新顶层设计, 激活科研创新动能, 加快建设高科技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从而实现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根本转变。

2. 做好对等反制措施, 完善合规体系建设。面对美国非法对华制裁的嚣张行径, 要及时采取对等法律效力的反制措施, 保障中国科技企业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害。应当看到, 面对美国纷繁复杂的制裁法案和管理清单, 我国出口管制在立法和调查方面尚有不足, 管制物项范围和措施与其他国家还不完全对等, 因此要尽快完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 在对外反制裁措施上做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 要逐步完善合规体系建设。美国将矛头对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这无疑对企业的合规意识与体系完备提出更高要求。高新技术企业要树立诚信合规经营意识, 坚定依法合规经营理念, 推进企业合规文化建设。在对美开展投资业务时, 企业要及时做好风险评估与应对, 统筹谋划企业发展前景, 自觉依法合规经营, 避免遭受美国制裁。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多元化应对产业链调整冲击。拜登政府宣扬在全球产业链中“去中国化”, 降低“中国制造”的不可替代性, 给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目前来看, 我国产业链体系完整, 产业配套能力不断增强, 但是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42]。面对全球产业链的升级和重构, 要多元化应对产业链调整冲击, 做到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技术产业升级双管齐下。我国要加快推动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升级, 打造更加完整的产业链分工体系, 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加强本土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 凝聚广泛共识, 携手推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共建共享。

4. 始终坚持对外开放, 拓宽国际合作新渠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越是面临封锁打压, 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 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43]一方面, 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对外开放态度应对美国联盟体系的挑战, 发挥中国市场优势, 拓展与美国之外的国家间科技合作, 因势利导打破美国对华科技围堵的藩篱。另一方面, 深化“一带一路”建设, 打造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贸易投资关系, 加深“中国制造”的不可替代性, 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的影响力, 吸引更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更深入的利益往来与对话合作。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是赢得中美科技之战的关键, 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掌握竞争主动权, 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 [1] 周琪. 美国对华科技脱钩进程及其影响 [J]. 当代世界, 2022 (9): 32-39.
- [2] 姜志达, 崔越. 数字霸权与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影响 [J]. 和平与发展, 2021 (5): 18-33+135-136.
- [3] 池志培.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实施与制约 [J]. 太平洋学报, 2020 (6): 27-42.
- [4] 唐新华.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趋势观察 [J]. 中国信息安全, 2020 (8): 68-70.
- [5] 蔡仲. “布什模式”、科技遏制与冷战思维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 1-8.
- [6] 丁明磊, 黄宁. 美国利用联盟体系遏制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22, 37 (5): 1-6.
- [7] 王立. 《芯片与科学法案》背后是对华科技遏制的考量 [N]. 第一财经日报, 2022-08-16 (11).
- [8] NSC4812,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EB/OL]. (1949-12-03) [2022-03-3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1v06p2/d103.htm>.

- [9] 崔丕. 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 [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1949—1952): 中 [G].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4.
- [1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EB/OL]. (1950-10) [2022-03-3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6.htm>.
- [1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 上 [G].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 [13] 林坚. 远渡重洋: 中美贸易二百年(1784—1999)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 [14] 布热津斯基. 实力与原则: 布热津斯基回忆录 [M]. 邱应觉, 梅仁毅, 王家湘, 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 [15] 宫力. 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 [16] 黄军英.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走向分析 [J]. 国际经济合作, 2009(6): 38-41.
- [17]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on Policy [EB/OL]. (2004-05-19) [2022-03-31].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ppcategories/presidential/statements/signing-statements>.
- [18]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U.S. Dual-Use Export Controls for China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Final Report No. IPE-17500 [R/OL]. (2006-03) [2022-03-31]. <https://www.oig.doc.gov/OIGPublications/IPE-1750.pdf>.
- [19] 冯晓玲, 姚欣. 21世纪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研究 [J]. 经济视角(上旬刊), 2014(1): 63-65+84.
- [20] H. R. 2596 [R/OL]. (2011-10-17) [2022-03-31]. <https://www.congress.gov/112/bills/hr2596/BILLS-112hr2596rh.pdf>.
- [21] H. R. 1473,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Full-Year Continuing Appropriations Act [R/OL]. (2011-04-11) [2022-03-31]. <https://www.congress.gov/112/plaws/pub110/PLAW-112publ10.pdf>.
- [22] 美终裁对华光伏产品征双反关税 中企将继续抗辩 [EB/OL]. (2014-12-18) [2022-03-31].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yyj/20121109/050413622425.htm>.
- [23] 赵婉云. 奥巴马政府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的国会因素 [D]. 北京: 外交学院, 2015.
- [2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OL]. (2017-12) [2023-04-0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 [25]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plement No. 4 to Part 744 Entity List [EB/OL]. (2020-04) [2022-03-11].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documents/regulations-docs/2326-supplement-no-4-to-part-744-entity-list4/file>.
- [26] Jeffery M. More restrictive U. S. policy on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 visas raises. Alarm [EB/OL]. (2018-05) [2023-03-31].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more-restrictive-us-policy-chinese-graduate-student-visas-raises-alarm>.

- 郭永虎, 于艳文.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 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54-165.
- [27]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 包括华为等 59 家中企被列入投资“黑名单” [EB/OL]. (2021-06-04) [2023-03-20]. http://news.youth.cn/gj/202106/t20210604_12995028.htm.
- [28] 陈峰. 美国扩大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中国科技的影响和对策 [J]. 情报杂志, 2022 (8): 1-7+23.
- [29] Jacob Fromer, Mark Magnie. US EU Must Prepare for 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Says Joe Biden [EB/OL]. (2021-02-20) [2023-03-30]. https://new.scmp.com/web/new_page.htm.
- [30] 赵明昊. 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 (6): 26-55+157.
- [31] Allison, Graham T. “Destined for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EB/OL]. (2017-07) [2023-03-31].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557386>.
- [32]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R/OL]. (2021-03) [2023-03-30]. <https://sgp.fas.org/crs/natsec/IF11798.pdf>
- [33] 冯维江. 百年变局视野下的大国竞争与中美关系 [J]. 当代世界, 2019 (8): 10-15.
- [34] 硅谷裁员愈演愈烈, 车企“张开双臂”欢迎软件人才 [EB/OL]. (2023-03-27) [2023-03-30]. https://www.sohu.com/a/659806650_376050.
- [35] Kristin Shi-Kupfer and Mareike Ohlberg. China’s Digital Rise: Challenges for Europe [EB/OL]. (2019-04) [2023-03-30]. <https://d-nb.info/1183121938/34>.
- [36] 曹宇轩, 粟锋. 中国“卡脖子”技术研究述评 [J]. 科技和产业, 2022 (11): 38-44.
- [37] 美国众议院公布对华竞争和芯片法案 [EB/OL]. (2022-01-26) [2023-03-30].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20126-1236>.
- [38] 一季度华为跌出全球手机品牌前五 小米 OV 混战抢市场 [EB/OL]. (2021-05-01) [2023-03-30]. <https://www.caixin.com/2021-05-01/101704844.htm>.
- [39]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clamation on the Suspension of Entry as Nonimmigrants of Certain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0-05-29) [2023-03-2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suspension-entry-nonimmigrants-certain-students-researchers-peoples-republic-china>.
- [40]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J]. 当代党员, 2021 (12): 3-7.
- [41] 王红茹. 新组建的中央科技委什么来头 [J]. 中国经济周刊, 2023 (6): 22-27.
- [4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43] 习近平.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 年 9 月 11 日) [N]. 人民日报, 2020-09-12 (10).

责任编辑: 刘泮菡



中美战略博弈下的美国对华人权制裁： 法理批驳与中国因应

李燕飏 许妙

（西北政法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摘要：近年来，美国以“人权问题”为由不断升级对华制裁，干预中国事务，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通过涉人权制裁立法、对中国实体开展直接制裁、针对第三国“人权事务”制裁中国企业等方式实施对华人权制裁。美国人权制裁是一种有危害性的政治干涉，剥夺了被制裁国公民的发展权、生存权。美国还滥用WTO例外条款作为抗辩依据，违背不干涉内政和国家管辖权等国际基本准则。其对华人权制裁既不具备正当性，亦不具备合法性。为应对此类制裁，我国逐步完善国内反制裁立法框架，积极开展人权反制实践，充分重视国际人权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此基础上，应结合国际法规则及我国国情加快完善反制裁涉外法治体系，积极利用国际框架开展反制裁工作，加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设，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关键词：中美关系；人权外交；人权制裁；涉外法治；反外国制裁法；反干涉；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166-15

DOI：10.13946/j.cnki.jcqiis.2023.03.015

作者简介：李燕飏，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西北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许妙，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2019级本科生。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自选项目“反制裁法律法规研究”（CLS（2022）D86）；陕西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一带一路’的数字话语风险与对策研究”（22JK019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新疆形象自塑的话语建构及策略研究”（2022VZJ020）

引用格式：李燕飏，许妙. 中美战略博弈下的美国对华人权制裁：法理批驳与中国因应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3）：166-180.

一、问题的提出

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操弄需要, 美国多次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实施制裁,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制裁和其他经济手段已成为美国威慑、胁迫和遏制对手的更广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美国政府不断强调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将制裁“武器化”, 实行“长臂管辖”, 并试图结合新干涉主义的对外人权战略, 指责中国人权状况, 企图论证制裁的有效性。“9·11”事件后, 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 制裁范围从贸易领域扩大至金融领域, 制裁黑名单也越拉越长。根据美国财政部《2021年制裁评估报告》, 截至2021财年, 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9400多项。从2000年到2021年, 美国对外制裁增加了93.3%^[2]。其中, 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累计超过1000家, 主要集中在新兴科技领域, 特别是中国所需的关键物项或技术, 目的是遏阻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

(一) 研究综述

目前, 我国学者主要针对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国际人权法规制等问题进行探讨, 对美国特定人权制裁法案以及欧盟人权制裁机制也有一定研究。部分学者以美国出台《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为例, 梳理美国人权制裁的脉络, 认为该法能够有效规避其他制裁手段的道德后果^[3]。有学者研究美国人权制裁运行机制后认为, 中国应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和司法手段进行对等反制^[4]。部分学者从贸易视角提出, 正确行使WTO成员贸易保护权及诉诸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路径解决人权制裁危机^[5]。有学者剖析了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 认为该机制在合法性、法律确定性、人权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 可能构成国际不法行为^[6]。但总体而言, 目前我国国内对人权制裁的系统研究较少, 未能对人权制裁予以明确概念界定, 从法理视角对美国人权制裁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深挖细化也较少。同时, 在《反外国制裁法》出台后, 国内尚未出现基于该法律框架深入探讨美国涉华制裁的文献, 相关研究成果集中在对该法的定性、出台背景、正当性基础以及核心内容的分析。近年来, 美国加强人权制裁、域外适用持续扩张, 以人权为由制裁中国实体的案例不断涌现。这对学界以反制裁视角展开美国人权制裁研究提出了现实迫切的要求。

在新一轮制裁浪潮中, 健全反制裁法律法规体系是我国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的重要之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当前, 中国正在顶层设计方面切实推进涉外法治建设, 在相关领域法中增补条款, 出台阻断办法及相关立法, 强化对域外长臂管辖的法律阻断。面对现实要求, 我国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按照急用先行原则, 加强涉外领域立法, 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法律法规^[7], 切实完善反制裁立法、执法、司法体系。

(二) 人权制裁的概念厘定

制裁作为对外政策中的一种强硬手段, 既包含在国际法框架下的制裁, 也包括违反现行国际法的不法制裁, 存在两面性。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为实现其政治目的, 突破国际法框架滥用“人权”对中国等其他国家采取的不法制裁。

制裁在国际法中没有权威的定义, 学界主要围绕制裁发起方的目的以及制裁所针对的行为进行探讨。一个广泛接受的定义是政府刻意地实施或威胁实施中断贸易、金融活动、人员流动等^[8]。从

制裁发起方的目的来看，普遍观点认为制裁是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标的工具。而反映到国际实践层面，有观点指出制裁通常是指一国或多国对被制裁国施加非武力的、非断绝外交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强制措施，旨在增加制裁对象经济活动或交易的成本和难度，迫使制裁对象改变其政治或经济决策^[9]。作为被广泛使用的一项外交政策，制裁是道德表达目的和国内政治需求的结合。此外，国际社会中的制裁也可出于惩罚目的。国际法委员会在制定《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中曾提出，制裁的特点在于其目标的本质是惩罚性的，并伴随着对类似相关行为的警告意图^[10]。因此，如果制裁发起国不同意目标国的政策或行动，不仅可以施行事前积极威慑，迫使目标国放弃既定政策并改变行为，也可采用事后消极制裁，使目标国因自身决策承担损失。

关于制裁针对的行为，根据《国际公法百科全书》定义，国际法中的制裁是指为迫使某国停止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而施加的不利法律后果^[11]。这与凯尔森的观点高度契合。他在《国际法原理》一书中阐释了制裁是法律秩序对不法行为的反应，是法律秩序所构成的共同体对作恶者即不法行为人的反应^[12]。这个定义将国际法上的违法性作为发起制裁的前提。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二款使用“歧视性限制措施”一词定义制裁针对的行为，即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此条文将“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设置为识别“歧视性限制措施”的重要依据，明确各国的不法行为或能增加被我国列入反制清单或被施加反制措施的风险。

学者们通过描述实施原因来定义人权制裁，认为它是经济制裁的重要工具。霍夫鲍尔将经济制裁的目标细分为五类，其中一类是使目标国的政策用相对适度和有限的方式改变，最常见的是针对人权等问题而实施的经济制裁^[13]。罗艳华、庞林立认为，人权制裁是一个国家因为某国侵犯人权而对其实施制裁的行为^[3]。王孜弘指出以人权与民主为重要政策目标的经济制裁即人权制裁^[14]。既有研究注重描述人权制裁的实施理由，缺乏对制裁独特性的全面阐释，更难以概述当前美国所展开的人权制裁实践。我们应从性质、主体、客体、手段、目标等多种要素定义人权制裁。首先，美国善于运用经济制裁来实现较小的政治目标，经济制裁是美国传统的人权制裁方式。其次，人权制裁的发起主体是国家或国际组织，实施对象可以是国家、组织机构、个人或企业等。美国实施的人权制裁绝大多数由其国内法衍生，缺乏国际法依据。再次，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为依据的案例中，常见的人权制裁手段包括签证禁令、资产冻结以及禁止交易往来等。同时，该法也表明其立法宗旨是对严重侵犯国际公认人权行为的外国人或者出于其他目的实施制裁，即保护人权与民主并不是美国发动制裁的唯一理由。综上，本文探讨的美国对华人权制裁是指美国为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以所谓“人权保护”为理由，通过禁止入境、冻结或没收资产、拒绝贸易往来等手段对中国（包括国家、个人或企业、组织）进行阻碍或者施加其他不利影响，企图迫使中国根据美国意愿改变行为的限制性措施。

二、美国对华人权制裁现状

特朗普政府 2017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拜登

政府 2022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中国被美国视为“超过俄罗斯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妄图通过技术限制、经济制裁等方式削弱中国的竞争力, 而制裁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对华制裁逐渐由最初的“竞争遏制”发展为“全面遏制”。过去 5 年, 美国政府实施了数量空前的以“人权和腐败”为借口的制裁。全球制裁跟踪平台 Castellum.AI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针对中国主体的制裁案例中, 所谓“人权与腐败问题”已成为主要制裁理由^[15]。美国凌驾于多边人权机制之上, 高频针对中国内政出台人权立法, 制裁中国官员和企业, 甚至针对第三国“人权事务”对中国企业开展制裁。其制裁的单边化色彩加剧, 人权制裁进入高峰期。

(一) 涉华人权制裁立法

美国实施对外制裁时, 历来注重法律体系的建构, 试图为其行为寻求合法性。2016 年 12 月,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生效。该法规定的制裁理由分为严重违反国际公认人权和重大腐败行为两大类。其中, 严重违反国际公认人权的行为包括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未经指控和审判的长期拘留, 绑架和秘密拘留造成人员失踪, 以及其他严重剥夺生命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的行为。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入境美国和冻结美国境内资产。2017 年 12 月, 特朗普签署第 13818 号行政令以执行《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更新了马格尼茨基名单, 进一步明确了制裁程序, 扩大了该法赋予总统的制裁权力。拜登政府也通过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发布第 14032 号行政令制定 NS-CMIC 清单, 试图进一步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军工企业发动制裁。这些法案逐渐成为美国对华制裁的核心立法依据。

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基础上, 美国还加快通过国会立法、总统行政命令及 OFAC 等部门条例, 为其对中国发动制裁提供国内法依据。其中, 国会立法主要围绕我国香港、新疆、西藏等地所谓“人权”议题展开。所谓“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针对任何“违反香港人权”的外国人进行制裁, 措施包括实施资产冻结、撤销现有签证、禁止入境美国等, 并规定因“争取香港民主、人权和法治和平示威”而被拘捕的人仍可获得美国签证。所谓“香港自治法案”进一步强化了涉港人权制裁机制, 针对提供实质性协助的外国人及外国金融机构的制裁措施更加细化^[16]。此外, 美国发布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年度人口贩运报告”等均含有涉港内容, 肆意抹黑香港人权法治情况^[17]。美国审议通过数项涉港人权消极法案。如众议院米克斯提出的所谓“谴责继续侵犯香港民众权利自由的决议案”、民主党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所谓“2021 年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等, 要求为反中乱港分子、违法犯罪人员提供庇护^[18], 试图借助人权议题对华施压。

香港国安法通过后, 美国涉港人权议题逐渐冷却。2020 年 6 月特朗普签署通过所谓“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这同样是一部以人权为名义干涉他国内政的美国国内单边立法。该法案针对美国政府认定为所谓“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制裁。2021 年 12 月, 美国发布多个涉“强迫劳动”暂扣令 (WRO) 以及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同时设置“可反驳的推定”制度, 要求进口商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均不涉及强迫劳动。对象不仅包括在新疆部分或全部开采、生产和制造的产品, 还包括与相关企业发生业务往来的含有新疆因素的货物。关于涉藏人权议题, 2018 年 12 月特朗普签署所谓“对等进入西藏法案”, 要求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报告前一年拒绝或限制美国外交官及其他官员、记者和外国公民进入西藏地区的中国官员, 采取行动拒绝或撤销其签证。从上述立法不难看出, 美国涉华立法保持着强硬基调, 出台的众多法案以人权为借口、与贸易和技术制

裁相联结，这为其对外制裁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择。

（二）对中国实体展开直接制裁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美国对华制裁的理由从对本国国家安全的担忧逐渐向所谓保护人权、干预中国内政的方向扩张，频频针对中国实体出台措施。其中，美国针对中国公民个人的制裁主要集中于旅行禁令、资产封锁等措施，如将新疆地区有关官员列入特别指定清单。此类举措对中国有关人员的实质影响不大，更侧重对外宣誓和威慑价值。与制裁中国公民个人的形式价值相比，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兼具经济和政治目的。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制裁计划，美国依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屡次以商务部实体清单、财政部制裁名单（包含“特别指定国民名单”“综合制裁名单”“其他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名单”）、总统法令等手段，对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2022 年 6 月 17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强迫劳动执法办公室发布了首批“新疆棉事件实体清单”（UFLPA Entity List），以“强迫劳动”为由纳入了 31 家中国企业。2023 年 3 月 14 日，CBP 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为由进行执法，扣留了 3 237 批货物，总价值高达 9.61 亿美元^[19]。根据 OFAC 提供的 2009 至 2021 年的数据，美国国会通过了多项法律，对在香港和新疆的所谓“侵犯人权”行为负责人实施制裁。其中，22%的制裁与新疆有关，其余大多数与香港有关。同时，美国政府更多地依赖出口管制和海关限制对我国企业进行人权制裁。此类制裁举措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同时也给深陷困局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表 1 2020—2022 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代表性人权制裁

议题类型	时间	制裁实施情况
涉港人权制裁	2020-06-26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就所谓“香港问题”对中国相关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2020-06-29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即日起禁止美防卫装备出口香港，并限制美国防、军民两用技术出口香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发表声明，正式取消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
涉疆人权制裁	2020-07-09	以所谓“严重侵犯新疆少数民族的权益”为借口，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有关官员实施制裁，并将其列入 SDN 名单 ^[20]
	2021-06-03	美国商务部产业和安全局（BIS）以所谓“涉嫌侵犯人权”为由制裁 5 家新疆能源类企业。制裁措施包括列入“实体清单”和发布海关暂时扣留令 ^[21]
	2021-03-22	OFAC 以所谓“涉嫌非法拘押，人身虐待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为由制裁两名中方官员
	2021-12-16	OFAC 宣布将大疆等 8 家中国科技公司认定为中国军工复合体，并以所谓“涉嫌以生物识别技术区分种族，监视和跟踪中国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为由对其进行制裁。制裁措施为列入 NS-CMIC 清单，禁止美国投资者投资该类企业 ^[22]
	2022-03-22	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连同汤姆·蒂凡尼向众议院提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要求美国撤销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地位，并建议对中国的“人权报告”进行评估，以此判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2023-03-30	美国商务部将 5 家海康威视在新疆的子公司纳入实体清单主体，明确涉及美国外交利益的人权问题是增加实体清单的基本理由之一
涉藏人权制裁	2022-12-09	以所谓“涉嫌任意逮捕、迫害宗教和政治自由，以及在西藏自治区进行大规模拘留”为由，将两位西藏自治区前官员列入制裁名单 ^[23]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财政部网站）

(三) 针对第三国“人权事务”制裁中国企业

美国的制裁不仅管辖美国与目标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还管辖目标国与有业务往来的第三方国家的关系, 即包含“次级制裁”。OFAC 诬称: 中国企业在与第三方国家公司开展合作项目时, 涉嫌利用或指使第三方国家公司对合作对象的“强制劳动”, 或以第三方合作对象身份从事所谓“强迫劳动”, 且可能“违反”联合国公约关于防止使用暴力的要求。例如, CBP 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发布一项声明称, 依照 2017 年《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 扣押广州京德贸易有限公司及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口商品。其妄称这些企业的供应链“涉及朝鲜劳工”^[24]。5 家中国动漫制作和贸易公司因与受制裁的朝鲜主体开展项目合作和资金交易而被判定参与所谓“强迫劳动”; 2 家中国捕捞企业及分支机构被 OFAC 以参与非法捕捞和对船员“强迫劳动”为由实施制裁。这意味着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国企业, 并极有可能在今后更为频繁地对相关事实进行过度和歪曲解读, 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与初级制裁相比, 此类“次级制裁”明显超越了美国国内立法的管辖权, 具有明显的非法性, 还持续影响着全球化程度极深的跨国企业和经济实体, 是美国对华制裁政治工具化的典型代表。

三、美国对华人权制裁的法理批驳

美国对华大肆开展的人权制裁既不具备正当性, 亦不具备合法性。从正当性看, 此类制裁是一种有危害性的政治干涉, 也是对我国公民发展权、生存权的剥夺。从合法性看, 此类制裁是对 WTO 例外条款抗辩依据的滥用, 亦违背了不干涉内政与国家管辖权原则。

(一) 正当性批驳

正当性取决于人的价值判断, 是人价值范式的应用。当我们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正当时, 必须考虑它是否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伦理上、道德上是否可接受。国际社会, 国家主体的活动如缺乏正当性, 便会出现合法性危机。美国对华人权制裁显著缺失正当性。

1. 有危害性的政治干涉

从本质上讲, 制裁始终是为谋求国家价值和利益而服务的工具, 即使贴上“人权保护”的标签, 美国高压的制裁行为也没有达到其宣称的所谓“保护人权、促进民主”目的。

首先, 人权制裁会为摆脱多边体制限制的贸易制裁提供便利。在多边贸易体系发展过程中, 单边制裁已被套上“多边体制”的枷锁。有些国家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以“人权保护”为借口来反抗贸易制裁多边体制, 企图从世界贸易体制中获得制裁授权。此举不仅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 且对改善人权状况无益。

其次, 人权制裁并不能规避道德后果, 干涉他国的行为可能会对目标国的贫弱群体造成伤害。《2022 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显示, 美国作为实施单边制裁总数最多的国家, 目前仍对 20 多个国家实施制裁, 严重削弱了它们的人权保障能力与水平。美国以委内瑞拉政府“侵犯人权”和“反民主”为由, 签发行行政令制裁该国的石油、采矿业以及与马杜罗政府进行“腐败性交易”的个人和实体, 导致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自 2014 年到 2020 年, 委内瑞拉经济收缩了 75% 以上; 大部分消费品进口下降了近 95%, 约 96% 的人口处于贫困, 进而导致超过 30 万人由于缺乏药物和治疗而处于

危险之中^[25]。人权理事会曾表示：“单边强制措施是对落实《发展权利宣言》最大的障碍。”显然，对一个国家实施人权制裁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发展造成严重阻碍，直接损害当地经济，进而影响该国人权状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制裁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以各种名目实施的单边制裁，妨碍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制造并加剧人道危机，侵害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平民的基本权利，对国际关系的和谐稳定造成极大破坏，干扰国际经济、贸易、科技合作。”美国在主观上以自身的人权价值为基准判断目标国是否违反人权，利用“道义孤立”发起人权制裁，不仅有干涉内政之嫌，也加剧了目标国人权状况的恶化。

2. 剥夺被制裁国公民的发展权、生存权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 8 号一般性评论中强调，制裁往往会破坏平民工作和生活的能力^[26]。单边人权制裁行为侵犯了受制裁国人民的发展权和生存权。

其一是发展权。发展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带来的利益的权力。发展权的主体范围并不局限于人民个体，它同时也是国家主体和民族的集体人权。人权制裁首先危及的是个别企业及个人，但长期必将影响目标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甚至对目标国民众的生存发展产生直接破坏。2020 年 9 月 15 日，美国财政部制裁在柬埔寨进行“一带一路”有关项目建设的天津优联集团。美国财政部诬称，天津优联集团为了己私利，使用柬埔寨军队“恐吓村民、烧毁村庄”，严重侵犯了柬埔寨村民的人权^[27]。事实上，制裁天津优联集团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认定该项目用于中国军事，影响了美国主张的所谓“南海航行自由”。此次制裁实施后，大量就业岗位丧失，给柬埔寨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初心，是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共同发展。而美国的人权制裁严重阻碍了有关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侵害了有关国家的发展权。

其二是生存权。生存权是指公民享有维持其生活所必需的健康和生活保障权。联合国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汉和独立人权问题专家奥比奥拉·奥卡福尔的联合声明指出，自美国 2018 年重启并不断加码对伊朗制裁以来，伊朗在地中海贫血症药品的进口上受到了重重阻碍。尽管美方针对相关药品有所谓“制裁豁免”，但相关规定过于复杂，难以实施^[28]。因此，美国实施的人权制裁大量导致受制裁国国民生命安全、基本生活保障和健康水平受到影响，这些制裁措施因侵犯了生存权而不具有正当性。

（二）合法性批驳

正当性为合法性提供了法理根基，而合法性为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基础。针对美国人权制裁的合法性问题进行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第一，美国滥用例外条款而罔顾 WTO 等国际条约义务，严重冲击了国际规则秩序；第二，根据习惯国际法，美国人权制裁背离了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基本原则，且引发无限扩张的域外管辖权的国际法争议，即突破国家管辖权原则。

1. 滥用WTO例外条款作为抗辩依据

利用贸易等手段进行人权制裁是美国常用方式之一^[3]。国际法学者哈里森曾把国际贸易领域和人权相挂钩的立法和政策分为三大类型：附条件的贸易措施、履行人权义务的贸易措施、以合作为基础的与人权挂钩的贸易措施^[29]。其中，“附条件的贸易措施”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制裁性，即以他

国人权状况和表现为前提, 以限制进出口的手段对有关国家予以贸易制裁。此类措施最大的合法性障碍在于 WTO 体系下的《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其以非歧视原则作为核心原则。非歧视原则中的“无条件”要求各缔约国在不采取歧视性待遇的情况下, 在进出口上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美国作为 WTO 正式成员, 应自愿承担此条约义务。然而, 美国基于人权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 显然与“非歧视”原则所要求的“无条件”背道而驰。因为它包含了对那些“侵犯人权”的贸易进行限制, 从而形成贸易壁垒。被这些措施限制贸易的国家有权提出这种贸易壁垒与 WTO 相违背的申诉或抗议。此外, 人权制裁措施也会违反 GATT 第 11 条“禁止非关税壁垒”, 该条款禁止国家施加诸如进口和出口配额、许可证限制和禁运等非关税壁垒。而绝大多数人权制裁都依赖进口与出口非关税壁垒和许可证限制。可见, 在多边贸易体系内实施人权制裁缺乏合法性基础。

GATT 第 20 条 (a) (b) 款要求措施为维护公共道德、保障人民或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 该条款最有可能为人权制裁提供合法性依据。换言之, WTO 成员可潜在地依赖第 20 条 (a) (b) 款规定, 证明在出口国侵犯国际法上的人权时, 可针对该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实施进口限制。该条文 (e) 款规定的“与监狱囚犯产品有关的措施”也与人权制裁紧密相关。基于此, 美国辩称“保护人权、禁止酷刑和强迫劳动”的主张具有强烈的公共道德性质, 也体现保护人类生命健康的目的^[30]。鉴于生产者和生产环境的特殊性, 监狱囚犯产品往往被指责为强迫劳动。尽管 GATT 第 20 条列举了多种正当实施贸易限制的理由, 但它仍受到必要性要求(“保护所必需的”)和条文起首部分的限制。欧盟禁止海豹产品交易的判例中, 就阐释了以下评估措施必要性的标准: “必要性分析涉及一个‘权衡和平衡’一系列因素的过程, 包括目标的重要性、措施对该目标的贡献以及措施的贸易限制性。”^[31] 如果人权制裁的目标是促进目标国的人权, 首先要考虑 WTO 成员能否在其管辖范围之外强制执行其公共道德标准, 其次要审查人权制裁对实现所追求目标的贡献, 即评估目标国人权改善的证据。但针对侵犯人权的制裁已违反了 WTO 协定前言中的众多条款, 如提高生活水平和充分就业。还应注意的是, GATT 允许一国禁止他国进口囚犯劳工产品, 主要是基于对利用监狱劳工的国家在生产成本上会有不公平竞争优势的担忧。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也是美国单方面实施人权制裁所援引的理由之一。为了防止他国滥用人权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WTO 成员可以援引此条款实施限制措施^[32]。但要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特别是第 21 条 (b) 款 (iii) 项以实施人权制裁, WTO 成员方应证明这些措施是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 而且这些措施是“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状态下采取的”。“乌克兰诉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的报告表明, WTO 成员有权自主决定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情况下采取保护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措施, 但该自主权应当受限于“善意原则”。除此之外, 该条款对“紧急状态”界定的复杂性仍然存在。“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状态”不仅包括军事冲突, 还包括国家间的其他紧张局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国侵犯人权行为可以归属于这一例外。成员国以国家安全为由行使的自由裁量权, 再加上缺乏 WTO 争端解决机制, 导致“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美国宣称, 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是不可由法院审理的事项, 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的措施不受第 20 条“一般例外”附加的要求以及必要性、相称性的限制, WTO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无权审查其援引情况。

2. 违背不干涉内政和国家管辖权原则

在判断人权制裁措施是否违反习惯国际法时，国家实施制裁的意图和动机是评估重点。然而，确定制裁的意图十分困难，具体应讨论以下两点。

第一，考察美国的人权制裁是否违反“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载明于 1970 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得到了国际社会公认，已成为习惯国际法的基本禁止性原则。纵观美国采取的制裁措施，多数是单边法律性经济干涉和单边外交性经济强制^[33]。实施这两种情形的制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针对目标方的不法行为，二是采取非武力强制措施。虽然国际社会对前一种制裁的合法性仍然存在争议，但只要其不明显违背国际法原则，其他国家一般会默认合法。然而，美国对华人权制裁大多数构成“通过拒绝、控制方式来影响另一国获得该国的资源、资金、商品、服务、技术、市场”。如果美国对目标国个人或实体的侵害人权行为实施制裁，而相关被制裁行为又属于目标国内部事务，那么美国的制裁措施很可能对目标国的主权要素构成非强迫性干涉。在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这种以政治外交利益为出发点的干涉措施，显然与现有的国际法原则或国际社会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属于干涉他国内政。

第二，探讨美国的人权制裁是否符合国际法上公认的管辖权原则。美国人权制裁措施的核心在于具有“单边性”：一是它们的实施以国内法为依据，二是它们往往缺少来自区域或国际组织的预先授权。从涉及国家管辖权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看，美国过度扩大“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概念的边界，其管辖依据可能是犯罪行为发生在美国以及犯罪行为的后果及于美国，也即援引属地管辖权和保护性管辖权。由于国家管辖权原则属于不成文的习惯国际法，其适用往往要经过识别，这会产生一定的解释空间^[34]。而美国恰好利用解释空白，通过对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解释进行不一致的解读，为人权制裁法律域外适用的合法性背书，实质上是对“长臂管辖”的强化和升级。

四、中国应对美国人权制裁的现状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单边制裁，主要在立法和实践层面积极应对，应对方式逐步走向正式化、体系化。同时，在人权领域，我国也更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权事业，以应对美国的人权攻势。

（一）反制立法框架趋于完善

面对美国无端的非法制裁，我国从被动反馈逐渐走向积极应对，“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35]。在充分借鉴美国的出口管制清单、以欧盟为代表的阻断法体系以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反制裁法体系后，我国先后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以下简称《清单规定》）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简称《阻断办法》）。《清单规定》是对美国将大量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的正面反馈，具有较强的反制特点。其对象特定、反馈直接，对美国特定实体有较强的威慑作用。《阻断办法》侧重拦截美国对华初级制裁与次级制裁对我国国内实体产生的现实影响，直接阻止外国不当适用的法律发生效力^[36]。在此基础上，2021 年我国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被视为反制裁的更有力武器。该法在《清单规定》《阻断办法》及先前的反制裁实践基础上，为打击个别国家肆意非法制裁的恶劣行径提供了国内法依据。一方面，《反外国制裁法》建立了明确的反制清单制度。根据该法第 4 条规定，直接或者间

李燕飙, 许妙. 中美战略博弈下的美国对华人权制裁: 法理批驳与中国因应[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3): 166-180.

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具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 可能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反制清单, 这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反制裁措施的系统化、法制化。另一方面, 《反外国制裁法》授权有关部门对列入反制清单的当事方及关系方采取相关反制措施, 这为我国依法反制外国的无理制裁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撑和保障。

但与此同时, 上述法律法规宣誓性和授权性条款较多, 部分条款的可操作性仍需细化, 制度和机构之间的合作与衔接也亟待强化。具体而言, 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反外国制裁协调机制。《反外国制裁法》中并未直接规定执行措施的责任机关, 仅概括性地将实施权授予国务院各行政部门、检察院和法院, 这意味着具有执行权的行政部门较多, 可能会出现多头并管但主体不明的情况。假使以各部门颁行的法律法规作为采取反制措施的法律依据, 在实践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法律法规重叠或冲突问题^[37]。反观美国的制裁工作机制, 其设置了财政部下属的 OFAC 专门负责制定、实施对外经济制裁。此外, 《反外国制裁法》的诸多概念与机制的实际内涵尚较模糊、反制措施的原则性和框架性特征较为明显。该法第 6 条第 3 款的“禁止或者限制”、第 4 款的“其他必要措施”; 第 12 条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和“执行或协助执行”等反制裁核心概念均需要进一步解释细化。

(二) 积极开展人权反制实践

我国一贯反对任何不合法的单边制裁, 主张优先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我国也会对触及国与国之间正常交往底线的非法制裁行为进行有力回击, 实施对等反制。反制措施主要涉及在华资产、出入境许可及贸易限制三个方面。自 2020 年起, 中国外交部针对美国的人权制裁多次宣布进行反制。针对涉疆人权议题, 2020 年 7 月, 外交部宣布制裁美国“国会一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及 4 名美国人, 并指出“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横加干涉”。2021 年 3 月, 中方决定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等人实施反制裁措施, 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 冻结其在华财产, 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同其交易。《反外国制裁法》出台后, 我国反制裁工作的法律依据更为充分。2021 年 12 月, 外交部决定依据《反外国制裁法》针对在涉港人权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人员实施相应反制裁措施。2022 年 12 月, 针对美国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制裁两名中国官员, 中国决定对余茂春、托德·斯坦恩采取反制裁措施^[38]。

纵观我国当前的反人权制裁实践, 反制内容呈现从抽象到具体的趋势。2020 年 8 月 10 日, 针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几名美国人员的反制裁, 并未公布具体内容。2023 年 4 月, 由于美国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便利, 中国决定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采取反制裁措施, 禁止其负责人入境中国并限制大陆有关组织与其合作^[39]。从我国反制裁实效来看, 反制对象多为个人, 宣誓效应大于实质效果。

(三) 充分重视国际人权治理

当前, 我国正积极构建中国特色人权事业, 并将国内人权保障与国际人权对话相结合, 促进人权话语与人权实践形成良性互动。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1 年发布首部人权白皮书以来, 约有 65 部有关人权的白书记录了我国人权事业进程, 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权的现状与发展趋势。1998 年开始, 国务院也持续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及“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旨在对美国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做出回应。同时为响应《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倡导, 2009 年国务院颁布施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到目前为止, 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四期人权

计划，分阶段确定了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目标和任务，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同时，在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指引下，中国不仅有规划地推进人权话语体系的发展，也在积极引领国际人权治理。在应对美国单边制裁的过程中，中国不仅积极反制，还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向其他受制裁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帮助建设综合项目、提供物资、技术合作，并派遣医疗队和志愿者等。多年来，美国不断以民主变革为名践踏叙利亚的主权，大谈保护叙利亚的人权，并对其发动制裁。当叙利亚遭遇地震时，美国仍不放松对叙利亚的制裁，一味遵行“权力是政治活动主要动力”的现实逻辑，导致局势恶化。在此情形下，我国严厉敦促美国无条件取消所有的非法单边制裁，并紧急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五、中国进一步应对美国人权制裁的举措

为应对美国对华人权制裁，中国应继续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快完善反制裁涉外法治体系的建设，积极利用国际框架展开反制裁工作，强化国际人权话语体系建设，形成国内与国际、实践与话语共同编织的严密反制裁网络。

（一）加快完善反制裁涉外法治体系

《反外国制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连同商务部发布的《清单规定》《阻断办法》共同构成了中国反制外国制裁的基本法律和政策框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制裁法律体系。基于此，为更好地应对制裁风险，保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构建涉外法治体系，应从进一步完善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和推动国内法域外适用两方面展开。

其一，落实现有法律法规，完善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在立法层面上，一是颁布实施条例或发布解释，解决现存规则中的条文适用问题，如执法机构如何解释相关歧视性限制措施，以及哪些行为属于《反外国制裁法》所规制的范围等。二是强化制度规范，明确机构权责，尽快确定负责统筹和监督的协调机关，建立由外交部或商务部牵头的反制裁工作机制，确定具体的执法程序。在执行层面上，通过公开透明的执法实践提升反制裁的可执行性，让公众了解被采取措施的实体及具体措施，提升反制裁措施执行的透明度^[40]。此外，我国要在法律体系的实施中引导国际性大企业改变行为后果参数，敦促各实体重新审视过去基于西方人权制裁政策而建立的合规策略，寻找新的平衡点^[41]。

其二，推动国内法域外适用，构建涉外法治体系。目前，中国关于国内法域外适用的规则尚未系统化，分散在许多法律法规中。我国尚未对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条件、程序、方法和后果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应加强涉外立法，加快制定涉外立法战略规划，将域外适用规则化零为整。同时，在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密切相关的现行法律中加入域外适用的条款，着重关注国家安全、恐怖主义、人权等领域^[42]。此外，在执法和司法层面，应完善相应的行政、司法配套设施，设置跨部门协调机制，确保中国法律域外适用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跨国司法治理权，推动“攻防兼备”涉外法治体系的构建。

（二）积极利用国际框架展开反制裁工作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应充分利用国际法规则体系，以准确的法律语言表达诉求，并通过权威平

台及时、准确、充分地向国际社会宣布并阐释我国立场^[43]。首先, 作为应对人权制裁的合法性基础, 我国必须切实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以及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在应对破坏国际秩序、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人权制裁时, 我国应尽可能地团结多边主义力量, 争取并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共同反对借涉疆、涉港等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1 届会议上, 以 19 票反对、17 票赞成的结果, 拒绝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交的涉疆决定草案, 其中反对票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表示, 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以及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破坏人权对话与合作。同时, 我国也应呼吁国际社会确认现有制裁制度的基本要求, 包括制裁计划的强制性人权影响评估 (HRIA)、司法救济程序的有效性和人道主义豁免机制的考察。

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应继续积极利用联合国这一多边外交平台, 推动国际合作, 促使联合国大会针对美国单边人权制裁的合法性做出决议, 以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具体而言, 可以推动联合国通过决议阐明其不支持美国人权制裁的立场, 消除美国单边人权制裁的国际法基础。此外, 在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中, 不仅要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我国自身人权领域取得的成就进行阐述, 同时也要在普遍定期审议上对美国实施人权制裁而产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进行质询。值得注意的是, 结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的由特别报告员、特别代表、独立专家和工作组组成的特别程序, 应举荐更多的中国专家或人权专家担任报告员, 对美国人权制裁问题予以监督、审查、建议和公开报道, 推动中国支持的宣言或决议形成。

(三) 加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建构

政治即语言, 语言即政治。美国对中国人权的“他者”消极建构与中国“自我”的积极建构之间冲突不断, 二者在国际舞台中的人权话语博弈日趋白热化。与其他话语相比, 西方人权话语更具有作为政治符号的敏感性和伪善性, 被西方人权话语否定的行为往往会成为制裁借口。历史上, 西方国家多次以人权为借口颠覆政权、干涉内政。美国多次操弄“人权”话术, 利用所谓新疆棉花等事件炒作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侵犯人权”等谎言, 为发动人权制裁寻找借口。因此, 中国必须重视国际话语价值, 对西方人权话语霸权的解构应揭示其本质, 而不仅仅是其形式。同时, 应注重提升我国通过国际法话语同其他国家沟通的能力, 在人权议题的国际斗争中摆脱单纯的防御性状态, 敢于打舆论攻坚战, 主动向国内外媒体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中国也应在人权话语的框架内积极传播正面议题, 结合全媒体融合形式和非政府组织掌握议题设置和舆论导向的主动权, 以多语种、多平台的形式, 广泛宣传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突出成就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进程, 回击他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无理攻击和诋毁, 为国际人权舆论的积极发展作出贡献。在实践基础上, 打造区别于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人权话语, 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为理论基础的人权话语体系。

六、结语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治理体系亟待重塑。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际法规则下平等、互利、共赢的国际秩序。然而从实体清单到 OFAC 的制裁名单, 再到 UFLPA 清单, 美国对中国的人权

制裁数量空前提升,并有变本加厉之势,体现出美国政府对华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随着美国对《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等相关指南文件的细化,我国面临其新一轮大规模单边制裁的风险。当前,我国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取得新发展,涉外法治格局的形成正迎来关键时期。面对美国的人权制裁,我国应主动提出人权议题,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与发展,积极开展涉外法治体系的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反制裁法律体系,以反制裁立法、司法、执法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

参考文献:

-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B/OL]. (2022-10-07) [2023-01-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 [2]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he Treasury 2021 Sanctions Review [EB/OL]. (2021-10) [2023-02-15].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36/Treasury-2021-sanctions-review.pdf>.
- [3] 罗艳华, 庞林立. 美国人权制裁的新动态及其影响——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为例 [J]. 国际政治研究, 2019 (3): 9-37.
- [4] 魏泉泉. 美国单边人权制裁的国内运行机制与中国对等法律反制研究 [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21 (3): 72-85.
- [5] 李良才. 美国新贸易壁垒——人权制裁措施及应对 [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 (9): 106-109.
- [6] 王媛媛. 欧盟制裁机制的转型: 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的法律框架、运行机制及缺陷 [J]. 国际法研究, 2022 (3): 72-90.
-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N]. 人民日报, 2021-12-08 (1).
- [8] Hufbauer et al. Efficacy of Economic Sanction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3.
- [9] Jermano, J.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in U.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J]. PRISM, 2018 (4): 64-73.
- [10]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80. [EB/OL]. (1980-07-04) [2023-02-15]. https://legal.un.org/ilc/publications/yearbooks/english/ilc_1980_v2_pl.pdf.
- [11] COMBACAU, Jean. Sanctions,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M]. 1986: 337-341.
- [12] 凯尔森. 国际法原理 [M]. 王铁崖,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3.
- [13] 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 杰弗里·J·斯科特, 金伯利·安·艾略特, 等. 反思经济制裁 [M]. 杜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52.
- [14] 王孜弘. 意识形态与国际经济制裁——以人权与民主为政策目标的经济制裁浅析 [J]. 国际论坛, 2014 (4): 1-6+79.
- [15] Spencer Vuksic. Year in Review: 2022 Sanctions in 15 Charts [EB/OL]. (2023-01-10) [2023-02-15]. <https://www.castellum.ai/insights/2022-sanctions-year-in-review>.

李燕飙, 许妙. 中美战略博弈下的美国对华人权制裁: 法理批驳与中国因应[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3): 166-180.

- [16] 支振锋, 王博闻. 美国涉港立法及其制裁的合宪性问题 [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2(7): 66-84.
- [17] 张建, 朱晓易. 修例风波以来美国的涉港制裁: 效果评估与中国的反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1): 62-72.
- [18] 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 [EB/OL]. (2021-09-24) [2023-02-17]. 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58635262/6d54y9AgstFaJkusgyzqUt1M65PD4a4kRoApnLzvuNrLqakZ_YopAMyrrbkhZqB0ce_K9P_azkTqDX463mBdgfk2RWekEzbN5d1NuHOkUPnOL7Q.
- [19]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UFLPA Entity List [EB/OL]. (2022-06-21) [2023-01-25]. <https://www.Dhs.gov/uflpa-entity-list>.
- [20] Treasury Sanctions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onnection with Serious Human Rights Abuse in Xinjiang.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EB/OL]. (2020-07-09) [2023-02-15].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0070>.
- [21] Industry and Security Bureau. Addition of Certain Entities to the Entity List [EB/OL]. (2021-06-24) [2023-02-15].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1/06/24/2021-13395/addition-of-certain-entitics-to-the-entity-list>.
- [22] @Non-SDN Chines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ompanies (NS-CMIC) List Updates [EB/OL]. (2021-12-16) [2023-02-15].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financial-sanctions/recent-actions/20211216>.
- [23]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Sanctions Over 40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Across Nine Countries Connected to Corruption and Human Rights Abuse [EB/OL]. (2022-12-09) [2023-02-15].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155>.
- [24]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 Enforces 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 [EB/OL]. (2022-12-27) [2023-02-15]. <https://www.cbp.gov/newsroom/national-media-release/cbp-enforces-countering-americas-adversaries-through-sanctions>.
- [25]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EB/OL]. (2021-06-24) [2023-02-15]. <http://www.csis.org/analysis/why-venezuela-should-be-us-foreign-policy/priority>.
- [26] U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respect fo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B/OL]. (1997-12-12) [2023-02-15].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7a7079e0.html>.
- [27]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Sanctions Chinese Entity in Cambodia Under Global Magnitsky Authority [EB/OL]. (2020-12-15) [2023-02-15].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m1121>.
- [28] 无情、无理、无差别的残害——起底美国非法制裁危害伊朗民众生命健康 [EB/OL]. (2023-04-03) [2023-04-03]. <http://news.cctv.com/2023/04/03/ARTIkj7xdww06H5GKqRaPD76230403.shtml>.
- [29] James Harrison. The Human Rights Impact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Hart Publishing, 2007: 61.
- [30] 张辉. 单边制裁是否具有合法性: 一个框架性分析 [J]. 中国法学, 2022(3): 283-304.

- [3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Prohibiting the Importation and Marketing of Seal Products [EB/OL]. (2013-11-25) [2023-04-03].
- [32] 李良才. 单边人权贸易措施解释论——基于国家安全例外的考察 [J]. 社会科学论坛, 2010 (2): 35-39.
- [33] 简基松. 关于单边经济制裁的“司法性”与“合法性”探讨 [J]. 法学, 2007 (1): 80-87.
- [34] 凌冰尧. 美国次级制裁的合法性分析 [J].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20 (5): 106-119.
- [35]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 加强涉外领域立法, 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衔接配套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 [EB/OL]. (2022-05-30) [2023-02-17].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05/7635a4f3b6304f09a8ba37d82005c7c9.shtml>.
- [36] 汤诤, 廖挺. 阻断法的司法适用: 性质、效力与法律冲突 [J]. 法律适用, 2022 (7): 43-51.
- [37] 杜涛, 周美华. 应对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方案——从《阻断办法》到《反外国制裁法》 [J].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21 (4): 1-24.
- [38] 中方决定对余茂春、托德·斯坦恩采取反制裁措施 [EB/OL]. (2022-12-23) [2023-02-18]. http://www.news.cn/world/2022-12/23/c_1129228950.htm.
- [39] 关于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EB/OL]. (2023-04-07) [2023-04-07]. 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fzcqdc/202304/t20230407_11055802.shtml.
- [40] 霍政欣. 域外管辖、“长臂管辖”与我国法域外适用: 概念厘定与体系构建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 72-83.
- [41] 何为, 罗勇. 制裁与反制裁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 3.
- [42] 廖诗评. 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视野下的行政执法 [J]. 行政法学研究, 2023 (2): 55-67.
- [43] 霍政欣. 国内法的域外效力: 美国机制、学理解构与中国路径 [J]. 政法论坛, 2020 (2): 173-191.

责任编辑: 龚静阳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 表现、后果及中国应对

尚海明

（西南政法大学 人权研究院，重庆 401120）

摘要：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强迫劳动”议题的国际领导者，不断以强迫劳动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事实上，美国国内存在严重的强迫劳动问题，私营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便是其中之一。美国国内存在的严重强迫劳动问题，表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虚伪本质。美国移民拘留中心胁迫被拘留移民承担无偿清洁工作，参加“志愿工作计划”。不承担相关任务的移民将无法获得足够食物或生活用品，或遭受单独监禁等惩罚。相关企业利用美国移民拘留中心接近免费的劳动力获取暴利，但移民却难以获得及时的法律救济。面对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一方面，应引导国际社会增加关注，并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终止私营移民拘留中心的使用；另一方面，应推动联合国相关机构对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开展调查，推动设立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特别报告员或专家工作组，密切监测、分析美国移民拘留中心侵犯人权状况。

关键词：人权外交；美国强迫劳动；移民拘留中心；移民海关执法局；“志愿工作计划”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181-12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权外交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将对别国人权状况的判断作为是否与其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标准，并以此向其他国家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这其中，劳工人权议题是美国人权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不断利用该议题干涉他国

DOI：10.13946/j.cnki.jcqiis.2023.03.016

作者简介：尚海明，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涉疆民族、宗教问题研究”（22BMZ140）

引用格式：尚海明.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表现、后果及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 181-192.

内政^[1]。例如，美国近年来不断造谣污蔑，指责新疆地区存在大规模强迫劳动，并推动出台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对我国实施单边制裁^[2]。美国基于自身强大的话语塑造能力与舆论动员能力，甚至有意引导涉疆人权议题成为“社会运动”^[3]。事实上，自诩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劳动问题。在美国的农业生产、血汗工厂、移民拘留中心等领域，均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劳动问题。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侵犯人权现象近年来引发广泛关注。联合国前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 2019 年曾表示，对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拘留条件感到震惊，认为拘留中心的儿童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保健或食物，而且面临不良的卫生条件，并认为拘留移民儿童可能构成国际法所禁止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4]。除此之外，学界围绕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展开了众多讨论：批评美国大规模强制拘留入境移民^[5]，批评美国政府大量使用私营移民拘留中心，担忧美国在军工复合体之后再度形成“移民产业复合体”^[6-7]，关注移民拘留中心内部存在的侵害移民健康权^[8-9]、儿童权利^[10]、酷刑等问题。相比之下，学界对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问题关注较少。对此，本文以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分析美国国内存在的严重强迫劳动问题，揭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虚伪本质。

一、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及其侵犯人权的基本情况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是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海关执法局（ICE，下文简称移民海关执法局）设立，用来关押非法入境美国移民的专门机构。移民海关执法局截获非法进入美国国境及需要被驱逐出境的移民后，通常会将这些人羁押于移民拘留中心。这部分移民将在此等待移民法庭的排期审理。

（一）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基本情况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拘留体系。1980 年，平均每天有近 2 000 人被拘留在移民拘留中心。至 1990 年，移民拘留中心规模扩大了两倍多，拥有近 7 000 个床位。近些年，移民拘留中心规模更是急剧扩大，2018 年移民海关执法局全年累计拘留近 40 万人，平均每天有 4.2 万人被羁押于移民拘留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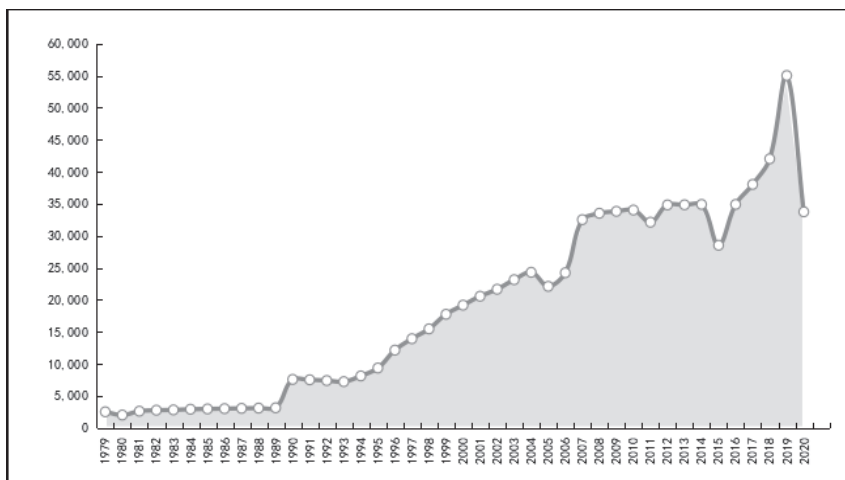


图 1 1979—2020 年美国移民拘留中心每日平均拘留人数变化情况^[11-12]

尚海明.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 表现、后果及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81-192.

针对移民拘留的性质, 移民海关执法局称: “移民海关执法局不会因为惩罚性的原因进行拘留, 移民拘留纯粹是为了等待个人移民案件的解决或执行驱逐令。”^[13] 然而, 虽然移民拘留被认为是不具有惩罚性的民事拘留, 但移民海关执法局的绝大多数拘留设施, 包括由政府 and 私人公司运营的拘留设施却由监狱和类似监狱的设施组成。被拘留的移民事实上生活在类似监狱的监禁系统之中。

美国有公共服务外包的传统^[14], 在移民海关执法局超过 200 处的拘留设施中, 近 80% 由私营企业运作。美国惩教公司 (CCA, 成立于 1983 年) 和 GEO 集团 (成立于 1984 年) 是美国最大的两家私人监狱公司, 两家公司近 30% 的收入来自于移民拘留业务^[15]。这些公司向移民海关执法局承诺, 以较低价格提供与公共部门相同的服务, 说服政府将移民拘留业务私有化, 而压缩成本的最重要方式就是降低被拘留移民的人权保障水平。

(二) 美国私营移民拘留中心对人权的侵害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尤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移民拘留中心严重侵犯人权现象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6-17]。移民拘留中心侵犯人权现象已被广泛报道, 包括对移民的虐待和性侵犯, 移民拘留期间死亡, 低劣的饮食与医疗保障水平, 缺乏获得法律援助的途径, 等等。

有报告指出, 移民拘留中心存在针对移民的系统性虐待, 形式包括殴打、喷胡椒喷雾和单独监禁等^[18]。从 2010 年 1 月到 2016 年 7 月, 美国国土安全部共收到 33 126 起关于性侵犯和虐待的投诉, 但只调查了其中 570 起^[19]。“自由移民组织”统计发现, 自 2003 年至 2017 年 5 月, 至少有 185 名移民在拘留期间死亡^[20]。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称, 在 2015 年至 2022 年期间, 有多达 72 名移民在拘留中心死亡^[21]。在一次针对 7 000 多起庇护案件的审查中, 三分之一的寻求庇护者报告说, 他们在拘留中心的生活条件和医疗待遇很差。其中, 反映食品和饮用水问题的占 61.8%, 反映卫生问题的占 34.5%, 反映失眠、过度拥挤、禁闭、温度过低等问题的占 45.6%^[22]。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调查报告证实了以上情况。报告指出, 移民拘留中心存在“重大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包括在拘留室中使用绞索, 不适当和过于严格的隔离, 对拘留者医疗照顾不足”, “拘留中心不能充分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 饮用水发绿、有粪便味道, 食物变质或过期等”^[23]。

二、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的表现形式

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乔治亚州和科罗拉多州, 美国惩教公司和 GEO 集团正面临至少 6 起与强迫劳动有关的集体诉讼。本文从这些正在推进的诉讼以及大量有关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的新闻报道中, 大致梳理出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情况。

(一) 移民拘留中心的志愿工作计划与强迫劳动

所谓“志愿工作计划” (Voluntary Work Program), 是由移民海关执法局于 1950 年推动的一项活动。根据移民海关执法局的规划, 被拘留的移民可通过志愿工作计划在拘留中心内部从事诸如餐饮服务、洗衣服务、理发服务、医疗服务和油漆服务等工作。作为交换, 拘留中心需为工人提供每 8 小时 1~2 美元的工资。移民可以用这笔钱在拘留中心购买食品、个人卫生用品、付电话费等。在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对外文件中, 被拘留者应自愿接受工作, 不得有任何强制。然而, 如“公民自由联盟”所言: “这个项目应该是自愿的, 但被拘留者的经历说明了它的强制性。”^[24] “自由移民

组织”也指出：“志愿工作计划这个名称具有误导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实际上意味着强迫劳动。”^[25]“志愿”工作在实践中演变为强迫劳动，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通过剥夺被拘留者食物或基本生活用品的方式强迫其参加志愿工作计划。玛莎·冈萨雷斯（Martha Gonzalez）在得克萨斯州的移民拘留中心被关押了 14 个月，她在获释后便以强迫劳动为由将美国惩教公司告上了法庭。玛莎·冈萨雷斯指出，美国惩教公司运营的移民拘留中心像一个“奴隶劳役营”，它们将被拘留者视为“奴隶”，强迫其参与工作。为强迫被拘留者工作，移民拘留中心威胁将他们单独监禁，并剥夺他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在移民拘留中心，如果被拘留者请假，工作人员就会拒绝为他提供牙膏等生活用品。即便在生理期，玛莎·冈萨雷斯也要工作，否则工作人员会限制她使用卫生用品。她曾因未获得每天 1 美元的报酬提出投诉，却受到了不能继续参加“志愿工作计划”的报复。玛莎·冈萨雷斯指出，如果没有每天 1 美元的收入，她就没钱购买日用品，甚至无法给她的女儿和母亲打电话^[26]。该案件现已被法院认定为集体诉讼，玛莎·冈萨雷斯将代表从 2007 年 2 月 20 日起在美国惩教公司所运营的拘留设施中从事志愿工作计划或无薪劳动的移民进行诉讼。

玛莎·冈萨雷斯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美国惩教公司运营的斯图尔特拘留中心，巴里恩托斯（Barrientos）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在该拘留中心，工作人员拒绝为移民提供充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巴里恩托斯曾因厕纸用完向工作人员求助，但美国惩教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而是建议他用手指清洁。为了换取牙膏、食物、衣服、电话卡等生活必需品，巴里恩托斯在拘留中心参加了志愿工作计划，负责为被拘留的移民准备食物和清洗餐具^[27]。该案目前已被认定为集体诉讼，巴里恩托斯代表过去 10 年间在斯图尔特拘留中心参加志愿工作计划的被拘留者向美国惩教公司提起诉讼。

事实上，被拘留者无法获得充足生活用品的现象在各移民拘留中心广泛存在。在劳尔·诺娃（Raul Novoa）诉 GEO 集团的案件中，被拘留的移民指出，由 GEO 集团经营的拘留中心存在通过剥夺被拘留者生活用品的方式强迫被拘留者参加志愿工作计划的情况^[28]。被拘留的移民被迫接受每天 1 美元的志愿工作计划，以换取卫生纸、牙膏、食物等必需品。“公民自由联盟”对乔治亚州四个移民拘留中心的调查发现，拘留中心普遍存在食物供给不足的情况，很多被拘留者体重迅速下降^[29]。通过剥夺食物或生活用品的方式强迫被拘留者参加志愿工作计划，已成为拘留中心强迫劳动的重要手段。

其二，以单独监禁或转移到“鸡舍”为威胁，强迫被拘留者参加工作。除克扣生活用品外，拘留中心还会采取其他手段威胁被拘留者。在斯图尔特拘留中心，被拘留者手册明确将“鼓励他人参加罢工或拒绝工作”列为严重违纪行为，如被拘留者拒绝工作、组织停工或参与停工，将可能遭受不超过 30 天的单独监禁等多项惩罚。来自孟加拉国的肖伊布·艾哈迈德（Shoaib Ahmed）在斯图尔特拘留中心参加了志愿工作计划。在 2017 年的一天，艾哈迈德被斯图尔特的工作人员施以单独监禁，原因是他威胁罢工。艾哈迈德回忆说，他仅仅说了一句“明天不上班”便被单独监禁 10 天。他在单独监禁期间感到头部剧烈疼痛，并想大声喊叫，但他知道，在拘留中心大声喊叫也是一种违规行为，会延长他单独监禁的时间^[30]。被关押在乔治亚州拘留中心的祖尼加（Eduardo Zuniga）在厨房工作时膝盖韧带撕裂，医务人员建议祖尼加休息。然而，美国惩教公司的警卫用单独监禁威胁他，“如果不去报到换班，就会被单独监禁”^[31]。相关诉讼信息显示，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以上两个拘留中

心, 也存在于 GEO 集团运营的阿德尔托拘留中心以及美国惩教公司在德克萨斯运营的拘留中心。除此之外, 拒绝工作的人还有可能被转移到较差的房间居住。这一类房间被移民称为“鸡舍”, 非常拥挤且不卫生, 许多“鸡舍”的淋浴甚至只有冷水。

(二) 移民拘留中心的无偿清洁政策与强迫劳动

除志愿工作计划外, 移民拘留中心的无偿清洁政策也涉嫌强迫劳动。根据移民海关执法局的规定, 被拘留的移民在拘留中心有保持内务清洁的基本义务。这具体包括整理自己的床铺和物品, 保持自己房间的地板没有杂物, 不乱悬挂衣服、照片等^[32]。然而, 多个针对移民拘留中心的诉讼指出, 美国惩教公司和 GEO 集团不仅要求移民保持内务清洁, 还强迫被拘留移民无偿清洁整个移民拘留中心。

在科罗拉多州的奥拉多拘留中心, GEO 集团制定的纪律手册明确规定, 每一个被拘留者都需要参加拘留中心的卫生计划, 对整个移民拘留中心进行清洁。对于拒绝参加该计划的人而言, 他们可能会遭受最长 72 小时的单独监禁、警告、训斥等惩罚。亚力翰卓·梅诺卡尔 (Alejandro Menocal) 便曾经被关押在该拘留中心。他向法院陈述说, 他刚进入拘留中心时, 值班警卫便告诉他, 他需要承担无偿清洁工作。如果不做这些工作, 就会被关进隔离室。在被拘留的那段时间里, 他亲眼看到至少有 10 人因拒绝做清洁工作而被关进隔离室^[33]。美国惩教公司也有着同样的卫生政策: “地板要每天清扫和拖洗” “碗筷和水槽要每天清洁” “淋浴和地板要每天拖洗” “所有的家具都需要每天除尘, 必要时打扫” “所有的垃圾都要每天倒空” “窗户每周清洗一次” “所有的门每天都要擦拭” “所有的设备每天都要除尘或清洁”^[34]。

西尔维斯特·奥维诺 (Sylvester Owino) 和乔纳森·戈麦斯 (Jonathan Gomez) 于 2017 年将美国惩教公司告上法庭。两人此前曾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拘留设施中。他们代表所有被拘留在美国惩教公司运营的拘留中心并承担无偿清洁任务的移民提起诉讼, 寻求损害赔偿。奥维诺指控说, 美国惩教公司强迫被拘留者承担清除垃圾、擦窗户、扫地和拖地、擦洗马桶、水槽和淋浴器, 以及整个设施的其他清洁责任, 这违反了联邦和州有关禁止强迫劳动的法律规定^[35]。

(三) 志愿工作计划与无偿卫生政策均已构成系统性强迫劳动

1930 年通过的《强迫劳动公约》指出, 强迫劳动是指“以任何惩罚相威胁, 强迫任何人从事非本人自愿的一切劳动或服务”^[36]。美国内战结束后通过的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也明确规定: “除作为对当事人已被正式定罪的罪行的惩罚外, 奴隶制或非自愿奴役不应存在于合众国境内或其管辖的任何地方。”^[37] 被拘禁在移民拘留中心的移民属于民事拘留而非刑事拘留, 这些在等待移民诉讼的人应当受到美国宪法保护, 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事实上严重违反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不仅如此, 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还严重违反了美国《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

《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的强迫劳动条款指出, 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或下列方式的任何组合提供或获得的劳动或服务均构成强迫劳动。其一, 对该人或另一人以武力、武力威胁, 人身约束或人身约束威胁的方式。其二, 以严重伤害或者以严重伤害相威胁的方式对该人或者另一人实施。其三, 以滥用或威胁滥用法律或法律程序的方式。其四, 通过任何计划或模式, 意图使该人相信, 如果该人不执行该劳动或服务, 该人或另一人将遭受严重伤害或身体约束。在此, 严重伤害不仅包括身体伤害, 也包括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或者名誉上的伤害。对移民拘留中心而言, 拘留中心对被

拘留者实施的单独监禁已经构成了明确的身体约束。单独监禁以及转移到“鸡舍”等不安全、不卫生的居住环境，会对被拘留者造成身体、心理伤害。拒绝提供充足生活用品，可能导致被拘留者饥饿、体重下降，构成身体、心理伤害。被拘留者基于对以上措施的恐惧参与拘留中心的劳动项目，已明显构成强迫劳动。

强迫劳动系统性地存在于美国的私营移民拘留中心。在西尔维斯特·奥维诺（Sylvester Owino）诉美国惩教公司一案中，该公司的管理人员承认，各个拘留中心没有能力选择退出这些全公司范围内的标准政策。这意味着，具有强迫劳动性质的卫生政策是在全美国范围内普遍实施的^[38]。在劳尔·诺娃（Raul Novoa）诉 GEO 集团案中，原告同样声称 GEO 集团有一个统一的“卫生政策”，所有被拘留于 GEO 集团运营的拘留中心的移民都被实施了强迫劳动。如“自由移民组织”所言，我们非常确定，除了那些已经提起诉讼的拘留中心，强迫劳动同时在其他数十个设施中发生，但被关押在移民拘留所的人害怕会因为投诉遭到报复，更不用说提起诉讼了^[39]。

三、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的后果

相关企业借助志愿工作计划和无偿卫生政策，极大地降低了移民拘留中心的运营成本，而被胁迫参与劳动的移民却难以获得法律的及时救济。

（一）相关企业依靠强迫劳动获取暴利

美国惩教公司和 GEO 集团是美国最大的两家移民拘留承包商。根据两家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官方文件，美国惩教公司 2021 年的收入超过 16.9 亿美元，而 GEO 集团的收入超过 22.6 亿美元。这两家公司近 30% 的收入都来自于移民拘留^[40-41]。每天 1 美元的志愿工作计划及无偿卫生政策支持下的强迫劳动，为拘留中心带来巨大利润，为两家企业赢得大量政府合同。

根据移民海关执法局的规定，被拘留者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0 小时。但实际上，这些规则未被遵守。移民被迫参加工作，却只能获得每天 1~2 美元的收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杰奎林·史蒂文斯（Kumar Savannah）指出，每天 1 美元的工资如此之低，以至于我们所提出的“移民拘留中心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这一说法都很不恰当。当一方实际控制接受工作指令的另一方，而让工作选择和工资条件都不可协商时，将这 1 美元称之为“奴役工资”可能更为恰当^[42]。

2017 年，美国民权委员会曾呼吁国会解决移民拘留中心虐待劳工行为，并要求所有被拘留者获得公平的工资^[43]。然而，国会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相反，18 名共和党议员联合发文为移民拘留中心辩护，认为在每天 1 美元工资的情况下让被拘留的移民参加劳动，能够有效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44]。美国惩教公司发言人对指控其公司“通过强迫移民劳动获利”的说法表示反对。他认为：“志愿工作计划不会也从未打算取代合同要求的人员配备和服务，该计划没有带来任何成本节约。”^[45]他还声称，志愿工作计划有利于被拘留者，因为这可以减少懒散、提高士气，减少拘留中心的违纪行为。美国惩教公司的这一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杰奎林·史蒂文斯研究发现，通过向奥拉多拘留中心的被拘留者每天支付 1 美元——远低于每小时 7.25 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和科罗拉多州每小时 9.3 美元的最低工资，GEO 集团每年将节约超过 400

尚海明.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 表现、后果及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81-192.

万美元。他进一步指出, GEO 集团在 2012 年通过强迫劳动增加了约 3 300 万至 7 200 万美元的利润, 美国惩教公司增加的利润约为 3 000 万至 7 700 万美元^[46]。麦迪逊·保利 (Madison Pauly) 也对奥拉多拘留中心进行了分析。他指出, 根据 GEO 集团与移民海关执法局签订的包含联邦工资法规的合同, 奥拉多拘留中心允许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 10.9 美元。如果 GEO 集团雇佣拘留中心外的人员来做这项工作, 公司将支付每人每天近 76.3 美元, 整个拘留中心每月的工资和福利支出将超过 125 000 美元。以上还未考虑到移民拘留中心所实施的无偿清洁政策^[47]。美国 In These Times 杂志评估认为, GEO 集团和美国惩教公司通过让被拘留者参与劳动, 在 2018 年到 2022 年间共节省了 2.65 亿美元开支, 平均每年节省超过 6 600 万美元^[48]。

在通过志愿工作计划及无偿清洁政策降低成本的同时, 移民拘留中心还高价售卖生活用品, 将发放给移民的工资再次收回。移民参加志愿工作计划将获得每天 1~2 美元的工资, 但这些钱并不能取现, 而是计入移民的个人账户, 用于在移民拘留中心购买肥皂、牙膏、食物、衣服、电话卡和其他必需品。大量报道指出, 移民拘留中心内部的物品价格是周边物价的数倍。如在加州的一个拘留中心, 一罐金枪鱼的价格是周边商店的 4 倍, 一块香皂价格是 2.44 美元, 而周边商店只要 1 美元^[49]。在此, 移民拘留中心建立了一个精妙的内部平衡系统, 利用不充足的物资供应胁迫被拘留者参与工作, 以此降低移民拘留中心的人力成本与物资支出, 并通过高昂的物价将支付给移民的工资再次回收。

(二) 遭受强迫劳动的移民难以获得相应救济

不论是《世界人权宣言》还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废止强迫劳动公约》, 都严厉禁止奴隶制和强迫劳动。美国政府已批准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同样禁止发生在移民拘留中心的侵犯人权行为。然而, 美国政府在拘留中心强迫劳动问题上始终持暧昧态度, 遭受强迫劳动的移民难以获得相应救济。

其一, 移民海关执法局放纵私营移民拘留中心侵犯人权。联合国人权专家莉莲·波比 (Lilian Borea) 在 2019 年指出, 将移民相关拘留设施的管理服务外包给私营服务提供方会产生极大的侵犯人权风险, 这尤其表现在移民拘留设施私有化带来的问责和补救方面。莉莲·波比认为, 各国义务对私营拘留设施进行监督和监测, 采取妥善措施进行补偿和补救, 以保护被剥夺自由者的权利^[50]。监督缺失是美国私营移民拘留中心显著存在的问题。美国移民正义中心的研究报告将移民海关执法局的监督系统讽刺为“合规剧场”。移民海关执法局在对拘留中心进行年度检查前, 会预先通知相关拘留中心, 这无疑是允许拘留中心提前隐藏证据, 纵容移民拘留中心侵犯移民人权。2009 年以后, 美国联邦法律禁止移民海关执法局与任何连续两次未能通过年度检查的拘留中心继续签订合同。但数据显示, 在过去几年中, 只有两家拘留中心获得了“不合格”评级, 而且之后都通过了第二次检查^[51]。除此之外, 国土安全部监察部门发现, 即便移民海关执法局发现了拘留中心的违规行为, 也很少对承包商施加经济处罚。相关报告显示, 在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 移民海关执法局发现了数千起危及被拘留者安全和权利的违规行为, 但并未对相关机构进行任何处罚^[52]。

其二, 移民难以获得足够的司法救济。美国私营移民拘留中心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侵犯人权行为受到广泛谴责, 但不论是移民海关执法局, 还是美国惩教公司和 GEO 集团, 一直在试图掩盖真相, 移民事实上难以获得足够的法律救济。早在 1990 年, 16 名被拘留的移民就曾指控移民管理机构违反

了《公平劳工标准法》。然而，法院最终裁定被拘留的移民不被视为雇员，不受该法保护。1997 年，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一案件中裁定，被拘留的移民在拘留设施中的劳动并不构成强迫劳动，因为这是被拘留者的“公民义务”^[53]。除此之外，美国许多地方法院的判决也都将移民在拘留中心的工作视为“家务”，认为这是移民在拘留期间应承担的义务，而不是强迫劳动^[54]。自 2014 年 9 名奥拉多拘留中心的被拘留者对 GEO 集团提起诉讼始，两大公司已经接到了超过 6 项集体诉讼，指控他们管理的移民拘留设施中的强迫劳动违反了《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但目前看来，受到强迫劳动的移民能否胜诉仍不确定，美国国会可能在这些大公司的游说下修改《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将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排除在法案管辖之外。美国极为冗长繁琐的司法程序事实上也极大影响了移民获得及时救济。

其三，美联邦政府并未真正下决心改变移民拘留中心现状。一直以来，GEO 集团等花费大量金钱游说联邦政府继续与其签订合同，而这显然取得了效果^[55]。2009 年，奥巴马曾承诺要改变私营移民拘留中心的现状，将移民海关执法局的拘留体系转变为“真正的民事拘留系统”^[56]，但这些承诺并没有落实。特朗普政府更是大量增加移民拘留中心数量，拘留人数连创新高。拜登在总统竞选中一再表示“强烈反对使用营利性拘留中心拘禁移民，任何企业都不应当从逃离暴力的绝望者的痛苦中获利”^[57]，但拜登执政后所发布的逐步取消与私营监狱合同的行政命令并不适用于私营移民拘留中心。拜登上台后，对移民政策进行了适度调整，但移民海关执法局仍很快与私营监狱公司签署了超过 2.6 亿美元的新合同^[58]。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研究发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81%的被拘留者关押在私营拘留中心，到拜登执政时期，这一数据仅下降到了 79%，并未降低对私营移民拘留中心的依赖^[59]。

四、中国揭露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问题的具体举措

现有证据已能充分证明，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内部存在针对移民的系统性强迫劳动，大量外国移民在拘留期间遭受了强迫劳动。但面对如此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美国政府却缺乏足够意愿终止这一违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负有监管责任的移民海关执法局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并未认真对待过拘留中心的系统性强迫劳动，而美国的司法系统也没有给予移民足够支持。面对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问题，我国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引导国际社会关注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劳工权利保障的“国际典范”，并自封为打击强迫劳动的“国际领导者”，以“强迫劳动”为借口采取各种手段干涉他国内政。事实上，美国自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劳动问题。但截至目前，美国国内的强迫劳动问题尚未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对此，我国应加强议题设置能力，充分使用新闻媒体、学术研究、国际会议等渠道，揭露美国强迫劳动的事实真相，并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对美国私营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的关注，让外界真正了解美国社会强迫劳动真相，解构其“人权教师爷”的虚假权威。

（二）呼吁美国政府终止对私营移民拘留中心的使用并彻查强迫劳动罪行

强迫劳动主要发生在私营移民拘留中心，究其原因，是私营移民拘留中心对利润的追求。对此，

尚海明.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 表现、后果及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81-192.

应推动国际社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其切实遵守国际人权规范, 终止与私营移民拘留中心的合同。同时, 呼吁与美国惩教公司、GEO 集团等存在业务联系的企业终止与此类公司的业务联系, 以促使其放弃移民拘留业务。要求美国政府彻查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问题, 并对外公布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的具体情况, 包括强迫劳动问题的存续时间、涉及人数、强迫手段, 以及移民拘留中心借助强迫劳动的盈利情况等。

(三) 推动联合国相关机构对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开展调查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问题, 均已违背了相关国际条约。对此, 应推动禁止酷刑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等联合国人权条约机制对美国移民拘留中心进行审查。同时, 应推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移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 单边强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 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等介入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的调查。应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议题列入届会议程, 由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进行讨论。

(四) 推动人权理事会任命关于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特别报告员或专家工作组

设立特别报告员或专家工作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监督、解决一国人权问题的重要手段, 如俄乌战争爆发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先后设立了乌克兰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 以及俄罗斯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调查俄乌战争期间可能出现的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针对美国移民拘留中心问题, 应推动人权理事会设立美国移民问题特别报告员或专家工作组等监督机制, 常态化监测、分析美国移民拘留中心侵犯人权状况, 并推动解决移民拘留中心强迫劳动问题。

参考文献:

- [1] 靳晓哲. 美国对新疆的人权污名化及其逻辑 [J]. 人权, 2022 (3): 172-194.
- [2] 李捷. 美国对华政治极化与涉疆虚假人权叙事 [J]. 当代传播, 2021 (4): 69-73.
- [3] 郑亮. 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 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93-101.
- [4] 联合国. 人权高专巴切莱特对美国移民和难民拘留中心的条件表示震惊 [EB/OL]. (2019-07-08) [2023-03-0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7/1037731>.
- [5] Philip L. Torrey. Rethinking Immigration's Mandatory Detention Regime: Politics, Profit, and the Meaning of Custody [J].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 2015 (48): 879-914.
- [6] Karen Manges Douglas & Rogelio Sáenz. The Criminalization of Immigrants & the Immigration-Industrial Complex [J]. Daedalus, 2013 (142): 199-227.
- [7] Tanya Golash-Boza. A Confluence of Interests in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How Politicians, the Media, and Corporations Profit from Immigration Policies Destined to Fail [J]. Sociology Compass, 2009 (3): 283-294.
- [8] Hamilton, Kimberly R. Immigrant Detention Cen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J]. Berkeley La Raza Law Journal, 2011 (21): 93-132.
- [9] Tania Penovic. Privatised immigration detention servic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mplementing human rights [J]. Law in Context, 2014 (31): 10-47.
- [10] 欧阳贞诚. 美墨边境“无人陪伴儿童”移民潮的特征、缘起与影响 [J]. 美国研究, 2023 (1): 58-81.
- [11] Carl Takei, Michael Tan. Shutting Down The Profiteers: Why and How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hould Stop Using Private Prisons [EB/OL]. (2016-09) [2023-03-05]. <https://www.aclu.org/>

- sites/default/files/field_document/white_paper_09-30-16_released_for_web-v1-opt.pdf.
- [12] Altaf Saadi, Maria-Elena De Trinidad Young. Understanding US Immigration Detention Reaffirming Rights and Addressing Social-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J]. Health Hum Rights, 2020 (1): 187-197.
- [13] Carrie Johnson. Justice Department Will Phase Out Its Use Of Private Prisons [EB/OL]. (2016-08-18) [2023-03-07]. <http://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6/08/18/490498158/justice-department-will-phase-out-its-use-of-private-prisons>.
- [14] 张鲁萍. 美国公共服务外包的演进轨迹及其启示 [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7 (4): 94-101.
- [15] Private prison industry shifts focus to immigrant detention centers [EB/OL]. (2022-06-21) [2023-03-07]. <https://www.opensecrets.org/news/2022/06/private-prison-industry-shifts-focus-to-immigrant-detention-centers-funding-immigration-hawks/>.
- [16] 美国侵犯难移民人权问题的真相 [N]. 人民日报, 2023-03-31 (16).
- [17] 邓江江. 民主的暗色: 美国非法移民拘留营报告 [D].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2017.
- [18] Sheriff's Office Staff at Glades County Detention Center Pepper Spray, Assault, and Throw Men into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Retaliation for Complaint [EB/OL]. (2021-03-04) [2023-03-11]. <https://www.freedomforimmigrants.org/news/shut-down-glades-ctkmn>.
- [19] Merton R, Fialho C, Sexual Abuse, Assault, and Harassment in US Immigration Detention Facilities [EB/OL]. [2023-03-11].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a33042eb078691c386e7bce/t/5a9da297419202ab8be09c92/1520280217559/SexualAssault_Complaint.pdf.
- [20] Detention: A Death Sentence? [EB/OL]. [2023-03-11]. <https://www.freedomforimmigrants.org/medical-neglect>.
- [21] Brazilian asylum-seeker who died by suicide held in horrific conditions [EB/OL]. (2022-09-01) [2023-03-05]. <https://sourcennm.com/2022/09/01/brazilian-asylum-seeker-who-died-by-suicide-held-in-horrific-conditions-attorneys-say/>.
- [22] A. J. Fischer, P. Gonzalez, and R. Diaz. There is no Safety Here: The Dangers for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Other Disabilities in Immigration Detention at GEO Group's Adelanto ICE Processing Center [EB/OL]. (2019-03) [2023-03-07]. https://www.immigrationresearch.org/system/files/There_Is_No_Safety_Here-min.pdf.
- [23] Sherman, Samantha. Defining Forced Labor: The Legal Battle to Protect Detained Immigrants from Private Exploitation [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21 (5): 1201-1245.
- [24] ACLU. Prisoners of Profit: Immigrants and Detention in Georgia [EB/OL]. (2012-05) [2023-03-08]. https://www.prisonlegalnews.org/media/publications/georgia_aclu_prisoners_of_profit_immigrants_and_detention_in_georgia_2012.pdf.
- [25] Victoria Law. Corporations Are Profiting From Immigrant Detainees' Labor [EB/OL]. (2018-05-29) [2023-03-01]. https://inthesetimes.com/features/ice_immigrant_detention_centers_forced_prison_labor_investigation.html.
- [26] Gonzalez v. CoreCivic, Inc., No. 1: 18-CV-169 [EB/OL]. (2018-02-22) [2023-03-07].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6314158/gonzalez-v-corecivic-inc/>.
- [27] Barrientos v. CoreCivic, Inc., No. 4: 18-cv-00070-CDL [EB/OL]. (2018-04-17) [2023-03-07].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6384840/barrientos-v-corecivic-inc/>.
- [28] Novoa v. GEO Group, Inc., No. 5: 17-cv-02514-JGB-SHK [EB/OL]. (2018-03-05) [2023-03-07].

尚海明.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 表现、后果及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81-192.

-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6244853/raul-novoa-v-the-geo-group-inc/>.
- [29] ACLU. Prisoners of Profit: Immigrants and Detention in Georgia [EB/OL]. (2012-05) [2023-03-08]. https://www.prisonlegalnews.org/media/publications/georgia_aclu_prisoners_of_profit_immigrants_and_detention_in_georgia_2012.pdf.
- [30] Barrientos v. CoreCivic, Inc., No. 4: 18-cv-00070-CDL [EB/OL]. (2018-04-17) [2023-03-07].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6384840/barrientos-v-corecivic-inc/>.
- [31] Sherman, Samantha. Defining Forced Labor: The Legal Battle to Protect Detained Immigrants from Private Exploitation [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21 (5): 1201-1245.
- [32]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Performance-Based National Detention Standards 2011 [EB/OL]. [2023-03-15]. https://www.ice.gov/doclib/detention-standards/2011/pbnds_2011r2016.pdf.
- [33] Menocal v. Geo Group, Inc., No. 1: 14-CV-02887-JLK [EB/OL]. (2018-02-09) [2023-03-07].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4196461/menocal-v-the-geo-group-inc/>.
- [34] Owino v. CoreCivic, No. 3:17-cv-01112-JLS-NLS [EB/OL]. (2022-06-03) [2023-03-07].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6127721/owino-v-corecivic-inc/>.
- [35] Owino v. CoreCivic, No. 3:17-cv-01112-JLS-NLS [EB/OL]. (2022-06-03) [2023-03-07].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6127721/owino-v-corecivic-inc/>.
- [36] 李雪平. 国际法上的强迫劳动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规范效用 [J]. 经贸法律评论, 2022 (3): 1-17.
- [37] 张业亮. 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漏洞”为“强迫劳役”提供法律依据 [J]. 世界知识, 2022 (21): 66-67.
- [38] Owino v. CoreCivic, No. 3:17-cv-01112-JLS-NLS [EB/OL]. (2022-06-03) [2023-03-07].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6127721/owino-v-corecivic-inc/>.
- [39] Victoria Law. Corporations are Profiting from Immigrant Detainees' Labor [EB/OL]. (2018-05-09) [2023-03-04]. https://inthesetimes.com/features/ice_immigrant_detention_centers_forced_prison_labor_investigation.html.
- [40] The GEO Group Reports Fourth Quarter and Full Year 2021 Results [EB/OL]. (2022-02-17) [2023-03-04].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220216006284/en/The-GEO-Group-Reports-Fourth-Quarter-and-Full-Year-2021-Results>.
- [41] CoreCivic Reports Fourth Quarter and Full Year 2021 Financial Results [EB/OL]. (2022-02-09) [2023-03-04].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22/02/09/2382279/0/en/CoreCivic-Reports-Fourth-Quarter-and-Full-Year-2021-Financial-Results.html>.
- [42] Jacqueline Stevens. One Dollar per Day: The Slaving Wages of Immigration Jail, From 1943 To Present [J]. 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 2015 (3): 343-371.
- [43] 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Concerned with Alleged Abusive Labor Practices at Immigration Detention Centers [EB/OL]. (2017-12-21) [2023-03-05]. <https://www.usccr.gov/files/press/2017/12-21-PR.pdf>.
- [44] These GOP Lawmakers Say it's Okay for Imprisoned Immigrants to Work for a \$1 a Day [EB/OL]. (2018-03-16) [2023-03-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8/03/16/republican-congressmen-defend-1-a-day-wage-for-immigrant-detainees-who-work-in-private-prisons/>.
- [45] Thomas Ferraro. Raising a \$1-a-Day Wage Seems Like a No-Brainer [EB/OL]. (2022-07-21) [2023-03-03]. <https://inthesetimes.com/article/dollar-a-day-wages-immigration-detention-geo-corecivic-congress>.

- [46] Jacqueline Stevens. One Dollar per Day: the Slaving Wages of Immigration Jail From 1943 To Present [J]. 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 2015 (3) : 343-371.
- [47] Madison Pauly. How a Private Prison Company Used Detained Immigrants for Free Labor [EB/OL]. (2017-04-03) [2023-03-03]. https://www-motherjones-com.translate.goog/politics/2017/04/geo-forced-labor-lawsuit/?_x_tr_sl=en&_x_tr_tl=zh-CN&_x_tr_hl=zh-CN&_x_tr_pto=sc.
- [48] Thomas Ferraro. Raising a \$1-a-Day Wage Seems Like a No-Brainer [EB/OL]. (2022-07-21) [2023-03-05]. <https://inthesetimes.com/article/dollar-a-day-wages-immigration-detention-geo-corecivic-congress>.
- [49] Katherine Hignett. ICE Detainees Who Earn \$1 a Day Can't Afford \$11 Toothpaste on Sale at Private Detention Center [EB/OL]. (2019-01-18) [2023-03-06]. <https://www.newsweek.com/ice-detention-center-immigration-adelanto-stewart-1297597>.
- [50]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移民问题背景下的国家外包私营安保公司引发关切 [EB/OL]. (2019-12-20) [2023-03-06]. <https://www.ohchr.org/zh/stories/2019/12/concerns-over-states-contracting-private-security-companies-migration-situations>.
- [51]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Cut The Contracts: It's Time to End ICE's Corrupt Detention Management System [EB/OL]. (2019-08-05) [2023-03-05]. <https://immigrantjustice.org/research-items/policy-brief-cut-contracts-its-time-end-ices-corrupt-detention-management-system>.
- [52]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ICE Does Not Fully Use Contracting Tools to Hold Detention Facility Contractors Accountable for Failing to Meet Performance Standards [EB/OL]. (2019-08-05) [2023-03-07]. <https://www.oig.dhs.gov/sites/default/files/assets/2019-02/OIG-19-18-Jan19.pdf>.
- [53] Booth Jonathon. Ending Forced Labor in ICE Detention Centers: A New Approach [J]. 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 2020 (3) : 574-611.
- [54] Cambridge. Jamila S. Land of the Free?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Forced Labor in U.S Immigrant Detention Centers [J]. Howard Law Journal, 2020 (3) : 405-430.
- [55]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Two Companies Dominating The Prison Industry [EB/OL]. (2012-06-23) [2023-03-07].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heres-what-you-need-to-know-about-the-two-companies-dominating-the-prison-industry-2012-6>.
- [56] Nina Bernstein, U.S. to Reform Policy on Detention for Immigrants [EB/OL]. (2019-08-05) [2023-03-05]. <https://www.nytimes.com/2009/08/06/us/politics/06detain.html>.
- [57] Biden Vowed to Close Federal Private Prisons [EB/OL]. (2021-11-12) [2023-03-05]. <https://www.cnn.com/2021/11/12/politics/biden-private-prisons-immigration-detention-centers-invs/index.html>.
- [58] 李庆四, 许鸿波. 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J]. 美国研究, 2022 (2) : 132-159.
- [59] Private Prison Corporations and Immigration Detention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EB/OL]. (2021-10-07) [2023-03-05]. https://www.aclu.org/sites/default/files/field_document/2021.10.07_private_prisons_and_ice_detention_blog-factsheet_003.pdf.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年第3期 总第39期 第7卷

双月刊 2023年5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何晓栋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微信公众号

定价：20.00 元